



---

# 中共党史人物传

---

## 第二十三卷

---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

## 第二十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9 字数 2) \$, 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11, 800

统一书号: 11094•144 定价: (平)1. 75元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 目 录

陈 赓 .....	穆 欣 ( 1 )
张叔平 .....	李 吉 ( 91 )
昌绍先 .....	吴德才 (106)
朱锡昂 .....	钟优武 陈欣德 (117)
欧阳洛 (毛春芳) .....	左招祥 宋俊生 (133)
李敬銓 .....	刘明义 (147)
黄公略 .....	方大铭 谢秉忠 (158)
吉国桢 .....	张守宪 董建中 王少民 (186)
曹大骏 .....	陆泉生 曹茂銓 (201)
张 英 .....	周庆本 丁献良 (221)
杨重远 .....	张守宪 李艳玉 (238)
李青云 .....	曾庆圭 (255)
陈海松 .....	刘国东 (272)
理 琪 .....	王文泉 李肇年 (292)
张际春 .....	王宗柏 (307)
马 林 .....	刘景泉 (340)

中共党史人物傳

陳雲為宣



陈 赓



张 叔 平



昌 绍 先



朱 锡 昂



欧阳洛（毛春芳）



李敬铨





黄公略



吉国桢



曹大骏



张英



杨 重 远



李 青 云



陈海松



理琪



张 际 春



马 林

# 陈 赓

穆 欣

## 火 红 的 青 春

陈赓，原名庶康，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他的祖父出身贫寒，幼年就去从军，以善于打仗、机智勇敢闻名于当时。祖父常给陈赓讲述作战的故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湖南人当兵的多，陈赓由于幼年受到祖父的影响，养成勇敢倔强的性格；加上反对包办婚姻，和父亲发生了冲突，一九一六年，年方十三岁，高小尚未毕业时，就报名参加湘军鲁涤平部六团二营当兵。他在这支旧军队中忍受种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将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造套筒枪拖了四年，才由二等兵升至上士。因他在学校里读过书，性格勇敢豪爽，受到士兵们的尊重。他置身于军阀部队的底层，亲身体验到军阀部队中打骂士兵、克扣军饷的重重黑幕；连年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祸，战场上遗尸遍野，民间十室九空，使他对这种军队生活逐渐感到憎恶。陈赓当年在东山学堂学习时，曾在进步教员引导下，读了一些进步书报，与新兴的社会思潮有所接触，懂得一点儿“列国强，我国弱，列国富，我国贫”的道理，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抱负。他

面对着这样的军队生活，头脑中不禁浮现出“自己当兵究竟为了什么”的疑问，觉得在这种祸国殃民的军队里当兵，对于国家民族毫无益处，亟想早日离开。

一九二一年，陈赓十八岁的时候，在军阀内战中，他所在的那个团被吴佩孚的军队打败。团长离开军队，谋到了一个粤汉铁路湘局局长的差事，并且将护送他从岳阳到长沙的陈赓，安排在铁路局当办事员。从此，陈赓就一面在铁路局做事，一面进各种补习学校和夜校，顽强刻苦地进行自学。他还努力学习英语，培养自己将来成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才。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加无已，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高涨。陈赓到长沙后，曾经参加青年救国会等进步的群众团体，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到街头检查、抵制日货，积极从事反帝的爱国运动；还参加了由于湖南省长赵恒惕杀害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所引起的罢工风潮。他曾进过自修大学，同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有了密切的接触，得到何叔衡、郭亮、姜梦周等的帮助，政治觉悟日益提高。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他十九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陈赓曾沿长江旅行，到过武汉、九江、上海等地，看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里盛气凌人、欺侮国人的情况，深感愤慨。他在上海曾到进步的上海大学旁听，思想上进一步受到影响。不久，他又回到湖南。这时，长沙的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爱国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陈赓立即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积极参加了湖南各界声援“二七”惨案所进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曾当选为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日本水兵一九二三年在长沙制造枪杀中国同胞的“六一”惨案，激起中国人

民的愤恨，反日运动进一步开展，陈赓参加了这一运动，并曾因此受伤。现实生活使他日渐意识到，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进行革命斗争要想取得胜利，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

不久，孙中山的大本营决定在广州创办陆军讲武学校。这年十一月间，派人到长沙招生。党组织决定选派一批党团员去学军事，因陈赓当过兵，便要他去报考。当时，湖南是在反动军阀赵恒惕统治下，考试是秘密举行的。几天之后，他被口头告知已经录取。由于粤汉铁路还未修通，陈赓便联络了十几个人，于十二月下旬绕道上海转往广州。他们到广州时，讲武学校尚未办起来，过了一些日子，才在北校场正式开学。这个学校虽然名义上隶属革命政府，却仍因袭旧军阀部队的陈腐作风，管理方法采取封建专制的高压手段，要求学生绝对盲从，军阀味道十足，没有一点革命气氛。陈赓在这里感到压抑，非常失望。

这个时候，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共产党人积极帮助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这年春天，开始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为校址设在黄埔，所以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干部帮助创立这所学校，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和叶剑英、聂荣臻等，都在黄埔军校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和教员。陈赓和讲武学校的一些共产党员，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考取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最后讲武学校亦并入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不久，在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领导



下，成立了以蒋先云为书记的第一个中共支部，陈赓任支部的候补干事。党支部经常领导校中党、团员同校内外的国民党右派周旋。陈赓还和学员中一些共产党员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经常自编自演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并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白花剧社”唱对台戏。

陈赓在军校学习了七个月，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毕业，被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他在学习期间曾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一九二五年五月又参加了扑灭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战斗，都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在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变前几天，被指挥部派往珠江北岸侦察敌情，靠着出众的机智和勇敢，突破种种艰险，完成了任务。六月十二日东征军发动进攻，陈赓又率领他的连队渡江，一气打到北校场。这次平叛胜利，使广东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在六月十九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中，他曾被派往省港罢工委员会，参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暗杀，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积极捉拿凶手。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广东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陈赓这时在夺取惠州战斗中有殊功的第四团当连长。这个团是由黄埔军校组成的，全团十二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战斗力特别强。在夺取惠州的激烈战斗中，陈赓冲锋在前，带领部队最先攻上城头。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脚，他拔出弹头继续冲杀。十月十四日傍晚，国民革命军终于全歼陈炯明最精锐的部队。在从惠州继续东进潮（州）梅（县）途中，陈赓带领的连队，被调到东征军的总指挥部担

任护卫。

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和师长何应钦率领第一师攻克海丰。当时陈炯明叛军主力林虎部集中在华阳，而靠近总指挥部行动的东征军第三师，是由粤军改编的，师长谭曙卿不探听虚实，未作周密部署，于二十七日冒然向华阳前进，与敌遭遇。敌强我弱，众寡悬殊，打到中午，林虎以大部兵力包围过来，谭师陷于苦战。蒋介石赶去督战，也未能挽回危局，谭师全线崩溃。眼看敌人逼近过来，蒋介石心慌腿软，走不动路，狼狈地拔出手枪想要自杀。陈赓见状，急忙连拖带背地把蒋介石拖了好几里路，直到一条河边，上了船，脱离了险境。第二天，陈赓又冒着无数艰险，日以继夜地连续跑了一百六十多里，赶到后埔，送信给周恩来、何应钦，由一师派部队去把蒋介石接了回去。

起初，蒋介石不晓得陈赓是共产党员，对陈赓的救命之恩表示十分感谢，并想借此拉拢，将陈赓调作侍从参谋，可以随便进出他的住处。东征军打下汕头后，总指挥都住在崎庐，蒋介石住一楼，陈赓跟周恩来住在二楼。有一天，陈赓在蒋介石的桌子上，发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名册。翻开一看，见共产党员的名字上头都有一个红圈，对陈赓还有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陈赓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给他写个条子，辞职不干，看他如何处置？”次日，陈赓就托词母亲病重，写了个条子请假回家。蒋介石看过条子，狡黠地问：“不是吧？你看了我什么东西了吧？”陈赓没有吭气。过了一晚，蒋介石叫人送来了船票、路费和一张“委任状”：“委任陈赓为中央军官学校中校队长”。陈赓随即离开汕头，回到广州。

一九二六年三月，黄埔军校第四期开学，陈赓任步科第一团第七连连长。他是中共黄埔军校支部领导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曾经领导群众跟军校内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五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党务整理案》。此案通过后，蒋介石强迫黄埔军校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共产党内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竟然也劝共产党员退党，“作国民党左派”。陈赓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蛊惑，打定主意终身作一个共产党员，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分，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十余万人开始北伐。陈赓被派在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彭泽湘）。北伐誓师不久，陈赓接到党中央调派他去苏联学习的通知。陈赓非常高兴，稍作准备，便秘密离开广州，经由上海前往苏联。他在莫斯科住了十几天，即到伯力乡下红军中学习保卫工作；又到海参崴红军中学习暴动经验和爆破技术，历时三个多月。

## 历史的岔路口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陈赓刚从苏联回到上海，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指示他前往南昌。陈赓到南昌后，曾在北伐军总司令部见到蒋介石。蒋介石暗中已经磨刀霍霍，积极准备着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大屠杀，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对陈赓虚与委蛇。陈赓在南昌还看到了蒋先云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等，他们都说：“蒋介石快叛变了”，要他赶

快离开南昌，到武汉去。

陈赓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三月间到达武汉。通过上层统战关系，派他到唐生智军部特务营任营长。这个特务营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共约千把人，大都是由富有革命传统的安源工人组织起来的，军官中共产党员很多，士兵的政治素质也很好，武器装备都是新式的。按照党组织的决定，陈赓还直接指挥着武汉市工人纠察队。他用这些力量保卫着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叛变革命。四月二十七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赓出席了大会，并以他所掌握的这些武装力量保障了会议的安全。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集团也正式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刹时间，革命的武汉成了反革命的根据地，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这时，何键看中了陈赓这个特务营的新式机关枪，派遣部队逼迫陈赓只身离开；原来掌握在陈赓手里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下令缴械。

陈赓越过长江的险风恶浪，从汉口过江来到武昌。党的工作虽已转入地下，周恩来仍在那里。七月下旬，陈赓跟随周恩来乘船秘密到达九江，七月二十七日秘密抵达南昌，住在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以后搬进马桩子女子职业学校，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这里是前敌委员会的指挥中心，一同住在这里的还有李立三等。八月一日起义时，陈赓在总指挥部担任保卫工作。他跟李立三等连夜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且接管了江西省银行，把没收的大批钱财用汽车运往总指挥部参谋团。

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陈赓此时调到贺龙第二十军的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跟部队一起向广东

进发。他随部队经过抚州、瑞金前往会昌。反动军阀钱大钧的部队却先到了会昌。八月十四日，起义军先头部队第三师一到会昌附近就和敌人接了火。陈赓带领全营由正面一气攻下三个山包。由于原计划在两翼发动攻击的部队没有准时赶到，陈赓他们变成孤军深入。这时敌人派四个团前来堵截，从早晨八点钟打到中午，我军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占压倒优势的敌人疯狂出击，我军弹尽援绝，渐渐支持不住，十一时许便向后撤退。

撤退时走在部队最后面的陈赓，下午一点钟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胫骨、腓骨都被打折，不能行动。他见敌人追来，忙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条野草丛生的沟里。腿上的血一直在流，把沟里的水都染红了。跟着他的卢冬生从山上跳下来照顾他。敌人迫近时，他劝卢冬生快走，但卢冬生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机警地藏入附近的草丛中。在敌人经过时，他们躲过了搜查。过了两三个钟头，叶挺的部队反攻上来，把敌人赶走，会昌已被我军攻占。陈赓由卢冬生等抬到城里，见到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等许多同志。此刻重逢，格外亲切。

部队继续前进，未照原计划直下寻邬、梅县，改向福建的汀州（长汀）、上杭一带。陈赓因伤势严重，乘船前往，途中又经历了不少风险。在汀州福音医院，陈赓得到傅连璋医生的治疗。接着又乘船沿韩江南下，进军东江，于九月二十三日攻占潮州后随军入城。不久，他被送往汕头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但是日本陆战队和英国水兵都在这时制造借口，强行登陆，替国民党军队开路。九月三十日我军从汕头撤走时，周恩来曾派人送款子来，结果没有送到。日本人的态度恶劣，向陈

赓下了逐客令。多亏有个护士李小姐和一个工人偷偷把他们藏起来，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以后又帮助陈赓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李小姐一直把陈赓送到船上，并且帮他对付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盘查。

陈赓坐的这条太古公司的轮船，是我军在汕头失败后经汕头开往香港的第一条船，到香港后巡捕上船进行严格的盘查，陈赓机智地对付过去。船上本有我们许多同志，大都设法迅速离开了。等他艰难地上岸时，已找不见一个熟人。陈赓就和卢冬生在马路边坐着。香港巡捕用棒子乱赶，不准在街上停留。他们曾住进一家旅馆，但许多人围上来看“从汕头跑来的红军”。他怕受盘查时编造的“故事”失灵，赶快从旅馆出来，又坐黄包车到一家医院要求治疗，被医院拒绝。他想要找个地方混过一些时间，便到一家中医那里挂了个号。医生发现他是打仗受伤的，便又逼着他出去。走投无路，卢冬生只好背他到路边一个厕所里去坐，才得到片刻休息。陈赓是个乐观的人，什么艰难都压不倒他。这时肚里咕噜咕噜直叫，抬头见不远处有家西餐馆，他就和卢冬生开玩笑说：这会儿能弄顿西餐来吃多好啊！卢冬生为人忠厚老实，真的跑到西餐馆要了一份西餐。店员端着饭菜跟随卢冬生走到厕所跟前，张望了一下坐在里边的陈赓，不仅饭没给吃，反而骂了他们一顿。

陈赓身上有二十块钱，想用它作路费到上海去找党，正好打听到有船马上要去上海。他先被开汽艇的老板敲了竹杠，接着外国人也不卖票给他，后来得到一个工人的帮助，才得成行。那位工人不但帮忙买到船票，又找来一张行军床，和卢冬生一起把陈赓抬到货舱里。舱里左边堆的香蕉，右边堆的是桔子，行军床就藏在里面。轮船离开香港，要先绕到汕头停泊一

下，上人装货。汕头当时还在戒严，一片白色恐怖。陈赓刚刚从汕头逃出来，现又要折回这里，不禁心中一阵紧张。

船刚靠岸，又有起义军的许多同志上船来了，其中还有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他是被敌人抓住后又逃出来的，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他张船票。他一上船，就挟着一张烂席子走到货舱里。此时，陈赓正躺在那里看报纸。他见周逸群进来，非常惊喜，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上的消息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周逸群起初吓了一跳，但立刻就听出这是陈赓的声音，两个人都笑了。

###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陈赓和周逸群、卢冬生乘船到达上海，已是十月中旬。他们很快找到了党中央。党组织了解到陈赓的伤势严重，设法将他送进有名的牛惠霖医院医治。牛惠霖曾留学英国，和他曾在美国留学的弟弟牛惠生都是骨科医生。他们的医术高超，在上海很有名望，国民党“党国要人”和有钱的阔佬都找他们治病。他们是宋庆龄的亲表兄弟，政治思想倾向进步，一向同情革命。宋庆龄素来爱护黄埔军校的进步师生，又是这次南昌起义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这一点，牛惠霖是知道的。所以，当他得知陈赓是南昌起义中的伤员，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上海求医时，便精心治疗，保住了陈赓多处负伤的腿，从此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陈赓动手术后很快发现医院里住有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在他快治愈的一天，有个认识的国民党团长突然到病房看他，并且盘问他的经历。那人离去以后，陈赓当机立断马上搬出医院。这时，卢冬生已随同

贺龙、周逸群等前往湘西去发动游击战争了。

在陈赓住院治伤期间，根据周恩来的倡议，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成立了中央特科。这是一个专为保卫上海党组织的安全而设立的政治保卫机构。一九二八年四月，陈赓受伤的腿尚未痊愈，走起路来还一拐一拐时，就遵照党的决定，化名王庸，担任特科的情报科长。从此，他在上海日夜与中外反动派、国民党特务及党的叛徒作斗争。经过他和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很快就在上海和党的各个活动地区，建立了秘密工作的网点；改变了党在白区的活动方式；建立和健全了秘密工作的制度、纪律；同时选派了优秀的共产党员深入虎穴，打进敌人机要部门，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取情报；并在敌人专业的反共领导机关建立了反间谍关系，从而为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控制上海敌人侦探机关打开了局面。那时，陈赓争取了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为特科工作，通过他又和租界英美特务头子挂钩，同巡捕房建立了密切关系；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进敌人的最高特务指挥机关，钱壮飞作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能够掌握中统特务组织的全部机密。

这个时期，陈赓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他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的两年当中，曾经搬过五次家，先后在霞飞路、辣斐德路、保定路等地住过。他身临地下斗争的前哨与敌人拚搏，随时准备与可能遇到的敌人格斗，夜里睡觉时都把手枪压在枕头下面。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不但经常变更住址，还要时常改变自己的身分，变换自己的形象。好在他自幼擅长辞令，会说很多方言，在学校里演过戏，扮演过各种角



色。他在上海工作的这几年，时而西装革履，象是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戎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冒充敌特捕房的“蟹脚”；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又似巨商大贾的模样。陈赓平常爱穿长衫，有时到工厂里工作，又改穿工人服。当时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工作的张克侠将军，曾经回忆一九三〇年间在上海同陈赓见面的印象说：“陈赓同志来时是化了装的，他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象上海的‘小开’，一进门便高声招呼，十分亲切。他英姿焕发，诙谐善谈。我先已听说他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问他伤势是否严重，伤口是否复原。他立刻当场表演起来，一会纵情跳跃，一会又蹲屈腿，显示他的伤腿已经彻底痊愈。我们交谈彼此的见闻和感受，十分和谐。”<sup>①</sup>陈赓置身龙潭虎穴，在错综复杂而又极其尖锐、残酷的隐蔽斗争中，公开和敌探特务周旋。由于他沉着、机敏，敌人对他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见面时全都很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那时，不论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场所，或是外国侵略者的租界巡捕房，必要时陈赓都可以进出。有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现场，情况异常紧急。陈赓也正在那里。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他灵机一动，站了出来，立即同那些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充当“蟹脚”，独自把守着一个出口，悄悄地将一些党员放走。他依靠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着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某些探目特务，

---

<sup>①</sup>张克侠，《秘密的岗位》，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1981年9月出版。

甚至还掌握了个别在蒋介石左右的人。

由于“知己知彼”，能够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上海党的秘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曾有多次，党的机关眼看要被破坏了，由于事先知道了敌人的缉捕，终于得以化险为夷。有的时候，有些同志被捕了，陈赓和特科的同志们仍能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或者通过同情我们党的社会人士进行援救，想方设法把被捕的同志从牢里救出来。任弼时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上海被捕、关向应一九三〇年春天被捕以后，先后经过特科的努力，都在较短的时间获释。

陈赓根据党的指示，经常单枪匹马，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敌人的心脏，严厉地惩治那些背叛党、危害革命的叛徒。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由于叛徒何家兴夫妇的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英租界被捕，四月十八日引渡给国民党后，二十一日未经任何审讯即被枪杀。四月二十五日凌晨，陈赓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带领红队镇压了叛徒何家兴，制止了叛徒进一步出卖党组织的罪恶活动，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一九二八年八月，又因叛徒白鑫的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五人在上海被捕，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于八月三日被敌人杀害。陈赓和特科的工作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细致的侦察，摸清了叛徒的全部情况及其活动规律，又经周密部署，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当白鑫畏惧特科的追踪，正要动身逃往国外避风时，陈赓和红队队员一起，把这个大叛徒击毙于他在当时藏匿的霞飞路和合坊四十三号门前，并将策动白鑫叛变后充当其保护人的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

员范争波击伤、其弟范争洛击毙。这件大快人心的案件，立即震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极力封锁，第二天报道此事的中国报纸都开了天窗；但第三天（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几十种中外文报纸冲破封锁，全在显著地位绘声绘色地报道了镇压叛徒白鑫的详情。有的报纸使用红色标题，说是“东方唯一的大暗杀案”。

陈赓的活动，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又恨又怕，千方百计地想捕捉他，杀害他，曾为他的头颅悬了巨额的赏格，却无法找到他的踪影。实际上，那时候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没有发现他就是陈赓，不晓得他就是他们日夜谋算的那个共产党人。

那时候，由于陈赓和特科的其他同志在已夺取的阵地上，不断地扩大战果，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宪兵队、党部以及社会上的帮会、地痞、流氓、租界里的包探、巡捕当中，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和同情者或被我们所利用的关系活动着，随时能在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等各个方面，为我党提供非常及时而有价值的情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关系，不仅消息灵通，而且常能办成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有次一位同志外出，身上带的重要文件，不慎在电车上被窃，特科就利用在流氓里面的关系去找，结果不出两天，就把文件找回来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在中央特科主持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严重地威胁着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这时在南京特务头子徐恩曾那里作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当天夜里接连看到武汉发给“徐恩曾亲译”的六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及时知道了顾顺章叛变的详情，连夜派人赶到上海，经过陈赓报告给周恩来（第二天钱壮飞也赶到上海）。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当机立断，马上召集陈赓、李强等有关

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了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侦察到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可能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带领情报科全体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这样，抢在敌人行动之前，一天之内完成了领导机关的大转移，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

四月二十七日，顾顺章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顾顺章除供出党的机密，还布置了一个一网打尽中共中央机关的大阴谋。徐恩曾立即派人带领大批特务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但因迟了一步，全部阴谋都落空了<sup>①</sup>。

顾顺章叛变以前，和顾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陈赓。周恩来在疏散有关同志先后离开上海的时候，叫陈赓立即隐蔽起来。这年六月，陈赓和陈养山等到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同年九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去工作。

### 严峻的考验

一九三一年十月初，陈赓来到鄂豫皖苏区，被任命为中国

---

<sup>①</sup>顾顺章叛变后，据传于1934年被国民党杀掉。

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十一月，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的时候，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师长。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集中全力攻击南线敌人盘踞的黄安。此役历时四十三天，无日不战，最后攻占该城，歼灭敌第六十九师，活捉敌师长赵冠英。陈赓率十二师对黄安城担任主攻任务，协同各兄弟部队英勇战斗，作出贡献。接着，四方面军又在潢川地区连续痛击国民党军队。一九三二年二月杜傅店一战，红军以十二个团的兵力，连续击溃了敌人十九个团的二十多次进攻，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敌主力第二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陈赓率领红十二师，以惊人的行军速度赶来参加战斗，与敌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肉搏战，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同年六月潢（川）光（山）战役中，陈赓率领红十二师包围双柳树，以大部兵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盘踞村中的敌一个旅发起攻击，另以一个多团的兵力隐蔽集结在双柳树以东、环山以北地区，虚留北面不围，诱敌突围时予以追歼。经过激战，最后在敌逃跑时，将其全部歼灭，敌旅长也被击毙。当时任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事后回忆双柳树之战的时候说：这次战役的部署，“表现了陈赓同志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当时，我们三个团对付敌人两个团，其兵力对比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况且敌据守于工事之内，强攻硬打不易奏效。采取‘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战法，诱敌撤离既设阵地，这就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打下基础。”<sup>①</sup>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攻中连获四战四捷的巨大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敌人。敌人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亲任鄂豫皖

---

<sup>①</sup>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第165页。

“剿匪”总司令，调集大军马上又开始第四次围攻。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四方面军开始向黄（陂）麻（城）地区敌人进攻时，陈赓率十二师曾于十八日中午一举攻占黄陂以西距汉口仅五六十里的仓子埠，歼敌一部，没收食盐万余斤，前锋进逼黄陂，武汉为之震动。八月七日，敌各路军对鄂豫皖发起了总围攻。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陈赓奉令率部先行出动迎敌。在冯寿二地区，与敌先头部队卫立煌纵队李默庵第十师遭遇。徐向前亲自率领后续部队跑步上前支援，经激战后将敌击退，歼敌副师长王劲修以下两千余名，将敌打退。这时陈继承纵队正向七里坪开进，四方面军主力转向七里坪击敌，与敌展开空前激战。敌第二师被打垮，六名团长悉数毙命，战场上敌尸纵横，遍地皆是。在战斗中，陈赓率十二师协同兄弟部队，冒着炽烈炮火和敌机的轮番轰炸，向敌展开猛烈反击。他们前仆后继，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的指战员与敌肉搏十余次，连续手刃敌军，血染战衣，刺刀为之钝挫，仍奋不顾身地坚持战斗。这场恶战结束时，陈赓说：“七里坪之战，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以后许世友也说：“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斗”<sup>①</sup>。

稍后，我军又向新集以北胡山寨转移，陈赓率部在胡山寨与敌激战三日。九月五日，陈赓右腿膝盖处负了重伤。但他不愿离开火线，继续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给全师指战员以很大鼓舞。

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攻未能获胜，一九三二年十

---

<sup>①</sup>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月十二日，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越过平汉铁路西进。这时，陈赓的伤势日益加重，行动困难，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十月末尾，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之间，陈赓化装成商人模样，右腿一拐一拐地离开部队。他在南阳地区，曾经两次遭民团盘查，险些出事；经过郑州时，又在旅馆里碰到一个曾是黄埔一期同学的国民党军官，靠着他的机智，全都安然度过危险。

十一月间，陈赓来到上海，住了几天找到党组织后，就向临时中央汇报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攻的经过和张国焘的错误，以及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的情况，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汇报时，他生动的讲述了围攻、反围攻战争的剧烈，红军指战员奋勇杀敌的事迹，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觉得最好能有一位作家写成作品。陈赓也有这样的想法。不久，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冯雪峰，把有关红军英勇事迹的谈话记录送给鲁迅，请他考虑是否写成作品。鲁迅曾经约请陈赓到家里详细谈过两次。第一次由冯雪峰和朱镜我陪同，第二次由楼适夷陪同。鲁迅对陈赓所谈的苏区军民英勇战斗的情况非常高兴，对苏区人民的生活非常关切，也曾准备写成作品。后因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陈赓原就喜爱鲁迅的作品，尊崇鲁迅的为人，敬佩他的革命精神，这两次谈话，尤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陈赓向中央汇报工作以后不久，又进牛惠霖医院去治疗腿伤，牛大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陈赓这次伤势比前次厉害得多，牛氏弟兄特地邀请另一位有名的骨科专家、红十字医院骨科主任胡兰生参加诊治。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陈赓的伤很快痊愈。当时正是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陈赓曾长期在上海做秘

密工作，认识人比较多，他又喜欢到处走动，党组织怕出事，就给他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党决定派陈赓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三月二十四日，要走的前一天，他到贵州路去看电影，不巧遇到认识他的叛徒陈连生。这个叛徒故意拉扯着他谈话。他立即从电影院出来，叛徒紧跟着他，缠住不放。陈赓把叛徒打倒，正想逃脱，叛徒躺在那里拚命吹哨子，四周围巡捕闻声而至，当场将陈赓逮捕，送到老闸巡捕房关起来。因为从前在特科工作时，他常跟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的一些特务打交道，巡捕一见是他，吃惊地说：“怎么？你就是陈赓！你不是王先生吗？”工部局的英国特务头子兰普逊也很震惊。陈赓在这里接连遭到敌人的鞭打、电刑。一次，敌人又要用电刑来审讯，恰好宋庆龄带领许多新闻记者前来探视，才被迫停止。以后敌人又换了一副面孔，改用软的手段对他。陈赓始终坚贞不屈。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对陈赓进行了一次“审判”。帝国主义分子与蒋介石卖国政府狼狈为奸，当场判决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把他引渡给南京政府，囚于警厅路公安局拘留所。敌人怕陈赓逃跑，把他镣铐在一个铁柱子上。接着，叛徒顾顺章来劝降，陈赓痛斥他无耻的叛变行径，把他送来的“礼品”用脚踢开。

第二天，陈赓被押往南京。从上海动身时，敌人拿来一根铁锁链子，把他同另一被捕的中共党员谭国辅锁在一起，送上一辆有铁格子窗的囚车，看守森严。他们两个毫无惧色，沿途一同唱着《国际歌》。列车到达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故意拿着一封蒋介石劝降的电报，亲自到火车站来“接”。陈赓对此嗤之以鼻，不予理睬，遂被关进宪兵司令部的看守



所。

敌人又用严刑“审讯”，逼迫陈赓投降，主审人就是叛徒顾顺章。陈赓对他破口大骂，使他狼狈不堪。以后敌人又弄来几个他在黄埔的“同学”和他的“学生”来“看望”他。这批卑鄙下流的俗物，故意穿着镶金边的制服和闪光的皮鞋，炫耀他们的高级军衔。面对这伙法西斯死党，他都予以痛斥和辛辣地讽刺，逼使他们一个个溜走了。

陈赓等人被“引渡”的第二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长宋庆龄，怀着无比的愤怒，发表《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揭露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分子蹂躏民权迫害人民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援救陈赓等人。四月五日，宋庆龄、杨銓（杏佛）等人又到南京监狱里探视陈赓等人，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他们。宋庆龄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在广州认识陈赓，这次探视，她还巧妙地为党组织秘密转递一张纸条给陈赓。在这前一天，陈赓和另外几个被囚的人，分别被送进较好些的牢房，还给他们发了新的囚衣。此刻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就对宋庆龄和随同来的其他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和新闻记者，控诉自己亲身受到的非刑拷打和恶劣待遇，并且当场揭露：为了这次会见，他们才受到这特殊待遇。陈赓等人的揭露，使敌人十分狼狈，及至宋庆龄等一走，敌人就将陈赓送进一间又脏又暗的牢房，阴森、恶臭，一团漆黑，令人无法忍受。开灯以后，只见地上一堆人骨，墙上挂着刀、枪。特务用枪逼着他的鼻子，反复叫嚣：“招供！招供！”

这对陈赓毫无作用。他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拿他没办法。每当他想要出来活动，他就大声喊叫狱卒：“我要出来

散步，赶快开门！”他是出名难惹的人，狱卒只好走来开门。他每次出来走动时，总要设法去看看难友们，鼓励大家的斗志。同时，他还常对看守人员作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帮助我方被囚人员。

当时国民党正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这次“围剿”。他妄想亲自诱逼陈赓，并想通过他来“影响”红军中的黄埔学生，便命令用轮船把陈赓从南京送到南昌去。

陈赓到南昌后住进江西大旅社，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邓文仪带了许多“礼物”来看他，讲了劝降的连篇鬼话。陈赓义正辞严地驳斥了邓文仪的无耻谰言。这样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毫无结果。邓文仪临走时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见他。次日早晨，邓文仪又来劝他自首，还带来一张事先写好的“悔过书”要他签字，并给他封官许愿。对这一切威胁、利诱，陈赓都给予了严辞驳斥。当天下午，邓文仪又要他刮胡子、洗澡、换衣服，都被陈赓严厉拒绝。

他被带到百花洲科学仪器馆——蒋介石“行营”的一间客厅，里里外外布满了卫兵。蒋介石故意在楼梯上大声喊叫“陈赓在哪里？”表示他来了，好让陈赓恭迎他。陈赓却伸手拿起一张报纸看，对蒋介石睬都不睬。

蒋介石走下楼梯，连哄带骗，对陈赓说了不少劝降的话。陈赓放下手里的报纸，把脸转向另一个方向，板起面孔冷冷地答话，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不做你们的狗官。今天落在你们手里，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他的话语激昂，声色俱厉，满院的卫兵都能听到。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结巴着说：“你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你应该悔过，应该悔过！……。”

陈赓轻蔑地望着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的严正态度使得蒋介石十分尴尬，几至无法下台。沉默好久，于学忠来找蒋介石，蒋介石才找到个脱身的台阶，对邓文仪说：“你好好说说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陈赓站起来，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气概，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会出卖我们的党，向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东西投降！”

这样，陈赓又被押往南京，关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里，受了一个月的折磨。

自陈赓被捕后，党组织一直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宋庆龄也继续进行营救。不久陈赓被转移到另一幢房子里，虽然继续被敌人监视，有四五个卫兵专门看管，但是允许他行动有某种限度的“自由”。他和党组织很快接上了关系，准备逃走。到了这时，他才剃掉满脸的络腮胡子，衣服也换得干干净净。有一天，一个绰名叫“广东麻子”的共产党员，突然在他的房间里出现。他们在上海早就认识，见面后，“广东麻子”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帮助他逃出了这所房子。（不幸，“广东麻子”于一九三六年被蒋介石杀害。）

### “金沙浪拍云崖暖”

一九三三年五月末尾，陈赓在上海找到党，很快经赣东北苏区，到达中央苏区的红色首都瑞金，被任命为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这个学校专门培养连、排级的军事干部，“彭杨”是以彭湃、杨殷两烈士的姓氏命名的。他到学校工作不久，国

民党军队就开始对全国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央苏区的四个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归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指挥。

十月二十一日，陈赓、宋任穷率领干部团跟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地区出发。长征途中，干部团的主要任务除培训干部外，就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同时，它还配合主力军团，参加多次战斗。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强渡乌江、土城战斗以及再克遵义战斗中，干部团都积极地参加作战，作出重要贡献。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在贵州省遵义城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著名的遵义会议期间，陈赓率领干部团担任警卫工作，保证了会议的安全进行。

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在贵州兜了几个圈子，搞得敌人晕头转向，难于招架。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红军突然举锋西指，三路进军云南，直逼昆明，吓得龙云胆战心惊。不料我军决定乘敌隙虚，又立即分兵三路，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平渡。四月三十日，干部团在金沙江南岸二百八十里的滇北彝民地区，接到要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夺取绞平渡的命令。周恩来对于这次行动亲自向陈赓、宋任穷作了具体部署，并且宣布刘伯承总参谋长为指挥干部团的先遣司令。当即决定：第三营为先遣营，由宋任穷带

领；陈赓率干部团主力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刘伯承带一部电台，和第三营一起走在前面。这是干部团在长征途中第一次接受单独的战斗任务。这是关系着全军安危的一次战斗。因此，全团上下都感到十分高兴和光荣。

刘伯承和宋任穷带领政治干部组成的第三营，经过两天一夜的急行军，在五月一日午后赶到距离江岸四五十里，当地叫作“沙老鼠”的镇子上。部队找向导时抓住一个肥头大耳的区公所秘书，这人把刘伯承当成国民党的大官，一见面就报告说：

“上级下来了命令，将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毁，以免红军利用。”刘伯承要他交出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就让部队押着他一道走；同时根据所了解的情况，马上派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强行渡江，控制渡口。

先遣连立即出发，赶到江边，控制了绞平渡和全部渡船；此时，陈赓带领后梯队也赶了上来。因为红军行动迅速，“神兵天降”，敌人完全没有准备，先遣连马上把一个排送往金沙江北岸。部队刚一上岸，看见前面几米处有个黑影一闪，向后就跑，红军追上去一把抓住，原来是厘金局的人。从他那里得知，北岸没有国民党军队驻守，只厘金局有几十条破枪。厘金局设在一个石壁上掘进的石洞里。部队悄悄摸到门口，屋里有人正在打麻将、抽大烟，指战员破门而入，满屋子的人都跪下求饶。战士们一口气捉起三十多人，还没收了五千多元税款。先遣连长叫人在江边烧起一堆大火，报告渡口的敌人已经全部解决。这次对渡口的袭击非常成功，整个战斗干净利落，我军无一伤亡。部队费尽千辛万苦，在两岸渡口上只找到七只木船。中央军委特地组织了一个渡江指挥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七只小船日夜不停地摆渡，经过九天九夜的连

续抢渡，除去担负阻击敌人任务的第九军团从另一个渡口渡江外，中央红军全部人马都从这里过江，造成军事史上的奇迹。我军从此跳出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距离江岸不远的通安州，当天夜里已从会理开来四川军阀刘元璋部两个团。刘元璋部本来是要抢先占领通安州和渡口的，如今渡口被红军先占领了，他们便从山上压下来。通安到江边四十里，虽只是座落在山顶的小镇，但因居高临下，形势险要，成为保障全军安全渡江的一个重要据点。陈赓根据敌情，除留先遣营维持渡江秩序，立即带领团的主力前进，直取通安州。因为山道狭窄，两旁又是峭壁，加以敌我众寡悬殊，我部经过极其艰难、激烈的拼搏后，终于粉碎敌人的防御，登上山顶，把敌人压出镇子。这一仗，川军两个团被打垮，敌团长以下六百多名官兵被活捉。红军干部团的威名，从此大震。其实，全团参加这次战斗的，才只四百多人枪。

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休息了五天，在继续北上的道路上，干部团仍经常担负着艰苦而繁重的战斗。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翻过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川西北的达维、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因为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中央要他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做工作。过去在鄂豫皖，陈赓曾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一直怀恨在心；他到上海治伤时又向中央揭发过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也晓得。这次见面时，张国焘故意问他：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觉得哪个部队好？陈赓向来光明磊落，真诚坦率，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两个部队作了客观分析，指出各有优点和缺点。他说：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良好，政治工作好；四方面

军打仗勇敢，政治工作，群众纪律较差。因为讲到张国焘的痛处，他就勃然大怒，拍案大骂。以后到了卓克基，便对陈赓进行政治陷害，并准备加以谋杀。这时，周恩来觉察张国焘的阴谋，便派人送信给陈赓，叫他迅速去毛儿盖。陈赓见信即回毛儿盖，遇到张国焘的一个死党，此人诬骂陈赓“开小差回来了”。周恩来把陈赓安排到毛泽东身边住下，以后派他到新成立的一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稍后又调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接着，陈赓率领部队越过茫茫草地。他是一位热情奔放的指挥员，热爱干部，热爱战士，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他虽双腿伤残，行走不便，途中却经常把乘马让伤病员和身体弱的同志骑。有一天，陈赓在草地遇到一个红小鬼走不动了，就前去帮助。那个红小鬼怕丢了枪，不肯把枪让他背，也不肯让他背粮食，他只得抱着这个沉重的红小鬼走。一边走，一边同小鬼谈话。不大一会儿，红小鬼突然头垂下来，牺牲了。陈赓心里很难过，大哭了一场。日后谈起这件事，他仍然带着深沉的悲痛，流露着对这个革命小伙伴真诚的热爱。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跋涉，无坚不摧的红军，终于从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走出来。部队在越过大雪山时受到了严重损失，这次过草地又损失了许多人马。到达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干部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一方面军暂时改称陕甘支队，下辖各大队，陈赓调任由红十三团缩编的十三大队队长。

中央红军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部征程。这时部队恢复了一方面军番号，十三大队恢复十三团建制，陈赓改任团长。十一月中旬，他带领部队参加了歼灭敌第一〇九师的直罗镇战斗，并且在战斗中负

伤。随后，陈赓任第一师师长。

一九三六年二月，陈赓率部渡过黄河参加东征，直扑同蒲线，乘虚攻破敌在汾河布设的堡垒线，沿着铁路东侧南下，转战洪洞、赵城、临汾、侯马地区，一直打到安泽附近。五月，陈赓随军回师陕北，又于六月进行了西征，首先给予割据西北的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几次痛击，迫使他们停止向陕北进攻，退守宁夏。西进途中，第一师还向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宣传抗日，进行了争取工作。十月初旬，他奉令率领部队前去接应经过长征进抵陕甘边境地区的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十月八日，朱德率领部队到达甘肃的会宁，首先与陈赓通了电话，要他马上赶去见面。陈赓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会宁城关迎上朱德。十月九日，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城关与前来迎接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合，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这天，陈赓率第一师参加了在会宁举行的庆祝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盛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陈赓率部参加了山城堡（环县以北）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这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这次胜利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促成作用。这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西安事变。

一九三七年一月，陈赓奉命到中央军委主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原为红军大学）学习。

## 抗击日本侵略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一九



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八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这时陈赓已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结业，被派到援西军红三十一军工作。他于八月七日随部队从驻地甘肃镇原出发，在八月下旬到达陕西三原石桥镇地区。九月初，红三十一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下辖七七一、七七二两个团。陈赓任旅长，副旅长为陈再道，参谋长是李聚奎。

十月一日，第三八六旅在师首长的指挥下，由驻地出发，十月七日，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经侯马、临汾乘火车沿同蒲路转正太路向太行山挺进，于十八日到达平定地区。当时正值日寇第二十师团向娘子关进攻，图谋太原，形势紧张，许多在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告急。第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同时奉八路军总部命令驰援娘子关。

陈赓旅和日本侵略者打的头一仗，是七七二团在十月二十一日夜袭井陘长生口，一战而解旧关之危，救出在旧关被日军包围的国民党军队第三军曾万钟部千余人。二十六日，陈赓再率部队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设伏，歼灭日军二十师团辎重部队，毙伤日军三百余人，缴获骡马三百余匹和大批物资。但在七亘村胜利的同日，国民党军队却放弃了娘子关，使敌得以沿正太路及其两侧猖狂西进。为了痛击疯狂冒进的敌人，十一月二日，刘伯承又亲率陈赓旅等部共三个团，在昔阳以东的黄崖底附近，伏击向昔阳进犯的敌一三五联队，歼敌三百多人。这次战斗，被敌第二十师团的随军记者称作“过天险的黄崖底”。

十二月下旬，陈赓旅又和三八五旅粉碎敌沿正太路所发动的六路进攻，开始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后来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奠定初基。陈赓率领部队积极地打击敌人，锻炼了部

队，也赢得声誉。这年年底，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上校到晋东南访问三八六旅和八路军其他部队，亲眼看到我军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战绩。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他由作家周立波陪同来到陈赓司令部的时候，称赞三八六旅的卓越战略战术及善于联系群众“是世界上仅见”。卡尔逊说：三八六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你们在正太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日军延迟南犯的根本所在。”

一九三八年三月，敌以一〇八师团为主，出动兵力三万，对晋东南进行九路围攻。三八六旅协同兄弟部队，从三月十六日起，一个月间进行三次歼灭战：神头伏击战歼敌一千五百多人，骡马千余匹；响堂铺一战歼敌近千名，汽车一百八十辆；长乐村追击战又歼敌人二千，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三月十六日潞城、黎城间的神头战斗是陈赓亲自指挥的，三八六旅各团出其不意地埋伏在毫无遮掩的神头岭公路旁边，经过敌人汽车、步骑多次搜索，均未发现。其实，他们就巧妙地隐蔽在离敌百十米的地方。所以战斗一开始，敌人“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一两千在前方高地棱线上露出来的脸，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敌忾心的睁着眼的目光都可清楚地看到了”<sup>①</sup>。激战两小时，敌人在无准备中即被完全消灭。当时曾有一股敌人冲进神头村里，妄想依据房屋、窑洞固守待援。陈赓紧随七七二团八连和七连一个排冲进村去，指挥部队将敌逐出村外，消灭干净。

打退了敌人九路围攻，三八六旅乘胜追击敌人到石家庄附近，然后即沿平汉铁路南下，继转道清铁路沿线，给了敌人一

---

<sup>①</sup>日本《东奥日报》随军记者本多德治关于神头之战的报道。

个横扫，袭击了每座县城和每一个车站。几个月中，在平汉线进行大破击八次，道清线大破击七次；继又转战冀鲁豫大平原，打得敌人狼奔豕突，交通寸断。陈赓说：“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起劲了。”过去他曾三次负伤，左脚腕的骨头曾被折断，但是打起仗来，总是整晚整晚的不睡，兴奋而又紧张，喜欢到最前线指挥。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汤阴前线，因患痔疮甚重，无法走路也不能骑马，他便坐着担架指挥作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在道清线，一九三九年二月在香城固，敌人施放毒气，陈赓曾经数次中毒。

抗日战争最初两年，三八六旅对敌作战在二百一十次以上，足迹曾到晋东南、鲁西北、冀南、豫北各地。因三八六旅打得敌人很痛，它和八路军的其他英雄部队一样，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惧。敌人向晋东南九路围攻开始时，侵入北线的日军抓住我军一个通讯员，第一句问话就是：“你是不是三八六旅的？”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三八六旅设伏冀南威县城南香城固，包围了日军第十师团的一支快速部队——十辆汽车载运携有四门炮的三百名日军。敌曾几次反扑企图突围，并且发射毒瓦斯，我军虽有多人中毒，阵地屹立不动。结果敌人除十多名被我活捉外，二百八十多名全部被击毙。日寇愤怒地集中了一百五十辆汽车，五架飞机，配合坦克、重炮，尾随我军，进行了整整七天的搜索和追击，其先头装甲车上贴有“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三八六旅每到一处宿营的第二天，敌人的飞机便来侦察，继之以轰炸和围攻。可是，敌人每次都扑空了，我以徒步与敌的机械化竞赛，每次都机动地在宿营的当晚又转移了地方。敌人始终没有找到三八六旅，陈赓却在一条河边等待着它，又狠狠地把它痛打一顿。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八六旅奉调太岳解放区，成立太岳军区，陈赓任司令员。三八六旅协同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太岳区地方部队，转战同蒲、白晋两线，粉碎敌人多次“扫荡”，巩固了太岳解放区。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总部下令对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粉碎它的“囚笼政策”，以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这就是震撼敌人的“百团大战”。陈赓亲率军区部队开往正太前线。对于正太线的破击，一二九师决定由陈赓和陈锡联、谢富治统一指挥。陈赓直接指挥这次破击战的中央纵队（总预备队）。太岳部队组成的左翼纵队，进击正太路西段，横扫寿阳至榆次间一百多里的铁路沿线，斩断了每一座桥梁，炸毁了每一个车站，肃清了沿线所有敌人据点及其守备部队。接着，陈赓又率左翼纵队又到和顺县卷峪沟，与敌血战六小时，杀伤日寇千余名；在榆社双峰镇歼灭永野支队，击毙永野中佐以下四百多名。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陈赓亲率太岳部队进攻榆社城，全歼守敌。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的榆社之战，异常激烈。敌人虽在榆社构筑了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我军第一晚就攻进城内，把四百多名敌人压缩到东关第八中学的“乌龟壳”里，龟缩在四周尽是削壁，并围绕数层铁丝网的坚固堡垒群内顽抗。我军依靠密集的火网掩护，架起用几条梯子接起来的云梯，并用水湿的棉被突然塞住敌人的火口，突入四丈多高的母堡，炮火则集中火力压制敌人集结的文庙阵地，工兵乘夜挖好坑道把大量炸药放在堡垒底下。战斗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刻，陈赓就在烟火笼罩中，在碉堡的突破口下面，指挥部队向敌人盘踞的文庙和中学攻击。二十五日总攻击开始，敌人的主要堡垒都炸飞了，突击队突然出现与敌进行白刃战，使敌藤田中队整个

都毁灭在自掘的坟墓中。敌中队长因惨败而拔刀自杀，由两个士兵带着他的首级到辽县城去“交账”，我军赶到辽城附近又截回来。此役缴获武器弹药粮秣甚多，数千群众搬了一夜还没运完。在几天攻击中，敌人连续放毒，全城终日笼罩在瓦斯的烟幕中，陈赓和攻城部队一日中毒数次，但敌终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第二天，我军又在榆社城东的红崖头击溃敌增援部队三千多人，“增援者”又被“增援”，始得脱逃。

一九四一年起，敌人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经常以十万人以上的兵力对解放区反复“扫荡”。仅在一九四三年间，敌人就对太岳区进行了六次“扫荡”。对付敌人的“扫荡”，陈赓每次都是指挥部队分散转移到外线，和内线部队、民兵的游击战相结合，协同作战，内外夹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终将敌人的“扫荡”粉碎。每次反“扫荡”战役，军区司令部都要进行精简疏散，临时组织精干的指挥机构，由陈赓亲自带领，同敌人周旋。当敌人向根据地腹心地区分进合击时，就从敌人的“铁壁”、“篦梳”夹缝中转到外线；当敌人从根据地向外线分路反扑时，再从敌人“篦梳”夹缝中转回内线。有一次战斗，部队早已转到外线，大股敌人突然气势汹汹地冲进来，军区司令部决定转移，许多人猜想至少要走百十里路。那知陈赓带领大家只走很短一小段路就停下来，放出去的排哨眼看着敌人一直“扫荡”过去，他们马上又回原驻地宿营，安然无事。另一次反“扫荡”中，数路敌人进抵我解放区腹心地区，有些同志提议向南转移到中条山去，陈赓当即指出这样不行。许多领导机关由良马撤过沁河后，他带领着急速北进，顺利地迅速地钻出敌人的包围圈；个别未照命令北进而向南转移的地方机关，

却被敌人长途连续追击，十分紧张，有的且曾遭受损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这样险峻的局面，陈赓先后经历过多次。但是他对敌人的“脾气”摸得很透，不论遇到多么险恶复杂的形势，总能处之泰然，冷静地作出确切的判断，化险为夷。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敌人曾以二万多兵力对太岳区进行一次规模最大的“扫荡”。这次“扫荡”是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布置和指挥的，其目的不仅要“毁灭”太岳解放区，还企图在这次“扫荡”中取得“经验”，指导各地日军对我作战。敌人采用了所谓“铁滚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其重心是企图杀尽我根据地一切人畜，毁灭一切资财，制造“无人区”，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两万敌人集中在具有相当纵深的一线上，先自北向南，再从南向北推进，反复“扫荡”。但经太岳军民英勇奋战，终将敌人的进攻粉碎。当时冈村宁次对此种战法自鸣得意，特从各地调集军官及参谋人员一百八十多名（内有旅团长一名，并有汉奸汪精卫伪军代表二名），随同“扫荡”的敌军前来太岳战地“观战”。十月二十三日上午，这批军官正在首途参观时，突遭我军伏击于临汾、屯留公路上的韩略村（距敌指挥部三十里的一个村庄），全被消灭（被击毙者有敌旅团长服部直臣及大佐六名），所乘汽车十三辆悉遭毁坏。战斗结束，恼羞成怒的敌人将其配合“扫荡”的六架飞机全部调来滥炸泄愤，又把附近“清剿”部队二千七百多人，连夜调来韩略村附近，妄想来一个报复合击。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敌人自己的被炸毁的汽车和狼藉的尸体而已。冈村经此惨败，为了卸脱自己的责任，挽回一点面子，将其六十九师团长撤职。

这个时期，陈赓关注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所进

行的一切斗争。尤其是在太岳军区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建设中；在全区军民同仇敌忾，长期围困沁源迫使敌人撤退的作战中；在为争取友军中爱国将领团结抗战的折冲樽俎中；以及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打退他们对解放区进犯的斗争中，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四三年十月，陈赓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离开太岳解放区，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 针 锋 相 对

一九四三年十月，陈赓到达延安不久，便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在这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当他正在准备重返前线的时候，八月十日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陈赓随同刘伯承、邓小平等由延安乘飞机回到太行山。在此以前，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派部队一万七千多人，向我晋冀鲁豫腹地地带上党地区大举进攻，八月十九日起连续侵占长子、长治、屯留、壶关、潞城、襄垣各县，阴谋扩占整个晋东南，摧毁我太岳、太行根据地。刘邓听取了晋冀鲁豫军事情况汇报，即行部署上党战役作战。

陈赓在军区领受了任务，就返回太岳解放区。这时太岳区原来的主力部队由于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已经分散。陈赓根据上级命令，立即恢复三八六旅、决死第一旅建制，于九月初率领这两个旅共六个团约七千人，组成太岳纵队参加上党战

役。太岳纵队旗开得胜，于九月十九日攻克长子县城；接着又协同友邻部队合围长治，二十四日攻占北关。这时，阎军三个师由太原出动，正沿白晋路南下增援。刘、邓决心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援军，同时准备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阎军，在向各部队分配任务时，令陈赓指挥三八六旅等为打援左翼队。不久查明，这股援军包括敌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及两个炮兵团共计两万多人。及至九月三十日，敌援军离开白晋线，沿襄亭、屯留公路前进。十月二日，敌先头部队四十七师进占老爷岭，并继续前进。当敌发觉我军正由左右两翼向其迂回时，立即停止前进，据守老爷岭阵地，准备与我决战。

我为挫败敌军部署，决心乘敌立足未稳，向老爷岭发起攻击。十月三日，陈赓指挥二十团团长江大明，带领部队沿着一道被山水冲击而成的壕沟，摸到敌人主阵地背后去，接连攻下几个山头，切断敌四十七师与其主力的联系，并且占领北山水源，使固守残存阵地的敌人陷于孤立，水粮断绝。四日，敌人疯狂地连续数次反扑，激战竟日，都被我军打退。

部队连续攻打两天，十分疲劳。五日早晨，陈赓从余吾镇纵队指挥所打电话给三八六旅旅长刘忠，命令该旅无论如何要迅速攻下老爷岭，以便进而协同兄弟部队总攻援敌占领的第二制高点磨盘埡。可是正在这时，山上敌人害怕被歼，放弃阵地北逃。各团紧急追击，只吃掉一半，未及全歼。老爷岭遂被我军占领。

十月五日下午三时左右，陈赓亲到老爷岭山顶三八六旅指挥所来，观察阵地，布置向磨盘埡总攻。他用望远镜向磨盘埡瞭望，发现东面敌人大队虽沿公路向南移动，而东北方向又有小队敌人由东向北移动。原来，老爷岭、磨盘埡经四、五两日



我军猛烈进攻，敌军伤亡累累，援敌总指挥、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的南援决心根本动摇，已经下令敌军北逃。但为欺骗我军，故意佯南而实北。

陈赓判明援敌确实是在向北逃跑的时候，就当机立断，命令三八六旅：“刘忠同志的部队，改变总攻任务，立刻向北追。楚大明团在最前头，于敌人行进的公路左侧北进，插入敌后，追上敌人！沿途不许打敌人、捉俘虏、‘发洋财’（按：指缴获武器、物资）。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敌人前头，切断敌人退路，迫使敌人停滞在麇亭以南地区，以便围歼！”他还打电话给担任总攻磨盘垭的预备队决一旅，命令他们追击敌人。当时整个部队在运动中，同刘邓指挥所的电话尚未架通。陈赓马上派侦察科长前去向刘邓首长报告火线情况和当机立断的决心、追击的部署，以及请令兄弟部队向敌人出击的建议。

部队分头出动后，陈赓蹲在追击部队经过的路旁土坎上，向过路的战士宣传鼓动：“敌人在逃跑，只要我们跑到敌人前面就是胜利！”见到营长过来，他就多说几句：“最重要的就是截断敌人的逃跑，不要在追击途中求战果。”在陈赓的鼓动下，追击部队情绪高涨，奋勇前进。

六日天明，集结在二十团阵地面前的两万多敌人开始蠢动。敌人一批一批地冲过来，每次都被坚决地顶住，打退。敌人发动集团冲锋，团长楚大明，不断地组织和指挥整连整营反冲击、白刃格斗。全团指战员只有一个信念：堵住敌人就是胜利。就是这样，这个钢铁铸成的口袋底，与二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激战了八个钟头，挫败了敌人十几次的冲击，赢得了时间。到了傍晚，刘邓指挥的各路主力源源赶到，从敌左、右、后三面合围，勇猛出击，将敌八个师，两万人的援军，全部歼

灭在沿白晋公路的鹿亭以北和漳河沿岸地区。敌中将炮兵司令胡三余和许多师长都被生擒，敌总指挥彭毓斌下马逃命被我击伤，在敌乱军阵中毙命。

困守长治、渴望援军解围的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闻援军全部被歼，又接到阎锡山叫他突围逃跑的一道十万火急的电报，即于十月八日弃城西逃。陈赓立即命令太岳纵队各部不顾一切疲劳，克服一切困难，追击逃敌。我二十团和七七二团日夜兼程，以惊人的速度，飞奔赶到前面堵住敌人逃路；决一旅各部也经连续三昼夜兼程疾进，在沁水东西峪地区兜住敌人，活捉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到十二日，历时三十来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阎军来犯的十三个师共三万八千多人，经我刘邓首长直接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各部协力痛击，终于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

蒋介石蓄谋内战已久。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八月下旬就派遣军队经同蒲、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解放区进攻。但在今年十月，进犯上党的蒋阎军被歼灭后，进攻邯郸地区的蒋军四万余众也得到了全军覆没的下场，其他地区的蒋军都遭到惨败。这时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发现自己对于发动全面战争还没准备好，为了争取时间加紧内战准备，他只好在表面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停战的要求，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由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中央同时颁布停战令。当时，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华“调处”中国内战，以此名义帮助蒋介石加速大规模内战的准备。一九四六年一月，根据双方协议，成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其下由三方代表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分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这个时期，陈赓奉命前往临汾、太原参加和

平谈判。

这年二月，阎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违反停战协议，率部犯我晋南蒙城、侯马地区，遭到我军沉重打击。二月二日，北平调处执行部侯马小组（即以后驻临汾的十四小组）飞来侯马“调处”。当天下午，陈赓偕同我方代表团，同这个小组一起进入临汾。从这时到三月中旬，在临汾同阎方代表王靖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与那班昏庸颞预的国民党的代表迥然不同，每次会前，国民党代表都在花天酒地，狂嫖滥赌混日子的时候，他却在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认真准备。他不只重视当面敌情的研究，还随时注视整个政局的变化。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摆着由解放区来的函电、书报外，还经常堆满着国民党统治区新出版的包括不同立场的各种报刊。他还十分注意收听敌人的广播，阅读国民党的官方文告。他对这些东西读得非常仔细，常从字里行间窥探对方的动向。他在代表团内，遇事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对策；同时注意及时向党中央和晋冀鲁豫军区请示报告，经常保持电台的正常联系。

这样，每次会前他都能充分地掌握双方的情况，并且在地图上详细标明。每次开会，王靖国“恶人先告状”，总要抢先发言，对我军造谣诽谤。陈赓照例沉着应付，“后发制人”。等到对方讲完，他把带来的地图摊开，列举大量事实，驳倒美蒋（阎）方的代表。他对由于对方进犯造成的所谓“争议地区”，总是指出这些地方不仅早为我军解放，而且揭露对方逐次进犯的事实；同时举出阎军被俘人员名单，拿出阎锡山、王靖国等亲自签署的向解放区进攻的命令等等；充分证明是国民党军违背停战命令向解放区进犯，而不是八路军向对方进攻。美、蒋（阎）方代表面对着这些铁证，就象当场被抓住手的窃

贼，总是抓耳挠腮、窘态毕露。每逢遇到这种场合，国民党方面代表沈国辅、阎军代表王靖国之流，只是厚颜无耻地加以抵赖。对方这种态度，连他们自己在场的下级官兵，也都看不过去，常在背后议论：“陈赓将军说得句句在理，非常带劲，咱们那位上校就只会说‘我完全否认’，向人家赖帐。”有时对方进攻了我军，反而倒打一耙，诬称我军违犯停战令。陈赓就拉三方代表到现场勘察，使蒋（阎）方当场出丑，原形毕露，连美方代表伯尔也感到蒋（阎）方是“死猫扶不上树”，对他们“爱莫能助”，只好硬着头皮训斥他们。以后王靖国根本不敢到现场去，陈赓又叫会议“记录在案”，搞得他们狼狈不堪。

三月中旬，陈赓又由党中央派往太原中心执行小组担任我方代表。当他离开临汾时，根据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对临汾小组今后谈判工作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讲了许多意见，指出国民党方面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已进一步暴露，今后谈判主要是和对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他还乘此机会返回太岳纵队一次，临走时对各旅指挥员说：“人不能相信鬼的话，和平要用力量来保卫，你们越能牢固地控制住我们的地区，坚决地打退敌人的进攻，我在那里讲话就越有力量。”

三月二十一日，陈赓到达太原。在此以前，三月初，阎锡山勾结其非法留用的日本军队共计两万余人，曾在白（圭）晋（城）铁路沿线向我大举进犯。经我痛击后，太原小组前去制止。这时阎、日军重新进犯，但又采取“贼喊捉贼”的故伎，故意在陈赓到太原前一天——三月二十日由阎方报纸反咬一口，诬我军进攻。而当三月二十三日，太原中心执行小组前去来远调查此事时，他们又故意捏造消息，反诬我军在晋北定襄地

区“利用日军”进攻阎军。

阎、蒋方代表，也为东沁线事件在太原中心执行小组内起哄。到底是谁向谁进攻？到底是谁留用日军并且勾结日军挑动内战？为了查明真相，经陈赓提议，三月二十三日，太原中心小组人员乘火车前往来远（祁县境），到后即命令阎军现地停战。阎军妄想用恐吓手段阻挡小组实地勘察，连夜秘密布设地雷。第二天拂晓小组人员到来远西南方向山头视察，刚从来远走出一百多米，就在阎军防地踏响地雷一颗，炸伤三人，其中有陈赓随从参谋、太岳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王亭兰（身负重伤，双目失明，送医院不久就牺牲了）；陈赓本人也险遭不测。但他不顾艰险，坚持视察。当时正有日军六百多人向我军南山头阵地进攻，陈赓和国民党方面代表邹陆夫亲往制止。不料在双方代表前进时，阎、日军却偷偷跟在后面抢占了我军南山头阵地。陈赓手持军调部的旗帜冒险到火线上去制止，从阎军炮兵阵地上亲手抓住一个日本兵带回来远。太原中心小组即在来远邀约当地双方部队指挥员举行谈判。我方在当地坚持抗战八年的鲁瑞林司令员，当场驳倒阎方东沁军总司令赵承绶的一切谎言。阎日联军进犯解放区的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赵承绶无言答对，连声只说：“那我要请示阎长官”。阎军留用日军的罪行，因为陈赓当场抓回一个日本兵，贻赃俱在，对方尤其无法狡辩。经过陈赓坚决斗争，终于将阎、日军的进攻制止下来。执行小组回到太原后，四月一日太原各报发表的《太原组答中央社记者》新闻中，被迫承认阎军利用日军攻打我军的事实。这则新闻同时宣称：“在东沁线时，本小组尝举行会议。此次会议之成功，陈赓将军之斡旋，应受最高荣誉。”

陈赓在谈判过程中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同对方进行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我方未因谈判而丧失任何一个地方。面对那些恃强欺人，偏袒蒋方的美国侵略分子，他始终保持着民族尊严。但在具体交往中，他一开始就很注意考虑对待美国人的态度问题，做美方代表及其随员的工作，尽可能利用美、蒋、阎方面内部的矛盾。他对蒋、阎方的挑衅彻底揭露，对美方的偏袒行为也要揭露，使其不敢明目张胆地袒护对方；但又讲究分寸，留有余地，免得对方恼羞成怒，走得太远。他争取美方的主要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向他们说明情况，使其了解真相。临汾小组美方代表伯尔是空军上校，比较精明能干，善于外交辞令，比较圆滑，谈判桌上总是模棱两可，难得说句公道话。陈赓始终对他摆事实，讲道理，使他无计可施。陈赓的政治风度，杰出才干，也使他内心折服。陈赓于三月中旬调往太原，伯尔单独送别时，非常激动地对陈赓说：“将军！我对您和执行小组的合作表示感谢，我本人对将军十分钦佩！”

这年六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陈赓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机智地离开太原，经由北平军调部飞往延安，在胡宗南大举进犯前夕，安然回到晋南前线。

### 晋南战场六战六捷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犯晋南的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部队。胡宗南觊觎山西已久，日本投降不久，就将其第一军楔入晋南。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又将三个旅由陕西省东渡。七月上旬，即以其在晋南地区的七个旅全力北犯，勾结同蒲路南段的阎锡山军队，向我大举进攻，妄图在一个月內，打通同蒲南段，席卷晋南，寻歼我

军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然后再与阎军会攻上党，策应其主方向平汉线进攻。

面对胡、阎军队的大举进犯，陈赓率领的太岳纵队（以后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这里担负了战略性的重要任务：既要阻止胡、阎打通同蒲铁路；又要保卫太岳、太行根据地；还要保障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安全，直接策应西北人民解放军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太岳纵队、太岳军区均隶属晋冀鲁豫军区建制，就是由于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与西北战场的连系较为密切，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执行作战任务方面，第四纵队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针对敌人在晋南的进攻态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陈赓当时所拟定的太岳纵队作战方针是：协同太岳军区部队，在吕梁军队的配合下，于晋南方向，乘胡宗南和阎锡山部尚未靠拢的时候，利用两敌矛盾，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它的进攻。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旬，胡宗南部队六个多旅、七万余众从运城出动，沿同蒲路北进，侵陷闻喜县城。陈赓指挥所部捕捉战机，奋勇反击，经过激烈的近战、夜战，由七月十三日夜至七月十七日，歼灭胡军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一六七旅两个营、七十八旅一个营，共计六千三百余人，余敌狼狈窜回固守。这就是有名的闻（喜）夏（县）战役。接着，陈赓挥师北上，八月十四日又向临汾以北的同蒲沿线发动洪赵战役，两周内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城镇，控制铁路二百七十里，歼灭阎军暂编第三十九师等部八千余人。我军在此役中群众纪律优良，中共中央特打电报给陈赓祝贺、表扬。

在我军进行同蒲战役的时候，胡宗南于八月中旬又将其整编第三十师（辖三个整编旅）和精锐整编第一旅调到晋南。八

月十七日，胡宗南飞抵运城，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布置新的攻势：以第一师沿同蒲路北进，第三十师沿同蒲路东侧经绛县、翼城向北，企图压我主力于洪、赵地区，尔后和阎锡山军南北夹击，与我决战。九月初，胡军北进临汾、翼城地区；阎军则将平遥、介休地区的第三十四军集结义棠地区，以接应胡军北进。针对敌人动向，陈赓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乘胡军北进，在临汾、浮山地区，于敌运动中寻机歼其一至两个旅。

九月中旬，胡军主力陆续到达临汾地区。二十日，进驻临汾、翼城的胡军开始向浮山进攻。二十二日，敌第三十师二十七旅、第一师一六七旅侵陷浮山，即落入我军布设的网袋。正象陈赓所预料的：在临汾的敌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第一师师长罗列发觉情况不妙，便派第一旅沿临浮公路东去救援。该旅第二团杀气腾腾地进至官雀地区，就被陈赓部队紧紧扭住。

要打敌第一师是陈赓早就下定的决心，也是中央军委指示的精神。这时，陈赓即以李成芳第十一旅首先攻歼官雀之敌，以周希汉第十旅位老姆村、合理村，阻敌东援，相机捕敌而围歼之，而以陈康第十三旅位南北韩略村，阻浮山敌西援。攻击官雀的战斗于二十二日午夜开始，当即多路攻进村中。二十三日上午，正当我军在官雀激战时，陈赓收到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歼灭第一旅”的命令。他将这一命令当即传达到所有作战部队，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当天下午五时，十一旅向官雀敌发起总攻，敌团长王亚武向师长罗列和旅长黄正诚连声求援。第一旅中将旅长黄正诚率其第一团赶来，到达陈堰村西南方向驰援官雀，遭我十旅有力反击。一天内，连续击退敌人的十余次进攻，当晚该敌被包围于陈堰；从浮山西援的敌两个旅，被十三旅阻于西佐、韩村之线。二十四日拂晓，我



军在官雀、陈堰同时解决战斗，将敌号称“天下第一师”的整编第一旅全部歼灭，俘敌中将旅长黄正诚、一团少将团长刘玉树，二团团长王亚武被击毙，予敌第二十七旅、一六七旅以重创。

临浮战役全歼“天下第一师”的胜利，是陈赓根据毛泽东指示的关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踏步机动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在强大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在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下，巧妙地利用了胡、阎两敌的矛盾，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指挥部队勇敢战斗的结果。闻夏、同蒲、临浮三战三捷，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闻夏战役的胜利，给同蒲、临浮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后两个战役又是前面一个战役的发展。三次战役的胜利，充分表现了陈赓卓越的指挥才能。

陈赓部队连续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表扬。刘伯承在晋冀鲁豫边区干部会上说：“七到十一月敌由主动到开始被动，同蒲方面打得很好，中央夸奖说是出乎意料之外。”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临浮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即向全军各部队首长发出《关于陈赓纵队作战胜利通报》，高度评价全歼整编第一旅的巨大胜利和陈赓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晋南战场，蒋军八个旅约六万人，而我军只有三个主力旅及一个地方旅，兵力上敌占绝对优势，四、五倍于我。除七月间被我歼灭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外，此次又被歼灭一个旅及击溃一旅以上，再次证明只要在指挥上集中优势兵力，可以坚决歼灭敌人一路，并可连续取得胜利。至八月间陈赓纵队攻占洪、赵、霍、灵及汾西五城，共歼阎军万余尚未计算在内。望

以此例教育部队，鼓励士气，坚决歼敌。”

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又发表以《向太岳纵队致敬》为题的社论，赞扬陈赓指挥有方和太岳纵队英勇善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陈赓接获中央军委电报，命令第四纵队越过同蒲铁路，经吕梁山区，西渡黄河，参加陕甘宁边区作战。第四纵队随即西进吕梁，连克数城，纵队主力直达黄河东岸。这时我军在陕北的防御准备已经就绪，胡宗南慑于侧后威胁，先已渡往河西的第一师又重返河东。毛泽东电令陈赓：第四纵队暂缓西进，协同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发起晋西南战役。（又称“吕梁战役”）。这次战役在陈赓、王震统一指挥下，先后解放县城及市镇三十余处，歼胡、阎敌军一万六千余人，使北起中阳、南至吉县城郊，西至黄河，东至同蒲铁路，长达四百余里，宽约三百里的广大地区人民获得解放，并解除了陕甘宁解放区东侧的威胁。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陈赓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又率主力北上，协同吕梁部队组织汾（阳）孝（义）战役。此役我军首先攻占孝义，包围汾阳，阎锡山大为惊惧，亲到平遥指挥，急调九个师及两个纵队共计三万多人分路来援，战斗激烈。由一月十三日起至二十九日止的半个月中，我军共歼敌六十九师等部一万六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甚多。这次战役我军先乘虚歼灭分散之敌，袭夺孝义，围困汾阳，诱敌来援；后以分割歼灭敌人的战法，以积极勇猛的战斗给了阎锡山以沉重打击，使晋南胡军更加孤立，为我军展开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战后，第四纵队返回太岳休整总结，广泛开展群众性立功运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在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配合下，以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整编旅共十四万人的强大兵力，大举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四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陈赓指挥第四纵队协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地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作战。晋南战役自四月四日至五月十二日，历时三十七天胜利结束，先后歼敌正规军三个团，一个新兵旅，连同非正规军总计两万二千多人；解放县城二十五座，使晋南三百万人民得到解放，迫使敌军退缩于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不仅彻底粉碎了胡、阎联防体系，使晋南局势起了根本变化，而且我军抵近黄河左岸威逼关中，进窥潼关、洛阳，造成胡宗南的后顾之忧，直接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的作战。

陈赓指挥所部在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作战中六战六捷，越战越强。经过晋南战役的巨大胜利，已使山西全局为之改观。全省一百零五座县城，人民解放军控制者超过四分之三。胡宗南伸进山西的一条腿被扭断了，陕北胡军的右翼裸露，其后方老巢也受到了严重威胁。晋南战役结束不久，陈赓曾向记者纵谈晋南爱国自卫战争一年来的演变，他说：“一年来，我军先后解放县城三十四座，歼敌五万余人，已使整个山西形势起了巨大变化。妄图作‘山西王’的胡宗南、阎锡山辈，顾此失彼，处处挨打，眼看快完蛋了。”陈赓列举各种事实，说明敌人越战越弱，我军越战越强。他说：“过去我军攻占一座县城，常须两三天，如今只须几个钟头，就可结束战斗。解放晋南新绛县城仅三小时，而解放闻喜城只费三十分钟。反观敌军，则士气颓败，战斗力衰弱，其初犯解放区时之凶焰，早已烟消云散。如果说第一旅旅长黄正诚被俘还曾装腔作势，而到二十七旅副旅长王书忱被俘时，就立即承认他们是‘士气低落，

无心战争’了。时仅一年，胡宗南梦想打通同蒲、正太，压迫晋南人民解放军于汾河以东而歼灭之‘计划’，于今成了对他一种无情的讽刺。”最后，陈赓告诫全军指战员：“野兽受了伤，但还没有死，我们决不能自满，应继续更多地为人民立功，直到蒋介石小朝廷的灭亡。”

##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

晋南战役结束以后，陈赓部队即在翼城、曲沃一带地区集结休整。这个时候，整个部队正在厉兵秣马，准备新的战略行动，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一九四七年六月下旬，陈赓接到中央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的通知，马上带领随从人员，向举世瞩目的陕北战场进发，于七月初旬到达党中央驻地靖边县小河村。这次会议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一连开了七、八天，讨论的问题很多。会议确定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方针，同时确定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是中原。对于中原战场这盘棋，在毛泽东胸中酝酿已久了，他说：“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好得很啊！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关于陈赓部队的行动方向，中央原已作出决定要来陕北，并且曾经电令陈赓率领部队过黄河；这次会议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转而南渡黄河。最后，会议对于中原战场作出新的部署：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南进，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调动敌人第一线部队回援，在运动中歼灭

敌人有生力量，彻底粉碎敌之重点进攻，迫使他们转入全面防御，使我军由局部反攻发展为战略进攻。陕北我军则拟出击榆林，诱胡宗南主力北上，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寻机歼灭它的有生力量。陈赓部队则趁胡宗南陷在陕北、豫西敌军处境不利的时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南渡黄河，由晋南挺进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说：刘邓直插大别山，朝蒋介石的胸膛砍上一刀！陈赓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再砍他一刀！陈毅、粟裕大军，进入鲁西南，挺进豫东，再扎他一刀！这三路大军，在战略上就布成了“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在南起长江，北至黄河，西以汉水，东到黄海的中原大地上，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开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陈赓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继续向陈赓进一步说明当时全国战场的大好形势，深刻地阐述了新的战略决策的意义。毛泽东还向陈赓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部队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毛泽东说：“‘破釜沉舟’的故事你知道吧？项羽跟秦兵打仗，过河以后就把锅砸了，把船沉了，激励士兵不打胜仗决不生还！说来也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们将要渡河的地方。……”陈赓说：“主席，那我更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到豫西去！”毛泽东风趣地说：“只是锅别砸了，船也别沉了。”引得在场的人们一起大笑起来。

小河会议结束后，陈赓于八月初旬赶回晋南前线时，根据七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的命令，有关部队共约八万余人组成了一个兵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进军豫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同时成立中共前委，以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即由陈赓主持，在太岳解放区的首府阳城召开了兵团前委扩

大会议。陈赓向到会的各部队负责同志，详细传达了中央小河会议的精神。会议讨论、制定了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的军事计划，还研究了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

这个期间，全军进行了整训，深入传达了中央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对到外线作战在思想上物质上进行了充分准备。八月十二日，南征各个部队分别从驻地出动，并于二十日左右进抵预定强渡的渡口附近集结。八月二十一日，陈赓于强渡前夕，在离济源长泉渡口十里的一间独立民房里召开研讨渡河作战的会议。他向各旅旅长分析了当面敌情，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提出三个方案交大家讨论，即使出现非常困难的情况，大家也有思想准备和处理的对策。最后陈赓眼望着奔腾呼啸的黄河，又在这里重新讲了一遍毛泽东所说的“破釜沉舟”的故事，并向担负突击任务的周希汉、陈康两位旅长说：“过河以后，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周希汉、陈康一起激动而坚定地回答说：“只有前进，不能回来！”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拂晓，陈赓部队主力只经十几分钟的强渡，即从济源长泉渡口一线胜利渡过黄河（西线部队同时由平陆茅津渡偷渡成功），蒋军恃为天险的三百里黄河防线，一夜之间完全崩溃。陈赓即带无线电台随周希汉旅渡到黄河南岸，就在河岸的岩石旁边指挥部队前进，扩大滩头阵地，席卷沿岸守敌的阵地和堡垒群。

陈赓部队渡河的壮举，引起敌人极大的震动。蒋介石一面慌忙调兵前来，连同驻守洛阳的部队共八个旅，组成第五兵团，由李铁军统一指挥；一面在西线拼凑四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敌西安绥靖公署陕北指挥官谢辅三指挥。陈赓派出先

头部队向洛阳虚幌一枪，就率领主力西向，在灵宝、陕县地区歼灭陕东兵团八个团中的六个多团，西逼潼关城郊，谢辅三落荒而逃。就在这个时候，我军一部又越陇海铁路南进，楔入伏牛山脉，先头直捣陕南。我军渡河不到一月，就在陇海沿线连续解放十座县城，把敌人这条横贯中原的大动脉打得稀烂，洛阳一夕数惊，西安准备巷战。我军凌厉的攻势，迫得蒋介石挖肉补疮，慌忙从大别山抽出第五十六师空运西安，又从运城、榆林等地空运两个半旅，匆促在西安、潼关地区集结十个半旅，组成裴昌会兵团。这时陈赓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突然率领主力隐蔽东进。李铁军还茫然无所知，仍在发动所谓“攻势”。我军突于十月二日在新安铁门一举歼敌第六十四旅，又在韩城镇把整三师打得落花流水，迫使李铁军把一个“攻势”变成狼狈的败退。陈赓兵团连续取得的巨大胜利，有力地策应了人民解放军南线各路大军，对于全国大反攻是一个适时有价值的贡献。

十月下旬，集结潼关地区的裴昌会集团和集结洛阳周围的李铁军集团开始蠢动，妄图以其优势兵力（共计十八个旅），从东西两线夹击我军，恢复其陇海铁路的交通。由于敌军主力集中，它在豫西广大地区的守备更加空虚，伏牛山东麓的许多城市，都只有保安团一类土顽驻守。这时毛泽东指示陈赓，除留一部在陇海路钳制西线敌军外，主力应即南下，歼灭豫西各县的反动武装，开辟根据地；如敌跟踪南下，则寻机分别歼灭之，但要打有把握之仗；同时指出，不要怕敌人占领陇海路，只要在东面、南面打开局面，大量歼灭敌人，裴昌会虽占领陇海路，但兵力分散，我即能再歼敌军而重占陇海路。毛泽东还说，这一行动对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和大别山刘邓主

力的作战都有重大意义。

遵照这一指示，陈赓即将主力沿伏牛山东麓展开，在南北三百里战线上发动新的攻势，连续歼敌万余，解放十余座县城。我军进展神速，势如破竹，河南的反动报纸都说我军“攻城陷地，如入无人之境。”还在沿陇海路西进寻找我军“主力”的李铁军七个旅，慌忙掉转屁股跟踪赶来。陈赓指挥周希汉旅，捕捉战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扬我军机动、勇敢、干净利落的作风，一举歼灭了郟县守敌整编第十五师，敌中将师长武庭麟、副师长杨天明、姚北辰均被生擒。

郟县战斗刚结束，李铁军带领七个旅已逼近城关。我军机智地撤离郟县，李铁军紧紧地跟来。由于敌众我寡，敌人七个旅挤在一团，必须将敌主力拖散，方能各个歼灭追敌。十一月八日，陈赓在南召店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尾追的敌人。陈赓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采取“牵牛”战术，派出四纵第十三旅和九纵第二十五旅伪装主力西进，将敌主力引至伏牛山地，将它拖疲拖瘦；兵团主力则改为向北、向东，沿平汉路西侧展开，随时准备出击平汉线，策应刘邓主力在大别山的斗争，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一旦时机成熟，就一举歼灭李铁军兵团。

会议开完，十三旅和二十旅即由九纵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统一指挥，伪装陈赓兵团主力向宛西地区行动，沿路虚张声势，攻打镇平、内乡等城。李铁军终于上当，以其主力整三师跟踪追击，一直被拖到伏牛山的西峡口、夏馆一带达半个月之久。正当李铁军说将陈赓“主力”逼进深山，得意忘形的时候，晴天一声霹雳：十二月十三日起，陈赓部队协同华野西集团发动平汉线破击战大获全胜，郑州至信阳八百里铁路全遭



破坏，敌人重要屯兵基地许昌、漯河等二十三座城镇被我攻克。李铁军丧魂落魄，率整三师立即调转屁股奔平汉路“增援”，紧赶慢赶，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又被十一旅等“牵”进陈赓预先在遂平以北祝王砦地区布设的“屠场”。李铁军想要逃脱，为时已晚，就以祝王砦、金刚寺为中心，仓促转入防御。陈赓部队协同华野一部立即围歼敌人，经两昼夜激战，至二十六日二十时许，将敌第五兵团部及整三师全部歼灭。敌兵团参谋长、副参谋长、整三师师长和两个旅参谋长都被生擒，两个旅长悉被击毙，只兵团司令官李铁军侥幸漏网。在驻马店地区，还给来援的敌第二十师以歼灭性的打击。第五兵团的歼灭打乱了中原国民党军的整个部署。这次巨大胜利，正是陈赓“牵牛”战术的成功，再次显示我军“指挥”、“调动”敌人获得胜利的奇迹。被俘的敌兵团参谋长李英才说：“贵军用兵真是神出鬼没。我们以为你们主力向西，结果你们主力在东。我们被你们拉着走了一个大圈子，肥牛拖成瘦牛，最后被杀掉了。”

平汉战役结束后，部队转往平汉线以西襄城、叶县地区集结，进行新式整军运动。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以来，因为受到老区土地改革运动在执行政策中出现的“左”倾偏向的影响，在新区发动群众工作和部队内部政治工作中也有所反映。有些同志过分性急，不顾当时新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强，我们各种工作尚无基础的具体情况，“走马点火”，到处斗地主、分浮财（粮食、财物）。结果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不敢接受；而且一下子把什么全分光了，弄得部队再转回来的时候没有粮食吃，有时影响部队作战行动。又因受到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的影响，在部队内

部也搞“贫雇农当家”，出现一股绝对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在有些部队中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陈赓及时地发现了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向党中央报告。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陈赓主持在叶县旧县镇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和毛泽东复示的精神，经过讨论，提高了干部思想、政策水平，作了妥善的解决。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旬，陈赓兵团协同华野西集团的两个纵队，在西北野战军于宜川歼敌五个整旅的大胜利后，乘陇海线敌一部慌忙西调的时机，发起洛阳战役。经过五天五夜的攻坚作战，解放了设有永久性防御工事的古都洛阳，歼敌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以下一万九千多人。这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中原地区对国民党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的一次攻坚战，在战斗中提高了我军城市攻坚的能力，为尔后夺取其它城市提供了经验。洛阳之战，再度切断郑州、西安间的联系，从此切断胡宗南赖以补给的陆上主要通道，使豫西、太岳解放区联成一片。这次胜利导致中原战局的主动权落入我军手中，整个中原的形势为之改观。从此，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赓兵团会师，进入机动歼敌的新阶段。

### 淮海战役歼黄维兵团

一九四八年秋季，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度的时候，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从九月解放济南以后各战场我军的胜利，到歼敌四十七万、东北全境解放的辽沈战役结束，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比敌人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转为优势了。这就加速了解放战争的

胜利进程。这年九月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粟裕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建议，乘济南胜利的余威，把战线向南推进，在陇海路东段和两淮举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毛泽东于二十五日致电粟裕和刘伯承、陈毅，同意进行淮海战役。

这时陈赓的司令部和中原军区司令部都驻在豫西方山地区。自从这年四月中原野战军主力进入豫西不久，陈赓就一直留在刘邓指挥部。五月到七月间，陈赓又在刘邓统一指挥下，率部参加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和豫东阻击作战。九月二十六日，刘伯承、陈毅召集陈赓和李达、陈锡联等，专门分析研究了形势。十月十三日，根据刘、陈指示，陈赓、陈锡联、杨勇、秦基伟在禹县拟定郑州战役计划。

在此期间，十月七日，陈赓陪同刘伯承、陈毅、李达，从中原军区驻地独树镇，乘车来到第四纵队，参加四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还视察了四纵队的军事演习。刘伯承说，我们很快就要在中原放手大打，形势的发展对部队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兵团作战，更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陈毅讲话时也强调要用组织纪律管教部队、约束部队。到会干部一致感到大战即将来临，确有必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跟上战争的步伐。陈赓当场代表部队表示拥护两位首长的讲话，要坚决地把部队整顿好，随时准备执行艰苦的任务。

十月十九日，攻取郑州的部队开始行动，二十二日全歼郑州守军九千九百多人。郑州解放次日，开封敌人惧歼东逃。江淮河汉间的战局顿形改观。这时，陈毅、邓小平在郑州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传达了九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

十月二十五日，遵照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命令，四、九

纵队配合中原野战军各兄弟部队，由郑州沿陇海铁路东进，开赴淮海战场。沿途痛击刘汝明第四绥区及邱清泉兵团第五军部队，在商邱地区截歼刘部第一八一师，俘四绥区副司令官米文和；继占汤山，从西面进迫徐州。这时徐州地区蒋军，象一群受伤的野兽，狼奔豕突，来回乱窜。孙元良兵团刚刚跑到宿县以南，又扭回头想增援徐州。十一月八日，陈毅、邓小平命令四纵、三纵及九纵第二十七旅，挺进津浦线上的宿县、夹沟地区，堵住孙元良兵团，斩断津浦线徐州、蚌埠段，孤立徐州蒋军，以保证华野围歼黄伯韬兵团的作战。陈赓即以四纵各旅猛扑津浦线，攻占符离集、黄山、李庄、夹沟各车站；继又协同兄弟部队北进，逼近徐州，第十旅同邱清泉兵团前来进犯的两个师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九纵二十七旅在三纵指挥下，协同兄弟部队，于十五日攻克宿县。

攻取宿县，截断津浦路，是淮海战役中一次重要行动，提前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封闭了敌人南逃的大门。黄伯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全被关在宿县这座大门以内。正自蚌埠北犯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已经进至皖北阜南，正向蒙城进犯的黄维兵团，都被关在大门以外。这一着打中了敌人的要害，卡住了敌人的咽喉，表现了军委和毛泽东的革命胆略。这是全歼徐州集团蒋军的重大措施。

在黄伯韬兵团行将被歼，徐州告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急令从平汉线东调，正在向北增援的黄维兵团兼程前进，并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由蚌埠北援徐州。中原野战军首长决心拖住黄维兵团的尾巴，好让华东野战军主力放手围歼黄伯韬兵团，于十一月十五日命令第九纵队并指挥豫皖苏独立旅及豫西两个团，在宿县、固镇间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第四纵队以

三日行程，迅速进至宿县以北地区待机。四纵受领任务后，部队昼夜兼程，于十八日进抵浍河南坪集地区。当时陈赓的指挥所还在靠近徐州的夹沟车站。他在十六日午后从夹沟车站乘坐汽车南下，当晚抵达浍河前线。

十一月二十二日，陈赓前往中野司令部驻地，参加刘、陈、邓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这一天，被围于徐州以东的黄伯韬兵团，已被华野部队全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刘伯承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已同意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的方针，华东野战军部队结束徐东作战后即可分别南下，钳制徐州和蚌埠之敌，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的安全。中原野战军当前任务是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尔后分割歼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认为黄维为免孤军被歼的危险，必将拚死向津浦线靠拢。因它机械化程度高，携有大量辎重，又急于东进，估计会继续选择宿（县）蒙（城）公路为主要通道，而这里只南坪集有座大石桥可以通过重炮、坦克。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宿蒙公路，坚决扼守南坪集作为扼守要点，乃令陈赓率第四纵队坚守。

这时，陈赓手里总共有十八个团的兵力，而黄维兵团则有四个军外加一个快速纵队，共计有三十三三个团，总兵力为十二万人。陈赓亲自到南坪集勘察地形，并向各部队首长分析黄维指挥上的弱点，同大家一起研究打法。他见南坪集以南是一片开阔平坦的田野，无险可守，地形有利于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如果我军固守村落，敌人优势炮火会把我们的阵地夷为平地，便命令担负阻击任务的十一旅将阵地推进到村庄以南数百米的田野上，在正面构成以班、排为单位的集团工事，以减少炮火杀伤，增强独立作战能力，待敌步兵冲到阵地前沿即突然开

火，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陈赓一直留在南坪集，在十一旅阻击部队进入阵地，敌人临近浍河时，他又亲自到突击连进行动员，鼓舞士气。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七时，黄维拿出他的“王牌”部队第十八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分向南坪集攻击。敌人轮番攻击我军各个阵地，均遭阻击部队痛击。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我军左翼阵地，不停地发起冲锋，全都被打回去。陈赓密切注视着前沿的战斗，得知指战员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便打电话传令嘉奖坚守立功部队。十二时，敌又以将近两个师的兵力向南坪集西侧轮番攻击，同样遇到顽强的阻击。经过整日激战，镇子里许多房屋全被夷为平地。敌军付出惨重代价，始终未能攻入南坪集。当天夜里，总前委决心采用诱敌深入，暗设口袋的打法，放弃南坪集阵地，诱敌十八军过河，拟将其装入预先布置的囊形阵地，利用浍河隔断敌人，以便中原野战军主力由东西两侧出击，求得先歼该敌其他各军。

我军在二十三日夜撤出南坪集一线。黄维以为我军被其击退，便于次日驱赶十八军、十四军各一个师渡河北进。该敌于行进中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不利态势，当天十七时即慌忙向浍河南岸退缩。我中野各部乘敌动摇之际，即从东、南、西三面全线向敌钳形展开猛烈的向心攻击，迫使敌人陷入我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至二十五日晨，我军即将敌包围于宿县西南以双堆集为中心半径十五里的地区内。二十六日，陈赓指挥所属各部从南坪集到东坪集一线强渡浍河，全线向敌追击，把敌人冲得溃不成军。二十六日，敌军整天突围未逞。二十七日再行突围时，敌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举行战场起义；陈赓指挥四、九纵队等部向敌侧背猛烈出击，将敌第十四军冲散，敌

军长熊绶春、军参谋长梁岱均一度被俘（后又逃脱）。这天友邻部队也都奋勇出击，黄维兵团其他部队也被冲得七零八落。二十八日敌人再次突围，又未得逞。二十九日起黄维调整部署，即在双堆集周围狭小地区，采取环形防御待援。

经过八昼夜的反复争夺，敌人被我严密包围。到十二月二日，敌人被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十里的地区内困守。

在此期间，陈赓在指挥作战中发现这里地势平坦，敌人利用村落集中兵力构筑环形工事，以家屋为核心，地堡群为骨干坚守，作困兽之斗。由于敌人缩成一团，工事及火力很强，攻进去很不容易。再加对敌防御能力估计不足，突击前准备不足，最初两天伤亡大，收效小。他便决定改变战术，采取攻击筑城、近迫作业，挖掘交通壕沟迫近敌人，作好周密的火力准备，再发起攻击。

对于如何消灭被包围在双堆集的敌人，逐步夺取敌人盘踞的村庄，各部队有两种打法：一种是用野战的办法，猛打猛冲，强攻敌人；一种是挖掘交通壕，近迫作业，距敌五十米左右处做为冲锋出发地，经过火力准备，发起进攻。陈赓认为，攻击筑城是攻击成功的先决条件，指示部队普遍采用“以战壕对战壕，以地堡对地堡”的战法，逐步延伸工事，进行了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构筑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以此紧缩包围圈，对付敌人的突围阴谋。结果，无数的地堡和散兵坑，从四面八方迫近敌人的阵地，有的挖到了敌人第一道鹿砦以内；同时又粉碎了敌人的破坏与反击，使得我军逐步地熟悉了阵地攻坚战术。这种战法的普遍采用，使整个战局顿然改观。

陈赓很重视重点火力准备。每次攻击部队不多（通常都是个把团的兵力），但都集中全纵队能用的大炮和大量的轻重机

关枪；还把华北战场上用过、在中原地区有了发展的炸药抛射筒在各部队推广使用。因为它的杀伤力特大，敌人闻之丧胆，把它叫作“原子炮”，或者咒骂为“没良心炮”。

十二月四日起，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进入最后阶段，阵地攻击。陈赓指挥部队采取稳步的攻坚战术，以构筑纵深坚强的攻防阵地，攻占一村巩固一村战法，逐个围攻敌人。总前委根据敌我情况的发展，于十二月五日发出对黄维的总攻作战命令，作战部署分为三个集团，以四纵、九纵、十一纵、豫皖苏独立旅附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地区的敌军突击；其他两个集团，分别向双堆集以西、以南之敌攻击。三个集团中，首先置重点于东集团，求得先攻占李围子、沈庄、杨围子、杨庄等处，使敌防御体系瓦解。

驻守李围子、沈庄、杨围子的是敌第十四军。十二月六日，陈赓命令十旅、十一旅和炮三团协同攻击李围子，打碎敌军坚固的外壳。经过周密准备，十六时三十分，我军炮火发挥神威，村中工事一小时内大部被摧毁，步兵飞速突破前沿，至二十二时解决战斗，全歼敌十师师部及两个整团；第二天，九纵二十六旅协同十一纵队攻克张围子，全歼守敌七十五师一个团。八日夜晚，陈赓又令四纵十旅、十三旅和二十二旅攻击李围子以西二里的沈庄，在步、工、炮兵密切协同动作下，仅十五分钟即解决战斗，全歼守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整团，打了一场“威风仗”。敌代师长潘琦被俘后心有余悸地说：“你们的重炮和炸药炮太厉害了，加上你们巧妙的坑道作业，和突击力的旺盛，使我们找不出丝毫对付的办法。几天来已经有三个团长被打死，十师师长张用斌和五十八师副师长吴宗远负了重伤。”为了不予敌以片刻喘息机会，陈赓又令四纵对敌十四军



军部杨围子发起总攻，经过一小时激战，将敌军部和十师两个整团全部歼灭，敌军长熊绶春被击毙，副军长、正副参谋长和两个团长均被活捉。这个时候，敌十四军已经全部被歼灭，黄维兵团东侧的外壳已被剥光，敌空投场和双堆集核心阵地都已落入我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敌人正面临着毁灭的末日。

十二月十二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联名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他提出最后警告，令即派人前来谈判投降条件。黄维执迷不悟，拒绝投降，妄作垂死挣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号召全军不怕最大牺牲，彻底歼灭敌人。十三日夜，陈赓指挥四纵攻击杨文学村，因敌施放毒气，延至十五日下午将其占领，歼灭守敌一个师部、三个整团。在此期间，陈赓又令九纵和十一纵连续攻占杨老五庄、杨子全庄、三棵树及杨四麻子，剥光了黄维兵团东面的最后一层皮。陈赓复令各部继续前进，直指敌兵团部核心阵地。这时得知黄维逃跑的消息，陈赓命令九纵向双堆集前进，第七十六团迅速占领了敌兵团部驻地东西马庄，控制了赖庄敌飞机着陆场；二十七旅攻占了吴庄、赖庄、金庄等地，八十团和七十七团与友邻部队协同攻占双堆集核心阵地。当夜二十四时，黄维兵团被我全部歼灭，持续二十多天的双堆集歼灭战胜利结束。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过程中，陈赓和全军指战员一起，紧张地度过了每个日日夜夜。他将前线指挥所从东坪集以北的杨庄，移到双堆集东北方向靠近前线的一个村庄。从这一天开始，他叫警卫员把卧具搬进作战室里（实际上很少有时间休息）。十二月六日夜间，对李围子总攻击开始以前，陈赓来到李围子以北距敌阵地只四十米的二十八团三营的前沿阵地上，

亲切地同战士们谈话，鼓励他们勇猛冲击，还仔细地检查了炸药抛射筒。接着，他又转到东面三十一团八连的前沿阵地上。敌人炮火猛烈，随他前去的一位侦察参谋在战壕里中弹牺牲了，陈赓仍然沉着地检查突击队的作战准备，和战士们在冲锋出发地亲切交谈。此后每次攻击，他都亲临火线，指挥主攻部队选择主攻方向，鼓励突击队奋勇作战。每次往前线去时，空中常有敌机窜扰，只能徒步前往。差不多每次都在前线待到深夜或拂晓方才返回指挥所。伤残较重的左腿，经常累得发肿，钻心的疼痛折磨着他，夜里得要卫生员按摩，才能稍减难以忍受的痛楚。

陈赓的行动为部队做出了榜样，东集团各纵队、各旅首长亲临火线指挥，深入部队动员，蔚然成风，有力地推动了各部队的作战。以后四纵《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中的经验总结》中指出：“高级首长深入部队动员，对战斗情绪的提高有很大的意义，如纵队首长亲到各旅及突击队动员都起了很大作用，在每次战斗前对突击队（尤其是对干部）明确解释任务与决心，严格要求其实行，并进行表扬鼓动工作，及时介绍友邻部队的作战经验，都能提高部队的作战意志与战斗情绪，这说明在连续残酷的战斗中，保持部队饱满的战斗情绪，直到最后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 南部边疆三次追歼战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东北、华北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均已解放；特别是歼敌近六十万的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奠定了肃清江北残敌、渡江南

进、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基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为部队的行动口号。淮海战役结束以后，陈赓所部集结到豫南平汉线两侧地区整训，总结经验，整编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全面准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由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豫西地方部队的一部分，以及淮海战役起义的廖运周师，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二月十四日，第四兵团在漯河宣布成立，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三月初旬，四兵团以十五军为先遣军，从漯河、周口地区出动，向长江北岸开进。三月二十日，刘邓命令在麻城、浠水、广济一线发起对桂系白崇禧部的战斗，使白崇禧误认为第二野战军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刘、邓随后又指挥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沿平汉路直迫信阳南下，威胁武汉，以进一步造成白崇禧的错觉。结果，就“指挥”了白崇禧部在安庆的夏威军主力西调于九江、武穴，一八八师从潜山、太湖西调黄梅，便利了我军的渡江作战。

这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政府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长江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个时候，第四兵团奉令在九江以东，从彭泽到东流沿线突破蒋军江防。当面守敌是刘汝明部六十八军，战斗力较弱，防御正面宽达百余公里。二十一日夜晚，陈赓指挥兵团左纵队在华阳至坝头段发起渡江作战。当天十六时四十五分开始炮火准备，神勇的炮兵压制住敌人的炮火，摧毁了南岸的灯塔。二十一时许，突击部队四十四师乘天

黑雨急的有利时机，战船齐发，经过三十分钟的水上运动，大部船只靠岸，迅速肃清沿岸守敌，把红旗插到香山、黄山上。右纵队十三军则于二十一日午夜攻占江心的八宝洲，次日占领马当要塞。四月二十三日拂晓，陈赓带领少数参谋人员从华阳镇随左纵队渡江，顺利到达长江南岸，即在弹痕累累的江边指挥部队作战。

陈赓兵团原定任务是要攻占南京、接管南京。但是，我军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敌人千里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整个反动统治机构迅速土崩瓦解，二十三日我第三野战军就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反革命中心南京。这时，刘、邓根据敌情决定，第二野战军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线；命令陈赓兵团直出上饶、弋阳地区，早日切断浙赣线，协同兄弟兵团歼灭沿线敌人，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隔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陈赓即率各军兼程南进，于五月初连克浙赣线上的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东乡各城和鹰潭。五月八日，陈赓又令我军一部奋勇南进，截击逃往福建的敌军，先头部队以两天二百七十里的强行军，于十日进占建阳，和由东线追击逃敌的我五兵团会师后，又以两天二百三十里的强行军，在十三日占领敌闽北空军基地建瓯；兵团主力则由浙赣路沿线西进，于二十二日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江西省省会南昌。

渡江作战以后，陈赓兵团连续作战一个月，行程一千五百里，歼敌二万四千余人。全军上下发扬了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作风，战胜了天雨、疾病和疲劳，以猛追穷追战术，歼灭了南逃的敌六十八军、一七四师、五十五军和交通警察纵队的一部，圆满完成了任务。

部队在赣江沿岸各地集结休整后，七月八日至十月八日，冒着江南盛暑，参加湘赣作战，进击白崇禧集团。这时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五兵团第十八军归四兵团指挥），在樟树至吉安的二百里前线上渡过赣江，追歼退往赣江西岸的夏威兵团残部，连续解放十座县城，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地区。老根据地的人民欢欣鼓舞，在“红军回来了”的欢呼声中，热烈迎接自己的军队。

七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指示，第四兵团及十五兵团（两个军）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进，占领广州。部队集结江西南部，进行进军两广、云南的准备工作。九月十四日，陈赓在赣州主持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到会作了报告。陈赓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会议根据陈赓的提议，作出反对骄横的决议，强调反对那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倾向；号召部队进一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九月下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陈赓兵团各部在万众欢腾的日子里，由江西南部开始向广东进军。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时刻，陈赓指挥第四兵团协同十五兵团各部越过赣粤边界的五岭山脉兼程前进，接连突破蒋军在粤北部署的三道防线，逼近广州。在我强大攻势面前，广东各处守敌闻风溃逃，十三日十时，敌人炸毁广州海珠大桥，弃城向西南方向逃跑。十四日十九时，我左路军自广州北郊进入市中心区。广州遂告解放。

十月十四日，当左路军进入广州市区时，右路军也已进抵广州市郊。毛泽东在十二日曾经指示：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

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因此，陈赓得知左路军已进广州市区，守敌已向西南方向逃跑时，即决定右路军四兵团所有部队一律不进广州，不停留地追击逃敌。他命令十五军向佛山方向、十四军沿北江西岸向三水高要方向、十三军向三水方向追击。各部不顾疲劳，奋勇前进，十四军于十六日解放四会，击溃敌十三兵团部，查明了敌刘安琪兵团等部正向雷州半岛逃跑，余汉谋已于十三日逃往湛江。这时，敌已远离我一百公里以外。陈赓即决定由十四军统一指挥该军三个师和十五、十三军的三个师，即刻行动，追歼逃敌。终在阳江、阳春地区截住敌人，将其团团包围。二十六日拂晓各部向敌总攻，于十二时结束战斗，被包围在这里的敌军约四万人全部被歼灭，其中击毙击伤及溺毙海中约一万余人、俘虏三万余人。

广东战役经过一个月的艰苦作战，取得巨大胜利，共计歼敌六万二千多人（陈赓兵团各部歼敌四万九千多人）。到十一月初，除海南岛、雷州半岛南部及其他一些滨海地区以外，广东全省大部宣告解放。广东战役的伟大胜利，为解放海南岛，为歼灭白崇禧集团、解放广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广州市一次祝捷集会上，叶剑英高度评价陈赓的指挥才能，表扬第四兵团是英勇坚强，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部队。他还特别指出：这个部队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有觉悟。广州这么大的城市，物资又这么多，部队到了城边，发现是空城，不进城而去猛烈追歼逃敌。如果没有很高的觉悟是做不到的。

广东大部解放后，摆在陈赓兵团进军路上的敌人，就是正在缩回广西老巢的白崇禧集团。这时，第四野战军主力集结在湘桂边境，陈赓所部陈兵雷州半岛，堵住敌人向海南岛的逃

路，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形势。广西战役从十一月七日开始到十二月十一日结束，历时一个月零五天，将白崇禧集团全部歼灭。全战役歼敌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队和三个兵团部、十二个军、二十五个整师；还有两个兵团部、十个师的大部，共计十六万七千九百余人（陈赓兵团在此战役中歼敌七万余人）。广西战役歼灭了国民党残存于大陆的最大一股武装力量，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四兵团在两广作战中，在有关部队行动、作战等重大问题上，陈赓曾经多次遇到林彪的干扰。每次他都及时向林彪提出建议，同时报告刘、邓、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取得上级同意后，在实际作战中纠正了林彪指挥上的错误。

陈赓率领第四兵团在解放战争后期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的最后一战，就是一九五〇年一月进军滇南，解放云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云南人民富有革命传统。从一九四七年起全省许多地方开展了武装斗争，到了全省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已有十二个支队，开辟了几大块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相继解放贵州、四川广大地区并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歼灭于成都地区。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但是，盘踞在滇南的蒋军第八军、二十六军不知悔悟，继续与人民为敌，妄图进窥昆明，作垂死挣扎。这时，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回云南，将敌第八、二十六军组编为第八兵团、自兼兵团司令，于十二月十八日悍然进攻昆明。从贵州入滇的解放军支持昆明人民和起义军击退了汤尧的进攻。敌第八兵团退集蒙自、个旧地区，控制滇南，准备负隅顽抗。这时，敌人距离国境只有一百多里，并且拥有蒙

自飞机场，自以为抵抗不成，逃跑方便。毛泽东为能歼灭这股敌人，除令由黔驰援的我军停止前进以麻痹敌人外，命令驻百色的四野一个军以一部就近向滇越边境前进，断敌向越南的逃路；又令陈赓派出兵团主力一部迅速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纵队歼灭该敌。这样，毛泽东就又布置了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于滇南地区的作战计划。

敌人原来估计我军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到达，汤尧正准备把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去，而将第八军留在滇西“坚持”。但是他的部队尚未飞走，我军经十四昼夜前进一千八百里，已经占领了蒙自机场。集结蒙自地区、准备飞跑的敌人，急忙向西、向南逃命。陈赓十三军配合边纵部队强行追歼，先在个旧、屏边地区歼灭了敌二十六军，又穷追向滇西南逃跑的第八军。经过十多天的艰苦作战，在元江、镇源地区歼灭了第八军，活捉了汤尧和敌八军军长曹天戈，只三千多敌人跑过元江，没命地向国境线上逃跑。陈赓命令我军一部跟踪猛追。追击部队越过哀牢山，跨过阿墨江，穿过瘴病区，整整追了八天八夜，终于在镇源地区追上敌人，迫使这股敌人投降；另一股残敌直奔滇缅边境，被我军跟踪追击了两千里，最后在南峽县被彻底歼灭。稍后一些时间，我十五军、十四军及边纵各一部，协同兄弟部队解放西康省会西昌，歼灭了胡宗南集团残存的最后一股部队。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第四兵团由陈赓、宋任穷率领进驻昆明。卢汉和昆明各阶层人民、起义部队共十二万人组成的欢迎行列长达十余里。到处是红旗和鲜花，欢呼和歌唱声震云霄。

第四兵团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在刘伯承、



邓小平直接指挥下，在三年多解放战争的时间里，转战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十五省，行程三万里，歼敌七十万，解放城市二百座，完成了党和上级给予的战斗任务，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册中，将会永远闪耀着第四兵团全体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在亿万人民的记忆里，也将永远铭刻着陈赓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 从越南战场到朝鲜前线

第四兵团进驻昆明不久，陈赓受党中央的重托，代表中共中央，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越南，帮助越军在边界战役取得转折性的伟大胜利。

那是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陈赓率领的由政治、军事和后勤干部十余人组成的工作组，从昆明出发，穿过滇南和越北的高山密林，走了二十天，于七月二十七日到达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府和越共中央所在地太原省，见到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还有我国驻越政治顾问团团团长罗贵波。

工作组在这里受到热烈的欢迎，胡志明激动地拥抱陈赓。他们是老战友，早在中国大革命时代，就在广州结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当时胡志明化名李瑞，在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处任翻译（他在广州组织在中国的越南青年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陈赓则是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骨干，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和胡志明一起度过了一段同甘苦、共患难的生活。这时，胡志明战斗几十年，呕心沥血缔造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正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杰出指挥员陈赓代表中共中央来到越北前线，两位老战友久别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有天吃饭时候，胡志明高兴地吟诵两句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表达了他和老战友重逢的欢愉心情。

陈赓在太原省住了五天。胡志明和越共中央常委会接受陈赓的意见，确定了边界战役的指导方针：主要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改变越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争取完全主动。

七月三十一日，陈赓一行离开太原省，前往高平附近的广渊，同越军总部和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一起制定了战役作战计划，决定先打高平、谅山之间的小据点东溪，拦腰切断第四号公路，把敌人打痛，然后南下围攻七溪，迫使高平、谅山守敌出援，在运动中消灭他们，最后即可拿下第四号公路北端的敌军重要据点高平。

九月十六日，越军按照预定计划，向东溪法军发动进攻。东溪虽然是一个只有三百多名守敌的据点，因为工作组初来帮助兄弟国家打仗，对于越军和法军的情况都不熟悉；同时了解到越军还缺乏攻坚作战经验，所以陈赓对这一仗兢兢业业，全神贯注，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一直同前线指挥部保持密切联系，随时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协助指挥战斗。十八日上午，边界首次战斗告捷：越军全歼东溪守敌，活捉敌军指挥官。这天陈赓正在考虑下一仗如何打，胡志明来了，非常高兴地题赠陈赓一首中文诗：“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里山拥万里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

东溪战斗的胜利，引起敌军的惊慌。驻高平的法军指挥官沙东上校率部弃城南逃，七溪指挥官勒巴上校带领两千多人北

上接应。陈赓和胡志明研究商定，在东溪附近布置袋形伏击圈，先吃勒巴兵团，再歼沙东兵团。越军连续战斗九昼夜，紧紧咬住敌人，不让他们会合，又于十月八日发动猛攻，全歼勒巴兵团，勒巴和他的参谋部人员全体被俘。第二天，沙东兵团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是越军一次空前的胜利，全歼敌军三千余人，俘虏了法国三个上校和许多中下级军官。

巨大的胜利使河内法军指挥部惊慌失措，急忙命令太原、七溪、那岑、同登、谅山、老街、陆平、安州守敌全都撤退，越北边境的法军防御体系全线崩溃，越南的国际交通线畅通了。在北部平原地区，越军这时也攻占或逼使敌人撤出四十四四个据点。法军的“东西走廊”被摧毁了，从越北根据地到中部第四联区根据地的交通线打通了。

这次边界战役，越军总部原来计划歼敌五个营，结果歼敌九个营共八千人，其中五个营是机动部队，占敌人在印度支那北部机动部队的二分之一；原计划主要解放高平，结果解放了五个城市、十三个市镇。战役结束后，胡志明在一次干部集会上说，边界战役的战果，远远超出我们原定的计划，“这次战役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越军战役指挥部在总结报告中说：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法国殖民者封锁边境、孤立越南的战略意图，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产生极大影响，这是越南“抗战史上一次最大的胜利”，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适合我国的环境和武装斗争。”这个时候，胡志明派人给陈赓送来几瓶缴获的法国香槟酒和一封信，信里是一首祝贺胜利的中文诗：“香槟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敌兵休放一人回！”

陈赓在越南工作期间，不仅帮助越军总部组织和指挥边界

战役，而且从一开始就认真考虑怎样帮助越南建军。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工作组离开越南前夕，陈赓应越军总部的请求，给营以上干部二百多人作了四天的战役总结报告。他通过这次战役的总结，通过讲成绩和意义，深刻地讲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宝贵经验，还特别针对越军在战斗中所暴露出来的弱点，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这次报告对于越军当时的作战和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个报告在越军干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们说：这样全面分析越军的优缺点，把问题和盘托出，在越南还是第一次，听了很受教育。

陈赓这次受命入越，从对越、法两军进行调查研究，到制订战役计划、组织战前准备等一系列工作，都以高度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群众路线作风，按照越南战场的实际情况，为越军作了一次组织战役工作的典型示范。在帮助越军总部进行战场指挥的时候，显出了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指挥员的英明、果断和坚决，为越军培养了积极顽强的战斗作风，使边昇战役得以全胜告终。战斗结束后，他对越军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尖锐、明确和中肯的批评建议，为越军大兵团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赓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判断问题敏锐而准确。他坚持原则，喜欢坦率直言，处理的方式却很灵活，善于对各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循循善诱，使对方乐于接受，取得最好的效果。他的这种性格和作风，赢得越军干部发自内心的敬佩。胡志明称道陈赓的风格为“老布尔什维克风格”、“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他坦率直爽的性格，认真负责的作风非常满意，多次高度评价陈赓和他带领的工作组在越南的重大成

就。十月二十四日，越方为庆祝边界战役胜利而举行的中国顾问与越军干部聚餐会上，胡志明在讲话中谈到这次胜利的原因时，把中国的援助放在第一条。他说，这次胜利的主要力量，一句话就够了，大家就明白了，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确，陈赓此行是成功的，为我党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国际主义任务，在中越两党、两军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陈赓从越南高平启程回国，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北京。陈赓在越南期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刚从硝烟弥漫的越南踏上祖国的土地，伟大的国际主义激情又把他的心带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他在十一月五日的日记里写道：闻悉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我甚兴奋，昨晚为之失眠。”十一月六日又写：“昨夜失眠，总是考虑着朝鲜战事。”在这些不眠的夜晚，陈赓心潮澎湃，思绪万端。他想到世界上还有许多被压迫民族尚未获得解放，还有亿万人民呻吟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想到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及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坚持斗争，争取解放的光辉前景。……他以无比兴奋地笔触写道：“想到这里，不禁欢喜若狂。但是工作是艰苦与残酷的，我准备贡献我的一切。”

陈赓从越南回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在越期间的工作以后，“马不停蹄”，就于一九五〇年底离开北京，经由沈阳前往举世瞩目的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发动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他在这时参加了彭德怀司令员在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开完会，他到前线去看望几个部队，在朝鲜前线 and 后方兜了一大

圈，然后搭乘火车返回北京。

一九五一年春天，陈赓正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他直接领导下，这个兵团的领导机关迅速组成，率领部队入朝并即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但在陈赓行将动身赴朝时，由于长期以来工作过于劳累，伤残的腿踝关节肿了，无法行动，确诊为左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留他在京医治（后又转往大连治疗）。这年八月中旬，他的腿部刚刚消肿，即行入朝。这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三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当时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驻在大水洞一带，陈赓先到三兵团住了一段时间。他在这里会见干部，听取汇报，询问情况。从第二天起，就分别召集兵团和各军负责同志讨论第五次战役作战经验及作战准备情况，对于尔后的工作做了部署。他于九月二日到达驻在伊川西北空寺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九月十五日迁到平壤以西的松仓）。从此，陈赓就在司令部协助彭德怀工作，在这里和彭德怀一起工作的，还有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副司令员邓华等。

陈赓入朝的时候，我军正在朝鲜战场上进入战略防御的新阶段。彭德怀当时就此指出：在大规模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可能性减少了，我们必须准备持久作战，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这种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对每一阵地必须反复争夺；同时采取反击及小出击，歼灭敌人。在防御作战中，在敌人大量的航空兵、炮兵、坦克的毁灭性的轰击下，能不能守得住，就成了对我军的新的严峻考验。

美军不但地面炮火占优势，海空军也占优势，它凭恃他们钢铁多，在一九五一年发动的秋季攻势中，采取所谓“钢铁战

术”，把大量的炮弹和炸弹倾泻到我军阵地上。在敌人的重点进攻中，火力更加集中，攻击我军一个连或排的阵地，每次发射炮弹一万发以上，甚至三万发以上。我军工事被毁，地面土被打松，部队利用弹坑顽强抗击，战斗异常激烈，伤亡较大。有的部队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忍受最大的艰苦进行连续战斗。

在这样情况下，为了避免敌人优势火力杀伤，增强战斗的依托，以便更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与器材，有个部队的战士在野战工事里挖了“猫耳洞”掩体，后来逐步挖深，形成了一条互相连接的小型坑道。彭德怀发现后，极为重视，并在全军推广，在全战线上掀起了构筑工事的热潮。

陈赓回顾我军战史，想到淮海战役期间坑道体系所起的巨大作用，又分析了当前朝鲜战场的作战情况，积极支持彭总关于部队挖掘坑道的号召。第三兵团第十二军首先动手，在阵地上普遍挖了坑道。在官垓里西山的防御战斗中，十二军坚守坑道十昼夜，最后将敌人的进攻粉碎。我坚守坑道的部队，全都粉碎了敌以施毒、喷火、爆破、挖顶、堵口等手段破坏我坑道的企图，并且不断地向占领我地面工事之敌进行反冲击，并配合第二梯队反冲击以夹击敌人，显示了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的优越性。但是，当时也有人反对挖掘坑道工事，认为这是“自掘坟墓”。

一九五二年四月，陈赓曾经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在志愿军司令部召开了各军参谋长会议，解决了有关坑道作战的一系列问题，从战术问题到挖掘技术都交流了经验，更进一步统一了对坑道工事在当时防御作战中的作用的認識，统一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

这次会后，志愿军坑道工事便在统一的要求与组织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兵团十五军接防的阵地上，过去竟然连一条坑道工事也没有挖。陈赓闻讯，即令三兵团所属其他两个军抽调部队，帮助十五军挖掘坑道工事，并请国内工业部门解决炸药和打炮眼工具，仅经几个月的时间，就在阵地上挖成了完整的坑道体系。以后在赢得世界声誉的上甘岭战役中，我十五军和十二军防守的阵地，经受住了世界战争史上空前集中的火力的最严峻考验。这次战役，也是对我军阵地防御，特别是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的一个严重考验。整个战役历时四十三天，一直在三点七平方公里狭窄地段内进行，敌人共向这里倾泻炮弹一百九十多万发，最多的一天达三十多万发；投掷炸弹五千多枚，最多的一天达五百枚，山顶土石打松一米多深。但是由于我军英勇顽强，积极主动，各兵种密切协同，正面抗击，坚持坑道与不断的反冲击，与敌反复争夺二十九次，终于粉碎了敌人对上甘岭的进攻。敌人付出重大代价（伤亡二万五千多人，损失飞机二百七十四架、大口径炮六十门、坦克十四辆），仅占去我前沿两个班的阵地。我军在上甘岭五三七点七、五三七点九两个高地的坑道坚守，两处山头被敌人的炮火削低了两三米，但是我军伤亡甚小，通讯联络一直畅通。其后全军掀起构筑坑道工事热潮，在朝鲜北部东西海岸前二百五十余公里战线上，筑成一条巨大规模和交织连贯的地下长城，形成宏伟的防御体系，使我军的防御获得空前的稳定，使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归于失败。

一九五二年三月，陈赓奉命归国，只在北京停留二十来天，因彭德怀额上生了一个肿瘤，中央决定要他回国治疗，又命陈赓重返朝鲜前线。这个时候，灭绝人性的敌人，实施了空



前规模的细菌战，除对朝鲜北部七个道，四十四个县撒了细菌外，美机竟又侵入我国领空，撒了带菌昆虫。敌人还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以狂炸我交通线的“绞杀战”与细菌战相结合，残害我中朝军民，削弱我军防御力量。陈赓和志愿军司令部各负责同志，共同领导部队粉碎了敌人这些阴谋。

当时由于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我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部队缺乏精通科学技术的人才，造成在朝鲜战场的困境，只能挖掘坑道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许多战斗由于装备技术落后的影响而不能取得胜利，或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些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刺激了陈赓，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沉重的压抑。他在这时深切地感到，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了，在战争中就要挨打。如何改进我军的技术装备，如何培养前方急迫需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维护、使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陈赓朝思暮想、经常思索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头脑里开始孕育了尔后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理想。

陈赓两次入朝，都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除了有关作战方面的日常事务，他还常到前方部队了解情况，经常研究美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帮助彭德怀考虑我军作战部署。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志愿军司令部召开了有各军以上的参谋长参加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由他主持，对于志愿军入朝以后的作战经验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此外，他还做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对新轮换入朝的部队介绍情况；对调动工作的高级干部谈话；接待朝鲜方面代表和祖国各地派来的慰问团，等等。

陈赓长期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对彭德怀一直都很尊重，他的军事才能也深得彭德怀的赞赏，彼此在共同斗争中建立了

深厚的战斗友谊。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分昼夜，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从来不顾个人安危，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身体。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安全和身体非常关心，曾多次表示关切并提出要求；志愿军党委和几位领导同志，对于如何切实保障彭德怀的安全，也曾专门做了研究。这次彭德怀患病，周恩来特地派人到朝鲜接他回国治疗；志愿军几位领导同志也劝说彭德怀早日回国。彭德怀在朝鲜战局稳定后，才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动身回国。这个时候，彭德怀的职务即由陈赓代理；和陈赓一起留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有志愿军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副司令员宋时轮、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等。

朝鲜战场上的生活异常艰苦。陈赓头次入朝时，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空寺洞，原是一座金矿，在矿洞里，由于上面漏水，人们住在里面还得遮上防雨布。因此，便在洞外山坡的树林里面，用树枝、木板和茅草搭盖草棚。陈赓和彭德怀住在简陋的草棚里，除了一张行军床和板壁上挂满军用地图外，几乎一无所有。以后志愿军司令部迁到桧仓，驻地又是一座过去的金矿。矿洞很深，里头缺氧，也很潮湿，到处淋水。初时没有电灯，洞中阴暗，人们进去需带手电，否则难以进出。洞中较低矮处，走路必得低头，而且曲折迂回，象在迷宫。由于敌机轰炸昼夜不停，人们整天呆在洞里。陈赓和彭德怀等住在靠近洞口的矿洞里面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间里。那时陈赓身体不好，经常感到头晕脑胀。一九五一年九月下旬，刚搬到桧仓金矿时，他的日记里常有这样的记载：“洞居，潮湿又黑暗”；“洞中氧气缺乏，使人头痛欲裂，窒息得呼吸不灵，但仍是开会。”“会完结。人在病中。”“昨晚失眠，下夜一时尚不能入睡。”尽管这样，陈赓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每日必须看上百份的

电报。关于作战问题，必须亲自与及时草电答复。”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旬，陈赓奉调回国筹办军事工程学院。在他离开朝鲜以前，连续参加了多天的会议。六月十三日，他离开桧仓，途经平壤，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受到朝鲜同志的盛情款待。第二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授予陈赓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为朝鲜战争胜利立下的功勋。

### 为国防现代化造就人才

一九五二年六月，陈赓从朝鲜回国以后，就着手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等军事技术学校——军事工程学院。同年七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这所学院的院长兼政治委员。这时苏联派来了以瓦·依·奥列霍夫空军中将为首的专家小组。他和奥列霍夫一起制定建院规划，并且一同坐飞机到各大城市勘察地点，最后把校址选定在哈尔滨。同时确定这个学校要办成一所包括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五个军（兵）种的综合学院。

八月二十二日，由陈赓领导，在北京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陈赓领导筹委会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因有周恩来的关怀和各有关方面的支援，很快就从各地抽调了近百名学有专长的教授、副教授；又从各大军区挑选三百名优秀大学毕业生成立助教队，训练师资。到一九五三年八月正式开学前夕，全院已拥有各类教师五百人、实验人员三百人。同时制定了建筑面积五十多万平方米的建校计划，开始着

手校舍的建设。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哈尔滨冻土未开，五千名建筑工人已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这场战斗，仅七个月就建成了十万平方米、三十六幢高质量校舍。为使学院能给国家早日培养出急需的军事技术人才，陈赓坚持边建、边学、边教的方针，一九五二年底先从部队招收一批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的学员，第二年初即办起新生大队，补习基础课。经过紧张的筹备，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即举行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

数以百计的老教师陆续调来学院，陈赓把他们看成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办好这个学院的依靠力量。在工作中，他对来校的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尽可能地予以照顾。他把老干部和老教师当作学院的两根支柱，提出“两老办院”的方针，以便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即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又将科技知识传授给青年教师和学员。他常教育军队老干部要尊重、团结知识分子一道工作：“既要承认自己的长征两万五，也要承认人家的十年寒窗苦。”

陈赓号召教授、专家做学院的主人，政治上对他们非常关切，十分信赖。有次学院保卫部门反映，有个教员是台湾国民党某大员的妹妹，不宜留校工作。陈赓说：“她确实有个哥哥是国民党的要员，可是她还有个哥哥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她没有跟国民党的哥哥跑到台湾去，却跟共产党的哥哥留在祖国大陆，不正好说明她是进步的么？”作为学院党委书记，他常关切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有次，他鼓励学院保卫部副部长介绍两位现实表现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教授入党。

当时政治运动比较多，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每

次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触动。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曾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或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日趋严重的“左”的偏差。陈赓却坚决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警惕“左”倾思潮的干扰，极力设法消除“左”倾思潮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善于使用高级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中，他对一切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采取坚决保护的态度，不让随便给他们戴政治帽子。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曾到外国留学，在旧社会做过事，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老怕挨整。陈赓亲自找他们谈心，恳切地说：你们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社会关系，讲清楚就是了，放下包袱，好好工作。难道你们的社会关系还有我复杂？我家里是大地主，我给蒋介石当过副官，还救过他的命。当我看到他的本子上说“陈赓是共产党员，不可信用”，我就设法脱身离开了，蒋介石后来要杀我，宋庆龄救了我。所以，问题不在于同蒋介石有没有关系，而在于同他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背了家庭成分包袱的，陈赓也用实际的事例同他们讲：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

有个从前学弹道的专家，曾留学法国，是国民党军队少将，解放战争中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有过贡献，但他以后犯了贪污罪，在“三反”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二年”。筹办军工学院时，有位教授对陈赓说他是宝贝，提名要他。陈赓说：只要是宝贝，就可以叫他立功赎罪嘛！陈赓马

上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打电话，请董老“刀下留情”。后经研究，叫他立功赎罪，改为监外执行。两个星期就办完了手续，带着手铐被押送到筹委会。陈赓叫把手铐去掉，送到学院专门翻译科技情报资料。这人一面劳动，一面工作，后被政府特赦。对于这个人的处理过程，说明陈赓爱惜人才，凡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要让他能为祖国服务，即使这样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也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

他还无微不至地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关心并且及时解决他们教学工作遇到的困难。每次从北京回到哈尔滨，一下火车常是先到斜纹二道街宿舍去看望老教师，然后才回家去。这些情况使老教师异常感动，都把陈赓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亲人。由此促进了他们同党的关系，鼓舞了他们的政治情绪和工作热情，政治思想方面也表现了较快的进步。

当时学院聘请了许多苏联专家。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专家，是真诚帮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的专家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首席顾问瓦·依·奥列霍夫积劳成疾，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哈尔滨逝世；负责教育的副首席顾问依·依·叶果罗夫，也是坚守岗位，积劳成疾，于一九五六年回国治疗，不幸于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逝世。陈赓对待苏联专家的工作是尊重的，态度是严肃的，每次同他们开会、研究问题之前，他总要认真进行准备。

他很关心苏联专家的生活，有人病了，他都到医院里去看望。有一次奥列霍夫心脏病发作，他从北京派出专机送治疗心脏病的专家黄婉大夫飞往哈尔滨去抢救。

作为一所高级的军事工程学校，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提高科技课程的教学质量。当时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从陈赓起到从

部队调来的许多干部都不懂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还在筹备期间，陈赓就曾带领一些同志，访问过国内知名的理工科大学，例如北京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开学以后，他又带领大家主动地向老教授和苏联专家请教；组织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钻研学术，掌握科学技术，每周请教授讲课，使自己成为通晓教学工作的内行。

他很重视学员的训练质量，非常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和革命军人素质的培养。他很注意野营教育和军事训练，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对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十分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实习工厂的建设。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各系科学研究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还不断地组织力量，检查教学工作，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

他也非常关心学员的生活。当时学员伙食标准比较高，规定一律吃中灶，每顿四菜一汤。他还从志愿军三兵团调来几位善于办伙食的干部，在他主持下多次开会专门讨论改善学员生活问题。他向全院工作人员指出：“我们所有的工作部门，都要为学员服务。”要求学院的“一切人都要为学员着想，对家属、保姆也要灌输这个思想。”他常带领有关人员到学员宿舍检查，问大家住得方便不方便？还常在学员起床或就寝前后走进宿舍去，看看秩序和卫生情况，摸摸学员盖的被子暖不暖。他主张广泛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把学员的课余生活搞得丰富多彩。

由于陈赓的正确领导，军事工程学院发展很快，到一九五七年就初具规模：校舍六十万平方米，教师一千六百人，专业三十四个，实验室一百四十九个，教材、图书、仪器，设备数量相当可观，也比较先进。一九五八年，学院技术力量在技术

革新中又有发展。国防部长彭德怀这年九月来院视察后向军委和党中央写报告说：“军事工程学院经过四、五年的经营，规模很大，在远东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钱学森教授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到学院参观时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的军事技术学校，在世界上也是奇迹。”陈赓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国防技术人才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sup>①</sup>。

## 战斗的晚年

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仍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职务。从此，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北京。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九月二十九日，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九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九月二十六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到北京工作后，还常到国外出访，一九五六年四月，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越南；一九五四年九月和一九五七年九月，两次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

---

<sup>①</sup> “文化大革命”中，军事工程学院遭到破坏，1970年被拆散南迁。1978年6月，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军事工程学院搬迁到长沙的力量为基础成立国防科技大学。



由于长期处在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又曾三次负伤，陈赓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随着年岁的增长，特别是建国后工作异常繁忙。过度劳累，陈赓的健康情况逐年下降。一九五四年，他调任副总参谋长这年，就已发现血管硬化的病症。到了一九五七年，健康情况更有显著的恶化，但这一年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二月下旬，他离京到南方检查工作，并在沿途勘察地形，先后到过南京、无锡、镇江、苏州、嘉兴等地；三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其后再经宁波到温州三线进行勘察，直到四月方才告一段落。他在这次勘察中备历艰辛，在风急浪高的海边，拄着拐杖，一个岛一个岛地深入部队，由于过度疲劳，有天晚上曾摔倒在浴室里。但他毫不在意，忍着疼痛继续工作。直到他逝世后，解剖遗体时发现，他胸前的几根肋骨曾经折断过。这次勘察完毕，回到北京，他就陷入特别紧张的会议生活。六月底，他又离开北京，冒着南方盛暑天气，前往广东、福建沿海各地，继续进行军事勘察。九月初旬，他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在苏联逗留一个多月。十月间返回北京不久，他又去南方参加陆海空三军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他从南方回来，身体健康情况已严重恶化，但他艰难地支撑着，不声不响地照常上班。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这位在任何场合都异常刚强的人物，突然被一场恶性的疾病击倒了；这天早晨心肌梗塞症发作了，经过抢救当夜十一点多钟方才苏醒过来，遂即送进北京医院，卧床三个月，才能起来走动。一九五八年三月，他从医院回到家里，医生要他全休疗养，还从医院派来一名护士照料。这年秋天，病情逐渐好转，他又要求上班。后经医院过细检查，报告中央批准他每天用一点时间上班试试。但他一旦开

始工作，就又全神贯注地大干起来。他对自己的病，一直不那么相信，不那么在意，心里装的只是工作，从来不谈自己的病。他的胸口常痛，但仍一面坚持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久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一大片。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间，他的心肌梗塞病第二次发作。以后，中央军委决定逐步减轻他工作上的担子，以便专心治疗。他对自己的病情始终估计不足，每逢遇到重大的紧急事件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毛遂自荐”，站出来“请战”。

陈赓晚年，就是在他生病这几年，正当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前期。这十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存在“左”的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党内斗争比较复杂而且频繁。陈赓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对党忠心耿耿，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一切错误倾向不能容忍，总是抱着不妥协的态度进行斗争。对这个期间正在泛滥开来的“左”倾错误，一些“左”的做法，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如对“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运动，他就表示保留的态度。一九五八年夏天，这个运动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的时候，军事工程学院党委打电报来请示：是否为此停课？他回答说：那不行，学生要学习，怎么能都叫大炼钢铁去？为此他去找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黄克诚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俩又去请示兼任国防科委主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聂总也支持他。他就马上答复军事工程学院：照常上课。他见总参机关里头，也把许多有用的铁器拿去化铁；没有引火的东西，把房屋的大梁都砸掉烧了。这些作法分明是劳民伤财，天天还要当作成绩上报数字，他便

批评道：“你们是‘左’倾幼稚病！”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勇气才敢这样讲话。

这一年，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在军队中突然发动了一场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这场矛头指向军事院校的运动，直接影响到军事工程学院。从上边派来指挥这个运动的人，一到学院就说原来制定的教育计划全都错了，使得一些主管教学的同志受到了错误批判，被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陈赓感到这股风的气味有些不对头，曾告诉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刘居英副院长坚决顶住，对于想要完全否定以前学院成就的歪风不要让步。由于他的干预，这个运动的开展在这里受到限制，不象有的院校造成那样大的损害。实践证明，陈赓的意见是对的。以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说：“建国以后，办了许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军委领导同志的讲话，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陈赓直言不讳、勇于斗争的可贵品质，得到老一代革命家的赞扬。在一九五八年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陈毅听了陈赓旗帜鲜明的发言，当场高兴地说：过去我和一些同志相处多年，他们遇事躲躲闪闪，藏在心里的东西掏不出来。陈赓同志就不一样，他象一个玻璃杯，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一九六〇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陈赓发言以后，陈毅又站起来讲道：陈赓同志就是我们党内一门炮，可惜现在我们这种炮少了些，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炮。陈赓同志，我有什么错误，你也可以轰一下呀！

一九六一年初，陈赓住在北京寓所，一直感觉房子里闷，

对家人说，房子太矮，气压低，呼吸不畅。其实是他本身不舒服，心肌梗塞症扩散的面大了，是胸闷。元旦过后不久，他让把寓所的房子修理一下，加高一些，就和全家人暂时搬到西直门内一个招待所去。

陈赓在招待所没住多久，就应上海市委的邀请，前往上海疗养。临近春节的时候，陈赓乘坐专列前往上海，住在华山路华东局招待所。这是一座民族风格的别墅，花木繁茂，美雅幽静，周围有许多花园洋房，远离闹市，宜于疗养。因为病情严重，医生不让他会客，不叫他多谈话，只让他在住处园内散步，间或到近处街道上走走，观察市民的生活。他是一个老上海，看到群众生活已有很大改善，心里高兴。

这个时候，中央军委有个通知，要求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就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因为陈赓病重，军委总参谋部本来决定不告诉他，结果他还是知道了。陈赓向来重视总结作战经验，战争年代每当一次大的战役结束，他都亲自主持及时作出总结。此刻他的病情已极度恶化，体质异常虚弱。他明知写出这个总结是吃力的，还是决定马上着手写作这份总结。从此接连几天进入沉思，毕生的戎马生活，连年的南征北战，好象一部连续影片，一幕一幕地浮现脑际，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他在三月七日开始口述，由秘书笔录，整成纪要。陈赓不很满意，便亲自改写。一旦动起笔来，写提纲，看材料，钩沉索微，呕心沥血，十分劳累，有时须吃咖啡，有时要喝浓茶，相当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病情；再加进入三月以后，上海天气反常，经常阴雨刮风，气温偏低，最高气温常在摄氏十度左右，使他常感不适。这些因素加速了心肌梗塞病的第三次发作。这篇总结终于未能完稿。他

原计划分作六章：《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结果只完成了《序言》部分。

三月十四日，上海最低气温降至三度。十五日午后，陈赓就大感不适。但他仍整天忙着撰写总结的事，直到黄昏时分，才放下笔来。连日以来，他的健康情况愈益恶化，常感全身瘫软，动作艰难，轻度劳动也难胜任。如象挂衣服这样的小事都非常吃力，手臂往上举不行，向下伸也困难，稍稍活动就感到心慌、气短、出汗。这天夜里，陈赓感到胸闷，有时隐隐地疼痛。这阵不很剧烈的胸痛，原是他这次心肌梗塞大发作前出现的征兆。

三月十六日黎明，窗外冷风呼啸，寒气逼人。六点多钟，陈赓为剧烈的胸痛惊醒，心肌梗塞病已第三次发作。虽经抢救，终于无效。陈赓忍着疼痛的折磨，在床上挣扎着熬过了最后的痛苦时刻（以后遗体解剖时，心壁瘤——心肌梗塞后的淤血，大约十毫米厚），延至早晨八时四十五分，毕生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赓同志，终于停止了呼吸，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新华社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讣告》。《讣告》高度评价：“陈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同时指出：“陈赓同志三十九年如一日，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具有无产阶级的坚定性格，顽强不屈的革命魄力和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军现代化、革命化建设中，都坚决地拥护和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取得了卓越的成绩。陈赓同志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生，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公祭陈赓同志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说：“陈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反革命的牢狱中，他表现了坚贞不屈和坚实顽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性格；在长期而艰难的战争岁月中，他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胜利信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他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维护和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不懈。陈赓同志的全部经历，表现了他是彻底的革命派，对无产阶级事业具有无限的忠诚。陈赓同志疾恶如仇，大公无私，待人热情诚恳，耿直谦虚。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和人民群众、广大士兵同呼吸、共命运，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

“陈赓同志也是我军一位杰出的指挥员。抗日战争中，太岳地区反日伪‘扫荡’的屡战屡捷，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挺进豫西的巨大胜利，都显示了陈赓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军事天才。他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对群众路线的运用，对部队作风的培养，对士兵的生活关怀，都表现了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陈赓：《我的自传》。
2. 《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现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
3. 陈赓：《挺进豫西》，《星火燎原》第9集。
4.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1977年9月13日

《人民日报》。

5. 《太岳纵队兼军区抗日战争战史》（初稿）。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
7. 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年版。
8. 穆欣：《霞飞路侧的枪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9. 穆欣：《北线凯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0. 穆欣：《南线巡回》，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11. 穆欣：《陈赓革命生涯》（稿）。
12. 穆欣编：《陈赓兵团在豫西》，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3. 穆欣编：《记陈赓将军》，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讣告》，1961 年 3 月 16 日。
15. 《罗瑞卿大将在公祭大会上的悼词》，1961 年 3 月 25 日。

# 张叔平

李吉

张叔平，原名秉铨，一八九七年出生于山西省永宁州大武镇（今方山县大武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八岁时，父兄省吃俭用，将他送入本村私塾。张叔平性格坚毅，勤奋好学，深受师友的嘉许。然而因家境窘困，十四岁那年被迫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一九一四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张叔平考入了离石县立高等小学（今贺昌中学前身），开始接触到《康梁文钞》、《孙文学说》、《章太炎文集》等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书籍，逐渐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一九一五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登基称帝，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离石，张叔平愤慨万分，和同学们罢课示威，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

一九一七年，张叔平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很快结识了许多革命青年，受到了进步思潮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反复认真地研究、分析各种主义，执着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太原，山西大学、第一中学等十一所大、中学校的师生立即行动起来，于五月七日成立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联合



会，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叔平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讲演团，宣传发动广大市民和商业界爱国人士查禁口货，举行罢市，迫使山西当局答应了向北京政府转呈学生会关于“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爱国要求的通电。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张叔平协助中阳人雷梦麟（瑞尼），将原来的天津大公报太原分馆改组为党民派报社，除代销本省各报及《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平、津、沪、汉及香港、新加坡等地报刊外，还销售《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张叔平还利用假期探家之际，在离石城内开办了党民书社，经售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潮，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一带引起了强烈反响。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协助同乡好友任定国在大武镇办起了方山县第一所高级小学。

在一中读书期间，张叔平和高君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高君宇等的教育影响下，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当他看到部分原来高唱“教育救国”、“读书救国”的一中学生，如苗培成，邱仰徽、韩克温等人，从学校毕业后，先后充当了国民党、阎锡山欺压人民的走狗和工具，使他痛切地感到过去所信奉的“教育救国论”是行不通的，只有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一九二一年，张叔平由省立一中毕业，考入了山西省立法政专科学校，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团地委根据张叔平在党民派报社工作的有利条件，选定他担任中央出版物经理员，以“山西大学张秀清”的通讯地址，负责对团中央的联络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张叔平遵照太原团地委的

指示，用集股筹资的办法，以党民派报社为掩护，在太原桥头街开设了文具、书报贩卖部，秘密地发行销售《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资本论入门》及团中央印行的各种书刊。

一九二四年，太原团地委进行改选，张叔平被选为团地委委员，并于同年夏天与侯士敏、李毓棠、潘恩溥、张育麟等一同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组成了太原第一个党的小组。这年暑假，高君宇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由北平返抵太原，筹建山西地方党的组织，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刚刚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张叔平被选为支部书记，傅懋恭（即彭真）、纪挺梓任委员。

中共太原支部建立后，即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当时，在晋南一带，以景梅九、张应川等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影响很大。他们打着反对阎锡山的旗号，鼓吹克鲁泡特金式的“社会主义”，迷惑了不少进步青年。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张叔平派遣傅懋恭前往晋南。傅懋恭到临汾后，即同张应川等人就“科学社会主义与克鲁泡特金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终于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到批判，在思想上、理论上为晋南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张叔平还专程前往汾阳指导工作，先后吸收韩蔚生、李伯生等优秀团员入党，正式组成了汾阳地下党支部。

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张叔平和太原支部全体成员的努力，晋南、晋中、晋北的十余个县先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在此期间，张叔平和中共太原支部还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有力地促成了山西省的国共合作，推动

省内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倡议召开国民会议，王振钧（代表国民党）、王振翼（代表共产党）被派来太原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张叔平和中共太原支部积极协助他们同山西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斗争，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临时机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临时宣传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联络太原各界人士建立了太原国民会议促成会。

一九二五年二月，张叔平和马鸣鄂、阎玉珍作为山西代表，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会议期间，张叔平偕同高君宇还数次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不久，高君宇和孙中山在北平相继病逝。张叔平返回山西后，于三月二十四日在文庙召开追悼孙中山、高君宇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苗培成等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张叔平当即予以批驳，严正指出：任何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都有违总理遗训，有害国民革命；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及一切进步人士团结一致，把革命大业进行到底。在张叔平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一九二五年秋天，国共两党共同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临时党部，在省党部的七个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占三席。从此，山西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

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成立之前，即一九二五年春，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借口抵御冯玉祥、胡景翼所部国民军进兵山西，在“保境安民”的幌子下，大肆扩充军备，在全省横征暴敛，加收房税，滥施刑罚，以致民怨沸腾。张叔平敏锐地觉察到以征收房税为导火线的群众性反阎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于是，他在党团组织的动员会议上尖锐地指出：反房税斗争是关系到全省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情，它不

仅可以打乱阎锡山扩军备战的计划，策应国民军进兵山西；同时也可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扩大党的政治影响<sup>①</sup>。

当时，党支部成员傅懋恭、纪挺梓以及共产党员潘恩溥，分别担任省立一中、进山中学和法政专科学校学生会主席，又都是省学联成员。党支部研究决定，由他们出面，通过省学联推选学生代表前往请愿。同时罢课游行，争取舆论支持，向阎锡山施加压力。

由于阎锡山拒绝了学生代表免征房税的请求，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太原各大中学校学生云集文瀛湖公园，举行示威，将省议会查封、捣毁，并到阎锡山的督军府门前请愿。接着，又捣毁了助纣为虐、提议征收房税的省财政厅厅长杨兆泰、银行经理徐一清、省政府秘书贾景德三个贪官污吏的公馆，迫使阎锡山当场下达了取消征收房税的命令。

不久，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张叔平指示一中学生、共产党员王瀛以太原市学生联合会为核心，团结各界人士组成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由中共太原党支部成员傅懋恭以该会副主席身分主持实际工作。

在中共太原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太原市沪案后援会于六月十日、六月二十五日先后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张叔平、傅懋恭主持会议，进行讲演，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会议一致决议：“与英、日经济绝交”、“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sup>②</sup>。会后，四十余所大、中、小学校师

---

<sup>①</sup>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料》（1981年12月）。

<sup>②</sup>燕铭：《五卅运动在山西》，载《山西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9期。

生和工、农、商各界以及市民团体数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第一中学和国民师范学生还奔赴街头、城郊宣传讲演，募捐款项，先后募捐到一万四千余元，及时汇往上海，支援爱国同胞。太原各教会学校学生也纷纷退学，以示抗议。

同时，张叔平还前往汾阳等地，组织各界“沪案后援会”，发表宣言、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不分阶级”<sup>①</sup>，一致奋起，团结救国。

为便于指导全省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宣传我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张叔平和纪挺桦一起创办了《铁血周报》，由张叔平任主编。六月三十日《铁血周报》正式发刊。在张叔平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刊出世的缘因，就是要本着天良来发表正论，掀破帝国主义的黑幕，唤醒全国民众，大家准备实力，和侵略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宣战。”<sup>②</sup>号召“铁血男儿奋起救国”；还公开介绍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生平事迹以及十月革命的情况。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以沪案后援会为核心的反帝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总商会负责人李云阶在阎锡山反动当局的唆使下，利用部分商人不愿抵制和查禁英、日货物的思想情绪，与太原市学联领导的抵制英、日货物委员会相对抗。张叔平当即指示傅懋恭以副主席身分召开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全体大会，决定将该会改组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简称“山西雪耻会”），推选张叔平为主席，并将《铁血周报》改为《雪耻周报》。八月一日，《雪耻周报》发表了《太

---

①燕铭：《五卅运动在山西》。

②《铁血周报》创刊号（1925年6月30日）。

原市民沪案后援会改组宣言》，明确宣告：山西雪耻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领导民众，促成全国工农学商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募捐款项，抵制英、日货物<sup>①</sup>。揭露总商会李云阶之流见利忘义、媚外求荣的行径，呼吁全省人民赶快团结起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九月十八日，在张叔平主持下，山西雪耻会在新华舞台举行市民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段祺瑞政府和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压迫工人学生暴行的通电。从而把山西的革命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一九二五年冬，由于全国革命高潮的出现，迫切需要干部，太原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先后输送宋熹等同志入黄埔军校，纪挺梓、李毓棠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傅懋恭调正太路总工会工作。张叔平也于一九二五年年底奉调离开山西。

一九二六年年初，张叔平经北京来到十里洋场的黄浦江畔，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亦称中共江浙区委）杨树浦区部委书记，以报馆记者身分开展革命工作。

由于张叔平初到上海，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组织上便选派老怡和纱厂女工、共青团员范介宝到区委机关，与张叔平假扮夫妻，协助张叔平工作；范介宝的姐姐范介梅和姐夫陈定观（陈良）也在区委任交通。他们四人组成一个家庭，以此作为掩护，在司文里秘密开展活动。

同年三月十三日，区委决定林仲南（林育英）担任杨树浦区部委书记，张叔平改任组织部长。为贯彻区委指示，支援沪中、沪西工人的斗争，张叔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发动

---

<sup>①</sup> 《雪耻周报》创刊号（1925年8月1日）。

老怡和纱厂工人进行罢工。时值纱价下跌，资本家遂以自动关厂的手法进行对抗，罢工出现僵局。张叔平当机立断，选派富有斗争经验的张维桢前往恒丰纱厂，组织该厂工人罢工声援。恒丰纱厂的罢工开始后，受资本家操纵的“两湖同乡会”竭力进行破坏。针对这种状况，张叔平和张维桢等在湖南、湖北籍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揭露“两湖同乡会”头子为资本家效劳的嘴脸，使“同乡会”濒于解散，迫使该厂资本家接受了工会提出的十一项复工条件。紧接着，张叔平又指示张维桢等组织恒丰纱厂的部分工人，前往老怡和纱厂声援，同老怡和纱厂的工友一道迫使英国资本家接受了工人们的部分复工条件，赢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兵分三路出师北伐。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的革命民众响应和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国内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立即起而响应，各行各业和工厂陆续爆发罢工斗争。九月八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特别会议，研究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着手组织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张叔平再次被任命为杨树浦区部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杨树浦、沪东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上海总工会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榆林路电车工人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次武装起义问题。张叔平和各部委、各产业工会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中，由于提篮桥巡捕房爪牙告密，参加会议的百余名同志被巡捕房抓走。张叔平在几个女同志的掩护下，机警地跳窗而出。脱险后，他立即通知各厂工会，要各厂资本家出面保释

被捕的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否则就实行同盟罢工。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下，资本家们纷纷打电话要巡捕房放人。弄得巡捕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张叔平的督促下，杨树浦电灯公司的英国经理也亲自出面，到巡捕房首先保释了该公司工人、市政总工会委员长王克全（后叛变）。当晚九时，除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的五个同志外，陈云、张维桢等一百余人已全部获释。此后，张叔平又与区委有关负责同志一起，通过提篮桥的包打听头目买通监狱当局，由外国人出面，把扣押在淞沪戒严司令部的李泊之等五人要回提篮桥英国租界，经过临时特种法庭审理后，无罪释放。张叔平在这次营救活动中的机智果敢，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赞赏。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中共江浙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会议上，张叔平被提名增选为区委候补委员；二月十六日，在区委改选后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被选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这时，北伐军已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二月十九日，上海各行业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二十二日上海区委下达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张叔平和张维桢奉命率领沪东两万名工人向闸北进攻。由于事先“缺乏武装暴动思想与技术的准备”，没有向工人群众灌输夺取武装的思想，致使二次武装起义仍未成功。

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更加软弱动摇。国民党右派势力集团“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聚集在法租界密谋策划，破坏工人运动。为监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活动，经区委同意，张叔平委派左天祥打入“西山会议派”内部，搞到了“西山会议派”人员名单及其决议文件、联络密码



和活动情况等,及时向区委汇报,因而使我党在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对国民党右派的干扰、破坏,采取了相应措施。

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张叔平出席会议,并向区委汇报了杨树浦、引翔渡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罢工、暴动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对张叔平的汇报十分关注,当日下午亲临沪东,在详尽地了解全面情况之后,对张叔平和部委的其它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过去,我们只知道罢工、示威,没有很好地注意武装自己,因而就难以战胜武装的敌人。他指示部委要尽快组织一些当过兵、会使用武器的工人,请他们帮助训练出一支武装纠察队的骨干力量<sup>①</sup>。当周恩来得知沪东工人中十分缺乏有军事斗争知识的骨干力量之后,不久即选派从苏联回国、懂得军事武装斗争的徐航安来到沪东,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同时还设法送来一批枪支弹药。张叔平在积极组织领导全区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同时,也常常挤出时间参加军事训练,练出了双手打枪的本领。

三月七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对各部委、各产总领导力量进行调整,张叔平调任上海码头运输总工会委员长,兼任浦东区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二十日晚,北伐军进占龙华,总工会主席团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决议于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尽快转入武装起义。张叔平遵照会议决议,协助浦东区区委书记马玉夫开始了紧张的部署。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张叔平与

---

<sup>①</sup>张维桢:《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载《革命史资料》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马玉夫等指挥浦东工人纠察队按照预定方案，首先攻占了烂泥渡第三警察所，缴获武器一百余件。接着又分头进攻直鲁联军巡防队驻地，并乘胜攻占了烂泥渡第三警察所下属的第一分所和第二分所，将浦东区的反动武装力量全部摧垮，成立了以工人武装纠察队为主体的浦东区临时保安局。在此基础上，张叔平、马玉夫等又联络各界人士，组成浦东区市民委员会。实现了“工人取得武装”和“建立民众政权”这两项预定的起义计划，为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作出了贡献。

不久，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形势急剧恶化。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张叔平调往杭州。五月间，张叔平化名张农，偕同爱人范介宝（他们在杨树浦部委工作时已结婚）、妻姐范介梅和姐夫陈定观到达杭州，根据党中央和江浙区委的指示，筹组浙江省委。六月间，浙江省委正式成立，由庄文恭任书记，赵济猛任宣传部部长，张叔平任组织部部长兼工人部部长。

不久，省委书记庄文恭因病请假，省委工作由张叔平主持，省委机关由民权路迁至下城万安桥弄口，工作方针是：

“整理内部，加强教育，以培养恢复力量，听候中央新的政策和方针。”<sup>①</sup>在张叔平的主持下，浙江省委通过杭州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惩处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使白色恐怖下的广大人民深受鼓舞。

不久，由于叛徒葛耀祖（葛潜）的出卖，杭州市党组织遭到破坏。接着，张叔平夫妇和陈定观夫妇也被敌逮捕，关进杭

---

<sup>①</sup>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主任王嘉谟：《七月份报告书》，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州陆军监狱。

张叔平被捕的当天晚上，即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科科长何秉达亲自审讯。张叔平坚称自己是上海老怡和纱厂的职员，携眷属来杭州游览。何秉达见威胁利诱均无效果，即命令特务对张叔平严刑拷打。但是，任凭敌人施用压杠子、坐电椅、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酷刑，张叔平始终坚不吐实。虽然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双腿压断，几次昏死，但苏醒后仍怒骂不止。

敌人见张叔平宁死不屈，就想在范介宝身上打开缺口，故意把浑身血肉模糊、双腿被夹断的张叔平拉来与妻子见面。范介宝见亲人被折磨成这副样子，心如刀搅，泣不成声。张叔平却安慰她说：“这不是流泪的地方，也不是流泪的时候。”他暗示妻子：“这次真不该带你来杭州游览，凭空惹下这场麻烦。”<sup>①</sup>机敏的范介宝立刻领会到叔平的意思，做好了应付敌人审讯的准备；敌人施尽诡计，也没有从她口中套出任何东西，只好把她仍旧押回女牢。

张叔平等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共江浙区委立即派人由上海赶赴杭州，积极进行营救。经过努力，将范介宝姐妹保释出狱。

范介宝姐妹出狱后，张叔平经叛徒葛耀祖等指认，身分已经暴露，自知不免于难，乃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利用庭审、放风等一切机会，揭露和痛斥敌人，并和先后被捕入狱的赵济猛、王政、胡公达等取得联系，领导难友进行斗争，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他还组织狱中难友学唱《国际歌》，为临刑

---

<sup>①</sup>访问范介宝记录（1983年12月4日）。

就义的难友送行。

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决定秘密杀害张叔平等革命志士。张叔平得悉这一情况后，泰然自若，通过狱中难友给范介宝寄出一封绝笔信，嘱托妻子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代他向“母亲”

（即党组织）致意，并转告“母亲和亲友”，说“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出国深造去了”<sup>①</sup>。充分表现了张叔平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深夜，敌人把张叔平、池耕襄（中共杭县县委书记）等八位革命志士绑赴刑场，由何秉达亲自监刑。当池耕襄等七位志士倒在血泊中之后，何秉达得意地狞笑着对张叔平说：“张先生，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下场。不知此时此地张先生有何感想？”

张叔平愤怒地答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为共产主义哪怕抛头颅，为劳苦大众甘愿背十字架！”

“那好哇！我今天就成全你了！”何秉达狂叫一声，喝令刽子手把张叔平拉到墙边，用八寸长的钹钉将张叔平双手钉在墙上，接着另两枚长钉穿过叔平脚心深深钉入了土中。随着热血的喷涌，张叔平竭尽全力连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使全场的军警惊骇万分，准备钉往张叔平心窝的最后一枚长钉，也从刽子手颤抖的手中掉到了地上。一向以“杀人魔王”自称的何秉达也惊得脸色灰白，连声狂叫：“开枪！快开枪哪！”一阵枪声过后，张叔平

---

<sup>①</sup>访问范介宝记录（1983年12月4日）、

烈士象一尊大理石塑像似地紧贴在墙壁上<sup>①</sup>。

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张叔平，用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青春的热血，谱写了共产党人的不朽诗篇。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彭真、袁静风、左天祥、李伯生、王森、刘绍南、张维桢、宋侃夫等老同志和烈士夫人范介宝、亲属友好张永修、张永图、任定国等的访问、座谈记录或他们提供的书面材料。
2. 1925年6-7月的《铁血周报》、1925年8月《雪耻周报》，存山西省博物馆。
3.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各产总联席会议记录》，均载《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资料汇编》，存上海总工会资料室。
4.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地区党组织发展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增刊第1期。
5. 施英：《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载《向导》189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载《向导》193期。
6. 《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改组及主要领导人变更情况概略》，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第10期。
7. 庄文恭：《党在杭州地区的初期活动》，载《杭州地方革命史资料》第3辑。
8.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主任王嘉谟的《七月份报告书》，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9. 上海部分老工人联名给中央组织部写的有关张叔平、刘华等革命烈士牺牲情况的报告，存中央组织部档案馆。
10. 《浙江省委组织第一次被破坏、省委张农等被捕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杭州监狱中遇害人名单》、《被

---

<sup>①</sup>张叔平牺牲的情况，主要依据范介宝转述有关同志的回忆，并参阅中央组织部保存的烈士档案中的有关证明材料。

迫害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叛党分子小传》、《迫害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特务及有关分子人事小传》，均载《反动国民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参考资料》，存杭州市公安局档案馆。

11. 王建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
12.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料》（1981年12月）。
13. 《宋侃夫同志在杭州狱中斗争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杭州党史资料》1983年第10期。

# 昌 绍 先

吴 德 才

昌绍先是湖北省沔阳县人，曾任中共皖北特委委员，皖北工农红军总指挥等职，是安徽省阜阳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为创建皖北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皖北指挥红军突围的激战中，壮烈牺牲。

## (一)

一九〇七年八月五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昌绍先生于湖北省沔阳县昌家湾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昌瑞麟，经营四十余亩田地。昌绍先七岁开始上私塾，十岁随担任京汉铁路技师的叔父昌石麟到北京读书，一九二二年高小毕业，同年初秋考入燕京法文学校。一九二四年，昌绍先随同乡青年、北大学生孙鸣九常到北大旁听李大钊讲课，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五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帝怒潮。昌绍先在北京参加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岁的昌绍先怀着参加国民革命的志愿，投笔从戎，奔赴张家口，考入冯玉祥的国民军陆军干部学校步兵科第一队学习。临行前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革命豪

情。诗曰：

男儿壮志出都门，  
英夷不灭誓不还，  
横尸疆场不足憾，  
愿留白骨照河山<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春，吕绍先在国民军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刻苦攻读法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国民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军骑兵第五师做政治工作，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同年夏，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联合攻击冯玉祥部，冯部在南口与吴、张联军激战。吕绍先在这次战斗中，表现英勇机智，深受赞扬。九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部队在五原誓师后向西开拔。吕绍先随骑兵师向甘肃行进，经过沙漠地带，行军艰难。他负责宣传工作，鼓动官兵克服困难，顶着狂风飞砂向西挺进。就在这次征途上，吕绍先赋诗一首：

黄沙蔽日天昏暗，  
狂风卷地石乱窜，  
练就一身钢筋骨，  
砥柱中流挽狂澜<sup>②</sup>。

---

①②诗由烈士之侄吕国英提供。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和革命意志。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六月，冯玉祥依附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将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原国民军联军中的二百五十余名共产党员集中到郑州，名为“政训”，实为软禁。在郑州期间，昌绍先受党的指示，利用私人关系，打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取得鹿钟麟的信任，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鹿钟麟见昌绍先年轻英俊，机智勇敢，又懂法文，擅长演说，很有军事才能，因而极为器重。当时，鹿钟麟是冯玉祥部的前线总指挥，他自认为四个得意的参谋，高望东、昌绍先、朱大鹏（现名朱军，原南京海军学院院长）、贾本甲（后脱党）等，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昌绍先年纪最轻，人称他“小参谋”。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为在鹿部开展兵运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昌绍先、谢甫生（原名谢祥荫）等随南汉宸去皖北太和驻防的杨虎城部，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同年冬，南汉宸、昌绍先、谢甫生等从开封到皖北阜阳、太和等地，分别向杨虎城部、高桂滋部的党组织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与杨、高两部的党组织负责人魏野畴接上了关系。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魏野畴多次与杨虎城将军谈心，杨虎城表示愿意与共产党继续合作。杨虎城鉴于失败的教训，决心创办军事干部学校，训练下级军官，便委任南汉宸为军校校长，昌绍先为第一教导队队长，谢甫生为第二教导队队长，吴岱峰为第三教导队队长。军校在太和县城一个当铺里正式开学，从校长、教导队长到教员，多数是共产党人，课程设置分为军事、政治两个方面，而且着重政治训练，向学员们讲授革命知识、社会发展史、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内容，没有正式课本，由校长、教导队长、教官自编讲稿，口头讲授<sup>①</sup>。昌绍先任教导队长时，既教练军事课，又讲授政治课，使学员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提高很快。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全校有两百多名学员，思想进步，表现革命，准备在毕业前吸收为共产党员。这是一支十分宝贵的革命力量，为后来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派韩振声来皖北杨虎城部逼杨“清党”，并要逮捕魏野畴、南汉宸等共产党人。杨虎城拒绝“清党”，韩振声胁迫杨同去南京见蒋介石，使杨虎城处境十分艰难。以后杨虎城被迫赴日考察，十军军长由孙蔚如代理。孙蔚如用“礼送出境”的办法，先将南汉宸送出太和，又通知魏野畴等离开部队。由于形势急剧变化，一些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魏野畴离开十军后，于二月九日夜在太和县城主持召开有七十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建立了以魏野畴为书记，胡景陶、高望东、胡英初、昌绍先、刘仲华、李烈飞、李端甫、蔡甲午等为委员的皖北临时特委，通过河南省委与中央取得了联系。特委下设太和、寿县、亳县三个特分委，直接领导各县委。特委成员分工由昌绍先领导兵运工作。昌绍先通过私人关系，打入高桂滋部教导团，与教导团三营营

---

<sup>①</sup>参见南汉宸：《回忆我在皖北的革命斗争》（1960年5月15日稿），载1982年12月《阜阳地区党史资料》第1期。

副、地下党员杜聿德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积极从事兵运活动。杜聿德和杜聿明是同父异母兄弟，为劝说当时任中央军校学员大队长的兄长杜聿明走革命道路，护送其嫂曹秀清至苏州会见杜聿明。因政治观点对立，壁垒分明，兄弟俩谈崩了，杜聿德便来高桂滋部教导团任职。吕绍先问他和杜聿明谈得如何，杜聿德很气愤地说：“杜聿明效忠蒋介石，我和他分道扬镳了。”吕绍先和杜聿德研究了在教导团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和连队建立党组织的计划。

在中共皖北特委的领导下，军队内部和地方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十军、十九军、肖之楚师、王金韬师以及各县党团员由一百余人发展到近千人，十军内部已有党员二百八十多人。吕绍先、杜聿德所活动的部队——教导团九个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包括留守司令部的特务连）都为我们党组织所掌握<sup>①</sup>。二月中旬，吕绍先和杜聿德商量决定，利用教导团扩军的机会，大量吸收党团员和进步农民入伍，抓紧军事训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为了组织农民赤卫队配合武装起义，吕绍先身着便衣，携带武器，到阜阳行流集地区组织农协会，先后在宁大庄、小边庄、王关庄、行流集、小关庄、小灵庄等十几个大村庄，组织农友集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打倒土豪劣绅。当时阜阳大旱，三月不雨，赤地千里，劳动人民背井离乡，四处讨米要饭，城乡饥民自发开展抢粮、“吃大户”的斗争。为把饥民自发的斗争引上有组

---

<sup>①</sup>参见李保民、李恒山：《阜阳“四九”起义》，载1982年12月《阜阳地区党史资料》第1期。

织的有领导的革命斗争，吕绍先和阜阳市委书记李端甫深入到阜阳城周围的插花、行流、北苗集、洄溜、马店、长官店等地，建立了区、乡农协会，发展了数以万计的农协会员。到起义前夕，仅行流集周围方圆五十余里一百多个村庄的农协会，就发展会员五万多人，赤卫队员也发展到三千多人<sup>①</sup>。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阜阳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向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开展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抗差的斗争，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革命热潮空前高涨。

三月二十五日，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来信指出：现在的策略是“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强调必须“给工农群众、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准备好“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须条件”<sup>②</sup>。根据中央指示，四月五日，魏野畴、吕绍先等在阜阳城贡院后街马昌实家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讨论制定武装暴动计划。可是，在大家讨论时，宋树勋（魏野畴离开十军后，由宋担任地下军委代理书记）反对起义，会上引起争论，没法形成统一的决议。旋即宋树勋叛变投敌，于四月五日晚将党员名单通过太和县县长李天午转告十军代理军长孙蔚如。四月六日，孙蔚如集合军校学员，收缴武器，把一百一十名党员交炮兵连押送出境。在这危急关头，皖北特委于四月七日晚，在阜阳西湖“会老堂”召开了地方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席会议，到会的有魏野畴，胡景陶、吕绍先、杜聿德、李端甫、胡英初等二十余人。会上，吕绍先向大家报告

---

<sup>①</sup>参见李保民、李恒山：《阜阳“四九”起义》。

<sup>②</sup>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了兵运情况，指出：目前高桂滋部主力北上，阜阳城内驻军不多，城防空虚，驻军只有两个教导团，其中教导二团和留守司令部特务连大部分被我党掌握，起义时机已经成熟。根据上述情报，会议讨论决定组织起义，以高部教导二团为起义部队主力，城内工人、学生响应，城外农民赤卫队配合行动，先解除各地民团武装，然后一齐攻城。会上还成立了皖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魏野畴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昌绍先、杜聿德二人负责领导教导二团起义部队攻城，其他同志则分别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响应起义。四月八日，特委获悉阜阳李象贤把起义计划泄露给了国民党特派员办事处秘书吕醒寰，形势十分险恶。魏野畴和昌绍先、杜聿德等研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提前举行起义，抢在敌人反扑之前，实现武装暴动计划。当晚，昌绍先、杜聿德在教导团秘密召集起义骨干紧急会议，传达特委指示，进行起义动员。

###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凌晨，在滂沱的夜雨中，昌绍先命令敢死队长申明甫根据约定时间、地点，将棉被浇上煤油，点燃了武装起义的信号。不料被敌人发现。此时远处已闻枪声，敢死队随即将敌司令部门岗解除武装，缴获步枪四枝，并立即发出紧急集合号令，申明甫带四十多人撤离敌司令部，到东门外文峰塔下集合。由于大雨瓢泼，在城内外各地集合的起义人员，看不清起义的信号，未能按计划配合攻城。这时，把守东城门的第六连排长、共产党员吉超，开枪打死了反动连长苗鹏飞，旋即占领了东城门，但遭到敌人的反扑。一小时后，住三

里湾师范学校的教导二团，在杜聿德的指挥下开始起义，击伤教导团长高建白，击毙反动官兵三十人。杜聿德旋即率起义部队赶到文峰塔下和魏野畴会师，但未见到魏野畴。魏野畴在东门听到三里湾师范学校枪声大作，人声呐喊，知道杜聿德已率部起义，便派六连前去接应，他亲率少数起义部队把守东门，坚持与敌战斗。可是这时，教导一团向起义部队反扑，城内留守司令部枪声大作，魏野畴则带起义部队向三里湾撤退，而城西之敌又埋伏阻击，使城内外的起义部队失去了联系，攻城计划难以实现。在此紧急关头，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魏野畴、昌绍先等当机立断，改变攻城计划，将起义部队的五个半连分两路向外线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率领三百五十余人渡过颍河，向阜阳城以北三十里的行流集、王官集方向挺进；一路由魏野畴、胡景陶（后脱党）率领二百人前往阜阳城以西的老集一带发展力量，准备接应行流集、王官集部队，会师后开往鄂豫皖边打游击。可是，魏野畴率领起义部队遭到敌人截击失败，魏野畴也壮烈牺牲。昌绍先、杜聿德等率领起义部队，于九日上午按时到达王官集，和当地的农民赤卫队胜利会师。

昌绍先、杜聿德率领起义部队到王官集后，得知魏野畴部已失败和魏牺牲的消息，心情非常激愤。为了巩固和扩大起义成果，建设苏维埃政权，创建皖北工农红军，昌绍先、杜聿德、李端甫、李烈飞等商议决定，于九日下午，在王官集北头大寺庙前召开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庆祝大会<sup>①</sup>。会场门口，高悬绣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和工农红军的军

<sup>①</sup>参见中共阜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的《阜阳“四九”起义专刊》（1982年12月）。

旗，会场内外贴满了红绿标语，起义战士和农民赤卫队分别戴上了“工农红军”红色臂章和“赤卫队员”红色胸章。起义部队拥有长、短枪五百多枝，农民赤卫队有大刀、长矛三千余件。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李端甫、李烈飞分别任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昌绍先、杜聿德分别任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总指挥<sup>①</sup>。大会通过了由魏野畴生前主持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等三个文件。在宣布成立红军时，昌绍先作了关于建立工农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皖北革命根据地的报告，会场上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大会结束后，昌绍先、杜聿德带领工农红军，与地方干部李端甫、李烈飞等，积极领导打土豪，分浮财，镇压恶霸地主和扩大工农红军的运动，革命声威大振。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军很快扩充到一个团，赤卫队也发展近万人。

#### （四）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扑灭皖北工农革命烈火，很快调集部队围攻起义军。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一日晨，高桂滋部留守司令王守义纠集教导一团和所属骑兵营及教导二团兵变未拉出来的三个半连，加上敌县长康欣之的地方团队，共三个团的兵力，向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发起猖狂进攻：梁文铁带领教

---

<sup>①</sup>参见中共阜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的《阜阳“四九”起义专刊》（1982年12月）。

导一团由西面而来，康欣之带领地方团队和骑兵营由东北面而来，对王官集地区进行包围。昌绍先为保卫新生的工农政权，指挥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攻，激战三、四个小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被敌打散。在这严重危急关头，红军总指挥昌绍先为保存革命种子，命令当地同志疏散隐蔽，外地同志由杜聿德、苗勃然二人带领突围。杜聿德、苗勃然带领部分红军战士突围后，向太和县境转移，不幸遭到该县团总尚信臣、练总尚泽普、敌警备营连长曹子壮等带领的反动武装的截击，杜聿德、苗勃然等不幸被捕，在阜阳城英勇就义；胡英初、蔡甲午等二十余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昌绍先为掩护当地同志突围转移，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中弹受伤。李烈飞、李端甫等要背着他一起突围，他见敌人已从小边庄冲过来，断然拒绝说：“我身负重伤，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快突围吧！”并指着西边说：“你们绕小道，渡颍水，到了河西，就可以隐蔽了，千万要保存革命种子！”<sup>①</sup>李烈飞等含着眼泪，向战友昌绍先告别，带领部分同志在群众掩护下突围脱险。这时，十多名敌兵围拢来，企图将他活捉。昌绍先虽已身负重伤，但仍顽强战斗，忍痛和敌人拚搏，掩护其他同志转移出阵地，最后壮烈牺牲于行流王官集战壕里，时年仅二十一岁。

阜阳“四九”起义是继广州起义之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建国后，为了纪念烈士，党和人民政府在安徽省太和县草寺集兴建了昌绍先等烈士墓和纪念碑，在阜阳城建立了革命

---

<sup>①</sup>引自李占元的口述：《昌绍先烈士牺牲的情况》（1983年6月3日），原件存中共沔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烈士纪念馆，在王官集建立了“四九”起义陈列室，参观者络绎不绝。昌绍先等烈士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皖北人民心中。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安徽省民政厅保存的昌绍先烈士档案资料。
3. 南汉宸、刘贯一、谢甫生、刘占元等老同志回忆录及烈士侄子吕国英提供的资料。
4. 方罗来：《皖北阜阳暴动与皖北苏维埃政权》（初稿）。
5. 吴德才、曾云1983年6月赴安徽阜阳的调查笔记。

# 朱 锡 昂

钟优武 陈欣德

朱锡昂，字识惺，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是广西早期革命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一生，正如广西同志在他殉难一周年时的挽联所写的那样：“血洒玉林，芳流千古；功高八桂，痛切同侪”。朱锡昂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 (一)

一八八七年四月，朱锡昂出生在广西博白县沙河区山桥乡上洞村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朱慎恒，在乡下教私塾，母亲王氏，为人善良。祖父时家里置有二石种<sup>①</sup>的田，雇有长工耕种，另有少量土地出租。朱锡昂从小随父亲读书，成绩优异，毛笔小楷尤其写得工整秀丽。一九〇三年，父亲送他赴玉林州试，得中秀才，取第一名。消息传开，乡亲纷纷前来祝贺，一些绅士也向“小秀才”打躬作揖。

一九〇七年，朱锡昂去广州考入广东实验学堂（后改为广东高等工业学堂），被编在甲班，并选为班长。为了表达自己

---

<sup>①</sup>一石种的田相当于12市亩。

追求社会平等的理想和愿望，他和雷沛鸿等同学借用《列子》中“黄帝梦游华胥之国”的典故，在住房门上挂了块写着“华胥”二字的牌子<sup>①</sup>，经常邀请一些进步同学来研究学问，讨论时事，阅读进步书报。

在广州读书期间，朱锡昂很敬佩杰出的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秋瑾烈士，用秋瑾的反清革命斗争精神，教育和激励自己。他还将秋瑾写的诗，如“爆烈同拚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前仆后继人应在，为君不愧轩辕孙”和“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录作座右铭，经常背诵，并与学友互勉互励。一九〇八年，光绪皇帝“驾崩”，学堂当局要求学生披麻戴孝，到灵堂吊孝时还要放声大哭。朱锡昂十分气愤，暗地串连潘乃德等同学，在一片嚎哭声时故意纵声哈哈大笑，闹了一场震动学校内外的“笑吊”喜剧。学校当局恼羞成怒，立即张贴布告，对所有发笑的学生给予记过处分。朱锡昂对布告嗤之以鼻，愤愤地说：“记过者，记功也，妙哉！”事后，有人赞他是“直士”，也有人骂他是“逆子”，他并不介意，对同学说：“吾侪若不干一番大事业，则反清救国夙愿难展，‘直士’徒有其名而已。”不久，经该校施正甫介绍，他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sup>②</sup>。一九一一年，朱锡昂秘密组织一批同学参加同盟会在广州举行的黄花岗起义。开始，他准备配合起义部队攻打总督衙门，后因外地来的同盟会员不熟悉去总督府的道路，由他担任向导<sup>③</sup>。这次起义，由于准备仓促和战斗指挥不周，在清军反扑下失败

---

<sup>①</sup>雷沛鸿：《辛亥革命的回忆》，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0期。

<sup>②③</sup>访问潘乃德记录。

了，但他却受到了一次革命风暴的锻炼，更加坚定了“前仆后继、拚死贼臣”的革命决心。

## (二)

辛亥革命爆发后，广西宣告独立，地方局势逐渐安定。这时，朱锡昂从广东高等工业学堂毕业，回到广西，被广西省府委派为玉林五属教育团副团长，并出任玉林五属中学校长；一九一二年冬，又任省参议会参议员。一九一三年秋，因南宁府立中学校长雷沛鸿出国留学，由雷介绍朱锡昂接任该校校长。一九一五年，朱锡昂被聘改任怀集县（现属广东省）中学第一任校长。一九一六年，经友人推荐，朱锡昂前往肇庆担任广东肇庆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林虎（隐青，陆川人）的秘书，曾劝林虎广贴布告，明令军队和地方当局实行“三禁”：禁烟、禁赌、禁娼。二、三年后，朱锡昂改任广东郁南县知事，以爱国爱民，为官清正，仗义执言，刚正不阿知名一时。他对祸国殃民的鸦片毒品深恶痛绝，曾羽令严禁吸毒，凡土豪劣绅违禁者也一律惩办。一九二一年，他任广西省议会秘书长，由于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感到厌恶，遂于第二年辞官归里，回到玉林，重新担任省立第九中学（即原来的玉林五属中学，后改为省立高级中学、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校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想做官，他回答说：“做官高高在上，剥削人民，虽有吃有用，而人民无衣无食，居心何忍？”他还刻了一枚有“独立自主”四字的印章，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sup>①</sup>。后

---

<sup>①</sup>曾善友、朱万瞻：《国庆忆英雄——朱锡昂烈士永生》（1959年）。

来，广西省当局多次邀请他出任省课史馆长、教育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要职，他都一一拒绝，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

朱锡昂到九中任校长后，从广州、上海等地多方聘请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到校任教，并以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拿来救济师生员工的生活。他要求老师勇于探索，大胆施教，努力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一改学校过去读死书的沉闷局面。

### (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朱锡昂被选派到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sup>①</sup>。途经上海时，他接触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到达日本后，朱锡昂与广西留日学生住在一起，并同中国共产党日本留学生支部接触。在党的帮助教育下，他摒弃了教育救国的空想，决心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于一九二五年初，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②</sup>。

一九二五年春，朱锡昂离开日本，前往菲律宾考察，同年三月回到玉林学校，带回了一批日文版的《资本论》、《哲学之贫困》、《唯物史观》等马列书籍。他回到学校后，立即发动学生订阅《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还请人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悬挂在学校礼堂两旁。他经常到附近的仁东、六卢、大路、下寮等村调查农村现状，了解农民疾苦，启发农

---

① 《广西历年派员出国考察史系表》，存广西第一图书馆。

② 关于朱锡昂入党时间、地点问题，说法不一。本文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第6辑中《血洒玉林，功高八桂》及苏厚光等的回忆材料。

民政治觉悟。他还利用星期天或晚上在学校礼堂向工人和文化知识界发表演说，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揭露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势力侵略中国的罪行。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迅猛扩展到全国各地，玉林县也成立了有工、农、商、学、居民参加的玉林各界后援会，由省立二中学生会负责人朱光翼任会长，朱锡昂任名誉会长。在他的指导下，后援会发动各界人民在县城大府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痛斥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还组织青年学生进行反帝宣传。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湖南省长沙正式召开。朱锡昂和苏诚二人代表广西省教育会出席了这次会议<sup>①</sup>。他在广西的教育业绩，受到湖南代表的钦佩，曾以湖南省教育会的名义，赠送他一幅湘绣，对他表示敬意。现在这幅湘绣仍保存在广西博物馆里。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朱锡昂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sup>②</sup>。这时，朱锡昂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更加积极地在校内校外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北伐战争开始时，朱锡昂立即领导全校师生，组织宣传队，每十人一组，分赴城区和乡村开展宣传，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大力支援北伐战争。当北伐军攻下武昌时，玉林县各界在大府园召开庆祝大会，朱锡昂在会上发表了热情赞颂北伐军的讲话。

这一年，贵（贵县）、兴（兴业）、玉（玉林）公路通

---

① 《历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分类汇编》，存湖南省图书馆。

② 据《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议文件》。

车，朱锡昂被邀请参加通车典礼，并在会上致词。他一点也不附和当局说什么“公路通车后，交通方便、万民同福”的论调，而是严正地指出：贵、兴、玉公路，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筑成的，在当今情况下，公路的通车，不过是便于帝国主义推销更多的商品，以搜刮中国人民的钱财罢了，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什么“同福”可言！他的这些触及社会痼弊的“贺词”，曾使一些到会的达官贵人十分难堪。

朱锡昂对附近各县的学生运动也很关心，积极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鼓舞他们的斗争。如博白县中学的女生听了他介绍苏联和日本的妇女情况，号召她们学习苏联妇女的革命精神，破除封建思想，争取妇女的自由、平等的报告以后，很多女生剪掉辫子，有的退了父母包办的婚约，勇敢参加社会宣传活动。当他得知该校女生以罢课的方式反抗县当局对她们进行社会宣传活动的阻挠和破坏，并来信请求支持时，他便立即回信，表示支持她们的斗争，并在信中向她们介绍湖南长沙等地学运情况，给该校女生增添了力量。朱锡昂关心学生进步的另一方面，是对学生的错误思想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一天傍晚，当他路过校园的草坪，听到几个学生在谈论“共产共妻”的谣言时，心情十分沉重。晚上，他走进这几个学生所在的教室，愤怒地批驳了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造谣和诬蔑。第二天，他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进行严厉的抨击，说：“共产党主张共产，但反对公妻。唯有官僚、地主、资本家才纳妾嫖妓，才是公妻。”<sup>①</sup>

---

<sup>①</sup>据李家金等的回忆材料。

#### (四)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疯狂进行“清党”活动，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这时，朱锡昂接到广西省教育厅长黄华表发来的电报，警告他不要再领导学生闹革命。朱锡昂阅后满腔怒火，立即在学校周会上向全体师生宣读电文，揭露国民党右派的罪行，号召大家与反动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会后，他给黄华表复电，说：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行动，领导学生救国救民，并不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若说我二中师生有爱国革命行动，乃是学校的光荣。由于敌人已将朱锡昂列在通缉名单之列，他于同年七月被迫离开学校，秘密前往上海。途经南宁时，他住在玉林五属会馆里，被敌人发现，派兵前来逮捕，恰逢他走出大门，那些匪军不认识他，见他穿着平民服装，以为是会馆职工，便喝问道：“喂，朱锡昂住在哪个房子里？”他回答说，住在最后的房子，匪军听后立即一拥而入，他便趁机走脱，后经湛江、广州到达上海，住在一位日本朋友家里。朱锡昂在上海期间，曾到复旦大学看望原广西省立九中的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此后，他便来往于上海、武汉之间，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还远涉南洋苏门答腊一带，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七年初冬，朱锡昂从南洋返回香港，住在俞作柏<sup>①</sup>

---

<sup>①</sup>俞作柏与朱锡昂同是玉林五属人，俞当时担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因同情我党，倾向进步而遭受排挤，借外出视察为名，潜逃香港。



的公馆里。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广西籍共产党员陈勉恕、俞作豫（俞作柏之弟）等人。党组织先安排朱锡昂到《香港日报》社工作；同年十一月，又将他与陈勉恕、俞作豫、朱士华等人派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已自鄂返粤，在广州另立旗帜，与南京反革命头目蒋介石对抗。张发奎获悉俞作柏与桂系有矛盾，便派人到香港请俞作柏担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七军指挥部指挥长，指挥部设在广州吉祥路。朱锡昂等几位共产党员到广州后，公开身分就是第七军指挥部的秘书，暗中则积极为广州起义做准备。朱锡昂被分配负责一个区的起义准备工作，经常前往暴动总指挥部联系。同志们看到他准备起义而日夜奔忙的情景，曾用“朝发白云楼，夜争海珠渡”的诗句来赞美他。广州起义失败后，朱锡昂与俞作豫、陈勉恕等奉命分头撤退。十二月十三日晚，他们先避入曾当过南宁市商会会长的周君实的设在广州的“宝隆”商店，第二天又化装到沙面租界搭英商轮船赴港，仍住在俞作柏在港的楼房里，与广东省委在港的负责人杨殷等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一月，党组织决定委派朱锡昂率领在港的广西同志回桂，恢复和发展广西党的组织，领导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决定由他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们分三批启程，约定在北流集中。当大家来到北流后，朱锡昂立即派人分头联络留在广西坚持斗争的同志，并在黎家庄黎衍家里秘密召开有党员、团员、进步青年等二十人参加的会议，其中有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和特委巡视员董铨汉等人。他向大家传达广东省委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的利益，疯狂镇压革命，加紧对农民

的剥削；地主、豪绅不顾农民死活，加租加税，广大劳苦农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我们要在农村发动农民起来革命，要与农民建立感情，搞好关系，做农民兄弟的知心朋友。同时，还要做好工运、军运、学运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会后，朱锡昂除分派同志到已有联系的贵县、玉林、北流、陆川、博白等县活动外，还派出党员到宾阳、南宁、梧州、柳州、桂林等地联络失散的党员。当时，中共广西特委临时办事处设在黎衍家里，并在北流县城设“华丰”商店和一个医务所为联络处，朱锡昂化名张志先住在办事处，全面负责并兼顾玉林方面的工作。他患有肺病，经常胸痛，但他带病坚持工作，经常与俞作豫等头戴斗笠，身背长烟筒，挂上布口袋，到北流县附近九代坡村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劳农会，发展党的组织。他在九代坡村发展了张善宗、张善棠等四名同志入党，在村里建立了党支部<sup>①</sup>和劳农会。在九代坡村的影响下，关塘、牛柑塘、竹围、民乐、金城、塘岸等村也迅速建立了劳农会。

同年三月，朱锡昂与党内秘密交通员张震球从北流取道九代坡步行到玉林县城郊的瑶岭村，住在该村一间原来装粪用的屋子里，领导该村劳农会开展反对地主夺耕的斗争。他经常找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促膝谈心，向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讲国民党“清党”的罪行，讲实行减租减息的意义和农民翻身的革命道理，使这里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四、五月间，朱锡昂化名滕柏，从玉林来到贵县，通过党员张国才与杨翰峤、姜绍文等党团骨干取得联系。这时，正是中共贵县县委机关遭到破坏不久，县委书记陈培仁刚被杀害，党

---

<sup>①</sup>访问张罕因记录（1978年7月）。

组织一时处于停滞状态。他帮助贵县的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鼓励大家继续坚持斗争，并着手重新组织贵县党团联合县委，使贵县、玉林、北流、博白等县的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与南宁、梧州等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原称中共广西“一大”）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张国才家举行，到会代表十多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朱锡昂和张伯群（张弟杰）作为玉林五属党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原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主持。大会决定接受广东省委关于夏收暴动的决议案，决定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系，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开展农运和工运，组织和扩大农民武装，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成立全省劳农会组织，以推动全省农运的发展。会上选出朱锡昂、邓拔奇、雷经天、董铨汉等十五人为中共广西特委（后改为临时省委）委员，由恽代英指定朱锡昂、邓拔奇、董铨汉等七人为常委，朱锡昂为特委书记兼管宣传科，董铨汉为候补书记兼管组织科<sup>①</sup>。为了便于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会议还决定在交通方便且又靠近广州的梧州市设立特委机关。

这次大会建立了新的省特委领导机关，统一了全省各地党组织，并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这对推动全省工农运动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 （五） /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朱锡昂转到梧州市省特委机关工

---

<sup>①</sup>据广西特委 1928 年 7 月 30 日给中央的信。

作。他针对当时有些县的基层党组织尚未恢复、农村的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经常深入到这些地区去检查、指导工作，在玉林五属各县及南宁、桂林、柳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时还以做“生意”为掩护，前往广州、香港向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工作。即使病倒在床，也从不肯停止他的看书学习和处理工作等活动。同志们很尊重他，称他为革命长辈，但他却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太晚，不能早日为革命效力，总是以革命晚辈自称。因此，同志们都亲昵地称呼他为“晚叔”。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底，临时省委委员昌景霖叛变，使设在梧州的省临委机关和通讯联络处（梧州大东下路学后街“耀记”鞋店）遭受严重破坏，省临委委员郭金水、李秀农等被捕牺牲，朱锡昂因外出幸免于难。为应付这种危险局势，他决定把党组织转移到农村，并派北流县张罕恩等同志前往贵县、南宁、芦圩等地，把昌景霖叛变事件通知各地党组织。这时，他已不能在梧州立足，便化名“王亚三”，于十二月秘密转移到玉林县境，并在新桥榕木根村设立广西临时省委办事机关，继续领导全省革命斗争。

在玉林，朱锡昂曾化装为算命先生，到新桥门口岭最贫穷的郑四婆、吴九佬等农民家里，了解当地农民疾苦，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至今，当地农民还记得他教过的歌曲，其中一首《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歌词是这样的：“来来来，打倒它反动派，那怕他国民党小奴才！高举着我们的红旗向前进，高举着我们的红旗向前进；杀杀杀，国民党的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打倒它，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sup>①</sup>

---

<sup>①</sup>访问苏基裘记录（1978年）。

在朱锡昂的发动、组织下，榕木根和陂共等村的大部分农民加入了劳农会，仅榕木根村劳农会员就有三四百人。朱锡昂非常重视建立农民武装组织，曾指示各村的劳农会都要建立农民自卫军。他还与俞作豫一道，教育、改造了以丘宏才、丘大伯为首的新桥地区的“绿林军”。这支“绿林军”驻扎在六万大山里，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豪绅有矛盾。当他们生活有困难时，朱锡昂便设法派人送去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当他们同国民党军警激战并处于危急时，朱锡昂和俞作豫立即派农民自卫军前往支援，共同打退国民党军警的进攻。所有这些，使得“绿林军”的首领深受感动，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革命主张，同意把部队改编为农民武装，随后组成了我党领导的玉林五属农民游击队。

一九二九年春末夏初，朱锡昂在新桥榕木根村农民郑振南家里举办了二期农运骨干训练班，每期十多人，学习十天左右。参加学习的有李健雄、苏厚光、苏宠松（均为党员教师）、林云龙（新桥七小进步学生）等二十多人。学习的内容有“社会发展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革命必胜的道理”、“农村工作”等，朱锡昂和玉林县委领导人王懿仁（后牺牲）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的讲课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声音也很宏亮，深受学员喜爱。每当夜幕降临，学员们便在煤油灯下听课学习，直到半夜或拂晓时才分散离去。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分别奔赴农运第一线。这一期间，玉林县各地革命斗争非常活跃，革命力量有较快发展，全县团员和党员共有一百多人，“劳农会”员达三千多人<sup>①</sup>。桂东南其它各县农民运动

<sup>①</sup>参见中共玉林县委党史办：《中共玉林县党史简编》（1924—1949），未刊稿。

也有很大发展。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朱锡昂去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回来后，在北流县黎家庄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强调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此，他着力抓农民武装的建设工作，没多长时间，北流县的武装游击队员已达好几百人。至左、右江起义前夕，玉林五属各县的农民武装，改编和扩充为我党直接控制的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后参加了百色、龙州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八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朱锡昂在斗争中机智勇敢，并得到群众的保护，几次都化险为夷。有一次，他在博白县三育大园村准备召开农会骨干会议时，突然，遭到当地反动民团的围捕，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化装成一个看水的老人，披戴蓑衣笠帽，扛着锄头，沉着而机智地走出村外。对于这些风险，他置之泰然，常对关心他的安全的同志说：“一个人迟早总是要死的。俗语说，三十有死，四十有亡，只要是我们为真理而死，为大众利益而死，死也甘心，死也有价值。”“搞革命是会遇到生命危险的，有的人可能被敌人抓进监狱严刑拷打，有的人可能会杀头，但我们不应该怕死，至死也不能叛党。”<sup>①</sup>

## （六）

一九二九年五月，蒋桂军阀混战，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

---

<sup>①</sup>访问苏基裘记录（1978年）。

终。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准备接管广西军政大权。俞、李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向来同情和倾向革命，与我党关系密切，加上俞作柏是共产党员俞作豫的异母兄弟，李明瑞是俞家兄弟的姑表亲属。他们三人从小在一起生活、读书，又曾一起在旧军队中工作，感情笃厚。朱锡昂便利用他们这种关系，通过俞作豫的活动，从俞、李部队中搞来一批武器弹药。同时，他正确分析形势，认为俞、李回广西主桂后，有利于广西革命力量的发展。为了迎接这种新局面的到来，朱锡昂一面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派俞作豫前往湖北，协助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明瑞带领部队迅速回广西；一面加紧训练干部，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为争取革命的新发展做好准备。

五月中旬，朱锡昂接到广东省委的紧急通知，前往香港开会，研究俞、李回桂后广西党组织面临的新形势与任务。按照党的指示，他多次到“俞公馆”与俞作柏商议回广西后的合作与行动计划，最后，商定农历五月初五（公历六月十一日）那天，由朱锡昂在玉林领导端午节农民暴动，俞作柏则拨出一个师的兵力在梧州策应，目的是夺取玉林县政权<sup>①</sup>。

朱锡昂从香港回到玉林后，同玉林县委负责人王懿仁一起立即从事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朱锡昂日夜奔忙，他既要起草暴动的宣传材料，又要检查、督促各地准备工作；并考虑和部署如何从外县抽调军事人员来支援、以及暴动后的退路等问题。

由于玉林城乡各地大量出现了宣传暴动、揭露敌人罪行的传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敌人加紧派遣特务，到处搜索情报

---

<sup>①</sup>访问黎福海记录。

和侦缉朱锡昂的下落。

敌人预先收买了新桥门口岭附近的坡心村农民林七，让林七通过其堂兄林三的介绍，加入劳农会，从内部收集情况。这时，朱锡昂恰巧从外地检查布置工作后回到新桥，于农历四月二十五（公历六月二日）晚上，同王懿仁、郑振南（劳农会领导人）参加了门口岭马屋劳农会召开的新会员会议，新会员中就有被敌人收买的林七。林七等会开完，立即向玉林县县长唐朝绳报告。唐朝绳闻讯后，当夜命令玉林城防队长唐云通知新桥城防队长梁晨秋带兵去榕木根捕人。唐云曾受过共产党的影响。他接到命令后，一面派人给梁晨秋传达命令，一面暗中派亲信到门口岭给朱锡昂送信。可送信人走到牛头浪村迷了路，来到附近亮着灯光的卢五家里问路，并说明是给朱锡昂送信。卢五刚参加当晚朱锡昂召开的干部会回来，知道朱锡昂和王懿仁在新桥七小住宿，但他不知道来人的身分，怕上敌人的当，要来人把信留下，由他代送给朱锡昂。卢五不知事情的急迫，拿到信后，心想朱锡昂连日劳累，可能已经入睡，等第二天一早送去也不迟，结果却误了大事。第二天，即六月三日拂晓，朱锡昂和王懿仁的住处已被敌人包围，他与同志们分头向村外冲去。敌人一面开枪，一面追赶。当时，朱锡昂虽然披着蓑衣，戴着笠帽，和其他人没有两样，但因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引起敌人注意，集中兵力朝他追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朱锡昂命令身边负责保卫他的四名武装人员快跑，不要管他，说他一个人被敌人抓去没什么关系，不要使武装受到损失。在他的掩护下，这几名武装人员终于脱险，而他却被敌人逮捕了。

朱锡昂被捕后，立即被押到玉林县城。玉林县长唐朝绳一面严刑审讯，一面电告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请示处理办



法。黄绍竑命令唐朝绳迅速将朱锡昂就地秘密杀害。

朱锡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畏惧，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对革命的坚强信心。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深夜十二时，敌人在玉林城外北角楼城脚公路旁的小榕树下，将朱锡昂秘密杀害。

####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张震球：《回忆革命烈士朱锡昂》，载《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 《中共广西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7月30日）。
3. 《朱锡昂给中央巡视员和粤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27日）。
4. 《历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分类汇编》。
5. 广西省民政厅：《一九五五年关于追抚工作的文书材料》。
6. 《玉林高中简史》，未刊稿。
7. 中共玉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朱锡昂事迹专辑》，未刊稿。
8. 访问张罕因、王笑珊、饶卫华、杨翰峤、黎福海、苏厚光、苏少南、苏箕裘、苏锡球、苏荣灿、宁裕祥、吕日眸、杨熙山、庞显扬、潘乃德、冯邳郁等人的谈话记录。

## 欧阳洛（毛春芳）

左招祥 宋俊生

欧阳洛，字仲廉，是江西省永新县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过永新县委第一任书记、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湖北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〇年春，在武汉被捕牺牲。

### （一）

欧阳洛，一九〇〇年四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芦溪阳家村。父亲欧阳珩，是一个穷秀才，在北乡莲坊、古竹一带教书，家有薄田七亩，由母亲和兄长耕种。

一九一〇年，欧阳洛十岁时，跟着父亲在学校读书。十五岁时，由于家境贫穷，辍学在家协助母亲料理家务，参加劳动。但他仍然坚持自学，并几次向母亲提出，要去南昌继续求学。

一九二二年八月，欧阳洛征得父母的同意与支持，离开永新到南昌，考入第一师范。在学习期间，他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积极参加由赵醒侗、方志敏、黄道、袁玉冰等领导的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二三年，

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每当寒暑假回家，欧阳洛都向亲友进行革命宣传。在他的启发影响下，全村三十多户人家，后来有十多名青壮年参加了革命斗争；他的大哥欧阳帮和弟弟欧阳济都加入了共产党，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先后为革命流血牺牲。

## (二)

一九二五年一月，刚从第一师范毕业不久的欧阳洛，被派到吉安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在吉安第七师范和阳明中学读书的永新籍学生王怀、刘真、刘作述、刘家贤等十余人为党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刘真等在吉安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第七师范为核心，团结各校学生推动了全吉安人民积极响应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八月，欧阳洛和刘真、王怀等从吉安被派回永新，从事农民运动。欧阳洛到永新北乡田南、樟桥、古竹村创办农民夜校，吸收青壮年农民参加学习，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接着，他又和王怀一起，在永新县城秀水小学创办平民夜校，吸收县城苦力工人、学徒、进步知识分子一百余人，以识字教育为名，灌输革命思想。在北乡和县城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欧阳洛又和刘真到西乡和南乡发动农民。在办夜校的过程中，欧阳洛十分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永新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象马明、胡通、贺曙光等，都是欧阳洛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向湖南进军前夕，欧阳洛根据省

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策应北伐战争的指示精神，又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怡、贺敏学、贺灿珠、张荣锦、尹铎等二十余人为党员。七月中旬，组成了永新县党小组，欧阳洛为小组长。

七月下旬，欧阳洛在县城左家祠秘密主持召开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建立了中共永新支部，欧阳洛为支部书记。大会根据欧阳洛的提议，决定把党员分成四个组，深入东南西北四乡，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乡农民自卫队，以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并指定颜炯任永新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贺敏学为副总指挥。

会后，欧阳洛等即前往湖南茶陵同北伐军接上了头。他们向北伐军介绍了赣西情况，表达了永新人民欢迎北伐军的心愿，并共同商讨了进军永新的问题。九月初，北伐军从茶陵经莲花进入永新境内。盘踞永新县城的军阀部队陈首菊连，在永新农民自卫队袭击下，狼狈向吉安逃窜。九月下旬，北伐军进入永新城的第二天，在县城校场坪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欧阳洛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代表全县人民热烈欢迎北伐军，号召全县人民继续支援北伐战争，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

十月，永新成立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权机构——县行政委员会和国民党永新县党部。欧阳洛担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北伐军进入永新后，永新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进入了空前高潮时期，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欧阳洛被推举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当时，全县十三个区，一百三十七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欧阳洛首先领导广

大农民开展打倒豪绅地主的斗争，对侵吞公产、公款的土豪劣绅进行清算；对一般的土豪劣绅勒令罚款；对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首要分子给予严厉打击。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乡农民协会把控告大土豪曾辉光的状子交给了欧阳洛，他当即指示法庭加紧调查，迅速处理。三月，在永新县城召开了四乡农民一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欧阳洛在会上列举了曾辉光十大罪状，处决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大土豪。与此同时，他还领导各地农民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获得翻身，经济生活也有了一定改善。欧阳洛很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陋习的教育，领导农民协会开展取缔赌博、禁止虐待童养媳、实行放脚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雷厉风行地开展了禁烟运动（包括禁种、禁运、禁吸等），将收缴的烟枪、烟土悉数销毁。

随着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永新党的组织发展也很快，在城区、北乡、西乡、南乡四个片建立了四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五百多名。为了加强对全县工作的领导，根据省委指示，一九二七年四月，成立了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欧阳洛担任临时县委书记<sup>①</sup>，组织部部长为贺灿珠，宣传部部长为刘真，妇女部部长为贺子珍，青年部部长为贺敏学。

在欧阳洛领导下，县共青团、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县学生联合会、县妇女会、县商民协会、县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阵营，使永新县的革命斗争不断深入。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永新县以龙镜泉为首的土

---

<sup>①</sup>访问贺敏学的记录（1983年5月）。

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在篡夺县党政领导权的阴谋遭到挫折后，也积极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五月底，龙镜泉与已被他们收买的李乙然、尹寿嵩等土匪武装首领在禾山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偷袭县城。六月九日，匪首李乙然依据叛徒肖金然（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提供的情报，率领匪徒八十余人，自北乡怀忠秘密向县城进发。十日黎明前，敌里应外合，首先攻入县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驻地，缴去全部枪支八十余枝，劫狱放出周继颀等右派人物，旋即进攻县党部，捣毁各革命团体，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贺敏学、颜勇、龙忠贵、贺灿珠、张荣锦等七十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永新“六一〇”反革命事变。

当时，欧阳洛正在县城福音堂开党的会议。突然传来的激烈枪声，使他警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宣布会议暂停，沉着地组织同志们紧急转移。当他最后一个撤离会场时，敌人已经包围了福音堂。在这危急关头，欧阳洛当机立断，躲在教堂内的下水道里。由于敌人搜查很严，他在下水道里一连藏了几天<sup>①</sup>，都无法露面，遂机警地顺着下水道走到禾水河边，来到一家铁匠铺里。在铁匠师傅的帮助下，他又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安全撤离县城，经怀忠走安福，奔波四天，终于转移到了吉安，和早已撤退到吉安的刘作述、刘家贤等同志会合。

欧阳洛到吉安后，一面派尹铎去宁冈，王怀去安福，刘洋去莲花联络，要求袁文才、王佐率领宁冈农民自卫队，王新亚率领安福县农民自卫队，杨良善率领莲花农民自卫队，三路进

---

<sup>①</sup> 《贺水生有关欧阳洛烈士情况的回忆》（1982年9月27日）。

攻永新县城，营救革命同志出狱；一面在吉安组成了永新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驻吉安办事处，推派刘真、彭大燮赴南昌请愿，要求省方派员彻底查究右派反革命事件，惩办勾结豪绅、土匪屠杀革命群众的右派。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宁冈、莲花、安福三县农民自卫队按照预定计划攻占永新城，赶走了反动派，从敌人手中救出了贺敏学、龙忠贵等所有被捕的同志，同时逮捕并惩处了柳安、李良弼、谭芝南等右派分子。

###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欧阳洛根据省委指示来到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sup>①</sup>。八月三日，起义部队南下，党组织指示欧阳洛火速离开南昌，转移去上海。欧阳洛化了装，昼伏夜行，兼程赶路，当他来到九江码头时，已经身无半文了，后又几经周折，才到了上海。事后，欧阳洛曾深有感触地对亲人说：“我到九江，找不到党的关系，路费已经用完，就到处讨饭，才来到上海，不料地远人生，找不到组织，几天没有饭吃，饿倒黄浦江边，几乎死掉，幸而碰到某同志，把我扶起来，才找到组织”<sup>②</sup>。

欧阳洛与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时已脸色黑黄，骨瘦如柴，简直不象个人样。但他仍然要求省委立即分配工作。省委答应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沪东部委（后改为区委）工作。

当时江苏省委为了恢复上海各工厂的工作，决定派一批得

---

<sup>①②</sup>廖华：《欧阳洛同志传略》，存中央组织部档案室。

力干部到工厂去，以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上海总工会特派员张维桢，大革命时期就在沪东区从事工人运动，对沪东各工厂的情况很熟悉，省委遂指示他把欧阳洛等十名党的干部介绍到沪东各工厂去。

根据这一指示，张维桢于一九二七年九月的一天，在共产党员江浩然的家里与欧阳洛接上了关系。张维桢告诉欧阳洛，组织决定派他到英国人开办的老怡和纱厂作工，并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张维桢还说：“我是湖南人，你就作我的老乡，说是从湖南乡下来上海找工作的。”为了秘密工作的方便，张维桢建议欧阳洛，从此改名毛春芳<sup>①</sup>。

张维桢以前在怡和纱厂担任党支部书记时，公开身分是厂里的职员，因而与那里的工头相识。这次，他与工头商议之后，叫欧阳洛在粗纱车间写字间当抄号头的先生<sup>②</sup>。在党内，欧阳洛是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不久，根据省委的指示，欧阳洛担任了沪东区委书记，省委常委等职务。

上海的工人运动，经过“四一二”事变，“工人斗争渐次退溃”<sup>③</sup>。欧阳洛担负着重新恢复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的艰巨任务，工作十分繁重。码头工人的工作难以开展，他就去那里召开支部会，并兼任码头支部书记。经过他几个月的努力，沪东区几个主要的工厂，如祥昌肥皂厂、英商自来水厂、英资新老怡和纱厂、日本纱厂、码头、电车公司、南洋公

---

① 《宋俊生、左招祥访问记录》，（1983年4月29日）。

② 写字间即办公室。抄号头的先生，负责按工号登记工人上班、缺勤、迟到、早退和厂里发生的重大事件。

③ 中共江苏省委：《职工运动决议案》，原载《政治通讯》1929年第4期。



司、华成公司、华商公司等单位，都有了党的组织，党的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强调要继续进攻，继续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在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中央要求江苏省委，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罢工，举行“第四次暴动”。欧阳洛任区委书记的沪东区，在当时上海的八个区中，是产业工人比较多、党的工作最有基础的一个区，所以江苏省委指示沪东工人首先大罢工，继而带动全上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欧阳洛领导沪东新老怡和纱厂、日本纱厂和电车公司等处工人进行了罢工，但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大批工人被厂方开除，国民党市政府还颁布法令——不准工人罢工。此时，上海的工人运动，“更退到消沉的境地”<sup>①</sup>，使刚刚聚集起来的一点力量，又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欧阳洛并没有退缩。他一面如实地向省委汇报了上述情况，一面和区委的其他同志一起，顽强地坚持着更加艰巨的重新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沪东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沪东工人俱乐部”，以拉拢工人，分裂工人队伍。欧阳洛经常向工人揭露反动派组织俱乐部的目的，教育工人不要去参加，致使“沪东工人俱乐部”招牌挂出好几个月，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只笼络了四十多人去参加活动<sup>②</sup>。

这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以欧阳洛为首的沪东区委又组织领导了一次捣毁“沪东工人俱乐部”的行动。据

---

①毛春芳谈老怡和（1929年3月2日），存上海市档案馆。

②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资料。

当年十一月十日《十月革命纪念周沪东区工作报告》说，这次事件发生后，“一般的工人与市民，没有一个不晓得是打反动俱乐部，……反动派……吓得不得了，几天不敢开门，今天已把招牌取下连同打坏的东西，用汽车搬走了。”

当时，由于党的整个工人运动政策过“左”，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欧阳洛重点抓的老怡和纱厂，个别同志亦存在胆怯心理，工人们斗争情绪普遍不高，工作一时难以开展。他首先坚定了党员的信心，然后领导大家先从童工、青工着手，进行细致的宣传动员，在有了一定基础后，大胆地组织了一次童工罢工，得到了胜利。童工罢工的胜利，鼓舞了成年工人的斗志，工人情绪开始活跃起来。欧阳洛因势利导，于一九二九年初，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新老怡和纱厂工人为反对工头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欧阳洛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发动罢工开始后，新老怡和纱厂的工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阿毛”（当时欧阳洛的公开身分仍是老怡和纱厂粗纱车间写字间抄号头的先生，化名毛春芳）。他们说：“这个先生与别的先生不一样，对工人和气。”表示愿意听他的话。资本家无奈，只得再三委托欧阳洛出面调停。结果，在他的“调停”下，通过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厂方答应开除殴打工人的工头，罢工半天不扣工资，释放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人，并放十元钱的爆竹；用汽车将被捕工人接回，恢复被捕工人工作，还发给十元钱的津贴费。“此后工人气焰甚极”，党支部也“已恢复，同时扩大到七八十人。”<sup>①</sup>整个沪东区，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一个工厂有党员一百六十

---

<sup>①</sup> 《毛春芳谈老怡和》，（1932年3月2日），

余人，十个党支部能经常开会；还恢复了八个青年团支部，有团员八十余人<sup>①</sup>。

一九二九年“五卅”运动纪念周活动时，沪西区委书记张浩被捕，沪西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省委为了加强沪西工作，决定派欧阳洛任沪西区委书记。欧阳洛毅然服从组织调动，于当年六月离开了经过他辛勤努力，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的沪东区，前往沪西。

欧阳洛到沪西后，首先抓了区委领导班子的整顿。区委有位负责同志怕艰苦，工作积极性不高，经省委指出后，仍无多大改变。欧阳洛多次找他交谈，坚定了他斗争的信心。为了团结区委同志一道工作，欧阳洛遇事都要与管组织的游无魂和管宣传的马天恨等共同商量。这样，不但弥补了他自己刚从沪东调来，对沪西情况不熟悉的弱点，而且也调动了区委“一班人”的积极性，为搞好沪西区的工作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接着，欧阳洛又领导区委，对基层党组织与各种群众团体进行了整顿与恢复，使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消沉的一些同志重新振奋了革命精神，并逐步学会了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的工作方法。

这时，欧阳洛虽然对党的“左”倾政策还没有全盘的认识与抵制，但是，他从实践中已感到对革命既不能有取消观念，也不能盲目的行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注意工作方法。早在沪东区委工作时，他就一再指出蛮干的工作方法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来到沪西后，他进一步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更加注意

---

<sup>①</sup> 《毛春芳谈沪东大概情况》（1929年），存上海市档案馆。

工作方法，反对盲目乱干。据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上海各区书记联席会议记录》载，欧阳洛曾多次在发言中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及防止错误观点的问题。他说：“工作方法是特别注意的”，那种“迫步生命恐怖之事”和“百无效果的集会不如不做”。他也不同意那种“取消观念”，说：“我主张必须防止不正确观点。”<sup>①</sup>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欧阳洛在沪西的工作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都被他克服了。

经过他和区委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支部破坏的已被恢复”<sup>②</sup>，整个沪西区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

欧阳洛在上海工作期间，与年轻的女共产主义战士沈风音结婚<sup>③</sup>。

#### （四）

大革命失败后，湖北省委的工作，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省委被破坏五次，先后有五名省委书记被敌人杀害，他们是：刘伯庄、蓝之光、于华、刘少猷和柳直荀。

党中央为了恢复湖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派叶守信、何玉林、欧阳洛（毛春芳）等赴武汉，重组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武汉特支的信指出：“中央决议恢复湖北省委，指定于斯珍（即叶守信）、赫世伦（即何玉林）、孟之

---

<sup>①②</sup> 《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存上海市档案馆。

<sup>③</sup> 沈风音，又名沈谷南，湖南省湘乡人，1909年9月生，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来上海，在中央机关任交通和机要秘书。1968年3月29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富（即毛春芳）、龙信嘉（即刘先觉）……，为省委委员，于赫孟三人为常委，于为书记，赫为组织，孟为宣传。”

当江苏省委某负责同志找欧阳洛谈话，把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通知他时，他感到有些突然。因为来沪西才三个多月，现在又要到湖北去，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同时，他也感到担子沉重怕挑不起来。但是他还是立即做动身的准备，仅仅用了几天时间，就交待了工作，准备启程。这时沈风音正怀孕在身，他安慰了妻子，并嘱咐生下孩子取名“欧阳申华”。之后，便离开家门。

九月下旬，欧阳洛乘船来到武汉，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叶守信、何玉林等一起，先将原武汉特支的工作接了过来，对原特支所属的各级组织及党员进行逐一审查，并重新组编了支部和小组。在武汉党组织整顿的同时，他们又先后组织了鄂豫边特委、鄂东特委、鄂西特委，为恢复和发展武汉地区及全省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组织整顿结束后，欧阳洛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工作，并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向中央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已加紧此地的工作，我们天天同他们去跑些工人支部，粤汉路亦找到线索，兵工厂亦有办法，十月革命纪念，此地亦准备大批宣传品，武汉三镇同时散发传单，工作上亦有相当的布置”<sup>①</sup>。在这个报告中他既谈到了湖北地区军阀混战的形势，也分析了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严重性，为更好地开展湖北的工作，他希望中央多派些人来。

在实际斗争中，欧阳洛很注意白区工作的策略与方法。他

---

<sup>①</sup> 《孟之符（欧阳洛）向中央的报告》，（1929年10月30日），原件存湖北档案馆。

深入工人之中，通过和工人谈话，给工人讲故事，把工人吸引到党的周围，引导工人为党的纲领而奋斗。在白色恐怖下，他主张党的工作应该从解决群众自身的利益入手，而不要勉强去鼓动群众搞那些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否则我们的工作不但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还容易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因此，他提出，要力求工作方法的群众化。他认为，当时在工厂中组织赤色工会的条件还不成熟，就向省委提出组织工厂委员会的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对团结工人，进行战斗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湖北省委里，欧阳洛是分管宣传的。他很重视对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办了很多二厂小报，不定期出版。为了办好这些小报，他在各工厂，特别是几个重要的工厂内建立了通讯员网。通过散布在各厂的通讯员，他把各个工厂发生的工人们最关心的材料收集起来，以及省委掌握的各地区工人斗争的情况，用生动活泼笔调叙述出来，一方面对工人进行教育，一方面对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工作上的指导。小报由于紧密结合工人实际，很受各工厂工人的欢迎。

由于欧阳洛的出色工作，一九三〇年二月初，中央在改组湖北省委时，升任他为临时省委书记。二月十八日，又正式任命他为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正当欧阳洛全力以赴为开展全省的工作而斗争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欧阳洛在洪山主持召开党的会议。因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开会的地方，欧阳洛、邓斌、何长濬、史汉斌四人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欧阳洛面对酷刑，“未供出一字”<sup>①</sup>，只说自己是江西人，名字叫苏得三，到武汉来

---

<sup>①</sup> 《省委工作记录》（1930年），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当工人的。不久，他的一个永新同乡、时任国民党军队团长的人物，以“看望”为名来狱劝降。欧阳洛厉声地说：“大丈夫死在战场，决不投降。”最后，那个同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欧阳洛说：“我死后，请告诉我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难过，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sup>①</sup>

一九三〇年四月的一天，欧阳洛在武昌阅马场惨遭杀害，时年二十八岁。

---

<sup>①</sup> 《关于欧阳洛同志的情况座谈》（1982年7月16日）。

## 李敬铨

刘明义

李敬铨，字子衡，又名李国栋，一九〇四年生于济南市。其父在济南经营一小煤炭店，字号“聚源和”，买卖尚兴隆，家庭生活也还过得富裕。在李敬铨出生前父亲病故，家业逐步破落，敬铨到了入学年龄，其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先读私塾，后入小学，小学毕业后，又考入济南师范讲习所。敬铨在校性情爽直和善，与生活清贫的同学感情很好，但对那些骄横的纨绔子弟，却是横眉冷对。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李敬铨初步接受新思想的影响，积极投入济南学生界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

一九二三年，青岛大康纱厂派人来济南，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培训工师，李敬铨应招进了青岛大康纱厂，任粗纱工师。大康纱厂是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厂里的工人直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李敬铨等学生出身的工人，本来具有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注入的进步思想，现在又目睹和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欺凌，对帝国主义充满仇恨。他们在工人中间活动，积极酝酿反抗斗争。

一九二四年，青岛的中共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到大康纱厂开辟工作，李敬铨同司铭章等人，首先同党组织发生了联系。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学习胶济铁路总工会的经验，在工人中间积



极地开展宣传活动，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秘密建立了大康纱厂职工会，李敬铨同司铭章等被推为负责人。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两个月便发展会员八百余人。

工会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厂方的注意，厂方阴谋先发制人，将刚刚诞生的工会组织扼杀在摇篮中。四月十八日，日本警察趁工人上班之际，持枪在“华工宿舍”强行砸门撬锁，进行搜查，掠去了工会的文件，还逮捕了三名工会干部。李敬铨等工会领导人得知消息，立刻发动工人于当日下午六时，团团围住了工厂的办公机关人事系。在激愤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日本厂主被迫于当晚十时，将三名工会干部放了回来。李敬铨同司铭章等人，连夜将厂里的情况向青岛党组织做了汇报。青岛党组织召集李敬铨和大康纱厂的其他三十余名工会干部开会，一致决议举行全厂大罢工，并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李敬铨同司铭章等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会议还推举李敬铨、司铭章等人，组成谈判代表团，负责与厂主谈判。会议一直开到天明，罢工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会后，工会迁到四方小学和四方机厂宿舍秘密办公。

四月十九日晨，大康纱厂的罢工宣言，分别送到日本厂主和青岛警察当局的手里。宣言提出二十一项条件，如不完全答复，全厂工人将于四月二十日晨六时起举行罢工。日本厂主看完罢工宣言，根本不考虑工人提出的条件，当即打电话给青岛警察厅，要求调保安队于二十日黎明来厂镇压。工会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提前六小时罢工。待黎明保安队到达时，全厂四千余罢工工人已经占领了大康纱厂及华工宿舍。接着，罢工执行委员会召开露天大会，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散发了《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和《告军警书》。在大康纱厂的

影响下，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和钟渊、富士、铃木等厂也相继宣告罢工。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联合罢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关心和重视。党中央从上海派工会代表江元清、张佑臣携款来青慰问，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吴雨铭来青表示支持，中共山东省委也派刘子久、王翔千、李慰农等到青岛帮助指导斗争。

罢工期间，工人们组成了武术纠察队，严厉教训了破坏罢工的工贼。日本厂主在内外压力之下，又眼见纺机停转造成重大损失，不得已答应与工会代表谈判。李敬铨、司铭章等工会代表，在谈判中坚持原则，不断揭露厂方软硬兼施的卑鄙伎俩。经过二十二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厂方于五月九日答复了改善工人待遇等五项条件，并签定了复工条约。在李敬铨、司铭章等人的指挥下，罢工委员会于五月十日下午二时，召开了由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和学生、商界代表共一万八千余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罢工取得胜利。但是，工人复工以后，大康纱厂的厂主却迟迟不履行协议，并密谋策划开除工人领袖，武力解散工会。正在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在出席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后来到青岛。他听取了市委负责人李慰农关于日本纱厂大罢工的汇报，指出：“这次纱厂罢工虽然胜利了，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条疯狗。大家想想看，敌人能从此甘休吗？必须估计到他们可能进行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得高，看得远，正确地认清时局。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事实果然如刘少奇所说。五月中旬，大康纱厂厂主便开除了李敬铨等五十名工会代表，并让市警察

厅将他们驱逐离去。李敬铨等离开大康后，仍住在四方一带，继续开展工会工作。这时，四方地区的各厂工会，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已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五月二十四日，各纱厂工会，在得知警察厅长陈涛将于二十五日率军警前往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取缔工会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在四方党支部的领导下，决议了对付办法：一、会议文件全部收藏，停止办公一日；二、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三、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到工会命令，三厂同时停工，工人不可出厂，但不做工，直至牌子归还为止。会后，李敬铨等马上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传达工会决议，发动工人严阵以待，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军警果然围困了大康纱厂，摘去厂工会的牌子。三厂工会同时下达了罢工令，不到一小时，三厂一律停车，开始了第二次罢工，并将警察厅长团团围住。当晚九时，警察厅请示督办公署后，将工会牌子归还工人，工会才下令复工。

五月二十八日，胶州湾突然开来两艘日本舰艇。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张宗昌出动了驻青岛的海军陆战队两个营，陆军两个营，青岛保安队两个大队及便衣警察，约计三千人左右，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和工会办事处，武装驱赶工人出厂，并绑架工会领导干部。李敬铨在大康纱厂工人宿舍被秘密绑架逮捕，同时，在大康被秘密绑架逮捕的工会干部有三十余人。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被反动武装军警打死八人，打伤十七人，又捕去工会干部三十余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对纱厂工人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动全国的“青岛惨案”。

被捕的七十二名工会干部，都拘押在警察厅东镇分局的一个大禁闭室里，李敬铨利用这个机会同大家商议，决定在敌人审讯时由他和司铭章等已暴露的同志承认是罢工领导人，承担起全部责任，以掩护大多数工会干部。结果，李敬铨等六人被反动政府作为首犯解送到济南执法处关押。

“青岛惨案”拉开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帷幕。“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全国人民纷纷声援青岛惨案中被捕关押的工会干部。军阀张宗昌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得不将李敬铨等六名工人代表释放。为了庆祝斗争胜利，济南学生会、市民雪耻会、各界外交后援会等团体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李敬铨出狱后，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秋，李敬铨被党组织派回到他的祖籍历城县鸭旺口搞农民运动。鸭旺口在济南城东约六十里的小清河南岸，是一个较大的村镇，镇上驻有缉查队三四十人，是反动统治比较严紧的地方，过往的行人都要受盘查。李敬铨同苏美一住在挚友、同族兄弟李敬朝的家。他们经常深入到贫苦的青年农民中去宣传革命道理，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足迹踏遍了鸭旺口四周几十里的村庄。这期间，济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宋伯行、省委委员刘俊才等，曾到鸭旺口检查指导工作。

一九二五年秋后，由于工作需要，李敬铨又被调回青岛搞工人运动。虽然他在历城只活动了四十多天，但却为以后党在这一带建立组织，开展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李敬铨到青岛后，反动当局跟踪盯梢很紧，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于是，党组织复调他去济南搞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

下半年，省委又派他去鲁西北搞了一个时期的农民运动。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为加强淄川矿区的工作，派李敬铨和张洛书、宋耀庭等到淄川，李敬铨主要负责矿区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依靠工人中的党团骨干张德水、刘洪庆等人，深入到矿区解庄、杨家庄、车家庄、宋家庄、寨里等农村的煤矿工人家里串访宣传，向工人揭露中日资本家和把头榨取工人的血汗的罪行，讲述中日合办的鲁大煤矿公司为什么要查封工人俱乐部等道理。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动，李敬铨等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两天，在龙王庙分别召开了矿西部和矿东部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共有二百多人参加。这两次会议上，工人代表们控诉中日资本家及反动军阀的压迫剥削，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李敬铨等主持的会议，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在思想、组织准备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作出了“一月三十日举行罢工”的决定。会后，又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淄川县委的名义散发标语传单，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及国民党政府，实行三八制，增加工资，救济一切失业工人和召开工农代表会议建立苏维埃政府等不适当的口号。军阀张宗昌得报后，立即下令逮捕共产党人，对罢工工人进行武力镇压。为了避免造成损失，李敬铨等果断地决定延期罢工，及时组织了正确的退却，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一九二八年三月，乘新老军阀抢夺地盘、山东时局动乱之际，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淄川炭矿的工作。他们深入到炭矿所属的八行、十行、南旺、石谷等井，串连工人，组织工会。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淄川炭矿工会在洪山镇正式成立，第一批会员就有三百多人，还组织了工人纠察

队。在李敬铨、张洛书等的努力下，淄川地区的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仅矿区就有党员八十余人。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淄川炭矿传出资方裁减工人的消息。工会会员们纷纷要求罢工。李敬铨、张洛书同工会干部研究决定，在裁人之前的六月二十五日，由工会公开出面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李敬铨、张洛书起草了《淄川炭矿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和致鲁大公司的一封信，申述罢工原因，提出工人们要求的条件，并限矿方六小时内圆满答复。对于宣言和信中提出的条件，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拒不答复。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在工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等分矿的四千多名工人，按计划全部罢工，当班的七、八百名工人齐集在马家庄南庙举行大会。中日资本家闻讯后，立即派出驻矿日本军队松田中队，去南庙冲击会场。罢工工人对这支曾在济南参与制造“五三”惨案，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帝国主义军队充满仇恨，奋起英勇搏斗，夺得了一挺机枪和两支步枪，使日本兵始终未能冲进会场，但九名工人却被抓走。事后，国民党县政府，派员赴现场调解，在县长陈学海向工人答复“三天内条件我可以担保”，并答应与日本兵交涉放出被抓走的工人后，李敬铨、张洛书和工会干部才商量决定，为减少损失，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工人各回本井进行斗争，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复工。

此后，李敬铨、张洛书等根据省委的指示，一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淄川县政府与中日资本家勾结的真面目，一面继续组织工人，为释放被捕工友和实现增加工资等要求而斗争。罢工坚持了十多天，警察当局和公司终于被迫放出了被抓的工人，并答应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

一九二八年秋季以后，李敬铨被调回济南，担任中央交通员，经常赴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传递党的机密文件。后来，他又在济南协助省委当时的负责人丁君羊工作。省委的办公地点就设在李敬铨家里。此时，李敬铨已有五个孩子，生活主要依靠其妻帮人洗衣、做针线活挣几个钱维持，全家时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但他没有因为家庭经济的极度困难而影响工作。他的妻子也积极支持他从事革命活动，还常为省委在他家召开的会议放哨。

一九二八年底，因王复元、王用章叛变，山东省委遭到破坏，邓恩铭、刘兆章、朱霄、宓耀庭等九人被捕。王用章原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已往关系甚密。省委被破坏后，王用章找李敬铨到大明湖畔谈话，拉李敬铨投敌。李敬铨了解到王复元、王用章等已经叛党投敌的时候，气愤至极。但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含糊的语言来搪塞王用章，王见李敬铨态度不明，便威胁说：“小李子，你干共产党我不反对，但不准你在济南干。你在济南我逮住就枪毙你。”李敬铨摆脱了王用章的纠缠之后，立即向新组成的省委领导做了汇报，组织上马上采取了应急措施，使一些同志脱离险境。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省委研究决定了铲除叛徒王氏二兄弟的计划。同时，中央为保存力量，将刘子久、卢福坦、顾作霖、傅书堂、王元昌、王元盛等调离山东。在省委领导下，终于由张英、王科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在青岛将叛徒王复元处决。

王复元被处决以后，王用章改名王天生，组织了捕共队，疯狂的破坏我党组织，捕杀我党党员。在恶劣的环境下，李敬铨冒着危险去疏通关系，营救同志。迫于当局的追捕，组织才将李敬铨调离济南去天津北方局工作。李敬铨在天津活动不

久，又被北方局派回山东。此时，济南已难以立足，李敬铨的家里日夜有特务监视。他在济南找不到党的组织，便先回原籍历城鸭旺口暂避。不久，李敬铨前往青岛，与已经迁到青岛的省委机关接上关系后，被留在省委工作，并任省委委员。后来，省委决定李敬铨返回济南，组织济南特委（亦称特支），并任书记。

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间，李敬铨到济南，按省委指示与王永周接上关系，住在王的宿舍里。当时，济南仍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特务、便衣、捕共队遍布全城。李敬铨不畏艰险，日夜奔忙，先后将济南北园乡村师范和鲁丰纱厂、电灯公司、津浦路机务段等单位的党组织恢复起来，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鲁丰纱厂、电灯公司和津浦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元旦，李敬铨约王永周到津浦铁路济南六厂去组建党支部。他们二人一前一后，走到三大马路纬五路萃卖场门口的时候，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突然刹车，从车上跳下了叛徒王天生、郭金祥，将李敬铨逮捕了。

李敬铨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定。任凭敌特叛徒软硬兼施，耍尽各种花招，他始终大义凛然，没有暴露任何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国民党反动当局非法判处李敬铨死刑。但李敬铨并未丧失斗争的信心。监禁期间，他向难友马馥塘借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秘密地认真阅读研究，并经常鼓励难友坚持斗争，保持革命气节。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凌晨，李敬铨和先期被捕的邓恩铭、朱霄等二十二人被提出牢房。他意识到这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的时刻到了，走出牢房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赴刑场的路上，又和难友们一同高唱《国际歌》。天亮以后，他们已在纬八路刑场惨遭杀害。李敬铨就义时，年仅二十七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出版。
2. 《向导》第120期，121期，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3. 刘元熙、赵振林：《淄博早期工运人物》，载《山东工运史资料》1982年第3期。
4. 丁君羊：《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山东党的组织状况》，载《山东党史资料》1981年第1期。
5. 刘子久：《我对济南早期工人运动情况的回忆》，载《山东党史资料》1981年第1期。
6.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全省党组织状况的报告》，1929年1月8日；《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汪秋实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大纲》1931年1月13日，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
7.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后山东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料辑要（续上）》，载《山东省志资料》1962年第1期。
8.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后山东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料辑要（下）》，载《山东省志资料》1962年第4期。
9. 《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在青岛》，载《支部生活》1980年第1期。
10. 中共平原县地方党史大事记，存中共平原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
11. 济南历城县志，存历城县志办公室。
12. 大康纱厂史，存青岛第一棉纺厂。
13. 淄博煤矿史，存淄博煤矿展览馆。

14. 1931年12月31日《平民日报》。
15. 访问刘子久、丁君羊、马馥塘、王永周、孟兆绪、李人起、李人英、李子善等人的录音、记录材料，存济南市总工会工运研究室。
16. 转抄杨乙辰、司铭章、魏轶凡、李敬朝、蒲文泉、周培喆等人的文稿，笔录资料，存济南市总工会工运研究室。
17. 王用章笔供资料，存山东省公安厅资料室。

# 黄公略

方大铭 谢秉忠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一九三〇年七月）

黄公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历任红五军第四团党代表、第二纵队长、湘鄂赣边境支队支队长、红五军副军长、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等职。从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到参加指挥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屡建奇功，威震敌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不幸在敌机扫射下中弹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 （一）

黄公略，原名汉魂，字家杞，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正月初三)生。湖南省湘乡县人。父亲黄秀峰，早年考秀才未中，便绝意仕途，在湘乡县兴让乡老虎山下的高木冲结庐数间，耕读自娱，兼教蒙馆为生。黄公略有三个哥哥，均系大母左氏所生。大哥黄梅庄，比他大二十多岁，为人奸滑，不务正业，后来当了蒋介石的走卒，被红军镇压。二哥黄星远，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活动，后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受训，未及毕业，因病返家，一九一四年病逝。他对小弟很爱护，临死前曾勉励黄公略要“保祖国于不忘”<sup>①</sup>。三哥黄麟四，早夭。黄公略和他姐姐菜香的生母彭氏，原是黄家丫头，左氏去世后，由父亲继娶为妾。她粗识文字，为人勤俭朴实，因出身低微，在黄家没有地位，非常同情贫苦人民的遭遇，经常教育黄公略长大后要为穷人撑腰办事，对黄公略有深刻的影响。一九二八年黄公略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后，彭氏被黄家逐出家门<sup>②</sup>。

黄公略七岁时，由父亲教读《三字经》启蒙识字。接着，又读“四书”“五经”。他自幼聪颖，记忆力强，读过的书能背诵如流。十岁入附近峒山小学读书。毕业后，又到离家六十多里的永丰高等小学堂就读。永丰高等小学堂是当时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教学内容除国文外，还有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学说方面的知识。在这里，黄公略扩大了视野，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他目睹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步加深，国势日危，民生疾苦，“中华民国”有名无实，忧

---

<sup>①</sup>1977年9月27日访问黄祖禹谈话记录，1961年3月24日湘乡县民政局整理黄公略事迹材料。黄祖禹，黄公略之侄。

<sup>②</sup>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9~170页。

国忧民之心无时或已。但是，他并不悲观。他相信社会终会进步，国家终会富强。由于他能诗会画，便经常以此寄托他的情怀。一次，一位族人请他作画。他挥笔画了一片浩渺的湖水，上空白云拥簇着红日，一只飞鸟掠空而过。族人问他的画意，他回答说：“烟雾是暂时的，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人类总是要由黑暗走向光明的。”随印在画上题了“烟携孤鸟渡，云拥半湖晴”的诗句。他的这种远见卓识，使这位族人深受感动，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sup>①</sup>。

黄公略少年时，性情刚烈，见义勇为，不畏强暴。在他十三四岁时的一天，在离家约五里地的壕基界小溪的石桥上，看到一个税警欺压民女。他上前干涉反遭叱责，便一掌把税警推到溪里，然后拔腿就跑<sup>②</sup>。父亲既喜他从小有志气和正义感，又担心他将来闯大祸，便要他经常背诵苏轼《留侯论》中“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之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段话，以促使他抑制自己性格暴躁的一面。他喜读兵书，也有感于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黄石公得以精通韬略，后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建功立业的故事，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作黄公略，又叫黄石<sup>③</sup>。此后，他就一直使用这两个名字。

一九一四年，黄公略在永丰高等小学毕业。父亲年迈，不

---

①中共湘潭地委组织部、中共湘潭地委党史办公室、湘潭地区民政局编，《湘潭地区革命烈士诗词书信选》，1983年6月印。

②访问黄祖禹谈话记录。

③杜平：《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载中共湘乡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编，《党史资料》1984年第9期。

让他远离，留他在家教私塾。他不忍违拂父意，但又很不满意这种株守家园、整天教学生念“诗云子曰”的生活，渴望冲出这“世外桃源”，为烟雾迷漫的中国寻找和开辟一条重见光明的道路。一九一五年秋，父亲病逝。他便向大哥提出外出求学的要求。大哥自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却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理由，不但不满足他的要求，反要他在家弃教种田。这使他感到十分气愤。次年底，他终于下决心效法班超，投笔从戎，在一个堂兄的陪同下离家赴长沙投奔湘军<sup>①</sup>。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 (二)

黄公略投入湘军之时，正值湖南军阀打着护法、统一中国的旗号，与北洋军阀争夺地盘之际。从一九一三年十月到一九二〇年六月，北洋军阀的汤芑铭、傅良佐和张敬尧曾先后督湘。他们在湖南镇压革命，搜刮民财，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特别是张敬尧督湘期间，湖南更是十室九空，怨声载道。因此，湖南人民对北军恨之入骨，而对当时遭到北军压迫的湘军则寄以殷切的希望。

黄公略投入湘军后，最初在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三营八连当兵。不久，他的书写绘画才能得到营长的赏识，被调任营部文书。一九一八年四、五月至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六团团部在驻地浣溪圩（位于湖南茶陵、酃县之间）举办临时训

---

<sup>①</sup>1977年9月28日访问黄春生谈话记录。黄春生，黄公略的堂弟。并参见《彭德怀自述》第169页。

练队，既学军事，也学文化。他被任为训练队国文教员。一九二〇年六月驱张（敬尧）战争结束前夕，他被提为排长。一九二二年秋，他考入赵恒惕主办的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编入第四教授班学习。一九二三年八月结业后，被派回原部任副连长。就职前，曾请假回家，与一农家女子刘玉英结了婚。同年十一月，谭（延闿）赵（恒惕）战争结束后，黄公略又被提为连长。

在这期间，黄公略从亲身参加军阀混战的实践中，开始体验到要救国救民，“还是要搞军队”。一九二二年秋，他与李灿相约彭德怀投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就是从这种思想出发的<sup>①</sup>。彭德怀是他在六团训练队当国文教员时认识的<sup>②</sup>。当时彭在训练队学习。通过彭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在六团一连二班当兵的中学生李灿。三人都满腔爱国热忱，思想感情一致，很快成了契友。后来彭德怀谈到他在湘军中当兵六年的感想时曾说：“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奋发图强，廉洁奉公，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黄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军三军军长和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sup>③</sup>同时，他从军阀混战的实践中也认识到：要救国救民，依靠湘军这样一支为军阀所控制、没有

---

①参见《彭德怀自述》第33页。

②彭德怀《往事回忆》中说：“公略是一个求知欲很高的同志，我们一九一九年即认识了”（《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6页）。据《彭德怀自述》，当时彭正在六团临时训练队学习。

③《彭德怀自述》第29页。

坚定明确的政治纲领、内部矛盾重重、“今日归汉、明日归曹”的军队是绝对不行的。据当年当过他勤务兵的左绍仙介绍说，当时湘军中的连排长多以醉酒嗜赌来消遣。黄公略当连排长时却总是勤研典范条令，与士兵同操作，暇则看报，经常感叹国事的腐败<sup>①</sup>。正因为如此，早在六团临时训练队期间，他就和彭德怀一起团结了一些人，大家相互勉励，以救国爱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等。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彭德怀组织救贫会的活动。一九二一年底，彭德怀、李灿和他等五人秘密讨论救贫会的章程时，他们把平日交谈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1. 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 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 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 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讨论中，当李灿提出第二条时，他高兴得跳起来说，这是救国救民的纲领<sup>②</sup>！这些既反映了他当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反映了他想和别人团结起来改造湘军的愿望。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原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衡阳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七月十二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唐生智将原湘军第二师改编为第八军第一师，任周磐为师长，下辖三个团。师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黄公略所在团改编为第一师第三团。他仍任连长。由于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和团、营指导员经常向部队讲政治课，在部队进步分子中秘密传阅《共产主义ABC》等书刊，

---

<sup>①</sup>访问黄祖禹谈话记录。

<sup>②</sup>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3页。



黄公略开始了解共产党和接触马列主义。

第八军第一师经过短期整训后，即行北伐。这时，黄公略认为他已经找到归宿，在北伐战争中作战非常勇敢。十月十日，总攻武昌时，他率领连队向宾阳门进攻，多次冲锋均被敌人打退。这时，他身先士卒，冒着炮火，搭云梯爬上城墙，将敌人的机枪炸哑，使部队得以冲上城头。他的英勇行动受到团长李仲仁的嘉奖。

黄公略所在部队参加攻克武昌的战斗后，经孝感、花园等地开到宜昌过春节。这时，适逢黄埔军校要从国民革命军中招收一批年轻军官到高级班学习。这个高级班是黄埔军校为适应北伐胜利，部队迅速发展的需要，培养一批组成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人员而设立的。当时黄埔军校在北伐军中威信很高，黄公略早已向往。经过团长李仲仁的推荐、师长周磐的批准，他通过考试被录取了。他十分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彭德怀，彭却不以为然<sup>①</sup>。但是，当他离开部队前往广州入学时，彭德怀还是赶来送了行。两位挚友依依惜别，黄公略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彭德怀，留作纪念<sup>②</sup>。

### (三)

黄埔军校高级班设在广州长堤原海军司令部旧址，设有军事、无线电及化学三科。一九二七年一月开课。黄公略读的是军事科<sup>③</sup>。当时黄埔军校中革命派与反动派之间斗争十分激

---

①参见《彭德怀自述》第47页。

②访问周桢、黄桃等人谈话记录。

③曾颖、卜一鸣，《黄埔军校高级班创设始末》，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烈，高级班开学后也不例外。黄公略入校后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观察，便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不久，“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黄公略更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反革命本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后，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揭开了他政治上崭新的一页。

一九二八年三月，高级班结业前夕，黄公略收到了彭德怀的来信，邀他毕业后仍回师工作，并说已征得周磐同意，由他来办一个随营学校；同时寄来了路费。当时第八军第一师已改为湖南独立第五师，师长仍为周磐。彭德怀已升任该师第一团团团长。黄公略将这一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旬，黄公略由广州经上海、汉口、岳州到达当时独立五师一团驻地南县，与彭德怀（当时彭已入党）等见了面。关于这次会见，《彭德怀自述》中有一段生动具体的描述：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注：应是指农历），黄公略由粤回南县团部，使人高兴。顷刻李灿等闻讯跑来，交谈了一年多来的情况。晚饭后除谈团的情况外，又谈到随校筹备工作快完毕，周兼校长，黄公略为副校长，实际周不会来校，对工作反而会有好处；军事教科书以湖南讲武堂的教材为准，正在翻印。讲到学校宗旨章程时，其中有打倒新军阀，黄石突然发问，新军阀是指谁呀？我（即彭德怀）说：‘当然是指蒋介石。’黄公略突然发怒说：‘我们校长’如何如何……。大家也突然失色：一切秘密工作都告诉了他，这还了得！大家气愤到不可形容。我说：‘公略呀！我们多年友好，过去你说，对革

命事业如何如何，现在一反过去，那就好吧！你走你蒋介石的阳关大道，我走我艰难险阻的独木桥。’张荣生拿了一条毛巾在他嘴上一封、颈项上一缚，黄石脸上立即发白。张荣生、李力都说：‘绞死他，今晚抛到南县河中去灭迹。’这时，黄石手指着皮鞋后跟，被邓萍<sup>①</sup>察觉，邓说：‘慢一点。放松一些，等他好出气，跑不了的。’把皮鞋后跟扞开，发现了广东省委的介绍信。大家猛吃一惊，半小时后，他才清醒过来。我说：‘公略，你这是干什么？开这样大的玩笑！’他说：‘你现在当了团长，谁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又说：‘还有黄纯一同志一道来的，在外面伙铺里，请派人接他进来。还有一个贺国中同志，候补党员，不知他今天到了没有，请到伙铺里查明一下。’幸而当即弄清了真象，马上消除了误会，免除了意外的损失。”

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早饭后，黄公略与彭德怀在一团团部门外的柳荫堤上作了一次长谈。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两人都认为蒋介石叛变后的中国局势仍然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独霸中国固不可能，和平瓜分也不可能。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勾结一派军阀，狼狈为奸，扩大势力范围。因此，军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彭德怀向黄公略介绍了一年多来部队中进步力量发展情况，特别是救贫会和秘密士兵会的情况。又谈了为了培植党的力量劝说周磐办随营学校的经过；同时，也分析了周磐同意办随校的野心。黄公略向彭德怀谈了广州起义的意义，国民党镇压这次起义的残暴，他来南县途中所见到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以及党组织派他回湘的打算等，并当即写了一首诗递给彭德怀。

---

<sup>①</sup>以上张荣生、李力、李灿、邓萍均系独立五师一团中的党员。

广暴失败旗帜在，  
树立红军苏维埃。  
旅沪武岳语弃市，  
乌云蔽日只暂时。  
欣谈时局喜春风，  
柳絮飞舞庆重逢。  
锦绣洞庭八百里，  
四江精粹在湖滨①。

彭德怀也写了几句顺口溜给他：

求知心切去黄埔，  
夜梦依依我不然。  
‘马日事变’教训大，  
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  
失败教训是盲动。  
唯有润之工农军，  
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  
利用周磐办随校，  
谨慎争取两年时②。

---

①② 《彭德怀自述》第76页。

黄公略还关心地问了彭德怀最近看了哪些书。以后，他们又商谈了随校的规模、宗旨等，并向周磐汇报，取得了周的同意。

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独立五师随营学校在南县正式成立。在开学典礼上，周磐讲了话，并宣布黄公略为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sup>①</sup>。

开学典礼后，彭德怀约集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三人开了一次有南（县）、华（容）、安（乡）特委代表张匡参加的党的会议，研究了如何通过随校培养、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在两年内以一团为核心举行全师起义的问题。同时，根据特委指示，决定在一团成立团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随校成立分支，受一团党委领导，以黄公略为分支书。

黄公略在随校时间不长，但给学员印象很深。据当年随校学员回忆，黄公略经常在学员中讲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农民运动的特点。他处处以身作则，生活和普通战士一样，很群众化。他对训练抓得很紧，要求很严格。那时，国民党军队中连以上军官一般是不出操的。他不但经常出操，而且亲自喊操。他平时对学员和气，经常找学员谈话，启发阶级觉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回忆他在随校学习情况时说：“我记得公略同志有一次和我谈话时问我：‘你知道地主老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做长工时，有个地主姓刘，外号叫刮皮佬。’公略问为什么叫刮皮佬。我答不出来。他就说：‘意思是剥削厉害，剥削了你还不知道。’”

---

<sup>①</sup>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在随营学校担任的职务，回忆材料中有多种说法，现以《彭德怀自述》中的回忆为准。

这话对我有很大启发，至今记忆犹新。”<sup>①</sup>彭绍辉在黄公略的启发下进步很快，后来由黄公略介绍入了党。

随校第一期共招收一百几十名学员，大部分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军士，如班长、副班长、连队的文书等，也收容了少数在湖南受打击的农民协会会员。在黄公略、贺国中等的熏陶下，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平江起义，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

一九二八年六月，随校第一期尚未结业时，独立五师奉命开往平江，接替阎仲儒旅防务“剿共”。因三团三营营长贪污被撤职，一团九连连长病故。周磐决定：黄公略调任三团三营营长；黄纯一调任九连连长；随校由贺国中负责，移驻岳州。黄公略离开随校时，向学员讲了一次话，中心是革命人生观问题。他用耳闻目睹的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地主压迫的悲惨事实，勉励大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讲得深入浅出，有血有肉，使大家深受感动<sup>②</sup>。

#### (四)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十八日，独立五师除随校外，全师陆续到达平江。彭德怀的一团驻县城及城南，黄公略的三团三营驻离县城六十多里的东乡嘉义镇。

---

<sup>①</sup>彭绍辉：《黄公略是我革命的引路人》，载中共湘乡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党史资料》1984年第9期。

<sup>②</sup>参见姚喆：《在随营学校》，载《星火燎原》（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版。

当时，平江的革命运动自“二月扑城”<sup>①</sup>失败后，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清乡队的反复“清剿”，破坏十分严重，但革命力量并未被完全镇压下去。党的县委还在，平江游击队在胡筠等的领导下仍然活跃于北乡及东、南两乡，并和浏阳游击队相呼应，严重威胁着湖南的反动统治<sup>②</sup>。湖南省清乡督办署饬令独立五师加紧“进剿”，并制定了一个相当严密的彻底“清剿”计划。

针对上述情况，一团党委专门开会讨论研究了如何破坏“清剿”计划，制止清乡团、队烧杀抢掠，减轻人民痛苦的对策。主要有：派人到各营、连报告当地反动统治情况；宣传孙中山扶助工农的政策，保护工农实际利益；发挥秘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加强对部队的纪律教育；在外出“清乡”时，监督反动民团不准他们有任何残民行为等。这时，黄公略初到三团，工作没有基础，团长刘济仁十分反动。他考虑要贯彻团党委破坏“清剿”计划的对策，必须首先取得本营（即三团三营）士兵对自己的信任。因此，他到营就职后，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分给士兵用，（注：当时独立五师已有五个月欠饷未发）借此鼓动士兵。同时，他又深入到士兵中去问寒问暖，“说他们终日劳苦，得不到一点安慰。因此兵士对他便表示欢欣，说我们打了几个月仗，没有分文发给，这营长一到，便拿

---

<sup>①</sup>1928年3月16日（农历2月25日），中共平江县委组织了20余万人的农民队伍，在罗纳川等的指挥下，攻打平江县城，通称“二月扑城”。

<sup>②</sup>参见《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3版第628页。

自己钱给我们，这营长真好。”<sup>①</sup>这样，他在士兵中很快建立了威信。

正当黄公略在三营开展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周磐的马弁陈玉成（原救贫会成员，我党派在师部的秘密情报员）从长沙给彭德怀拍来密电称：黄公略驻防南县时，曾开通行证给南华安特委的同志到长沙买油印机，现特委机关被破获，查出了这张通行证。周磐认出是黄公略的亲笔，已电副师长李慧根（注：当时周磐在长沙，部队由李负责）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三人。与此同时，彭德怀在电报局还截获了周磐给李慧根的电报，大意也是如此。

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彭德怀除扣压了周磐给李慧根的电报外，立即与一团党员和恰在这时到达平江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商量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为做好起义准备工作，起义日期定在七月二十二日；密告黄公略在嘉义率所部同时起义，配合平江城内行动，然后开来平江城内会师；密告贺国中届时率随营学校师生离开岳阳，开来平江参加起义；以李慧根名义发密电给周磐：“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

这时，黄公略在三营一连串的行动已引起反动团长刘济仁的怀疑。七月二十日，黄公略又释放了关押在乡政府的赤卫队员黄耀南（注：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监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此事为在三营当连长的刘济仁的侄儿察悉。黄公略认为事已暴露，不能等待预定起义日期，便提前于

---

<sup>①</sup>潘心源《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  
（1929年7月2日）



二十一日下午以闹饷为名，发动全营<sup>①</sup>士兵哗变，当场杀死了刘济仁的侄儿和另一反动连长，缴获了当地挨户团的三十多条枪，枪毙了挨户团头子。并当即与中共平江第四区（嘉义区）区委书记涂正坤、区委委员李克家取得联系，由他们派人给部队带路取道周方、恩溪、钟洞到平江城与彭德怀部会合。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左右，黄公略率领三团三营的起义部队到达平江城郊。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等已领导第一团官兵于预定时间七月二十二日举行起义取得胜利。贺国中也率随营学校师生及时赶到参加了起义。黄公略恐部队入城发生误会，便叫部队在城北五里处一个叫烟舟田的小镇上休息，自己只身骑马先入城向彭德怀、滕代远汇报。不料他走后不久，这个营在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动下又叛逃了。他闻讯后十分气愤，即要前往追赶，被彭德怀劝阻。当晚，黄公略在团党委会上作了检讨。他沉痛地认识到：武装起义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在部队尚不够巩固的情况下，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决不可轻易脱离部队。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平江城内月池塘召开了有几万人参加的庆祝平江起义胜利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下辖一、四、七三个团，共二千五百余人。黄公略被任命为第四团党代表。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五军委员会，黄公略被选为委员。

接着，红五军军委与平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平江

---

<sup>①</sup>据潘心源1929年7月2日报告中说，参加起义的只有两个连，还有一个连在长寿街北，黄对这连士兵没有把握，没有调来。

东乡的长寿街为中心，力争在最短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三省的边区革命根据地；派黄公略的第四团向平南发展，与浏阳县委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开展工作。第四团出发后，七月二十九日，平江遭到敌六个团的围攻，第四团又被调回参加战斗。但因中途遭敌截击，损失很大，无法回援。这时，第四团已只剩下两百余人<sup>①</sup>。又与主力失去联系，困难很大。但黄公略毫不气馁，带领部队在平江、浏阳边界单独活动达一月之久，终于在黄金洞与军部主力汇合。红五军军委决定撤销第四团番号，改为教导大队，由黄公略担任大队长兼党代表。

八月底，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红五军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推进，途中遇敌人前堵后追，至江西万载县大桥时，又因一个副连长投敌告密，部队遭敌袭击，仓促应战，伤亡很大。只得再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交界的纸坊休整。这时，部队剩下不到一千人，这是红五军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严重关头，黄公略协助彭德怀、滕代远等军的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对混在起义部队中的反动军官进行了审查和清洗；吸收在战斗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使部队得到初步的整顿。在此基础上，军党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团、营番号，改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黄公略任第二大队大队长。整编后，为避开湘、鄂、赣三省敌军的“围剿”，又决定由彭德怀、邓萍率领四个大队向鄂南的武宁、九宫山发展；黄公略率领第二大队在平江、浏阳、万载边境活动；滕代

---

<sup>①</sup>也有说这时第四团只余下五、六十人的。现仍按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载红旗飘飘》第19集）中的说法。

远率领特务连在修水、铜鼓和修、铜、平、浏边境活动。

九月上旬，红五军又集结于黄金洞、台庄一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整顿。九月十七日，滕代远在铜鼓的幽居，召开了平、浏、修、铜、万（载）五个县委<sup>①</sup>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正式恢复和组成了湘鄂赣边特委。十月，红五军军委和特委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五军和工农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sup>②</sup>，每纵队约四百余人。黄公略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同时，鉴于湘、鄂、赣三省敌军正向红五军“会剿”，决定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统一指挥，在平、浏、修、铜、武、万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开辟工作，保卫和发展湘、鄂、赣苏区；四、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向南冲破敌军的包围，设法上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络<sup>③</sup>。

## （五）

一九二八年十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四、五纵队奔赴井冈山后，在敌人向湘鄂赣边区大举“会剿”的日子里，黄公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紧紧依靠边区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领导红五军一、二、三纵队在给养补充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军血战，保卫和扩大了边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敌人四面围攻黄部，妄图一举消灭这部分红军。针

---

①另说是平、浏、修、铜、武（宁）五县。

②另说是混编为三个纵队，下辖大队，大队共有十一个。

③另说是彭德怀、滕代远率五个大队上井冈山，黄公略临时指挥包括二纵队在内的共六个大队坚持湘鄂赣边区斗争。

对这种情况，黄公略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二纵队的四、七、九中队散布在万载农村；一、二、三、五、六中队散布在浏阳农村；一、三纵队分散在平江、武宁、修水、铜鼓等地，帮助群众开展“五抗”（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斗争，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隐蔽的活动，有计划地打击敌人和保存部队的实力<sup>①</sup>。那时，部队经常在积雪的山中行走，黄公略有时要部队倒穿着鞋子走，留下相反的脚印；有时要最后一名士兵背着扫把扫除脚印，使追击的敌人摸不清方向，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追捕。部队的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没有饭吃，便以红薯丝、草根充饥；夜间多半是在山林里露宿，冬天缺少御寒的棉衣，黄公略与战士同甘共苦，毫不特殊。他除了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机会对部队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外，还经常到各纵队巡视，轮流在各纵队集中一段时间抓训练工作。他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纪律，借物必还，有损必赔，一定要搞好和群众的关系，积极支援群众的斗争。在他领导下，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部队的斗争热情仍不断地得到加强与提高。

一九二九年春，蒋桂矛盾日趋尖锐，敌人一部分驻军被调走，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黄公略便迅速地将一、二、三纵队集零为整，狠狠打击地主豪绅和反动军队。从一九二九年一月起，二纵队在黄公略的直接指挥下，在浏阳先后发动了毛田暴动、鲁家湾暴动、老乌墩暴动和金坑暴动，消灭了这些地方的挨户团和反动驻军。二月中旬，有一排敌军向红军投

---

<sup>①</sup>参见《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47页。

诚。三月二十四日，黄公略派人探听到永和市反动联防头子自恃人多枪好，防备不严，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配合浏阳第二区赤卫队一千五百余人，趁夜深天黑，三路包围永和市，突然发起进攻，结果，打死打伤敌人九十多名，缴获枪支一百一十多枝，子弹三十八担和许多其它军用物件<sup>①</sup>。在此之前，还消灭了白沙、大胜等地的挨户团，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一、三纵队在其它地方也取得了不少胜利。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边区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边区各项工作迅速顺利开展，出现了全面复兴之势。潘心源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写的《“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对这一形势做了如下概述：“彭、黄兵变虽遭到了很大损失，但对于平浏的工农群众斗争，确有大大的发展。浏阳自黄公略带两百枪来以后，东乡造成全乡的赤色恐怖，南北乡受到很大影响，东乡并建立了两个区苏维埃。平江游击队增加四倍以上的枪支，斗争的发展普遍到全县，建立了十几个区苏维埃组织。斗争的发展已波及到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各县。”面对这种形势，反动派惊惶失措。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黄公略，赏金不断升级，由一万元、五万元增到十万元。何健还曾两次派人到湘乡挖黄公略的祖坟，把黄公略祖父、父亲的尸骨带到长沙，丢进湘江。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东乡八区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和旁听代表共四十七人。黄公略作为红五军的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新的形势要求，决定统一边区赤色武装组织，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由

---

<sup>①</sup>参见《浏阳革命斗争史》1959年5月第四次稿。

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会议还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和边区的形势，通过了边区特委的任务与前途及目前工作计划等各项决议案，并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将湘鄂赣边特委改为湘鄂赣边境特委，选举了特委委员和候补委员，黄公略被选为特委委员和特委常委<sup>①</sup>。

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后不久，边区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湘、鄂、赣三省反动派又调集了近五个团的兵力，联合平、浏、修、铜、万、萍、醴七县的反动地方武装（称为“七县联防”）向边区再次发动猖狂进攻。面对优势敌人，黄公略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出、彼合我散、彼散我合和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战术，积极打击敌人，在浏阳的官渡、万载的高村、大桥、黄茅等地，缴获了敌人步枪八十多枝，子弹数担，挫败了敌人的凶焰。在这期间，黄公略还曾总结了如何避实就虚的游击战的经验，写成了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彭绍辉、何长工等都看到过<sup>②</sup>，可惜已找不到了。

正当边区军民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彭德怀率领四、五纵队回到了边区。他们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从永新出发，经莲花、萍乡，十三日到达万载，开始同“会剿”军作战。八月十四日，一举攻克万载县城，取得了返回边区的第一个胜利，使边区开始摆脱困境。接着，又向万载、铜鼓边境游击，八月底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战友重逢，分外高兴。黄公略向彭德怀和五军党委汇报

---

<sup>①</sup>参见《湘鄂赣苏区史稿》第51~53页。

<sup>②</sup>见1977年11月8日访问彭绍辉，同年12月6日访问何长工的谈话记录。

了四、五纵队去井冈山后边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对四、五纵队重返边区表示由衷喜悦。彭德怀赞扬了一年来的边区工作的进步，特别是对盲动主义有所克服表示赞赏。同时，又向黄公略介绍了湘赣边区和红四军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和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使黄公略深受启发。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两部合编，取消湘鄂赣边境支队建制，仍称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下属三个纵队，全军共三千余人。合编后，士气大振。十月一日，一举攻克了平江长寿街。接着，从十月到十一月，部队又与敌作战十余次，无役不胜，大大鼓舞了边区人民恢复和巩固苏区的信心。

十一月底，彭德怀、黄公略等率领一、三纵队开始向南游击。十二月中旬，到达湘赣边区的永新、遂川一带。这时，红四军尚远在闽粤赣边。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拟将赣西南的独立二、四团及延福、富田纵队等地方部队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他们向红五军提出要求派黄公略当军长。红五军党委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从此，黄公略离开了红五军，开始为创建又一支新的工农红军而努力。

## (六)

红六军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下辖三个纵队，全军约三千人。“成立之初，干部异常缺乏，成分亦极复杂，在战斗员中，农民意识、地方观念、游击主义的习气都是很浓厚的。”<sup>①</sup>

---

<sup>①</sup>引自李光《黄公略同志传》，载《湖南革命烈士传》，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1年版。

“当时，红六军的政治委员陈毅、政治部主任毛泽覃都没有到职。黄公略既是军长，又是军委书记；既抓军事，又抓政治”<sup>①</sup>，为培育这支人民军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进步很快，不到一年，红六军就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部队。

红六军成立不久，攻占了吉水县城。二月三日，在吉安富田、东固一带与由闽再度返赣的红四军会合。二月二十四日，又配合红四军在吉水的水南、吉安的值夏、赤家山一带全歼敌金汉鼎部精锐唐云山独立十五旅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二千余枝。此后，黄公略即根据总前委<sup>②</sup>“以三个月为期限分路游击”<sup>③</sup>的决定，将红六军分布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这期间，红六军根据赣西南特委的指示，还参加过几次攻打吉安的战斗。在游击战争中，他十分注意教育部队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群众纪律。他自己和群众关系十分亲密，每到宿营地就找群众开座谈会、个别谈心，了解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困难。群众对他非常爱护，经常给他送东西，如鸡、鸡蛋之类，但他都坚决拒收<sup>④</sup>。为了使群众了解红六军的宗旨、政策和号召群众起来斗争，他还用自己和政治委员陈毅的名义发布

---

①引自杜平《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据查，红六军政治委员开始由赣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兼任，“二·七”会议时，才决定由陈毅担任。

②总前委是一九三〇年“二·七”会议时改组红四军前委而成立的四、五、六军和赣西南、湘赣边、闽西等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黄公略参加了“二·七”会议，被选为总前委委员和候补常委。

③1930年3月18日《前委通告》（第3号）。

④参见高书官《回忆我在黄军长身边》，载中共湘乡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党史资料》1984年第9期。



了一份六言体的红六军司令部布告。原文如下：

### 红军第六军司令部布告

反动国民逆党	代表地主豪绅
摧残革命团体	屠杀工农士兵
勾结帝国主义	敢向苏联挑衅
为着争权夺利	制造军阀战争
增加苛捐杂税	民众痛苦日深
当此严重时期	本军应运而兴
接受共产指导	努力民权革命
实行武装游击	肃清地主豪绅
彻底分配土地	给予贫苦农民
工人减时加资	保护商人邮政
废除苛捐杂税	统一累进税金
打倒帝国主义	没收洋商资本
推翻反动统治	实现工农专政
至于白军靖匪	准其悔过投诚
所过秋毫无犯	纪律特别严明
望我工农群众	一致向敌进攻
特此剴切布告	望各一体凛遵

军 长 黄公略

政治委员 陈·毅

公历一九三〇年 月 日①

①影印件见中共湘乡县委宣传部编：《黄公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这份布告在赣西南地区曾产生很大影响，至今有些老人记忆犹新。红六军在为期三个月的分路游击中，不仅为推动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中央苏区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锻炼。一九三〇年七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就用“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词句，对黄公略及其所率领的部队作了很高的赞誉。

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黄公略仍任军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并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从此，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作战，屡建战功。一九三〇年八月奇袭文家市时，黄公略指挥红三军一、三纵队首先从文家市后山发起进攻，迅速占领了高升岭、棺材岭等制高点，但在一纵队向下猛冲时，遭敌顽抗，未能奏效，一纵队司令员柯武东不幸阵亡。这时，黄公略毫不迟疑，立即与三纵队司令员徐彦刚亲率一、三纵队再次发起冲锋，终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歼敌三个团又一个营，取得红一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捷<sup>①</sup>。以后在占醴陵、攻吉安等战役中，红三军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被人们并称为“朱、毛、彭、黄”。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时，由于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影响，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坚持打南昌的错误主张，反对毛泽东“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当时有的人由

---

<sup>①</sup>参见杜平：《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

于对富田肃反问题有意见，不顾大局，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进行挑拨离间。在这大敌当前，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黄公略与朱德、彭德怀于十二月十八日联名发表公开信，明确指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的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并郑重宣告：“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sup>①</sup>旗帜鲜明的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和一方面军的团结。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红三军在有名的龙岗战役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当时，部队初次执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进入阵地后等了很久，仍不见敌人，战士们求战心切，但黄公略沉着镇静。当赤卫队向他报告张辉瓒部已进龙岗时，他还是赶到阵地前沿亲自观察，最后才下攻击命令。战斗打响后，他又坚决、果断，不顾敌人的顽抗，指挥部队迅速冲入敌阵，生俘了敌张辉瓒警卫营全部官兵，为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张辉瓒立下了汗马功劳。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坐卧不宁。他为了破坏红军内部团结，瓦解红军将领斗志，曾千方百计地妄图“策反”黄公略。他先令何健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到长沙，然后在报纸上大造所谓“黄公略既将

---

<sup>①</sup>见1930年12月18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的公开信。

母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sup>①</sup>的舆论，借以混淆视听，进行要挟。同时，他又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并派黄公略的长兄黄梅庄为参议，携带银洋一千五百元和蒋及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苏区，劝诱黄公略“归正”。蒋介石自以为这样双管齐下，必有所成。谁知黄梅庄一入苏区，即为我红三军扣押。当方面军总部写信向黄公略征求他对其兄的处理意见时，黄公略不顾母亲、妻子尚在敌手，在复信中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刀两断，义无反顾。”<sup>②</sup>他的这一大义灭亲的坚定立场，不仅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而且大大激励了全军指战员革命到底的决心。

此后，红三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独当一面，在东固通中洞南侧山上，秘密设伏，居高临下，如“飞将军自重霄入”，一举包围敌二十八师师部，捣毁了敌人的指挥机关，为五战五捷首开胜局。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次战良村，再战黄陂，三战三捷；特别是在独战老营盘的战斗中，更表现了红三军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当时，黄公略亲自在前沿阵地上指挥七、九两师作战，九师师长考虑他的安全，将二十七团放在军部附近，留作预备队。战斗打响后，黄公略根据敌情变化，提出必须速战速决，争取一小时内歼灭敌人，便断然命令二十七团团长说：预备队不要了，先打敌人为主，动作要快，要坚决，向敌猛攻。结果一个

---

①见1931年3月24日《湖南国民日报》第7版《彭德怀黄公略赶快率部来归》。

②参见陈奇涵：《我和黄公略同志相处的日子》，载中共湘乡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党史资料》1984年第9期。并参见1977年9月29日访问黄春生谈话记录。当时黄春生曾随黄梅庄进入苏区。

小时内全歼了敌九师一个旅<sup>①</sup>。

一九三一年九月，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后，红三军奉命由西向东移往瑞金、石城、于都、宁都地区，以便消灭江西革命根据地内残存的白色据点和“土围子”，使根据地完全打成一片。九月十五日，当部队行军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黄公略和先头部队本来已经隐蔽。后来一个参谋向他报告说七师部队还在路上行进。他即跳出隐蔽体，指挥部队隐蔽和对空射击。敌机低空盘旋，疯狂扫射。黄公略不幸身中数弹，其中一颗打在他的腹部，因伤势过重，流血太多，抢救无效，于当晚七时许牺牲。临终前，他留给战友的遗言是：“一、二、三次反围剿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绝不可骄傲轻敌，应当充分准备，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sup>②</sup>

黄公略牺牲的噩耗传开，革命根据地军民同声悲恸。为了纪念黄公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了“公略亭”，将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了“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召开了追悼黄公略的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的挽联上写道：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  
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

①李聚奎：《忆黄公略同志》，载中共湘乡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党史资料》1984年第9期。

②参见杜平：《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李聚奎：《回忆黄公略同志》。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  
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sup>①</sup>。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黄公略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附记：中共湘乡县委宣传部一九七七年即开始收集黄公略的事迹。派人先后访问过黄公略生前的战友彭绍辉、陈奇涵、何长工、江渭清、李聚奎、郭化若、杜平、姚喆、杨世明、高书官等老同志及黄公略的亲属戚友共三十七人（其中部分访问记录已在中共湘乡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的《党史资料》1984年第9期《纪念黄公略同志专辑》上发表）。同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军事科学院、江西省革命历史展览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江西吉安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吉安县东固第二次反“围剿”纪念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室、中共平江县委、嘉义区委、湘乡县桂花公社党委等处，查阅了有关的档案材料。本文是在研究了上述所得到的材料，又查阅了大量其它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特此说明，并向中共湘乡县委宣传部致谢。

---

<sup>①</sup>见吉水县革命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红潮》（第一辑）1960年4月1日。

# 吉 国 桢

张守宪 董建中 王少民

吉国桢是我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为发展壮大陕西、河南地区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领导工农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一九三二年夏在河南开封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 (一)

吉国桢，又名凤洲，字干卿。一八九九年生于陕西省华县西北乡小张南吉家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父亲吉生贵一生务农，在吉国桢七岁那年因病去世。此后，家庭经济逐渐破落。

吉国桢九岁入私塾，一九一六年入华县教育会附设的高等小学。一九二〇年春，他考入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在进步教师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人的影响下，逐步接受新思想，同潘自力、苏士杰等同学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读书、讲演、演新剧以及体育等活动。

一九二四年春，吉国桢、潘自力带领同学同侵吞公款、欺压学生的华县劝学所长进行说理斗争。校长多方阻挠，并以开

除学籍相威胁。吉国桢、潘自力等在王懋廷老师的支持下，同校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带领同班二十多人愤然离开成林中学，前往北京求学。

吉国桢到京后，加入了旅京陕西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他一面参加共进社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一面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

同年夏，吉国桢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是年秋，经关中学介绍，吉国桢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二月，他为《共进》半月刊撰写了《警告吾陕名流》一文，历数军阀吴佩孚、刘镇华、吴新田的祸陕罪行，指出：“刘贼多在吾陕一日，吾民则必更痛苦一日”；揭露陕西政客郭毓章、宋联奎之流阻止陕西人民和陕军驱逐刘镇华的阴谋；呼吁陕西人民“急应猛醒，不要受骗”，要“瞅定我们的朋友，认清我们的敌人，刘氏等固在驱逐之列，所谓吾陕名流，我们当然也要同样反对，最低的限度，也要叫他们归里养痍。”<sup>①</sup>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吉国桢积极投入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白天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晚上深入到纱厂向工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工人、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呼吁工人群众要坚持罢工斗争，还帮助工人组织夜校，给工人讲解革命道理。

同年夏，吉国桢同何尚志、曹趾仁、关中学、党伯弧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大学陕西同学会，创办了《新群》半月刊，热情

---

<sup>①</sup> 《共进》第76期，1925年2月16日出版。



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孙传芳的罪行。

一九二六年夏，吉国桢和张仲实、王友直等数十人，被党团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年秋，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批准，吉国桢转为中共正式党员<sup>①</sup>。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吉国桢于一九二九年春奉命回国，到陕西工作。同年夏，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召开会议，学习中共“六大”文件，讨论如何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等问题。吉国桢参加了会议，并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苏联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九月，又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

## (二)

吉国桢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后，以省立六中教员的公开身分，开展革命活动。他召开陕北特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根据省委指示和陕北的实际情况，提出继续壮大党团组织，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为了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主持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为陕北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随后，他和特委选派的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相继进入甘肃、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以及王子元部，协助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为了争取陕北的地方武装，特委又先后派十余名党员去驻守在宜川、延长交界处的后九殿山寨的杨庚武部，建立党组

---

<sup>①</sup>张仲实、方仲如、王友直等人的回忆。

织，准备创建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旬，吉国桢召开特委常委会议，讨论纪念广州暴动二周年的活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公开发宣言和通告，并署名中共陕北特委，以便鼓舞士气；吉国桢则认为榆林白色恐怖严重，城内地域狭小，敌人驻军控制很严，如公开用特委名义，敌人一定特别注意，可能使党团组织遭到不应有的破坏。他强调革命斗争要讲求策略，主张以“广暴”纪念会的名义秘密发宣言和通告。这个意见和由他起草的宣言及通告，常委们一致拥护，使这次纪念活动起到了宣传革命，鼓动群众斗争的积极作用。

一九三〇年初，陕北特委迁到绥德。吉国桢、苏士杰（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领导特委工作。刘澜涛、常应黎（现名常黎夫）这时也到绥师，以职员作掩护，参加特委的领导工作。

吉国桢在绥师利用上公民课的机会，讲授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近代史和马列主义常识。特别是他对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广州起义、毛泽东与朱德领导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的生动讲述，引起了学生的很大兴趣，使他们深受启发和教育。吉国桢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待人诚挚忠厚，对学生关怀备至，深受学生钦佩。

吉国桢还经常具体指导绥师特别支部（书记白如冰）的工作。他指示特支把师生中的党团员分别编组，实行单线联系；对校内外斗争要注意策略，不能盲动；要开展适合学校特点的小型多样的活动，使绥师在政治上成为陕北的红色基地。当时，绥师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全校三百多名师生中就有七八十名党团员。他们利用革命节日在校内举行小型纪念活动，如

报告会、座谈会；在绥德县城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吸收贫苦的中青年参加学习，由党团员轮流去讲课，宣传革命思想；假期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作调查，发动农民，在陕北各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与此同时，吉国桢指导绥德县委发动打蛋厂的工人向厂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厂主被迫答应增加工资。这对整个陕北的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在吉国桢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至一九三〇年夏，陕北党团组织遍及十余县，党团员共达二千余人。在陕、甘、宁边界驻军苏雨生、三子元部，榆林井岳秀部高志清旅，都建立了党的秘密军委或支部，党团员发展到百余名。这些党员按照特委的指示，大力做争取士兵群众和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

正当陕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于一九三〇年春末，到陕北巡视工作。他以“左”的面目出现，全盘否定以吉国桢为首的陕北特委的工作成绩，武断地指责吉国桢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吉国桢对杜衡的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你就会给人扣大帽子！你好好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作些调查研究再批评人吧！”<sup>①</sup>杜衡独断专行，利用职权主持特委扩大会议，指责吉国桢和陕北特委“以往工作路线还拘泥于机会主义路线之中”。他不顾主客观条件，提出了难以实现的十二项任务作为陕北党组织的目前工作去完成。吉国桢受到打击后，仍以党的事业为重，继续努力工作，在“红五月”里，积极组织绥德的学生集会，纪念“五一”、“五四”、“五卅”，请进步教员发表反

---

<sup>①</sup>张文华的回忆（1980年12月5日）。

帝爱国的演说，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

### (三)

一九三〇年六月，吉国桢奉省委电召回西安。七月上旬省委在蓝田县巩高村小学召开扩大会议，他当选为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并参加省委组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八月，吉国桢作为省委代表去蓝田草坪，指导共青团陕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努力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后，吉国桢深入西安广仁医院调查研究，组织该院职工举行反对院方残酷剥削职工的罢工斗争。这所医院属英帝国主义经办，每次看病，挂号费就要两元，而护士每人每月工资只有一至五元，一天工作时间却长达十六小时之多。一九三〇年九月初，英籍院长李安国侵吞医院经费，经理侯翔虚与其狼狈为奸，使职工生活更加困难，激起了职工群众的强烈不满。九月三日，吉国桢指导该院党支部组织罢工委员会，下设宣传队、纠察队和侦探队，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工友”、“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和“增加月薪十二元”、“改良伙食”等要求，并张贴标语，举行记者招待会，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吉国桢还动员印刷局的工人和几所中学的党团员组织工人与学生进行声援。斗争坚持了几天。后由于院方帝国主义分子与反动当局勾结，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迫使职工复工。

吉国桢继而又发动省印刷局工厂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提出“要面吃”、“要欠薪”、“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工头剥削工人”等口号。他指导党员通过办工厂小报进行宣传鼓

动，组织全厂职工起来斗争，迫使厂主很快答应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九月十六日，是冯玉祥五原誓师的纪念日。冯的部下、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捞取政治资本，收买军心，借口追悼阵亡将士进行募款，以搜刮民财；还强令西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放假三天，满城张灯结彩，在革命公园演戏三天。为揭露敌人的欺骗，吉国桢根据省委的决定，主持起草了《告民众书》作为传单散发。《告民众书》指出陕西工农兵的痛苦完全是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造成的；“九一六”纪念活动是军阀搞的骗局；群众欲求自己生活的根本改善，只有斗争，工人组织政治罢工，农民和士兵起来暴动，彻底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

十月上旬，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的特务侦破，吉国桢和二十多名省、市委领导同志、基层党团干部被敌人逮捕。吉国桢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十一月底，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混战结束，冯部失败，驻守西安等地的冯军出走，杨虎城率部入陕，陕军甄寿珊、姚振乾部进入西安。吉国桢和狱中三十多名党团干部利用敌军之间的矛盾和混乱，互相砸断手铐脚镣，机智勇敢地破狱而出。

吉国桢出狱后，省委书记杜衡和省委常委王芾南奉令去北方局参加扩大会议，省委决定由吉国桢负责组织临时常委（吉任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这时省委处境相当困难，工作人员靠借贷度日；机关只有一个秘书处，省委常委、军委和西安市委的干部既无处寄身，也无开会之地。加上从监狱出来的党员和在外地不能立足而到西安的党员干部共三十人之多，都向省委要饭吃，要住处，要工作；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派侦探通缉和拘寻这批党员干部。临时常委自顾不暇，还必须照顾这些

党员的生活并给以教育<sup>①</sup>。但吉国桢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迎难而上。他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分析形势，制定工作计划，提出继续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迅速恢复一些被打散的党组织，把从监狱出来的党员和在外地站不住脚来到西安的党员干部分别编成十个小组，直属临时常委领导；对表现特别好的党员编一特别小组，经过训练，派往中心区域工作；对有叛党行为的党员干部，查清事实后开除党籍。会议通过了由吉国桢起草的《今后一个月的工作计划》。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吉国桢主持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并亲自讲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工作方法等课。经过短期培训，将他们派往关中各地工作，在分配工作前，吉国桢和党员一一进行谈话，考查他们的学习成绩，勉励他们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

吉国桢和省委还先后派了十多名有经验的党员干部打入杨虎城部，同我党在该部的地下组织（军支）接通关系，分别在杨的警卫团、宪兵营、炮兵营及西路地方武装中从事兵运工作，教育和争取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站到革命方面来，扩大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吉国桢在巡视蓝田县的工作时，指示县委要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反苛捐杂税、反豪绅行团<sup>②</sup>和反对军阀的斗争，对豪绅操纵的行团和红枪会要派得力的党员干部利用社会关系打进去，争取群众，逐渐夺取领导。在吉国桢和蓝田县委的领导下，该县南区的党员发动和组织了一千多名群众，赶走了豪绅王老九的行团和唐靖的土匪武装，处决了一批反动的团丁和惯匪，迫

---

<sup>①</sup>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sup>②</sup>行团是农村豪绅地主组织和掌握的反动武装。

使王老九不敢再到南区向群众敲榨勒索。

同年十二月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吉国桢在会上报告了临时常委会一个月来的工作情况。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讨论通过了《陕西年关斗争计划》，布置了职工运动、互济会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吉国桢继续当选为省委常委，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会后，他和西安市委负责人一起组织和发动了省印刷局、西安日报社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工人的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一九三一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罗章龙等则在党内拉了一部分人成立“力争紧急会议筹备会”，反对四中全会的中央。消息传到陕西省委，引起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在省委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为此争论不休，有拥护王明的，也有拥护罗章龙的。吉国桢认为在没有搞清重大是非前，不能轻易表示态度，建议省委派代表去河北省委（代行北方局的职权）和党中央详细了解情况后再决定省委的态度。会议接受了吉国桢的建议，并决定派他作为省委的代表执行这一任务。

二月中旬，吉国桢辗转到天津和上海，向河北省委和党中央汇报了陕西省委的情况。四月二十日，他给党中央写了一份长达四万余字的报告，指出：“在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加工制造的浩大灾害之下，致使政治经济空前的危机，农村破产，城市萧条，群众生活恶化达于极点。”<sup>①</sup>在谈到省委一年多来的

---

<sup>①</sup>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20日）。

工作成绩和错误，经验与教训时，他指出：由于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使党的组织削弱，日常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他提出要“在斗争中和实际工作中肃清消沉不动的分子出党，吸收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入党。以根本的改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希望党中央“打破万难，给陕西党经济上以必要的接济和工作人员的迅速调动和补助，尤其是政治认识很好，工作经验丰富，能形成政治领导的中心的书记必须马上来陕工作。”<sup>①</sup>由于报告是在上海期间与党中央负责人谈话后写的，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的一些影响，错误地提出陕西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sup>②</sup>。

#### （四）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吉国桢被党中央派赴河南任省委书记。此时河南党组织由于受立三错误的影响，“各地党的工作概多塌台、削弱，除孝义兵工厂支部能自动的工作外，其他没有一个能以真正自动工作的支部与地方党部，党团还多没有划分，党与群众的组织极其混淆不清。省委以及各地的工作概是虚浮，不实际。”<sup>③</sup>加以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给革命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吉国桢同省委军委书记袁明阶、省委组织部长老曹等中央委派的干部到开封后，立即找原省委领导成员交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吉国桢主持召开了省委会

---

①②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20日）。

③《河南省委（给中央）报告》（1931年5月2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议，通过讨论决定加强巡视工作、整顿各地的党团组织。会后，吉国桢和省委加强了对匪运工作的领导，派党员打入宜阳的土匪部队，成立军支，做争取士兵群众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准备逐渐将这支二千余人的土匪部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同时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打富济贫，准备夺取豪绅的武装。

为了培养干部和加强兵运工作，吉国桢亲自主持开办了两期党员活动训练班和兵运训练班，向学员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斗争策略和国内外形势；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地整顿党团组织或开展兵运工作。吉国桢还指导省委宣传和组织部门先后出版了《中州时事》、《中州新闻》、《群众周刊》、《党的建设》、《我们的生活》等刊物，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宣传红军作战的胜利及各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

一九三二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为了支援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河南各级党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战争，特别指示许昌中心县委要组织与领导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在此前后，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所领导的信阳特委和豫西南特委划归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在信阳设立了交通站，动员数千名农民参加红军，发动各界群众募捐支援红军，不断向苏区运送医药、被服等急需物资，并组织农民到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省委还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豫南、豫中建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同时派出不少党员干部，到国民党驻豫西的刘镇华部和驻淮阳、开封等地的军官教

导团以及任应歧部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动士兵哗变。这些工作，都牵制了敌人，援助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冬，吉国桢终因多年的劳累而病倒，一度半身瘫痪，卧床不起。经过治疗，病情稍愈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斗争。

经过吉国桢和他的战友们一年多的辛勤工作，被敌人破坏而削弱了的河南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二千三百多人，遍布全省九十多个市、县，成立了开封、郑州两个市委，豫南和豫北两个特委，许昌、洛阳、南阳等五个中心县委，临颖、舞阳、西平等三个县委，孝义、淮阳、鹿邑和军事学校等二十多个特别支部。

吉国桢在河南省委工作期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为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及其巡视员，曾多次指责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对全省工作的领导，严重的落在机会主义泥坑，对于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执行完全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sup>①</sup>吉国桢在受到错误的批评后，仍然努力为党工作，照常向中央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自己认为确实错了的地方，也能勇于自我批评。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吉国桢和团省委书记王伯阳作为河南省委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六月下旬，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及《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会议

---

<sup>①</sup>《河南巡视报告》第1—4号（1932年3月22—5月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一结束，吉国桢等立即返回郑州，先后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和省委扩大会议，并指导郑州市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创建河南的新苏区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初步制定了计划，拟通过发动农民暴动和组织国民党军队哗变以及改造土匪武装来创建新的红军，把工作重点放在豫南和豫中，以便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和取得红四方面军的援助。省常委会议还决定加强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和宣传工作，以配合新苏区的创建。与此同时，吉国桢还领导出版了《火力》刊物，发表反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河南新红军新苏区告工农书，出了“拥红创苏”特刊<sup>①</sup>。

一九三二年七月下旬，由于叛徒张俊等人的告密，吉国桢和省委秘书长杨斯萍、团省委书记王伯阳等二十多名党团干部在郑州被捕。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刘峙急令押送开封审问。敌人满以为可以从吉国桢等口中得到共产党的重要机密，对他们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是，吉国桢（化名周国荣）宁死不屈，使敌人未能得到任何口供。刘峙恼羞成怒，遂下令将吉国桢、杨斯萍、王伯阳等十四名党团干部在八月二十日晨五时，秘密杀害于开封郊区<sup>②</sup>。临刑前，吉国桢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怒斥敌人的反动行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

---

<sup>①</sup>《河南省委给中央信》（1932年7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sup>②</sup>1932年8月21日《河南民报》。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共进》（1925年）。
2. 吉国桢：《今后一个月的工作计划》（1930年11月）。
3. 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4. 《河南省委（给中央）报告》（1931年5月28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5. 《河南报告》（1931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6. 《河南省委关于兵运问题给中央报告》（1931年11月18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7. 《河南巡视报告》（1932年3月—5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8. 《中央给河南省委信》（1932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9. 《老吉同志关于河南的组织问题给中央报告》（1932年5月10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10. 《河南省委给中央报告》（1932年5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11. 《河南省委给中央信》（1932年7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12. 《六大以来》（上）。
13. 《中央给河南省委指示信》（1932年7月31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14. 《河南民报》（1932年8月）。
15.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给国民政府的报告（1932年8月30日）及其附件，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件。
16. 《振亚关于河南工作报告》（1932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17. 《河南省委关于全省组织情形给中央报告》（1932年11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18. 《河南豫中（许昌）县委报告》（1932年12月10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1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20. 访问刘澜涛、马文瑞、高克林、白如冰、常黎夫、张仲实、方仲如、赵伯平、吴志渊、刘晋、李实、王曙、李亦然、肖璋、陈云樵、关中哲、杜松寿、王立人、杨慰祖、王超北、张文华、曹志麟、艾志清、张字六、冯润璋、党伯弧、马文彦、王蒂南、刘依仁、赵和民、张剑石、顾洲三、史卓生、吉炳辰、吉海棠、吉信棠、吉正学、赵西娃等同志记录。

# 曹大骏

陆泉生 曹茂铨

曹大骏，化名曹易亭，湖北阳新县人，一九〇二年四月生。一九二四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阳新县委组织部长、中央巡视员、鄂豫皖边特委执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二年十月因作战牺牲，年仅三十岁。

## (一)

曹大骏的父亲曹尊荣，是一位塾师，住在阳新县龙山镇的叶家庄，为人正直，清贫自守；母亲石秧娣，勤劳贤淑。曹大骏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四弟曹井、五弟曹乡，都先后为革命献身。妻子吕相珠，因从事革命活动，在怀孕期间，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一九一〇年，曹大骏八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一九一六年考进柳林高等学堂。他爱好体育，文章也写得好，老师曹松舟先生曾称赞他是“可造之英”。曹大骏少年时，即常被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洪秀全等民族英雄的业绩所吸引。一九二〇年，他从龙山镇来到武汉，入武昌启黄中学读书。一九二三年，又就读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武昌中山大学）。

在此期间，他是《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的热心读者，还积极参加火炬社、青年读书社等进步团体的活动，经常为一些报刊写稿。在武汉读书期间，他结识了肖楚女、恽代英等革命青年，直接得到他们的教育和帮助，并于一九二四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二四年春，曹大骏与罗伟、刘海山等同学回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应用恽代英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的经验，联络知识青年，创办了龙山文化促进社（简称龙山书社），这是阳新县第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社团。最早参加书社的社员，还有罗冠国、曹玉阶、曹汝实、曹钦明、曹祥奉、石观于、石庆宗等人。龙山书社向青年提出“别除陈腐读新书，走出学堂闹革命”的口号，并制订了《书社的组织条例》、《书社的任务》以及拟订出版会刊——《龙山文化》的计划等。他和罗伟还介绍刘海山、罗冠国、曹汝实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带领书社社员深入龙山、福寿两镇农村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反对吸食鸦片、废除苛捐杂税和减少田租的斗争，为阳新工农运动的兴起播下了火种。至今，在叶家庄的一处凉亭上，还留有当年书社设置的“广告栏”的旧迹。

一九二五年初夏，曹大骏同罗伟等，又在武昌抚院街的阳新学舍，发起成立青年文化促进会，有二十余人参加，大都是阳新在武汉求学的进步学生。他们经常聚会，读书读报，开专题研讨会，评论时政，探讨改革社会良策，讨论青年的理想、道路和怎样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年夏，曹大骏在回乡期间，又陆续发展了刘怀玉、刘永满、刘会容、刘其祥等人入党，建立了阳新早期的党支部——中共刘宣垆支部。接着，

他又到金海镇的李贵塆、大塘等地农村，以走亲访友为名，发动和建立了阳新第一个秘密农民协会，会长是曹雪修，为党领导的阳新农民运动作了初步的实践。

一九二六年春末，曹大骏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夏初，他参加了由陈潭秋等秘密举办的迎接北伐军宣传训练班的学习。年轻的曹大骏身材高大，血气方刚，工作、学习有股虎劲，什么都不怕，人们都喊他“曹大炮”。有一天，陈潭秋到曹大骏寄寓的安仁学舍检查学习情况，发现曹大骏的讲义没有收藏好。上课时，陈潭秋批评曹大骏说：“大骏的长处是大胆猛干，短处是有勇少谋而粗心大意。长此下去，将给我们革命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希望大骏和大家都仔细想一想。”“这讲义要是被敌探拿去了，我们今日还能在这里上课吗？大骏应作出深刻的检讨，避免今后以小失大，犯大的错误。”<sup>①</sup>曹大骏诚恳地接受了陈潭秋批评，并经常以此鞭策自己。

为适应北伐军胜利进抵湖南岳州的形势，宣传训练班只办了个把月便告结束。曹大骏同侯亚英受陈潭秋的派遣，前往阳新、大冶、通山、咸宁、崇阳、通城等县，做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下旬，曹大骏到阳新后，为了加强党对“迎军工作”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同罗伟、柯松涛、曹玉阶等筹组党的阳新县委，后经省委批准，县委于八月正式成立。曹大骏任组织部长（书记罗伟，宣传部长柯松涛）。在县委的领导下，阳新人民群众的迎军准备工作积极开展起来。

---

<sup>①</sup>侯亚英：《陈潭秋同志在北伐宣传训练班》，载《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79年版。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李宗仁率北伐军第七军攻占了大冶、阳新、武穴等地。在北伐军的支持下，曹大骏等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阳新县党部，曹大骏当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任军事部长，还负责工人运动和全县的联络工作。不久，各地区党部和工会、农会相继建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龙山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公开镇压了“吃人不吐骨头”的“七老虎”石敬宜。工人开展了痛打“十三行”（指十三家大地主商行）、“三庙”（指城隍庙、华光庙、东岳庙）、“三堂”（指天主堂、福音堂、慈善堂）的斗争，使土豪劣绅、官僚地主及在阳新的帝国主义分子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阳新县总工会成立，曹大骏当选为县总工会委员长。十二月二十五日，曹大骏等组织和领导阳新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二万余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示威游行，充分显示了工农民众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引起了阳新反动势力的极端仇恨。商会会长朱仲忻对县长张鹏翊说：“阳新有我朱仲忻在，就决不会有曹大骏的立足之地。”他公开叫嚣：“非要捉到曹大骏不可”。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清晨，朱仲忻暗中勾结阮星明、伍修举带领百余匪徒，手持凶器，抓走成子英、石树荣等九位同志，用尽酷刑，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曹大骏等领导人的下落。但是敌人枉费了心机，没有从这九位同志口中得到一个字。对此敌人恼羞成怒，兽性大发，凶残地剥去九位同志的衣服，包上棉絮，淋上煤油，架上劈柴，活活烧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阳新“二·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后，朱仲忻企图嫁祸与人，置曹大骏于死地。他们一方面威胁群众，要“父戒其子，兄戒其弟，妻戒其夫”，“只准说是共产党闹事，烧死了九个和尚。不准说是烧死了九个共产党。谁要将真情透露出去，格杀勿论”；另一方面，他们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电告武昌第八军和总佛教会，说什么共产党人曹大骏、曹庆云等，连日劈毁神像，夺取庙产，强奸尼僧，阳历二十六（应为二十七）日晨，复带洋油，烧死城隍庙僧数名，已验殓报案，恳速维持。

在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曹大骏、罗汉杰等县委领导人，在群众的掩护下，转移到秦质夫开设的“秦益丰”洋纱店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措施。会议决定派曹大骏和刘熙两人立即去武汉报告惨案详情。

曹大骏、刘熙赶到武汉，立即向中共湖北省委、省农协汇报了阳新惨案详情，并向武汉国民政府、省政务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火速派兵到阳新镇压反革命，援救工农群众。曹大骏、刘熙还向《汉口民国日报》等有关报刊投稿，揭露朱仲忻等反动势力惨杀九位同志的真相，控诉敌人的滔天罪行，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舆论的声援。

三月六日黄昏，在曹大骏陪同下，省政务委员会特派员王慧文、省党部工人部长王延壻、省“济难会”代表蒋宗文等，率省警卫一团的一个连抵达阳新，准备惩治凶犯。但该连连长与土豪劣绅系一丘之貉，到阳新后，对严惩暴徒并不积极，对工农要求极尽刁难，说什么阳新事件“乃乡村与城市之冲突，不能依据一面之词办理。”<sup>①</sup>因此，阳新反动势力更加猖獗起

---

<sup>①</sup> 《查办之情形》，载1927年3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来，“惨讯日有数次，该县已在白色之恐怖之中”。

为了改变这一局势，曹大骏再次奔赴武汉，向中央党部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支援阳新人民，坚决镇压反革命。四月一日，中央党部以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三人组成的阳新惨案处理委员会，指令中央农民部特派专员黄书亮、湖北省农协代表蔡以忱，偕同北伐军十一军叶挺部之两个连，由曹大骏带领，再次赴阳新查办。他们同阳新县农协的查办阳新惨案委员会一起，撤销了张鹏翊的县长职务，拘捕了县公安局局长艾道生和凶犯二十余名，由新组成的阳新惨案委员会进行公审。四月八日，阳新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六万余人，云集县城儒学埕，隆重举行“追悼死难九烈士大会”，大会由新任县长余辉田主持。曹大骏代表阳新惨案委员会在会上揭露杀害九位同志凶犯的罪行，宣判首犯伍修举、阮星明等七人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凶犯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后由中央、省、县各界代表讲话。会后，继续查办反动分子，“先后被镇压的有三十余人”<sup>①</sup>。

经过这次同反动派的较量，阳新县的工农运动更加高涨，仅一个月时间，全县参加农会的会员，即由原有的七八万人，猛增至三十万之众，居全省之冠<sup>②</sup>。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于六月六日由通山窜入阳新“清乡”。阳新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与夏斗寅勾结一起，以百倍的疯狂，对共产党人

---

<sup>①</sup>曹大骏：《鄂东报告》（1929年5月16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sup>②</sup>《阳新农民运动大大的发展》，载《湖北农民》1927年5月6日第30期。

和革命工农进行灭绝人性的大逮捕、大屠杀。霎时，腥风血雨笼罩着富河两岸。阳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工农群众被洗劫一空，捉拿曹大骏的告示到处可见。阳新再次陷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 （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湖北省委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阳新、大冶两县的党组织，派胡朝珠、方步舟到阳（新）大（冶）地区，组织阳大县委。曹大骏很快与县委接上了关系，并增选为县委执行委员。

一九二八年一月，曹大骏根据党的指示，去龙港一带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他先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刘恒贞等取得联系，恢复了龙港的党组织。然后深入联系贫苦农民群众，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在曹大骏的艰苦努力下，燕厦、洋港、胡桥、后山等地的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为了以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武装镇压，一月二十五日，阳大县委在刘宣垆的后背山上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曹大骏提出镇压阳新的清乡团长刘慧臣和大冶的大劣绅罗巨舫的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三天后，在省委派来的军事干部老唐的指挥下，曹大骏一马当先，带领十余名游击队员，镇压了刘慧臣和罗巨舫，开创了农民武装反抗“清乡”斗争的新局面。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的反扑，曹大骏提出“敌人越‘清乡’，我们越暴动；敌人越‘清乡’，我们越杀土豪劣

绅”的口号。他亲自带中庄铺、大王殿、太子庙等地群众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年五月，湖北省委特派员吴致民来阳（新）大（冶）地区工作。根据省委指示，撤销了阳大县委，建立了阳新县委。曹大骏任阳新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办了《党声》（内部刊物）和《无情斧》两种刊物，作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宣传工具。

一九二九年一月，曹大骏代表大阳区特委出席了在汉口跑马厅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向大会汇报大阳区各县的党务和工作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四月，曹大骏率领五六十人的游击队，由太子庙出发，去攻打龙港的地主反动武装“常练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用化装突袭的方法，一举攻占了龙港镇，将没收区党部书记长肖锦庵、商会会长夏炳文和一些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群众。经过这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曹大骏赢得了群众的信赖，成为大阳区“有名的群众领袖”<sup>①</sup>。从此，“曹大炮”的名字，人民闻之振奋，敌人为之丧胆。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湖北省委因叛徒徐国元告密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夏文法、组织部长曹壮父等二十余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曹大骏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汉，了解详情，并于五月六日以湖北省委巡视员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经过情形及省委遭受破坏的经过和省委会所报告的各方面工作的报告<sup>②</sup>，使党中央及时了解了湖北党的情况。十三日，他又给中央写了《鄂东组织报告》，详细说明了阳新、大冶、黄梅、广济、鄂城等县的党员人数，四个县

<sup>①</sup>何长工给中共阳新县委党史编写组的回信（1978年10月）。

<sup>②</sup>见《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5月6日），原件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材料科。

委和一个特支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各支部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群众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干部队伍的教育培养情况；秘密工作情况以及大冶区特委组织情况等。报告还谈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纠正的方法。十六日，曹大骏又向中央写了关于“政治军事状况——豪绅势力及其组织；群众斗争；游击战争之组织及工作；过去工作之批评；今后工作之意见”。六月底，曹大骏继续去鄂东地区巡视指导工作。当时，敌人对鄂东各县发动围攻，有些县的党组织又遭破坏。曹大骏来到鄂东后，“先将黄梅党的组织整顿好，再次到其他县份巡视。当时负责人非常难找，有一次找到同志家里去，他的父亲不敢和不要我在他家里留宿，只有在草地歇宿一晚。”<sup>①</sup>在这种艰苦危险的情况下，曹大骏恢复和健全了黄梅、广济两县党的组织，随即南渡长江，来到阳新，帮助阳新县委制订培养和训练干部的计划，准备调派干部去邻县做党的工作。在大冶，他与县委书记徐宁甲一起参加基层组织的一些活动。经过这次对黄梅、广济、阳新、大冶四县的巡视，他深感觉党的工作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的缺乏，因此，他决定在大冶山区创办一个红军训练班和一个党务训练班，以加紧干部的培训，并亲自为这两个训练班讲课。尔后，他同徐宁甲一起来到阳新，在阳新召开五县（即大冶、阳新、圻水、鄂城、通山）联席会议（实际只有阳新、大冶、通山三县负责人出席），讨论有关政治、游击、红军训练班和党务训练班，如何推动圻、鄂两县工作，如何帮助通山县委及充实大冶、黄梅两个中心县委的领导等问题。这时，夏斗寅、鲁涤平的反动军队已到大冶“清乡”，交通断绝。他无

---

<sup>①</sup>曹大骏：《鄂东巡视员报告》（1929年8月31日）。

法进入大冶，乃渡江北上黄梅，因黄梅县委书记唐太嵩怠工，他再次改组黄梅县委，调阳新县委常委曹振亚任黄梅县委书记。他折回广济时，设法与圻春县委联系，并设法再去大冶，均未成功，返回阳新时，又因敌人封锁不能成行，只好折回黄梅。不久，曹大骏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党中央任命曹大骏为中央巡视员，同王平章一起前往鄂豫皖边区工作。他们到达鄂豫皖边区后，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坚决“纠正了鄂豫皖边区的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sup>①</sup>，恢复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使得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都有明显的改善，从而保证了鄂豫皖边土地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曹大骏以中央巡视员身分出席并讲了话。大会选举了鄂豫边特委，通过了有关政治、军事、群众运动、青年团和青年运动以及召开鄂豫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鄂豫边工农革命委员会等九项决议，胜利地完成了中央派他来鄂豫边区的任务。

### （三）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以后又增应山、安陆）；河南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息县（以后又增罗山）；安徽的六

---

<sup>①</sup>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了解曹大骏牺牲时间给大冶县委组织部的复信》（1980年11月7日）。

安、霍山、英山、霍丘、颍水、寿县、合肥等，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三月十八日，党中央又发出给鄂豫边特委和红军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四月，中央派来的郭述申、曹大骏、许继慎等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并在黄安北部之箭厂河召开会议，宣布组成鄂豫皖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曹大骏等二十余人为执行委员；宣布由曹大骏、许继慎、徐向前等九人组成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曹大骏任前委书记；红一军军长为许继慎，政治委员为曹大骏，副军长为徐向前，政治部主任为熊受暄。接着，会议通过了红军改编的决议。根据中央规定；红一军直属中央领导，与地方党委是横的关系；部队行动方针由红一军前委决定。

箭厂河会议后，曹大骏同许继慎、徐向前等投入紧张的部队改编工作。他们除将原红三十一师之十一大队改编为军部教导队外，其主力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师长由徐向前兼任，师政治委员为李荣桂。之后，前委和军部东进商南，在南溪将三十二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二师，师长为漆德伟，政治委员为王培吾；另以原三十二师一部和当地游击队三百余人，组成红一军独立旅，廖业祺任旅长。接着，红一军军部和二师到皖西与三十三师会合。五月二十三日，曹大骏在金家寨召开有六安中心县委及红二师、红三十三师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宣布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与此同时，还相继组建了中央独立第一师和中央独立第二师。至此，鄂豫皖边区红军统一整编任务全部完成，全军共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二千三百余人。红一军的组成，不仅解决



了统一指挥问题，而且有利于互相配合、支援，共同发展，逐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实现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

六月中旬，曹大骏、许继慎、徐向前等抓住军阀混战，根据地周围敌守备力量薄弱的有利时机，分别指挥部队主力出击，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他同许继慎率红一军二、三两师，向六安、霍山西部地区的反动据点发动进攻的作战中，先后收复了流波碓、麻埠等地，歼灭霍山县城的地方反动武装千余名，毙俘六安之敌潘善斋新编第五旅副旅长以下七百余人，缴获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获得了整编后的第一次大胜，军威大振，使皖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整个霍山县境几乎全部为革命势力所控制。

我军稍作休整和补充之后，即挥师南下，向盘踞英山的敌韩杰旅（共千余人）发起攻击。曹大骏采用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包围敌人在城北金家铺的一个团，于六月二十一日以第二师猛攻金家铺，以第三师和英山游击队布防于西南十五里的狮子坳，以阻击英山援兵和截击可能由金家铺南逃之敌。战斗打响后，金家铺守敌遭到我军猛烈攻击，仓惶向英山县城逃窜，红二师跟踪追击，与截击部队协同，将逃敌包围于狮子坳全部歼灭；从英山县城出援的敌军也被歼灭在狮子坳附近，并于六月二十八日乘胜攻占英山县城，获得了整编后的又一次大胜。

英山战斗结束后，曹大骏等又指挥红军东袭罗田，守敌闻风逃窜，红军乘胜占领罗田县城。此时，蒋、冯、阎军阀混战方酣，京汉线南段守备薄弱，军部乃率二、三师迅速西进，以便与一师会合，实现全军主力的集中，寻求更大战机。八月二十

二日，正当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师在商南四姑墩与反扑之敌戴民权部（二十五师）激战时，曹大骏、许继慎所率的二、三师赶到，并立即投入战斗，共击溃敌人两个旅，歼灭其中两个团和一个营，缴枪四百余枝，迫击炮三门，机枪三挺。

从六月至八月的三个月中，红一军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云梦、花园等重要城镇，歼敌约七千余人，取得了对敌作战的巨大胜利。同时，红军边作战，边补训，部队由改编时的二千余人迅速发展到五千余人，战斗力也有了显著提高。红一军的胜利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鄂豫皖边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各地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土地革命斗争迅猛发展，鄂豫皖边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一九三〇年六月，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于八月逐步传达贯彻到鄂豫皖根据地后，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同鄂豫皖边特委合并组成京汉路特区行动委员会，以便集中力量向京汉路出击。九月中旬，曹大骏等率红一军由四姑墩出发，沿京汉路东侧北上。先袭广水车站，因敌固守未克。二十二日，向信阳发动进攻，当日午夜，红军一个团攻占车站，歼守敌一个营；另一个团也将车站占领。正待进攻县城，但敌援兵已于次日拂晓，由南、北两面赶来，以猛烈炮火向红军轰击，于是军部乃主动撤离信阳车站向东转移。

广水、信阳两次战斗，都未达到预期目的，部队遭到了一定伤亡，使曹大骏等认识到，这样继续在铁路沿线战斗于我军不利，因为敌强我弱，又远离根据地，实在难以取胜。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他们没有盲目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从实际出发，果断地决定返回根据地。红军折出东北，袭击并占领正阳

关以南之徒沟镇，消灭反动民团数百人。部队在这里稍事休整后，继续南返。十月初，红一军渡过淮河。六日，以二、三两师袭占光山，歼敌新编二十五师的一个补充营。七日，以第一师强攻潢川，在北门歼敌一个营，但攻县城未下。接着，挥师西向，攻克罗山，歼敌王泰部的一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

红一军攻克光山后，曹大骏主持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为了加强军部的领导力量，副军长徐向前免兼一师师长，政治部主任由曹大骏兼任。光山会议还对红一军前委成立以来的工作按照当时“左”倾冒险主义指导思想来进行检查。认为一军的领导，在京汉路上“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等待革命高潮自行到来的“机会主义”。于是改选了前委，书记仍为曹大骏，但军长许继慎没有被选进前敌委员会。

十月，红一军移住罗山潘新店地区，鄂豫皖特委书记郭述申赶来前方，与一军前委书记曹大骏商讨军事行动问题。曹大骏随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认识到了前段部队行动与地方工作有脱节现象是个严重问题，但仍根据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思想，确定当时的中心任务为继续夺取京汉线，进攻信阳，以掩护铁路以东地方起义。恰于此时接到党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发来的停止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示，才端正了边区军民前进的方向。

十月十八日，党中央又向鄂豫皖特委发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并命令红一军与活动在圻、黄、广地区的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月上旬，蒋介石在军阀混战结束后不久，即组织重兵，开始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实行包围，准备对我各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曹大骏根据中央的“综合指示”和命令，率领红一军南下作战，执行威逼武汉，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对敌人第一次“围剿”的任务，同时准备向圻、黄、广地区发展，以便与红十五军联系。十一月十一日，红一军以第二师和第一师的一部，向黄陂以北姚家集之敌十三师七十五团发起攻击，屡攻不克。十三日，又以第一师进攻黄安之敌二十六师第二混成旅，仍未攻下。此时，曹大骏等吸取两次攻坚战失利的经验教训，决定向麻埠方向转移。

十一月二十四日，敌十三师补充团的一个营侵入谢店，红军乘其立足未稳，予以突袭，将其全部歼灭。三十日晚，曹大骏等指挥部队冒着鹅毛大雪，南下奔袭新洲，准备歼灭该地民团。途经潘家塘时，得悉敌第二混成旅从黄安、麻埠南撤，刚刚到达新洲宿营。曹大骏等立即指挥我军，乘敌不备，发起猛烈进攻，一举将该旅全歼。获胜后，他们灵活运用连续奔袭，突然包围、速战速决、出奇制胜等战术，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十二月一日，红一军东移但店，再由但店北上，经罗田、滕家堡等地进入商南。十二月十四日，红一军攻克金家寨，全歼守敌；十五日在鹅毛岭击溃守敌一个营；十六日乘胜攻克麻埠、独山、叶家集；十八日，在苏家埠、韩摆渡等地又歼敌四十六师两个营，并乘胜挥师东进，包围了六安县城。但围而不攻，旋即撤围南下，以一师威逼霍山，以二师集中于两河口地区。

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六安一度被围，霍山又告急，慌忙令其四十六师、警备二旅全力防守六安、霍山，伺机向我反扑；同时，敌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亦令三十师一个旅由商城进占金家寨，二十五师一个旅进占叶家集，企

图对我红一军组织新的合围。

曹大骏、许继慎等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于二十一日将主力集中在麻埠地区，准备待机歼灭其进犯之敌的一路，逐步扩大战果，以粉碎敌人新的合围。二十九日，果不出我所料，敌四十六师分左、中、右三路向麻埠进犯。三十日，曹大骏、许继慎、徐向前即令红一军第一师之一、三两团与第二师之三、四团，迎击中路敌军于东香火岭。经四小时激战，全歼其先头一个团，其后续一个团溃退同兴寺，亦被我军包围歼灭。当右路敌二七一团进至西香火岭时，我军当即调二师第四团予以迎头痛击，敌溃不成军，敌团长亦被活捉。随后，第四团乘胜追击二十余里，在石婆店与我第六团将敌前后夹击，悉数全歼。正当我军主力在与中路、右路敌军作战之时，左路敌人乘隙进至麻埠外围，并已有一部冲入镇内，但我军部直属部队击退，形成对峙。当被围于同兴寺之敌大部被歼后，军部即令调第一师第一团返回麻埠，于黄昏时向敌发动进攻，将敌击溃。此役总计歼敌三个团，击溃三个团，共毙俘敌团长以下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七百余枝、迫击炮数门和电台一部。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曹大骏、许继慎率领一、二师从皖西地区西返。途中发现敌三十一师的一个旅正由金家寨退驻商城。他们乘敌不备，果断地指挥红军奋起直追，并在四姑墩地区截住逃敌，随即发起猛烈攻击，几经反复冲杀，歼敌一个团，缴获山炮一门，枪四百余枝，残敌向商城溃逃。至此，敌对我鄂豫皖边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彻底粉碎。

四姑墩战斗后，红一军向商南转移。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旬，与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中央派来的邝继勋、余笃三分任军长和政治委员，曹大

骏改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并不因职务变动而消极，相反，他始终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认真做好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努力作战，为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 （四）

一九三一年一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张国焘紧步王明的后尘，立即抛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大肆吹捧王明，得到王明的信任，被作为中央代表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改造”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张国焘全盘否定和恶毒攻击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胡说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象共产党”，“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红军在立三路线时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提出首先要改组领导机构”<sup>①</sup>。曹大骏对此进行了抵制，并对个别军负责人提出中肯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不仅没有被听取和采纳，相反被认为“大骏同志更有看不起笃三同志的恶劣倾向”，“他重于感情”，“笃三是一个有力量的工人同志，这样大的责任是政治上必然拿得起的”<sup>②</sup>。

四月十一日，张国焘即在麻埠召开红四军会议，公开对原领导干部无中生有地横加斥责，指责“许继慎抗不遵命，反对邝继勋，是国民党军阀行为”；指责“曹大骏、熊受暄等反对

---

<sup>①</sup>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sup>②</sup>《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

没收麻埠反动派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工农”<sup>①</sup>。鄂豫皖根据地的干部和军民，对张国焘的全盘否定和恶意攻击，当然不能接受，一齐起来抵制，曹大骏则是这场斗争的带头人。因此，张国焘怀恨在心，视曹大骏为其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最大障碍，胡说：“在这种复杂情形之下，最能影响此地一般政治方向者有以下的例子，一，曹大骏来，在烧杀政策未尽转变时，主张联合富农，保护中小商人”<sup>②</sup>。五月十二日，张国焘又在新集镇召开会议，在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之后，接着急忙宣布：“红军中之公开反对中央分局路线的曹大骏等即撤职，而代之以最好干部……。”<sup>③</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以后，召集了鄂豫皖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了省委，由沈泽民任书记，郭述申任组织部长，徐宝珊任宣传部长。虽然此时曹大骏在红军中的职务已被张国焘撤了，但他在鄂豫皖苏区党和群众中的声望很高，仍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鄂豫皖省委派曹大骏接任红山（现英山）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红山、罗田、浠水、圻春、太湖、潜山等九县工作。曹大骏在任中心县委书记期间，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在肃反问题上也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如对红三县警卫团八连陆金昌连长等作了完全错误的处理，使革命力量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一九三二年六月，党组织派江克章任红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被调到英山独立团工作。同年十月一日，红二十七军成

---

①张国焘：《苏区发展的经过和肃反胜利的原因》（1931年11月25日）。

②③张国焘：《苏区发展的经过和肃反胜利的原因》。

立，曹大骏又被调到军部任供给处政治委员。是月，曹大骏随军到达安徽桐城县一带活动。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曹大骏在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十数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突出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无产阶级党性，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情操和英勇献身精神。

曹大骏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27年3月16日、3月18日、3月26日、3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2. 1927年4月17日《中央日报》。
3.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刊》第7期、第11期，1927年3月。
4. 王慧文：《援救阳新》，载《回忆董必武》，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5. 侯亚英：《潭秋同志在北伐军宣传训练班》，载《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0年版。
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80—160页。
7. 《鄂东南革命斗争简史》（初稿），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湖北省地方史研究室编印（1979年）。
8. 《阳新县革命斗争简史》，中共阳新县委党史编写组编印（1980年10月）。
9. 《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 《英山县简志》、《大冶县革命斗争大事记》、《黄石市革命斗争大事记》、《通山县革命斗争史料汇编》等（均为未刊稿）。
11. 曹大骏：《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5月6日），《鄂东组织报告》（1929年5月13日），《鄂东报告》（1929年5月16日）。



日），《鄂东巡视员报告》（1929年8月31日），《鄂东组织问题报告大纲》（1929年9月8日）。

12. 《党组织的恢复及其领导的初期革命活动》（1959年3月整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一）、（二）、（三）（未刊稿）。
13. 函调或走访徐向前、郭述申、何长工、汪克明、王只谷、方步舟、刘映青、黄鲲鹏等30余人的材料。

# 张 英

周庆本 丁献良

张英，原名马宗显，曾用名马尔赛夫，化名刘英。一九二二年在冯玉祥骑兵营任排长。一九二五年赴苏留学时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回国。由中央派至青岛处决叛徒王复元，威震齐鲁大地。后调鄂豫皖苏区三十二师任师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武汉英勇就义。

## (一)

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张英出生在山东潍县高里集马家庄的一个贫苦农家。他八岁入本村私塾，辛亥革命后转入新学堂读书，由于勤奋好学，常受老师的夸奖。

一九二二年冯玉祥在北京南苑组建骑兵。张英由家乡赶到京城投考，被录取。他胸怀爱国大志，努力学习骑兵操典和马术，颇受上司的赏识，很快被晋升为少尉排长<sup>①</sup>。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秘密约定，发动北京政变。张英和他的骑兵排积极参加。政变成功后，张英被晋升为中尉排长。次年春，他被选拔到冯玉祥的骑兵教导团学

---

<sup>①</sup>访问吉合记录，原件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习。

一九二五年夏，冯玉祥部的苏联顾问，提出挑选一批军官赴苏留学深造的建议，冯玉祥极为赞成，并交由训练处的总监熊斌和学兵团第一营营长鲁仲义负责挑选。刚从骑兵教导团毕业的张英和从步兵、炮兵和辎重兵团毕业的另外二十三名军官被选中<sup>①</sup>。于九月间在张家口集中。十月间，张英等在冯玉祥的全权代表熊斌和领队鲁仲义的带领下，由平地泉入苏联国境至海参崴西行，绕道贝尔加湖，十一月到达莫斯科。

后来，熊斌、鲁仲义相继回国。留苏学生中除四名学飞行，六名学航空机械外，其余十四名分配去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张英和张成功、杨国体、李希更、丁良骏等在骑兵，吉合等在步兵班学习<sup>②</sup>。

留学生入校后，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不懂俄文，而所有军、政教官均用俄语授课。张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刻苦攻读俄文和各门功课，并取得了良好成绩<sup>③</sup>。

军校苏共党的组织，经常请基辅各工厂的老工人和十月革命参加者对学员进行教育。通过政治课学习和老工人的教育，张英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要拯救苦难的中国，只有走苏俄的道路。他的思想日渐提高，并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秘密地参加了苏联共产党<sup>④</sup>。

一九二六年六月，冯玉祥赴苏联访问，曾亲赴基辅军校，接见了张英等中国留学生，对他们的学习成绩十分满意，并给以勉励<sup>⑤</sup>。

一九二七年夏，张英于基辅红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

---

①②③④⑤访问吉合记录，原件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到维斯特拉高级军官学校深造。此时，他取名马尔赛夫<sup>①</sup>。在维斯特拉高级军校里，张英刻苦学习合成军事指挥，不仅掌握了步兵、炮兵、铁甲兵等各军种的联合作战指挥本领和指挥艺术，而且骑兵的骑术和指挥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九二八年底张英学习期满回国，被分配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作保卫工作。

## (二)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央派张英去山东，协助青岛党组织铲除出卖山东省委机关的叛徒王复元<sup>②</sup>。受命后张英和他的助手王兆恭，化装成闯荡江湖的艺人，巧妙地躲过海关人员的检查，顺利地潜入青岛，在大庙山附近的客栈住下，当晚就与省、市委负责人王进仁（后脱党）、牟洪礼，王景瑞等接上了关系。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先派王兆恭赴济南，探听叛徒王复元的踪迹。王兆恭到济后不幸被捕。省、市委又派张英赴济侦察。青岛市委为了掩护张英的活动，决定由青岛四方机厂党支部书记傅书堂，动员其刚由农村来青岛的大妹子傅桂兰，扮成张英的眷属。张英和傅桂兰乘火车来到济南后，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悦来客栈住了下来。

为了尽快侦察叛徒的下落，张英让傅桂兰留客栈，自己先去找在济南开商号的老乡。当他返回客栈刚要进门时，突然被

---

<sup>①</sup>访问王士秀记录，原件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sup>②</sup>王复元曾窃据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伙同其胞兄王天生叛变投敌。他们叛变后，曾多次对山东省委党组织进行破坏。

十来个持枪暗探围了起来。张英脱身不得，被砸上手铐，带到济南警察第三分局。原来敌人是查抄八卦楼省委秘书处时，发现了张英的联络信件，获得了张英来济南住在老悦来客栈十六号房间的情报，所以张英离开客栈后，敌特就逮捕了傅桂兰，并派人在客栈等候张英。

张英被带到济南警察第三分局，当即受到审讯，但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坚不吐实，被关进看守所内。当天夜里，张英说他肚子痛要上茅房。他先后去了四次厕所，看守人员不耐烦了，最后一次只站在厕所外面，没有跟随进去。张英趁机熟练地从鞋底抽出一根钢丝将手拷脚镣捅开，翻身越墙逃出看守所，躲在一个大院里避开敌人的搜查。次日拂晓，又藏在一个不常用的厕所踏板下面隐藏了一天，直到黄昏才洗净身上的污泥、血迹，到开商号的那位老乡家里借了钱，换了衣服乘车返回青岛。

傅桂兰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一口咬定张英是她的新婚丈夫，自己的名字叫单娟。在敌人的威逼折磨下，她身患重病，三个月后即离开人间。

中共青岛市委为了确保张英安全养伤，决定把张英安排给曲学尧当帮手。曲学尧是地下党员王科仁的姐夫，思想进步赞成革命，当时在青岛邮电局长金指金一郎（日本人）家当厨师，国民党对这样的家庭是不敢轻易怀疑和检查的，于是，张英在曲学尧的掩护下，比较安全地隐蔽下来。王科仁也以看望姐夫为名，常来和张英联络。

市委为了尽快的消灭叛徒王复元、王天生兄弟，曾派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徐子兴以“假自首”打入敌人内部侦察叛徒行踪。当时，参加除叛的所有同志，都不认识王复元兄弟二人。为

了摸清王复元兄弟二人的面目，徐子兴通过在邮政局工作的一位范先生，获得了王复元、王天生的照片，当即转给了省委书记王进仁，并限定一夜归还。

当晚，王进仁找到张英，两个人对王复元兄弟的照片认真端详，掌握了两个叛徒的各种特征。这时，徐子兴还向市委提供了地下党员丁维尊、孙秀峰两人从动摇到叛变投敌的情报，经市委进一步核实：丁维尊还出卖了几个同志，曾在贮水山一带抓过共产党员；伙同王复元在胶县威逼共产党员自首。市委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张英，并转告给了丁维尊的新婚妻子、傅桂兰的妹妹，共产党员傅玉真。傅玉真义愤填膺，决定大义灭亲。

省、市委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首先处决叛徒丁维尊，斩断王复元的魔爪，并将任务交给了张英和傅玉真。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晚，丁维尊已经睡下。张英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来到青岛云南路江兴西里二楼丁家，镇定的说道：“老丁！快起来，中央来人了，有重要指示，咱们到前海栈桥溜溜去。”丁维尊做贼心虚，不肯去，傅玉真说：“既然上面来人准有要事，还是去趟好。”丁维尊看到温顺的妻子，望着安然等待的张英，又想到中央来人，准有重要指示，可以从中刺探机密，便随手拿过汗衫穿上，跟着张英走出家门，朝前海沿走去。丁维尊从张英的谈话中觉察到声色有异，便突然扭头朝滋阳路口跑去。张英从容地掏出枪来，将这个叛徒处死在滋阳路口。

丁维尊被击毙的消息象闪电一样传开，把正在青岛进行破坏活动的王复元吓得魂不附体，第二天便坐上火车窜回济南。但到济南后还是心慌意乱，又于十五日返回青岛。八月十六日，市委得到情报，得知王复元于当天下午六时去山东路（现

为中山路，是青岛最繁华的街）一一〇号新盛泰鞋店取鞋。当即决定派张英和王科仁去执行铲除叛徒的任务。六时许，一辆挂着车帘的黄包车在新泰鞋店门前停了下来，车里钻出一个人，快步溜进新盛泰鞋店。隐蔽在附近的张英一眼看清那人正是王复元，便命令王科仁紧随进店，相机处决叛徒，他自己站在店门旁放哨做掩护。王科仁跨进新盛泰鞋店，王复元立即警惕起来，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王科仁这个陌生人。王科仁强压着复仇的怒火，若无其事地走近柜台喊道：“掌柜的，买双鞋！”他一连挑了几双，又说：“你看我的脚这么大，这鞋我能穿吗？请你再取双大的……。”王复元以为王科仁真是来买鞋的，才松了口气，拿着为他捆好的鞋盒，转身向门口走去。就在王复元刚要迈出门槛时，王科仁举枪射击，王复元应声倒地。王科仁唯恐叛徒未死，又连射三枪。刹时，山东路人群骚动，乱作一团。武装警察亦闻风而到。张英和王科仁迅速离开鞋店，跨过繁华的山东路，淹没在人群之中。

短短的六天之内，青岛市连续发生两起处决叛徒的事件，广大革命人民拍手称快，反动政府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青岛特别市长吴思豫，为保其命，多日不敢回公馆，躲在军舰上过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从各地调大批军警特务到青岛限期侦破，并悬赏五百元，通缉张英、王科仁“归案”。

### （三）

叛徒王复元、丁维尊被处决后，张英迅即返回上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派张英去豫东商南，担任刚组建的红三十二师师长。

到商南后，张英深入部队基层，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使红三十二师这支新的武装克服了游击习气，战斗力大大增高。与此同时，他派出侦察部队对商城的敌情、地形进行调查，准备攻打商城。

一天，红三十二师通过党在商城作地下工作的同志送来的情报，得知国民党商城县县长宋慎，受固始、潢川两县县长之邀，率民团全部开往三县交界的江家集，留守商城的只有当地红枪会会长顾敬之带领的一些反动武装。

张英认为这是夺取商城的有利战机，遂决定智取商城。十二月二十四日，天降大雪。一部分红军指战员按照张英的部署，分别装扮成豪绅、富商和卖粮、卖柴的农民。二十五日天亮以后，化了装的红军战士来到商城南门，守城卫兵盘查很严，扮作豪绅富商的红军战士顺利地进了城，“卖粮”，“卖柴”的“农民”却被阻拦在城外。为了争取时间，他们掏出手枪，击毙了守城的两名卫兵。

枪响后，城里城外乱作一团。红军指战员乘机抢占了南城门楼，控制南门。此时张英率领的红九十七、九十八两团主力，纷纷从南门和东西两门冲入城内，直扑街门口十字大街。敌人被逼退至衙门大院死守待援。张英一面指挥部队围攻，一面发动政治攻势。敌军在红军的强大火力和政治攻势下，开始动摇。张英指挥战士们一鼓作气攻入衙门大院，激战三个多小时，消灭了这部分敌人，占领了商城。

红三十二师攻克商城的当天，张英向全师约法三章，张贴安民告示，动员商贾开店营业；组织纠察队查户口；打开粮仓发动群众分粮；然后又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商城县苏维埃政府。



商城县县长宋慎闻知县城被红军占领，当晚率领民团回返，妄图乘雪夜袭红军，夺回县城。张英对此已有预料，决定放开四门，将全师主力隐蔽在敌人必经之地。深夜，当宋慎带着民团扑到十字大街时，顿时伏兵四起，将民团大部歼灭，只有小股逃窜。

商城攻克后，我在商南地区的县级机关团体，迁入了县城，改商城为赤城。

#### (四)

一九三〇年四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黄安北部箭厂河成立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特区委员会，决定将原来的红三十一、三十二师改为红一、二、三师，编为第一军。张英调任红一师任参谋长，师长由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兼任，政治委员李荣桂。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的成立。使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和战斗在这三块根据地里的红军在组织领导上形成了统一的整体，这对促进鄂豫皖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一军组建时，正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在冀鲁豫三省之际，为红军向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红一师在张英等率领下，积极向京汉线南段出击。六月中旬，红一师首战杨家寨车站，歼敌郭汝栋部两个连。战斗结束后，部队进行了扩编，将根据地一批地方武装补充编入红一师。这样，全师由原来五个大队扩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师属特务大队，兵员由原来的八百余人增至一千二百余人。

六月二十六日，红一师刚刚完成扩编，获悉郭汝栋部分两

路向我进攻，一路是独立旅第一团，自武汉北上，进至阳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路是第二旅第四团，由花园进至小问溪。

徐向前、张英等迅速作出了歼敌部署。二十八日，红一师开到预定伏击区，将主力部队分兵两路埋伏在阳平口东北传家湾附近。张英亲率特务大队，出郑家店，担任诱敌进入伏击圈的任务。中午时分，敌人果然兵分两路向阳平口进犯。炎热中午，张英指挥特务大队，突然向敌人独立第一团发起猛烈阻击，然后边打边撤。敌人以为我军败退，遂紧追不放终于被诱入我伏击圈内。此时，徐向前指挥的第二、三支队突然从左右两翼向敌军猛扑，枪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四处逃窜；张英率特务大队又掉过头来直捣敌阵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敌一个团全部被歼，毙伤、俘敌千余人。红一师扩编后首战大捷，指战员斗志更加昂扬。

七月下旬，红一师向京汉线出击，曾一度攻下祁家湾车站。此时，应山县委送来情报：“目前蒋、冯、阎军阀混战方酣，三路大军集结于陇海路东段，正待决战。鄂北尚无敌军重兵扼守，铁路沿线敌兵力单薄，只有钱大钧教导师一个团，刚调到花园车站驻防，尚不明地理形势，且如惊弓之鸟，忙于高垒深筑，以求保命”<sup>①</sup>。徐向前和张英经过研究，立即决定挥师北上，奔袭花园车站。

由于部队不断扩编，新兵大量增加，得不到休整训练，缺乏野战行军经验。因此，原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夜袭花园，结果当红军赶到花园车站时，天已放亮，失去夜袭战机。正当徐向前、张英等为不明敌情变化，能否立即组织进攻而焦急的时

---

<sup>①</sup> 《红四方面军战史》。

候，孝感县委又送来情报：“敌军仍无变化，毫无戒备，士气低落，军纪松弛”<sup>①</sup>。徐向前、张英等分析认为敌情仍无变化，我军隐蔽亦未暴露，正好打他个出其不意，遂决定立即向花园车站守敌发起猛攻。张英身先士卒率红三团迅速越过铁路扑向花园镇。我军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缴械投降。此役红一师全歼钱大钧的教导师第五团，并攻占了花园车站<sup>②</sup>。

战后，红一师迅速转移到花园以北小河溪进行了第三次扩编，全师组成两个步兵团，一个机炮混成团，人员增至三千余名，战斗实力大大加强。

红一师在京汉线南段连战速捷，使蒋介石坐卧不安，忙调驻河南的戴民权的新编二十五军担任京汉线南段护路任务；另调彭启彪的新编十四旅进驻花园附近防守。八月二十一日，敌二十五军一个旅东犯小河溪。红一师仅用一小部分部队诱敌深入，主动放弃四姑墩。敌军以为我军不敢交战，趾高气扬地向四姑墩进犯，正中红一师的伏击。刹那间，枪炮手榴弹齐响，敌军大乱，被红一师歼灭了一个营。当戴民权再次率部反扑时，红一军二、三两师已由皖西赶到，立即向敌右翼迂回，配合红一师又歼敌一个团的大部。顽敌溃不成军，当晚逃遁。战斗结束后，红一军三个师会合于四姑墩作短期休整。

十月中旬，红一军在光山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强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思想、组织建设，并讨论和决定了部队的统一整编问题。整编后，张英任红一师师长。这次会议还改选了红一军前委，张英被选为前委委员。

---

<sup>①②</sup> 《鄂豫皖苏区红军史》。

## （五）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上旬，红一师为配合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挥师威逼武汉，并准备向长江沿岸挺进，打通和红十五军的联系。十一月十一日，张英率领的红一师在红二师的配合下，袭击姚家集、黄安，歼敌一部<sup>①</sup>。

十三日，红一师南下袭击新洲，全歼守敌一个旅。敌何成濬、李鸣钟调兵遣将前来堵截时，张英机智地率领红一师迅速转移到商南地区的罗田。

十二月初，张英主持召开了红一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反“围剿”指示：“以地方武装结合广大群众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迫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另一方面则集中红军主力出敌不意，狠打敌军的弱点，以尽快扭转战局”<sup>②</sup>。张英指出：彻底粉碎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是直接声援江西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号召红一师全体指战员要不遗余力的诱敌来犯，以求瓦解和减少敌人对湘赣、湘鄂根据地的压力。

十二月十四日，红一师随军部进驻皖西，攻克金寨，歼守敌四十六师一个营和反动民团一千余人，缴长短枪一千三百余枝，迫击炮两门。接着，又连续进行了鹅毛岭、独山、苏家埠等战斗，逼近霍山。十一月三十日，红一师一、三两团绕过霍

---

<sup>①</sup> 《鄂豫皖苏区红军史》。

<sup>②</sup> 《红四方面军战史》。

山、向诸佛庵前进，并在红二师四团配合下，迎击东路之敌于东香火岭，经过四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团。敌后续部队另一个团退至东香火岭同兴寺。张英率一、三两团直扑同兴寺，全歼了该敌。为了扩大战果，张英命令全体指战员轻装，以最快速度北上，直捣麻埠镇。当日黄昏后，红一团向麻埠镇守敌发起猛攻。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红一师遂即占领麻埠镇。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红一师随军部由皖西西返，途中发现敌三十军一个团由金家寨向商城撤退。张英果断地率部乘势追击，直至商城仁和集二道河西南之四姑墩地区将逃敌截住。就地全歼，缴获山炮一门，枪四百余枝。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班竹园会合，合编为红四军。张英任红十师副师长，师长蔡申熙。二十六日，蔡申熙、张英率领红十师围困麻城北部磨角柚之敌，诱麻城守敌出援，在运动中，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枝。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有计划地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的胜利。

随后，红十师配合地方武装将光山南部重要据点新集团团围住，另两个团集结于新集南北两地区进行休整，准备打援。

红十师在蔡申熙、张英率领下北上，围攻新集。因敌设防坚固，几次强攻未克。蔡申熙、张英商量决定改用坑道爆破。在当地群众大力支援下，很快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然后用棺材装了三百余斤炸药和数枚山炮弹，从坑道运到寨墙下。二月十日下午，从坑道点燃引线，一声巨响，新集北面石寨墙炸开一道一丈多宽的大缺口。战士们纷纷从缺口向寨内冲去。经过三个小时巷战，全歼新集守敌。

新集战斗后，红十师经短时间的休整，于三月九日拂晓，在红十一师的配合下，对双桥镇守敌三十四师发起突然袭击。

歼敌两个连，占领了部分高地，直接威逼双桥镇守敌。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慌忙从武汉调来飞机三架助战。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拚命向我反扑，战斗十分激烈。正在此时，蔡申熙身负重伤。张英一边命令抢救师长，一边乘红三十一团截住双桥镇守敌退路的有利时机，立即组织部队从正面发起强攻。岳维峻首尾指挥失灵，守敌慌忙突围逃窜。红军指战员乘胜追击，终将敌三十四师五千余人全部歼灭并活捉敌师长岳维峻。这次战役共缴长、短枪五千余枝，迫击炮十门，山炮四门，是鄂豫皖红军成立后缴获最大的一次胜利。战斗结束后，张英升任红十师师长<sup>①</sup>。

## (六)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限令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苏区的红军。

敌人的计划是：第一步分路合击新集寨、七里坪，“肃清”鄂豫皖的红军；第二步“进剿”皖西。为实现这一阴谋，蒋介石于四月初将“鄂豫皖三省绥靖督办”由武汉迁到潢川，临近阵前指挥<sup>②</sup>。

此时，皖西之敌乘红军主力未到，以敌兵盛暄的四十六师及警备一旅向皖西根据地进犯。四月十五日，敌人又增加五个团进驻方圆不到二里的麻埠镇，伺机进攻金家寨。

---

① 《鄂豫皖苏区红军战史》。

② 《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成立和红一军的组成，边界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

在张英率领下，四月二十日，红十师由商南迅速挺进皖西，与红十二师会合。二十五日张英以两个团的兵力猛攻敌人侧后之独山据点；红十二师奉命集中于麻埠镇外围，阻敌援军。翌日拂晓，张英命二十八团、三十二团向独山外围马家大尖和黄伯皖等地展开猛攻，歼敌一部。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张英亲率红二十九团乘独山镇内敌人向外增援之际，直扑独山镇守敌五十七师和警卫旅，激战四小时，全歼该敌，迫使麻埠、诸佛庵之敌逃窜，皖西大片村镇再次为我收复。

五月上旬，敌人又相继调三十、三十一两个师，分别向潢川，商城集结，企图合击金家寨，麻埠。与此同时，驼光山之敌李韞珩的五十三师和夏斗寅的十三师，由泼皮河、新集、福田河、滕家堡之间构成一条阻击线，以防我红四军主力西进。我红十师侦知敌人企图后，在敌人的防线未组成之前，突然西进，于五月九日进至新集以北的浒湾。五月十八日，张英率红十师随军部南下，进袭黄安宋埠之敌供应线上桃花据点，歼敌肖之楚四十四师一个营大部。在红四军猛攻之下，黄安敌一个旅驰来增援，于十里铺被红军埋伏部队歼其大部。南部之敌惧怕红军，仍龟缩黄安，未敢轻举妄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张英等以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打撤撤的战术，打破了蒋介石在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苏区红军”的梦想。

## (七)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南下，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

三次反“围剿”时，张国焘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主张打下英山后，主力打潜山、太湖进攻安庆，以威胁国民党首府南京。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张英、周维炯、王树声等，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冒险计划，坚持先打蕪春、黄梅，相机攻打武穴。因为这样可以威逼武汉、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

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红四军干部作了调整，张英仍任红十师师长，政委康永生。七月下旬，张英率领红十师在随军部南下途中，于八月一日出敌不意，攻克英山。接着继续南下浠水、广济。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红十师歼灭敌新编第八旅于曹家集，并活捉敌旅长王光宗，逼近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威震九江、武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组建红四方面军，张英任七十三师师长，吴焕先任师政治委员。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组织了商潢战役，以三个师由黄安挺进豫南。按照战役计划，张英指挥红七十三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击蒋介石嫡系汤恩伯所率之第二师，并相机夺取商城。一月二十三日，当敌第二师进驻上石桥时，张英率部迅速由东向敌第二师压来。同时，红十二师由红十一师一部配合也迅速向河凤桥，江家集、杜傅店逼近。汤恩伯与敌三十三旅见势不妙，乘红军尚未完成包围之机，仓惶向潢川，商城逃窜。至此，长达六十公里的商潢公路又为我军控制，同时，还拆断商城、固始之敌的相互联系。商城守敌因惧怕重蹈黄安复辙，潢川之敌虽有两师之众，因累遭红军打击，也不敢轻举妄动。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只好命令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率七十六师由信阳赶至潢川，会同潢川之敌第二、



十二两师出援商城。

此时，张英所率红七十三师已经在豆腐店布好阵势，准备以踞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伏击援敌。十月二日，当敌人进入红七十三师伏击圈时，张英下令迅猛发起攻击。红七十三师指战员分别向敌军正面和侧翼猛烈进攻，打得敌人弃枪逃遁。二月三日，红七十三师乘胜追击，直逼潢川城郊。商城守敌五十八师见援兵溃不成军，更加恐惶不安，遂弃商城南窜麻城。红军未战再克商城。

在二月三日的追击战中，张英站在豆腐店的一个坟头上，正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他的头部，当即不能说话<sup>①</sup>。被战友们抢救下来，送中央分局养伤。经医生精心护理，张英的伤势恢复较快，不久就开始学习讲话。此时，敌人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了张英的安全，组织上决定将他和负伤的陈赓一起送往上海治疗<sup>②</sup>。一九三二年十月，张英途经武汉时，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时年三十岁。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刘英（张英）同志回国后到上海，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工作。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都很好。在作战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英勇果断，是很能打仗的，是个很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我的很得力的助手。他是个很好的同志，牺牲得很可惜……”。

####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徐向前办公室给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复函。

---

<sup>①</sup>徐向前的回忆，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sup>②</sup>徐向前的回忆。

2. 《豫南巡视员郭树勋报告》存新县党史办公室。
3. 吉合给潍坊市党史办公室的复函。
4. 《淮河怒涛》，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 《戴季英谈刘英的一段情况》，存新县党史办公室。
6. 《中共商城县党史大事记》。
7. 《星火燎原》第二集。
8. 冯玉祥，《我的生活》。

# 杨重远

张守宪 李艳玉

杨重远是红军晋西游击队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历任高桂滋部中共军委书记、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参谋长等职，为发展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奋斗了一生。

## (一)

杨重远，原名杨敬熙，号弘毅，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九日诞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四十里铺麻地沟一个雇农家里。父亲扛长工，母亲体弱多病，在重远三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姑母将重远抱去抚养，到八岁才送回家。杨重远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念过两次冬学，农忙时帮助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和简单的农活。他从小就知道发愤自学，经常在劳动之余主动到老师处请教，并练就了一笔好字。杨重远十三岁那年，父亲又病故了。他孤苦伶仃，被迫出外自谋生路，先后在绥德四十里铺、三皇岭、县城等地打短工、扛长工、当店员，苦度十多年。他不甘心忍受财主的虐待，曾经多次反抗，几度失业。生活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使他越来越憎恨黑暗的旧社会，渴望受苦人有个出头的日子。

一九二四年冬，杨重远在绥德县城一家商号当店员。这时，共产党员李子洲、王懋廷用省立第四师范的名义，在绥德创建了四师附设平民夜校，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杨重远积极参加了夜校的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尽量记笔记，白天在商号抽空自学，晚上回到家，借助字典，苦读《共产主义ABC》和《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经常通宵达旦。他在马列主义的启示下，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投入了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

绥德县城有个劣绅被称为“高大老爷”，其大管家仗势欺人，抢占民妇，无恶不作。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杨重远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在绥德师范团组织的支持下，率领平民夜校的一些学员，冲进高家大院，质问大管家为什么胡作非为？大管家气急败坏地威吓说：“姓杨的，你好大胆，高府是个衙门，你竟敢聚众闹事，不要命了！”<sup>①</sup>杨重远激昂地回答说：“我既怕就不来，既来就不怕。别说是你这条走狗，就是你家大老爷，我也想教训他一顿呢！”<sup>②</sup>学生们在重远的指挥下，狠狠地揍了大管家一顿，救出了被欺凌的民妇。这场斗争震动全县，大快人心。反动当局却以“通匪”嫌疑要缉拿杨重远。团组织和平民夜校的领导人闻讯，将重远安全地转移到农村，与绥师学生一起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冬，在李子洲和绥德团组织的帮助下，杨重远通过社会关系，打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不久扩编为旅）韩其盛连，先后任司务长和文书。杨重远在这里结识了共产党员、连长李象九、谢子长等人。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经李象九、

---

<sup>①②</sup>杨世让等人的回忆。

谢子长介绍，杨重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不久升任石部八连连长，先后驻防延川、清涧、宜川等地。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连队积极发展党团员。在他的领导下，这个连队除坚持每天上操训练，上政治课、文化课以外，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演新剧，民主管理伙食，实行官兵一致；提倡士兵自己缝衣服，做鞋袜；禁止抽鸦片和喝酒，一扫旧军队的恶习。杨重远很重视做驻军附近的群众工作。他同部队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联合当地进步士绅和师生，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放足和破除迷信，并且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手工业工会、学生联合会和妇女协进会等群众团体。

一九二七年夏，大革命失败，陕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杨重远受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石谦部从事兵运工作。

为了进一步扩充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杨重远曾携带筹措的六百多块银元，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家乡，托人买枪买马。一个亲戚劝他说：“你闹革命很危险，家里又很穷，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留下婆姨娃娃无依无靠怎么办？还不如把这笔钱留下一些买点土地和住房，以后万一你不在了，家里的人也能靠这点产业生活下去。你出去闹革命也就放心了。”<sup>②</sup>亲友的“好意”杨重远是理解的，他自己常年在外，妻子刘恩培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确实非常艰难。但他不能接受亲友的“劝告”，说：“我提着脑袋闹革命，不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家庭，而是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光景。我怎么能把为

---

<sup>①</sup>冯又新的回忆（1981年6月10日），另据田有莘回忆，杨重远1925年在绥德由常汉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sup>②</sup>杨世让、杨焕文等人的回忆（1982年8月16日）。

革命筹措的钱用在自己家里？这笔钱是分文不能留的，一定要全部用到革命上。”<sup>①</sup>杨重远这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至今为家乡老人们所传颂。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石谦部近千人在清涧城举行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次日清晨，起义部队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率领师南下，十五日到达宜川。杨重远领导的一个连和共产党员李瑞成、王振娃领导的两个连在宜川城内立即起义，接应清涧起义部队。在此之前，驻宜川之敌代旅长康子祥闻讯清涧起义部队南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杨重远、李瑞成、王振娃连发起攻击。杨重远、李瑞成、王振娃当即迎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康子祥率部弃城逃跑，两支起义部队遂在宜川胜利会师。附近很多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起义部队迅速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三千多枝枪，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革命武装力量。

起义胜利后，由于领导人不懂得同周围农民相结合的重要性，在行动方针上意见不统一，加之后来指挥失误，在强敌进攻下，起义部队被打散。这时，杨重远曾对同志们说：“起义虽然失败，但我们决不能泄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武装斗争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sup>②</sup>

一九二八年，中共陕北特委派杨重远利用社会关系去河北遵化，打入国民党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作兵运工作。他不畏艰辛，东渡黄河，经山西到天津，与中共顺直省委取得联系，被任命为高桂滋部地下党军委书记，公开身分先是该军刘捷三师

---

<sup>①</sup>杨世让、杨焕文等人的回忆(1982年8月16日)。

<sup>②</sup>吴岱峰、马云泽：《丹心化碧血，浩气壮千秋——杨重远烈士传略》（1982年），未刊稿。

的副官长，后为军部军需。他同该部的共产党员黄子文、朱侠父、陈一平、马汝骥、吴岱峰等人一起，在顺直省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杨重远十分注意对党员加强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和严守纪律的教育。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秘密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并在一些营连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他还利用同乡关系，做军长高桂滋及其部下的统战工作，介绍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高部工作，或入该军办的军事政治干校学习。后来，这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晋东平定县的起义，成为组建红二十四军的基干力量。

杨重远在驻守遵化地区期间，利用参观游览的名义，亲自到喜峰口、热河一带，察看长城线上的地形，准备筹划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战争爆发，高桂滋部被蒋介石南调山东作战。杨重远等军委成员在峰县、枣庄一带驻防期间，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〇年，高桂滋参加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战争，结果损兵折将，所剩不到四千人，于一九三〇年八月退到山西平定，被张学良收编为陆军第十一师。杨重远在山东作战中身负重伤。伤稍愈后，即化装突破蒋介石军队的层层封锁线，于是年初夏到了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适值乔国桢（北方局委员）要到陕北巡视工作，李杰夫要去陕西任省委军委书记，北方局便派杨重远以探亲为名，护送乔、李去陕。杨重远护送乔、李安全到陕后，还应邀参加了在绥德黑龙山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作兵运工作的经验。他还把自己的家作为出席会议的同志存放武器和文件的场所，受

到同志们的赞赏。

## (二)

一九三〇年秋，杨重远回到高桂滋部，继续担任军需，并很快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取得联系。根据山西省委指示，他对高部党组织进行整顿，加强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注意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党员。这年冬，山西省委利用军阀混战刚结束的有利时机，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红军晋西游击队。杨重远受命参与筹建工作，担任省委汾阳联络站主任兼临时党支部书记。他到汾阳后，坚决贯彻执行省委的决定，以开设骡马店作掩护，在离石、汾阳、柳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积极筹集、转运武器弹药；还设法同晋西各县地下党取得联系，积极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省委先后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以及农村，抽调了三十多名共产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这些同志都是由汾阳联络站护送转入到吕梁山区去的。临行前，杨重远都一一找他们谈话，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指明任务及应注意的事项。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大麦郊娄底村举行成立大会，杨重远任省委军委代表兼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拓克宽、黄子文分任大队长和政委，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大队下辖两个中队。这是党在山西地区创建的第一支工农武装。杨重远在成立大会上带领全体队员庄严的宣读了誓词：

吕梁山上红旗飘，



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师导，  
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  
革命到底不动摇。<sup>①</sup>

杨重远非常重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在党支部设立组织、宣传、军事委员和候补委员，支部之下设三个党小组，规定党小组每半月过一次组织生活，支部会一月一次，遇有重要问题由杨重远随时召集开会。游击队每到一地，杨重远都要求部队严格执行革命纪律，爱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农忙季节，游击队组织战士帮助群众送粪、翻地、整田；对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除帮助他们种田外，还经常帮助砍柴担水。部队驻孝义县宋庄时，杨重远派党员协助农村开办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并亲自去讲课，教唱《国际歌》，启发农民认识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和团结起来革命的道理。在游击队的帮助下，不少村庄建立了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儿童团，开展了抗粮、抗税、抗款和打土豪分财物的斗争。中阳县上桥镇土豪杜寿高，占有两架山的土地，雇工三十多人，残酷剥削农民，周围几十里的农民对他切齿痛恨。杨重远派党员帮助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斗争杜寿高，没收了杜家的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孝义县攘头村没收了大土豪武世恭家的银洋三万元，使方圆几百里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人民更加热爱共

---

<sup>①</sup>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0辑。

产党和游击队，主动为游击队带路、送信、抬担架、救护伤病员。年轻的小伙子争相报名参军参战。

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事斗争。杨重远和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一起先后指挥了中阳县留誉镇、孝义县褚家焉、石楼县水头镇和老鸦掌等战斗，歼敌数百人，游击队迅速扩大到百余人，威震晋西。八月上旬，新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派七十二师、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围剿”晋西游击队。由于村庄和交通要道被敌封锁，游击队被困在山里，同群众断绝了联系，只能以野菜充饥。这时，山西省委由于被叛徒出卖，遭到很大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与此同时，平定起义后创建的红二十四军，也离开了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游击队又失去兄弟部队的增援，因此处境极为艰险。为了解决队伍发展方向问题，杨重远和拓克宽于八月二十八日在高山顶上主持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打游击，以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并决定一部分山西籍干部战士要求回家乡的，发给路费，让他们回乡就地坚持斗争。游击队在杨重远、拓克宽、黄子文等的率领下，冲破重重封锁，终于在九月二日到达黄河边的中阳县三交镇，准备渡河。此时，全队只剩下三十人（除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指挥渡河，杨重远到山顶上察看地形。他俯瞰奔腾向前的黄河，感慨万端，和战友们热情洋溢地凑成一首《黄河颂》，其中有：啊，黄河，自古称天险，今日不过黄河非好汉；游击战士，播种晋西，转战陕、甘，三十健儿，驰骋祖国西北高原<sup>①</sup>。

过河的工具是羊皮筏子。一个筏子只能载几个人，还要会

---

<sup>①</sup>吴岱峰、马佩勋：《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9期。

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走。夜晚，天空没有星月，冷风刺骨，指战员情绪高昂，在水手的帮助下，一批一批地渡到了西岸。不料最后一批队员渡河时，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油篓沉入河底。杨重远心急如焚，当即派会水的吴岱峰、白锡林下水，从河中乱石堆里将油篓打捞上来。经过整整一夜的搏斗，游击队胜利地渡过了黄河。

过河后，游击队进行了整顿，由于杨重远的出色工作和领导才能，在全队大会上，当选为游击队政委，阎红彦当选为大队长。以杨重远为首的新的队委会派人积极寻找陕北特委，以便能尽快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游击队在到达安定县（今子长县）西区枣树坪时，找到了地下党员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通过谢德惠找到了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马文瑞对晋西游击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立即向陕北特委作了汇报。不久，陕北特委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战争。为扩充游击队的力量，陕北特委先后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游击队首先在安定地区开展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群众积极地送粮、送情报，并踊跃参军，使游击队很快扩大到六、七十人。随后杨重远、阎红彦带领队伍转战安塞、保安（今志丹县）、靖边等县，歼敌八十六师和民团百余人，缴枪近百枝，还第一次缴获了战马，成立了骑兵分队。他们将打土豪筹得的经费，除留一部分供游击队军需外，其余均上缴给陕北特委。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游击队打开了局面，威震陕北。为了扩大革命力量，杨重远、阎红彦重视做联合、团结和改造保运商货的武装（简称保运武装，又称土客）的工作。十月上

旬，游击队先后与保运武装首领肖永胜、杨琪、师储杰等人率领的百余人达成协议，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双方联合对敌：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二、不抢穷人东西；三、不强奸妇女；双方并约定成立执法队监督执行。同时由晋西游击队给肖、杨、师所部各队派去政治指导员。杨重远很重视作保运武装官兵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在每次战斗的前夕，政治思想工作更是做得深细。在杨重远、阎红彦等人的教育和帮助下，保运武装队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后来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杨重远还十分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十月六日营盘山一仗，游击队取得了全胜，俘虏敌万宝山营和横山县民团三四十人，缴枪五六十枝。杨重远亲自把俘虏集中起来，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指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表示欢迎他们参加游击队；对愿回家者每人发给两块银元作为路费，还把伤员送往安定县城帮助医治。不少俘虏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月中旬，杨重远、阎红彦率领的游击队与保运武装转战到安定县凉水湾时，接安定县委转来陕北特委关于避开敌人主力，必要时可转移到陕甘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为贯彻特委这一指示，游击队向陕甘边转移。途中，进行了野鸡岔、红柳沟战斗，歼敌数十人。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游击队胜利地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

### (三)

两支部队会合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民族

矛盾急剧上升。陕西省委充分估计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暂时无力对革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有利形势，要求各级党组织抓紧这一有利时机，组织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组织和发动农民游击战争。陕西省委对于会合起来的武装力量十分关注，授权谢子长到南梁进行整顿改编，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红军。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谢子长按照省委指示来到南梁。他首先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指示，要求南梁会合起来的部队经过整顿改编后，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使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与三水（今旬邑）、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杨重远积极协助谢子长开展工作。他发现部队中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比较薄弱；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匪；在思想作风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面对着这些情况，杨重远坚决支持谢子长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编。部队经过整顿后，于同年冬，转移到合水县柴桥子。这时，陕西省委根据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为参谋长。

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有关游击战争的文件，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使指战员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始纠正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和干部基础。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不久，就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在甘肃合水歼敌暂编十三师两个连。

二月十二日，根据陕西省委新的指示，抗日反帝同盟军在

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李是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后叛变），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杨重远是委员之一，各大队成立了党支部。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陕甘游击队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旬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区域，开展游击战争。

杨重远沉着果敢，是个好参谋长。他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无论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他都处理得很好。他平时话不多，开会时也不轻易发言，但一讲就能抓住重点，为大家所佩服。每次作战，杨重远总是亲自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协助总指挥制定作战方案，指挥战斗。

二月十九日晚，游击队南下旬邑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谢子长、杨重远率部先后歼灭了耀县照金镇、宜君地区瑶曲镇等地的民团，还两次袭击正宁县城山河镇。四月下旬，谢子长、杨重远又率部打下旬邑县城，处决了反动县长。这是陕甘游击队打下的第一座县城。

战后，执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对游击队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全盘否定，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谢子长、杨重远身上，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和杨重远等领导人，还撤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春末夏初，敌人又向陕甘游击队发动了新的“进剿”。五月十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游击队在清水原集结后，召开队委会议，确定了粉碎敌人

“进剿”的方针。在半个月內，杨重远协助刘志丹指挥游击队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大小九战，八次获胜，歼敌一千四百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枝，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游击队发动的“进剿”。

七月二十三日，陕西省委派李艮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到职后，主观武断，错误地给刘志丹、杨重远戴上“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等大帽子，并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排挤刘志丹、杨重远等领导人。李艮完全不听刘志丹、杨重远等人的正确意见，强令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计划，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处境十分困难。

陕西省委为了扭转局面，八月底又派谢子长回游击队任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本着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照金地区设伏，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四百余。照金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

一九三二年秋末，游击队两次攻打保安失利，被迫撤至甘肃合水县白沙川一带。敌人大军压境，游击队处境极端险恶，部分干部、战士情绪低落。杨重远和谢子长、刘志丹针对当时困难的局面，研究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按照队委会的决定，游击队分成三路，杨重远和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他们在照金以北老爷岭打了大土豪，除将部分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外，还为游击队筹得大批经费。十月下旬，杨重远、阎红彦率部返回南梁地区，接济留守在该地由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和伤病员，受到战友们的热烈欢迎。随后，谢子长、杨重远率部挥师北上，在安塞县真武洞打了大土豪等，获马二十余匹和大批烟土，扩大了八十多

名骑兵。谢子长和杨重远还将筹得的一批钱，派党员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送往陕北特委和河北省委。

#### （四）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杨重远、刘志丹、杨森分别率领各路游击队在台水县黑幕原、塔尔原地区胜利会合，准备南下到淳化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此时，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根据党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杨家店整编。十二月中旬，杜衡以中央和省委代表身分来到游击队。当时陕西省委极其错误地认定杨重远和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要杜衡将他们处决。杜衡到部队后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污蔑杨重远、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诽谤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sup>①</sup>，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阎红彦的领导职务，强令其离开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杜衡被迫同意将杨重远、刘志丹留在部队，但对他们根本不信任，不分配重要工作。

十二月二十四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军只有这一个团），杜衡兼军政委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燕清任参谋长，杨重远被降为团参谋处长，刘志丹被降

---

<sup>①</sup>杜衡：《陕西共党的沿革》（1933年10月），存陕西省公安厅。



为团政治处长。面对着这种错误的打击，杨重远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仍努力为党工作。他积极协助王世泰、郑燕清指挥作战。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一连打了几个胜仗，使红色区域扩大到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地区。随着斗争的胜利，红军的影响迅速扩大，青年农民纷纷参军，红二团很快发展到三百余人，并建立了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随后，部队由照金地区南下，在淳化通润镇、三原西北原等地游击，消灭北原铁王镇民团数十人，使根据地扩大到淳化北原畔。红二团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旬邑、照金、雨原、香山、宜君等五支游击队。

在根据地逐渐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杜衡被胜利冲昏头脑，冒险地提出“集中力量，一股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内一切豪绅地主武装”，主张攻打庙湾夏老么民团。杨重远和刘志丹、王世泰等认为庙湾地形险要，碉堡坚固，该地民团又与红军订有互不攻击的协定，因而反对杜衡攻打庙湾的错误主张。但杜衡以“政委有决定一切的权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强令红军攻打庙湾，结果失利，红军同夏老么的统战关系就此破裂。

庙湾战斗后，陕西军阀令骑兵团在当地民团的配合下，向照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杨重远和刘志丹、王世泰建议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杜衡一意孤行，不顾杨重远等人的反对，强令部队驻在根据地内进行所谓“正规训练”，结果红军又遭受很大损失。

三月下旬，杨重远协助王世泰、郑燕清率红二团在铜川北面打开金锁镇消灭民团三十余人，随后进入三原武字区，歼敌一个排。四月上旬，杨重远协助王世泰，南下渭北，消灭了淳化南村寨子民团后回到照金。四月中旬，又西出彬县，途中消

灭了旬邑土桥镇敌河工队三十余人。接着又在龙马、高村消灭彬县民团三十余人。至此，杨重远参与创建的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东西五十余里，南北八十余里，面积达五千平方里。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游击战争的开展，使敌人惊恐不安。陕西军阀于五月上旬急调特务团、骑兵团和八十六师的一个团以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宜君、铜川等六县民团，分四路“进剿”照金根据地。红二团根据省委的指示，由照金向西开进转移到外线，以打破敌人的“进剿”计划。

部队转移到旬邑县阳坡头时，遇到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刘志丹给一支队干部、战士讲了话，鼓励他们积极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并拨给一些枪枝弹药，派杨重远去一支队任政委。杨重远率一支队返回陕北途中，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安塞、安定交界之董家寺（安定属），与敌民团遭遇，敌败我胜，缴枪二十余枝。五月二十九日，在安定县谭家岭又遭敌军两个连袭击，杨重远机智果敢，指挥部队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杨重远在转移中腿部受伤，战友们背着他继续撤退到扬沟村。这时敌人又蜂涌追来，情况万分危急。在这生死关头，杨重远不愿拖累战友，命令同志们不要管他，立即撤退。他以断墙为依托，沉着地痛击来敌，掩护战友们安全撤走，然后对准自己的胸膛开了枪。他以身殉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时年三十九岁。

杨重远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安定县城门楼上“示众”，妄图借此吓倒革命群众。安定县的人民群众，热爱红军和共产党，都为杨重远的牺牲而悲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头颅取下来送往城外，交给红军，秘密安葬。为

了纪念杨重远，一九三四年底，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安定县的南区和延安、安塞、靖边三县各一部设立重远县。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西北红军战史》（1965年8月）。
2. 《杨重远同志》，载《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烈士纪念册》（1966年4月西北红军战史编写委员会编印）。
3. 吴岱峰，马云泽：《纪念杨重远烈士》，《革命英烈》1982年第2期。
4. 阎红彦等：《回忆刘志丹与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5. 马佩勋、李维均：《回忆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革命斗争》，《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6. 刘约三：《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立及南下的失败》，《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7. 贺晋年、吴岱峰：《纪念谢子长同志诞辰八十三周年》，1980年1月29日《陕西日报》。
8. 刘明山：《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与安定地区武装斗争情况回忆》，《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9. 田有莘：《杨重远烈士传略》（1981年）未刊稿。
10. 访问吴岱峰、习仲勋、刘澜涛、阎揆要、马文瑞、赵伯平、贺晋年、常黎夫、马云泽、高朗亭、马佩勋、李维均、郭洪涛、朱敏、刘景范、王超北、刘约三、尤祥斋、高锦纯、薛兰斌、呼震西、李瑞阳、刘明山、田有莘、李波涛等同志的记录。
11. 杨焕文、高朗亭、雷恩均、冯又新等同志给作者的信。

# 李 青 云

曾 庆 奎

李青云是宁都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他作战骁勇，因劳瘁过度，于一九三四年夏以身殉职。

## (一)

李青云，字梯青，号含英。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二日生于河北省成安县贾庄。父亲李逢昌，母亲武氏，都是农民。李青云兄妹四个，他是老大。全家六口人，自耕八十亩薄地，生活基本自给。

一九一〇年，李青云入私塾。启蒙先生是他的外祖父武棋相秀才。武先生经常讲述古人勤奋读书的故事，诱导他用功学习。

一九一六年，李青云考入成安县高级小学校。他性格文静，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各门功课成绩都好，特别是作文和毛笔字写得很好，还爱好文艺，喜欢吹箫<sup>①</sup>。一九一八年，成安县县长把深受师生尊崇的校长李鹤云撵走，换了一个不学无术、抽鸦片的人当校长。这件事，引起全校师生反对，学生纷

---

<sup>①</sup> 《成安调查集录》，藏江西省宁都县博物馆。

纷罢课回家。李青云参加了这次学潮。不久，他高小毕业，到东范疇教书。

一九二〇年，李青云的家乡发生旱灾，许多老百姓四出逃荒，学校无人上学。他教不成书了。这年秋，他到武汉考取湖北军阀肖耀南办的军官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

李青云在武汉军官学校学习和任教期间，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新生的希望和照耀自己前程的曙光。因此，他内心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主张。但是，不久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了大好的政治局面。大革命失败后，李青云对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深感愤懑；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又感到迷惘。一天，他换上当地老百姓的衣服，混出城外，回到了故乡贾庄。

李青云这次回到家乡，又遇荒年。他呆在家里，日子也很不好过，就和父亲一道去邯郸贩高粱米卖，每跑一趟可赚得一、二斗。一天，他买来两袋高粱米，转眼工夫被人偷去了一袋。这件事，使李青云很伤脑筋。但是，也使他感到，作为一个有军事教养的人，搞这个买卖不是办法，应该为改变当前民穷国困的局面而奋斗才是真正的出路。他决心再找个机会闯出去。

## (二)

一九二八年春，冯玉祥将军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之一部路过成安。李青云通过在该部任职的同学的关系，投入了冯玉祥部，编在冯治安的二十三军军部任上尉参谋。军部的书写文印任务，几乎全部由他承担。在工作中他结识了军部的

参谋长赵博生。赵博生对参谋工作既懂理论，又有实际经验，为人谦逊和蔼，李青云常请教于他。赵博生认为李青云诚实，有才学，办事认真、能吃苦，对他产生了好印象，久而久之，彼此成了挚友。

后来，二十三军整编为师，赵博生调第十四军当参谋长，所部驻在西安。不久，该军组建特种兵旅，赵博生兼任该旅旅长。经赵博生推荐，李青云亦调该旅旅部任少校参谋兼副官。军长陈毓耀为了在军中培养出一批下级军官，决定成立一个教导大队，附设在特种兵旅。赵博生请李青云来协助主持训练工作。李青云为了把教导大队训练好，事事起表率作用。野战训练时，他脱掉鞋袜，率部在长满蒺藜的山坡上练习爬山，说：“假事一定要当作真事来做，作战时才顶用。”<sup>①</sup>赵博生十分称赞他的训练作风和吃苦精神。李青云在训练中对官兵严格要求，而平常对同事、对部属却是非常和蔼体贴。教导大队工兵助教郭如岳染病在床，李青云不仅每天给他煎药、送饭，还将面省下来给郭如岳吃，自己和赵博生一道吃小米。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对其关怀备至。

李青云在教导大队，除了严格抓军事训练，还协助赵博生对部队灌输进步思想。那时，赵博生作了一首抒发自己满腔豪情壮志和革命理想的《革命精神之歌》<sup>②</sup>请人谱了曲子，亲自在教导大队教唱，以激励部属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爱国热情和献身

---

<sup>①</sup>孙毅的回忆，藏宁都县博物馆。

<sup>②</sup>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

精神。李青云则在教导大队带头学、带头唱，并热情宣讲歌词的深刻含意与高尚的革命精神，借以唤起队员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实现大同而努力奋斗。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冯军大败，其主力部队在河南郑州等地被蒋介石收编，残部由宋哲元掌握。这次，李青云所在的第十四军未去参战。十一月，杨虎城率部入陕西，直插西安，要第十四军投诚，接受改编。军长陈毓耀决定投降，听任改编。赵博生却不愿参与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把李青云、孙毅、郭如岳等找来另谋出路。当时，赵博生认为冯玉祥还有一个师在汉中，只要把那个师争取过来，独树一帜，仍可积聚力量，开创革命局面，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李青云深受赵博生思想影响，当即表示赞同赵博生的主张。赵博生的主张亦得到教导大队多数官兵的响应，旋即成立了一支有五百人的“三民主义救国军”，赵博生自任军长。救国军下设三个支队，李青云任步兵支队队长。在杨虎城入西安前夕的一个晚上，李青云率该支队为前锋，以演习为名，向陕南的汉中方向开去。

第一天，他们到达户县。在该县县长的帮助下得到五千银元款子和一批军需品。接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崂峪口过去十里的地方露营。崂峪口是去陕南的小路，山大沟深，行人稀少，小径淹没在草丛中。为防敌袭，李青云带着部下，对露营地的山沟、山顶、山坡及深谷都作了仔细侦察，部署了警戒。第三天上午，部队登上秦岭，下午到达东江口。东江口是从崂峪口越秦岭去陕南的要冲。可是，这一带地区，当时却是土匪武装的渊藪。李青云不顾行军疲劳，一直随着前锋，一面侦察，一面行进。为了安全，李青云提出了几条对付敌人袭击的

办法，征得赵博生同意，将这几条办法立即通知全体官兵：第一，睡觉时枪要抱在怀里；第二，警戒哨要隐蔽在我能发现敌人而却不被敌人发现的地方；第三，察明地形，预先按大、中、小队、班划分好阵地，发现敌情迅速占领；第四，按实际情况，每个队应指定一至三处集合点，解散时，要逐个分开，由几条小路返回；第五，每天黄昏时迁移一次驻地，如敌情紧张，半夜或拂晓再迁移一次驻地；第六，行动要迅速，不得发生声响和火光<sup>①</sup>。当部队到达东江口时，果被窜犯土匪武装所阻，队伍停下来，白天隐蔽在村庄，夜晚露营在野外。由于李青云和设在那里的公安哨所沟通了联系，能从他们那里及时得到情报<sup>②</sup>，所以，部队在此滞留多日，虽然给养困难，亦未被土匪武装吃掉。这时，杨虎城的一位参谋长，原系赵博生的同学，得知此情况，便多次派人持函前来，慰劝他们回西安听候改编。出于无奈，赵博生率领救国军回到西安，所部被分散编入马青苑的五十八师。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未归顺杨部，约定以分散的形式各奔前程，待后视情况聚而再举。李青云抱着抓住军队相机进行革命的思想，决定同郭如岳一起，暂栖该师，在陈养虚一七三旅旅部任参谋。赵博生则离开西安，后应孙连仲之邀，前往济宁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任总指挥部参谋长。不久，李青云、郭如岳也以请事假为名，离开了西安。经赵博生介绍，来到了二十六路军，安排在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部。李青云任少校参谋，郭如岳任上尉参谋。

---

①郭如岳：《怀念战友李青云烈士》，藏宁都县博物馆。

②据郭如岳回忆，那个公安哨所与土匪武装已彼此默契，互不干扰。



### (三)

七十三旅旅长名叫董振堂，与赵博生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在西北军中，素以正直军人著称。由于赵博生介绍，董振堂了解李青云的品德和才干，所以，李青云到职后，很快受到董振堂的赏识和重用。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入江西，参加对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大“围剿”。

二十六路军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前沿后，李青云所在的师旅，奉命先在宜黄“驻剿”，继而“进剿”根据地的腹部宁都。五月，该军高树勋二十七师，从乐安向根据地的腹部“进剿”时，在永丰县的中村，被红军消灭了一旅及师部大部。二十五师于行进中闻讯后，未敢继进，旋即缩回宜黄。在宜黄度过了凄苦的梅雨季节。官兵们由于不服水土，生疥疮、烂孢子的特别多，加上常常受到地方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用“坚壁清野”和“十敌”战术<sup>①</sup>的打击，许多官兵情绪苦恼，思想波动，希望返回北方去。

这时，李青云却在思索寻找共产党。本来，李青云对共产党尚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现在，他思索这个问题，一方面，由于赵博生以前给他介绍国民军联军的历史时，讲到了刘伯坚、宣侠父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的事迹，使他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产生了钦慕之情；另一方面，他随部队进至中央革命根据

---

<sup>①</sup>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总参谋部1931年3月7日下达通令，指示地方革命武装用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毒敌的办法配合红军作战。

地的前沿，看到了红军的许多宣传品及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红军的情景，听到由红军释放回来的被俘官兵谈红军优待俘虏、官兵平等以及根据地的农民都分到了土地等真切的情况。于是，更加认定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党，要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只有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他把自己的想法毫不隐瞒地对赵博生说了。赵博生赞同李青云的想法，并说：前年在陕西，我曾派张志诚去找共产党联系，没有找到。这次你能不能到上海去找原国民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找到了他，我们就找到共产党了。李青云欣然同意，以请事假为名去上海，但是没有找到。

李青云从上海回来后，结识了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刘振亚常主动跟李青云接近，除谈论入赣以来二十六路军的状况，也涉及评论时政。从谈话中，李青云发觉刘振亚不仅具有坚毅、稳重的性格，而且思想也比较敏锐；同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彼此的观点颇相同。一天，李青云提议找共产党去。刘振亚答应了他的要求。其实，刘振亚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书记。就在这年七月，刘振亚介绍李青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青云入党后，积极、慎重地为党工作。他先后发展了王际坦、郭如岳入党。李青云在宜黄曾与王际坦多次联系，商量党的工作。他指示王尽快在学兵连开展秘密建党工作，积极发展党员，但初期不形成组织，只搞单线联系，等将来再成立士兵支部，一般不做宣传，着重结人缘，交朋友。李青云很强调学兵连工作的重要性，因学兵毕业后都将是下级军官，他自己也打算活动一个能接近学兵连的职务<sup>①</sup>。

---

<sup>①</sup>王幼平：《忆起义前后二十六路军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见《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七月下旬，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二十六路军被推入宁都县城。九月中旬，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不得已命令各路军后撤，唯独不许二十六路军离开宁都。

当时，宁都城周围一二十里之外都属红色区域，二十六路军驻地时常受到我地方武装的袭扰和截击，处境十分窘迫。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视为“杂牌军”，待遇很苛刻，经常不能及时发饷。士兵不服南方水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打摆子（疟疾）、拉痢疾，每天都有人死亡。加上有的官长虐待士兵，动辄打骂体罚，视士兵的生命为草芥。在此情况之下，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普遍存在着怨恨情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运动高涨。二十六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为了拯救民族与家乡的父母妻儿，联名敦促总指挥孙连仲拍电报给蒋介石，请准许回北方抗击日寇，而且不等复电，即向北开拔。当时，李青云所在的七十三旅一马当先，走在部队的前面。可是，刚刚走到离宁都城六十里的湖岭嘴时，即被蒋之嫡系朱绍良部挡住。蒋介石也拍来了电报，命令部队立即返回原防，说：“死也得死在宁都”。部队返回宁都后，一些高中级军官完全看清了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驱入江西是出于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孙连仲摆下部队，借口牙痛离开江西治牙去了，将日常军务交由赵博生主持。尔后，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及有的旅、团长也借故离开了宁都。留下的官兵则每日在忧虑与惶恐之中。其中也有些人在觅寻新的出路。二十六路军此时的处境，给该军地下党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李青云相机积极活动，实现了他“活动上一个能接近学兵连的职务”的计划，开初兼任学兵连教官，继而接任学兵连连

长。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艰苦朴素，以身作则，深受学兵拥戴。经过他与其他地下党员的深入工作，又有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现名谭志刚）、刘静生、霍万钟等人被接受入党，并成立了二十六路军中唯一的一个士兵支部，李青云任支部书记<sup>①</sup>。那时，李青云曾受组织的派遣，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回来时，他带了些政治理论书籍，如普列汉诺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在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处和学兵连内秘密传阅。凡秘密传阅的人，都约定写文章，由专人装订成册，彼此传看。李青云写了《不劳动者不得食》，揭露阶级社会的陈腐和罪恶，表示要做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士<sup>②</sup>。他还在学兵连里组织学术研究会，吸引学兵中的积极分子、副班长参加活动<sup>③</sup>。到今年十一月，二十六路军中的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特支之下，有一个士兵党员支部和一个官长党员支部。党员分布在机要部门或基层单位，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或者同情分子，基本上控制了全军。

#### （四）

正当争取二十六路军举兵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十一月底，特派员王超奉调回上海党

---

①王幼平：《忆宁都起义前后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

②郭如岳：《宁都起义的回忆》，藏宁都县博物馆。

③曹光裕：《宁都起义中的学兵连》，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1年9月刊印。

中央，途经南昌时，因党的接头关系被破坏，王超被捕，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领导人名单和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落到了敌人手里。十二月五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来急电：“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特支截获此电后，马上与赵博生研究决定，决心将此事转化成为全军举行起义的导火线，并立即分头进行起义的准备。李青云与刘振亚、王铭伍负责下级军官、士兵及党员中的鼓动与组织工作；袁汉澄、郭如岳去瑞金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请示；赵博生负责妥善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和做联合董振堂、争取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等人的工作。

李青云找到王际坦按照特支的规定和要求，商定了一个计划：每个党员至少要团结和带动三个学兵，并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说明二十六路军当前的处境，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及蒋介石卖国贼的罪行；宣传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作战勇敢等等，争取广大士兵对起义的支持与同情。

赵博生一方面向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借以敷衍敌人，争取时间；一面和董振堂、季振同商议，征得了他们的支持和同意。这时，去苏区联络红军的袁汉澄也回来了，带来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起义的指示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交给的部队起义后开进苏区的路线图和驻地地图。至此，起义的一切工作已准备就绪。

十二日下午，李青云以外出测绘为名，把王际坦带到宁都城东南郊的志溪坝，研究两天来学兵连的情况，并按预先画好的奔向苏区的路线图察看了地形。十三日晨，他按特支的布置，集合全连学兵，宣布连续举行几天野外演习。并命令全连官兵，立即全副武装，兵不离棚，枪不离手，晚上也不准解包

袱毯子，一律抱着枪睡觉，随时准备紧急集合。

起义时间原定十二月十三日晚十二时，后因故经中革军委同意推迟一天。起义前，特支又召开了行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就举行起义的事宜作了认真研究和周密部署。李青云带学兵连的一部分负责城北与东门之间的巡逻，做董振堂的机动兵力。

十四日，临近黄昏时，李青云召集全连积极分子会议，告诉大家就要行动了，要特别加强警戒。黄昏时，李青云按行动会议的部署，下令学兵连进入预定的警戒位置。八时许，起义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整个行动，均按计划基本顺利进行。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名官兵终于起义，宣布参加红军。

天大亮后，起义部队在赵博生与董振堂等带领下开向苏区。李青云率学兵连随七十三旅其余各部为先导。下午，起义部队到达宁都城东南六十里的固厚圩，受到中革军委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热烈欢迎。

十六日早晨，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起义官兵宣读了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接着，部队开向石城、瑞金境内进行整编。

整编时，李青云所在的七十三旅编为第十三军，驻在石城县的龙冈。李青云在龙冈主持召开了士兵支部大会，并在会上简略地介绍了宁都起义的经过。会议还讨论通过了董振堂入党，并宣布原二十六路军中共士兵支部解散。此后，原学兵连党员全部留下分配工作。李青云被分配在第十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九团任团长<sup>①</sup>。

---

<sup>①</sup>王幼平：《给李克敏同志的复信》（1967年5月1日），藏河北省成安县档案馆。

## （五）

第十五军是以起义前的二十五师七十四旅为基础组建的。七十四旅从国民军联军到二十六路军一直是装备精良、实力雄厚，起义后，思想、作风方面问题比较多。红军总政治部对其采取的策略是“鼓励”，鼓励他们向第十三军、十四军看齐。李青云处处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头学习政治，积极帮助上级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全团的整编与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深入连队检查干部转变作风、战士遵守纪律的情况，鼓励他们向红军兄弟部队学习，学习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使自己在思想上，作风上迅速转变成为真正的红军战士。他积极做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先后介绍了曹光裕等入团，后来，介绍了姬鹏飞等加入中国共产党<sup>①</sup>。

经过两个来月的整编与政治教育，红五军团即奉命开赴前线，和一、三军团并肩作战。当时，李青云所在的第十五军，划归红一军团的建制。第一次出征是参加打赣州的战斗。开初，第十五军驻在三江口至五里亭一线，沿江面监视北路敌军之渡河。因赣州城三面环水，城池坚固，且城内敌人已有相当准备，攻城部队自二月上旬以来，几经炸城未克。担任攻城任务的红三军团受到城内守敌和城外援敌的夹击。第十五军奉命进入阵地，协同攻城部队作战。他们用大刀数次与援敌拚搏，给敌人以重创，有力地援助攻城部队转变被动战局。

撤离赣州后，三月中旬，白五军团、一军团组成东路军，

---

<sup>①</sup>李克敏给宁都县博物馆的信（1979年11月1日）。

东征福建。四月十日，第十五军作前锋，在红四军协同下，神速攻占了龙岩。尔后，部队向漳州疾进，于二十日打下漳州。红军进占漳州后，街市秩序井然。为了教育部队，李青云于二十二日率所部排长以上的干部进市内参观，学习我军的城市政策和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作风，使部队受到深刻的教育。接着，李青云率部前往南靖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地主豪绅筹款，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和做扩大红军工作。

漳州一带，侨眷很多。他们都比较有钱，穿的也比较阔气。十五军的战士没有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加上闽南话不易听懂，开初在工作中出了些岔子，误认为那些穿西装革履、着毛料细软、戴眼镜、拄文明棍的人都是土豪劣绅，见了就捉起来罚款。当上级发现指出后，他们立即纠正，把误捉的都释放了，并向其道歉。尔后，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请来一些既会讲闽南客家话又懂北方话的年轻人做翻译，组织小分队，以走家串户，搭台讲演，刷写标语，张贴安民布告等方式开展宣传。通过广泛宣传和规模遵守纪律的行动影响，红军的主张、政策终于较快被群众了解和接受。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筹到了几万元款子，建立了党和革命群众团体的秘密组织以及数百人的秘密武装（当时，东路军开辟闽南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还有一二百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这时，李青云被提升任该军四十四师师长<sup>①</sup>。

---

<sup>①</sup>据当时在44师32团基层任职的徐国珍回忆，打漳州时李青云任44师师长。而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打漳州时任44师师长的是王洪章。徐国珍回忆，王洪章任44师师长，是李青云调离44师之后。尚待进一步查证。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东路军开赴赣南，与入侵赣南苏区的粤敌作战。七月上旬，红一、五军团在南雄与敌展开激战，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都打得非常勇猛，将敌军全部击溃。在这次战斗中，李青云调任四十三师师长。由于他在战斗中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受到了军团部的表扬。战斗结束后，中革军委提升他为第十五军军长<sup>①</sup>。

水口战斗后，李青云率第十五军大部于七月中旬在信丰西南一带，作了为期十天的休整、训练与鼓动作战的工作，另以一小部分部队及工作人员去收缴地主武装、筹集资财和发动群众参加红军。他为了加强对敌情的侦察工作，提高部队的制敌能力，在十五军军部组建了一个侦察排。

七月下旬，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于八月间，连克乐安、宜黄、南丰等县城。尔后，又克建宁。这年冬，红五军团和一、三军团相互配合，在闽北及资溪、黎川一带迭挫敌军，发展了闽赣革命形势，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联接起来。为了纪念宁都起义，褒扬红五军团对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的巨大贡献，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中革军委通令各地纪念宁都暴动一周年。是月十一、十二日，李青云率部在黎川县城参加纪念活动。他和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人一样，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的通令表彰和奖励<sup>②</sup>。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蒋介石加紧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行第四次“围剿”，派其主力第九十、二十七、十四师共约十

---

<sup>①</sup>袁血卒：《怀念李青云同志》，藏宁都县博物馆。

<sup>②</sup>中革军委：《关于纪念宁都暴动的通令》（1932年12月4日），载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

四个团，向金溪、南城一带进犯。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分左右两翼攻击敌军。左翼由红五军团担任，在黄狮渡消灭敌之右路军周志柔师；右翼由一、三军团担任，在枫山埠一带消灭敌之左路第九十、二十七师。李青云率十五军在黄狮渡以西的长源庙阵地，吸引与钳制三倍于己的敌军。长源庙是个只利于守，不利于攻的小山地。因为第十五军所负之责任重大，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亲临阵地与李青云共同指挥作战。战前，李青云和赵博生一道精心勘察地形，认真指导构筑工事，缜密布置兵力。战斗一开始，敌人即以密集的炮火向我方阵地轰击；接着，便一次再次地向我方展开集团冲锋，来势十分疯狂。李青云等坚定、沉着、果断地指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扼守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使一、三军团在枫山埠一带大败敌第九十、二十七师。据是年一月十四日《红色中华》报载：我军于长源庙战斗中，“击伤敌旅长一名”，“缴获步枪两千余枝，俘虏相等，军用辎重夺获无算，敌军受创极重，伤亡过半”。

一九三二年二月，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黄陂战斗中，李青云所部划归右翼队出击。他率部于战斗打响的二十七日晨至晌午，急行军六七十里，赶到黄陂西北高地之均坪，迎歼了敌五十九师一个团。

二十八日晚上，右翼队总指挥部传下总部敌情通报，说敌十一师已从宜黄出发，分进增援，估计三月一日八时以后可到霍源。李青云接到此情报后，一方面指挥独立第五师向河口方向严密警戒，一方面让第十五军集结于黄陂抓紧时间充分休息，准备打增援之敌。次日晨，他奉命将十五军部署在霍源东北各高地，与红二十二军及第十三军之三十九师等部一起迎击

敌军。八时三十分，敌第十一师的先头部队与我正面的二十二军接触。下午三时左右，敌向二十二军阵地猛攻。此时，李青云果断地指挥第十五军以猛烈的火力，从侧面射击敌军，阻敌前进，为后来歼灭该师与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七月间，红一方面军奉命实行分兵作战。以三军团为基干组织东方军，东出闽中作战；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在江西。李青云所部活动在赣中、赣东一带，后来转入闽北，与东方军并肩战斗。

九月，蒋介石调遣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战，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十月上旬，红军在洵口与敌军遭遇，歼灭敌人一个师。这次战斗中，李青云率部奉命从左翼截断敌之去路，并侧击白黎川援洵口之敌军。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不看此战之胜利所必然引起有利于我的变化，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贸然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硝石，结果不胜，第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由于他们一直大反所谓“游击主义”，把红军过去的一套正确的作战原则取消了，推行他们的一套所谓“新原则”，结果，仗越打越被动，根据地越打越小，不仅未能制敌，反而被敌所制。那种鲁莽灭裂，天天穷于应付的打法，使李青云身体被拖垮了。本来，他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八，体格粗壮的大个子，可是，后来他却成了瘦骨嶙峋的人。一九三四年夏，终于因力不能支，病故在永丰县的藤田地区<sup>①</sup>，终年三十一岁。

---

<sup>①</sup>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办公室复李克敏信（1983年3月4日）。

**作者附记：**

本文除注脚外，还参考了袁血卒的《宁都暴动纪实》、苏进的《忆宁都起义前后》、聂荣臻的《攻克漳州》及孙毅、郭如岳、刘向三、徐国珍、蒋耀德、王福堂等的有关回忆录、中共南靖县委编的《南靖人民革命斗争史》以及中共宁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办公室、宁都县博物馆收藏的有关历史资料。初稿经孙毅、袁血卒、郭如岳同志审改。

# 陈海松

刘国东

## (一)

陈海松，湖北省大悟县李陈洼人，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农历正月十九）生。父亲陈正普和叔父陈正福没有分家，一起和睦劳动，虽然只有一亩半山坡地，在正常年景，生活倒也过得去。海松的母亲死得早，靠婶母抚养大。婶母很贤惠，把侄子当儿子一样疼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儿时的陈海松，就成了穷家小户的娇子。

李陈洼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周围到处是参天大树。陈海松上树象猴子一样敏捷，能在树上作多种惊险活动。他是全村的孩子们头，孩子们干出的许多淘气事，多是由他领头搞的。他不爱读书，好动贪玩，虽然上了五、六年私塾，也只能粗通文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黄（安）麻（城）起义的枪声唤醒了大别山区的农民。一九二九年，李陈洼一带已成为红军的游击根据地。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向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当时已停学随父叔劳动糊口的陈海松，被革命的新鲜事吸引住了，一反昔日的淘气，见

到大人们窃窃议论，便凑拢去听，听了不满足，还要问这问那。

一九三〇年春，陈海松担任童子团大队长。他带童子团执行任务，一有机会，就向区乡苏维埃干部询问他还弄不明白的问题。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陈海松看到青年人纷纷参加红军，心里痒痒的，对红缨枪感到不过瘾，就和几个大点的伙伴商量，要一起报名参加红军扛钢枪。七月，他瞒着家里人，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

陈海松到部队不久，即加入青年团，一九三一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部队在鄂豫皖期间，他先后任勤务员、通讯员、营宣传队长。一九三二年秋，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向陕南川北转移的路上，陈海松任三十六团特务连指导员。一九三三年初，部队入川打下巴中后，他调任机枪连指导员。

机枪连连长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射手，机枪打得特别好。但他态度傲慢，几任指导员都跟他合不来。陈海松接任后，跟他相处得很好，并向他学会了打机枪。从此，陈海松对机枪有特别的爱好，后来他指挥作战，总要叫一挺机枪跟着，到了关键时刻，就亲自掌握射击。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刚刚立足，张国焘就在红军中大搞“肃反”。

“肃反”开始时，陈海松升任三营政委。不久，三十六团政委被抓，他又升任团政委。几天以后，团政治处主任被抓，在严刑逼供下，咬陈海松是“改组派”，陈海松随即遭逮捕。

陈海松被抓后，团长余天云跑去找师长何畏，说：“陈海松参军时还是个小鬼，跟着我长大，一直表现很好。在入川路上，那么艰苦，他把特务连的娃娃兵带得好好的，是什么‘改组派’？肯定是有人在背地攻击他！”<sup>①</sup>何畏不理。余天云又找总指挥徐向前。在徐向前的干预下<sup>②</sup>，陈海松被释放了，但师政治部拒绝恢复他的党籍，被派回三十六团，当余天云的警卫员。

不久，四川军阀田頌尧纠集近六万之众，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军发动进攻。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进行反三路围攻作战。

在田頌尧发动第二次大进攻的前夕，陈海松被调到三营任副营长，奉命率两个连扼守杀牛坪。他利用杀牛坪的地形特点，以小部兵力凭借工事扼守要点，大部兵力相机出击的打法，抗击田敌第二、第三师五个团的轮番攻击，激战三昼夜，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阵地屹立未动<sup>③</sup>。尔后在鹰龙山等地，又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阻击战。至此，才恢复了他的党籍，复任三十六团政委。

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于六月底决定部队扩编。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部成立教导队，调陈海松任教导队政委。完成培训干部的任务后，陈海松又调任七十三团政委，旋即升任二十五师政委。

二十五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老底子原是原

---

<sup>①②</sup>访问詹才芳、程世才、丁先国记录。

<sup>③</sup>《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访问丁先国、郑重记录。

十二师，从鄂豫皖来的老战士多，是红四方面军的三个主力师之一；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兼任师长。

一九三三年七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合四川各路军阀，准备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红四方面军趁敌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之机，集中优势兵力，举行了从（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陈海松和许世友率领二十五师参加了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都出色地完成了总指挥部交给的作战任务。

在宣达战役中，陈海松被敌人的炮弹击伤右大腿。他自己不下火线，却命令担架队把别的伤员及时抬下去。他坚持指挥，直到拿下宣汉城，才住进医院。可是他的右腿已经肿得老粗，把裤脚绷得紧紧的。医生剪开裤脚，发现弹片深深嵌进大腿，惊叹他怎么能在阵地上坚持两昼夜。取弹片时，没有麻醉药用，疼得他汗珠直流，但他不哼一声。

十月四日，刘湘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分为东西两线，进行反围攻作战。

在第一、二次收紧阵地期间，陈海松协同许世友指挥部队，打得英勇而又灵活，歼灭了大量敌人。在马鞍山反击战中，以迅猛动作攻克敌第三师师部驻地胡家场，歼其第七旅大部，并活捉第九旅旅长张邦本。当红军第三次收紧阵地至万源一线时，刘湘先后集中一百四十余团的兵力，妄图夺取南江、通江、万源，把红四方面军赶出四川。万源地处川陕边陲，是红军在东线的最后防线。因此，保卫万源就成了反六路围攻胜败的关键。总指挥部把万源保卫战的重要阵地大面山交给了二



十五师和八十八师，抗击刘湘的主力。

大面山在万源城的东南，海拔一千多公尺，象一把扇子，是万源城的主要屏障。翻过它，即可直下万源城。红军利用有利地形，与数倍乃至数十倍之敌，展开了极为激烈战斗。

为了保证战斗胜利，陈海松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他适时提出工作的重点和宣传鼓动口号，使部队的士气不断提高；他很关心伤员的后送工作，千方百计使他们得到及时治疗，消除战士英勇作战的后顾之忧；他组织宣传队向敌军喊话，瓦解敌军的士气；他和师长一起组织战场练兵，鼓励老战士带好新战士；他特别要求各级政治干部，要带头英勇杀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战士。他自己更是干部的表率，哪里战斗最激烈，他便赶到哪里，从这个工事跳到那个工事，跟战士一起提枪射击。战士们担心政委的安全，常用最坚决的保证阻拦他上前沿。

在军事指挥上，他重视斗智，与师长一起研究出许多灵活机动的打法。如发动指战员献计，因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搞了铁蒺藜、竹签桩、陷井、木城、竹城等防御设施，常规工事也越修越精；有意放敌人到阵地前沿，用近战消灭敌人；故意示敌弱点，诱敌偷袭，用伏兵消灭敌人；隐蔽精干，用小部队疲惫敌人，待敌人大烟瘾发作，十分倦怠时，突然向敌发起反冲锋，等等<sup>①</sup>。

刘湘仗恃他的兵多，见常规进攻无进展，就先后发动了六次成团成旅的集团轮番冲锋，进攻最凶猛的一个上午竟达八次

---

<sup>①</sup>许世友：《万源保卫战》，访问罗应怀、李明（李太国）、李明、陶怀德等记录。

之多，妄想一举拿下大面山，但每次都被红军压了下去。二十五师在坚守大面山的四个半月里，使敌人不断付出惨重代价，终不能越我阵地一步，为最后粉碎六路围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在会上表彰了功绩突出的部队。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分别荣获“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锦旗。

## （二）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不久，九军政委曾传六调总部工作，陈海松升任九军政委。

这时的部队正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整训。每当部队休息的时候，陈海松总爱下到连队活动，和战士谈工作、学习、思想、说笑话、做游戏。尤其爱找大个子比甩手榴弹和摔跤，而每次比赛，他常是优胜者，博得一阵阵喝彩。他矮胖、圆脸、大眼，在部队中常是笑容可掬，十分平易近人。有人喊他“小政委”，有人喊他“小胖政委”，他都一喊一应。在这样的時候，他完全是战士中的普通一员<sup>①</sup>。

他这样深入部队，很快就摸到了部队的思想脉搏。他掌握的情况，往往比政治机关汇报的要准确、具体。

整训后的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另一个团，将近

---

<sup>①</sup>访问李明（李太国）、张朝富、李新国、单向诚、陈宜贵等记录。

两万人。军长何畏在万源保卫战初期被敌机炸伤下肢，行动不便，指挥部队作战的担子就落到陈海松和副军长许世友的肩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接中央电示，要其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北上。根据这一指示，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陕南战役。

战役初期，陈海松率二十五师在转斗铺地区担负掩护主攻部队的左翼侧后安全的任务。当正面进攻部队在新铺湾遇到陕军的顽抗时，他不怕三面临敌的危险，毅然率领部队从侧翼疾插到陕军背后的沔县，断了陕军的退路。陕军随之溃乱。陈海松部即会同兄弟部队将陕军第四十九旅和独立旅一个团大部歼灭，连克新铺湾和沔县。二十五师乘胜进逼褒城，与敌鏖战八天，因陕南战役的目的已达到，遂撤褒城之围。

二月十七日，陈海松在南郑城西的长寨接见了陕军中的我地下党员武志平，听取了关于陕军情况的报告。他感到事关重大，即派人护送武志平去沔县见副总指挥王树声<sup>①</sup>。

红四方面军完成陕南战役后，为继续贯彻原定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方针，同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强渡嘉陵江前，陈海松到总部请求派二十五师担任主攻。总部领导告诉他，二十五师分不到渡江器材，要他们自己想办法，保证按时渡江。

沿江船只都被敌人抢到西岸。陈海松一面要求侦察人员悉

---

<sup>①</sup>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317页。

心侦察敌情、江情，一面和指战员想办法。一个四川籍战士提出用农民打稻谷的绊桶渡江。陈海松亲自参加试验。江水湍急，单桶不行，两个桶绑在一起也不行。他提出在两个绊桶之间加一根长杠子，终于成功。三月二十八日夜渡江战役开始，二十五师在阆中以北用绊桶偷渡成功。三十一日攻克阆中<sup>①</sup>。

四月二日，陈海松指挥二十五师和四军的一个师攻占南部，歼灭李炜如部三个团<sup>②</sup>。

四月四日，陈海松率二十五师从南部西出，又用绊桶渡过涪江，与二十七师会合，会同兄弟部队包围江油。这一攻势使敌人大为震动，邓锡侯亲率十八个团的兵力增援江油。陈海松率二十五师参加打敌援兵。当红军八十八师攻占敌塔子山主阵地时，陈海松乘机抛开当面之敌，挥师迅速向敌右侧包抄。敌军顿时动摇。红军全线反击，俘敌三千余人，邓锡侯几乎被生擒。

陈海松指挥作战，对敌情侦察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对敌情分析细致周到，敌军可能的变化，我军相应的部署，都力求做到成竹在胸。对重要阵地，他总是亲自带师团干部察看地形，配备火力。在战术上，他一般对敌正面用兵少，善于大胆迂回、穿插、突袭，出敌不意，攻敌要害，以奇兵制胜。在指挥作风上，他有三大特点：一是对敌情判断准确，行动果断坚决；二是战斗一打响，就上前线指挥所，面对面指挥；三是对下级指挥员要求严格，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但极少下死

---

<sup>①</sup>访问董贤应记录，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328页。

<sup>②</sup>访问徐国夫记录，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329页。

命令，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帮助他们研究出制胜办法，以坚定他们完成任务的信心<sup>①</sup>。

作为军政委，陈海松每临大的战斗，战前总要召集干部作政治动员，把敌情、我情、任务和策略都告诉干部，然后提出行动口号。他的动员，针对性强，富于鼓动性，干部听了都信心十足。每战过后，他总要亲自慰问伤员，检查伤员的治疗和安置情况，督促经理处，把缴获的生活物资优先供给伤员<sup>②</sup>。

陈海松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待下级，加上他的政治工作艺术和军事指挥才能，在他的身上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愿意亲近他、信赖他，有话向他谈，乐意跟他在一起作战。只要他在阵地上，部队的情绪就特别高，信心特别足<sup>③</sup>。

### (三)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首先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军部夜里得到会师消息，陈海松立即召集政治部的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开展会师后的政治宣传工作和迎接一方面军的问题。次日清晨，他不等部队集合完毕，就兴冲冲地走到队前，挥动双手，宣布会师的喜讯。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从今以后，我们和党中央在一起了！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革命胜利就会来得更快。红军

①访问徐国夫、丁先国、李明、李明（李太国）、郑重等记录。

②访问徐国夫、丁先国、单向诚、董贤应等记录。

③访问徐国夫、罗应怀、李明（李太国）、李新国、李明等记录。

有总司令部，我们要听总司令部指挥，跟一方面军老大哥紧密团结，并肩作战<sup>①</sup>。

会师后，九军与五军团的驻地相连。陈海松看到五军团由于长期转战，补给困难，衣服穿得破而杂，甚至有些战士没有帽子、鞋子，就动员部队，有什么好东西要舍得拿出来。全军很快就凑集了几百套灰布军衣和一批草鞋、毛巾、帽子、针线包，还有酥油和炒面，送给了五军团。五军团也回赠了一批枪支弹药。两军一起联欢，加强了团结。

在两河口，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一批高级干部，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总司令部。张的秘书长黄超要陈海松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带头发言。陈海松推脱说：“一方面军来的干部都是大知识分子，我这个土包子不行。你找文化水平高的人吧，我实在不行！”<sup>②</sup>

黄超说：“这是张主席的意思！……你怕讲不好，我帮你准备！”<sup>③</sup>

莫说违背张国焘的意旨，就是跟他有些不同意见，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陈海松不敢再推了。

黄超要陈海松讲的内容：一是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二是要拥戴张国焘当军委主席的“军情军心”。陈海松觉得太过分了，在会上没有讲骂中央领导人的话。黄超紧挨他坐着，极为不满，借故用倒拐包撞他。陈海松无法，只好硬着头皮照黄超的话讲下去。会后还是受到了黄超的责备。

陈海松的发言，给与会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一直志

---

<sup>①</sup>访问李明（李太国）、陈宜贵记录。

<sup>②③</sup>访问李聚奎记录。

忑不安。直到一年多后，他还对原一方面军的同志说：“那次反中央的会，是一场皮影戏。我是皮影子，黄超就是提我这个皮影子的人。真是干了天大的蠢事，一想起来就脸红！”<sup>①</sup>他明白地说：“党中央毛主席是正确的，张国焘是错误的，他有野心。”<sup>②</sup>

两河口会议后，九军和五军团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争吵、互骂的现象接连发生。九军收容队把五军团二十多名掉队人员抓起来，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来交涉，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竟要连他一起作反革命处理。陈海松对破坏两军团结的行为很痛心，他对一些干部说：一方面军跑了那么远的路，打了那么多恶仗，吃了不少苦，能来跟我们会合，就很不简单了。我们脱离鄂豫皖，一路跑，一路打，翻秦岭，没有吃的，只好杀马吃，不也是搞得象个叫化子军吗？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点，就欺负人家。都是红军，应该讲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共产党跟共产党分家，红军跟红军分家，象个什么话呀<sup>③</sup>！

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后，擅率四方面军等部及总司令部辗转道孚。总部警卫科科长李太国找陈海松说，他不愿意在总部工作，想回二十五师。陈海松劝他安心工作，说：朱、毛都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朱总司令现在在我们这里，应当注意保护他的安全<sup>④</sup>。

在甘孜整训部队，朱德多次到高级干部短训班讲课。他讲革命形势时，有些人在下面嘀咕：“别听他瞎吹牛！”可是陈海松相信总司令的话，每次都认真听讲，仔细琢磨，提出一些

---

①②访问李聚奎记录。

③访问李明（李太国）、李明、陈宜贵记录。

④访问李明（李太国）记录。

问题。朱德表扬他学习认真，肯动脑筋，反映问题快<sup>①</sup>。

张国焘成立伪中央后，采取调出来、派进去的手段，对原一方面军的部队实行“改造”。对干部明目“一视同仁”、“加强团结”，暗中却又通过保卫系统监视他们的行动。

先后调到九军任职的，有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组织部长朱盘显，宣传部长方强，二十七师参谋长刘培基等。陈海松利用工作关系跟他们单独交谈。经过一段私下交谈，他终于了解了一方面军的历史和遵义会议的基本精神，又从朱德讲的国内外形势和地理知识中领悟到当前的时局，加上南下碰壁的严酷现实，他原来无法判明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时在他的心中逐渐明白了。

从此，他对一方面军来的干部十分信赖，在工作上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曾日三和方强都是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他尤其倚重他们。在党内斗争的问题上，他的一些会招致张国焘杀头的话，都对他们两个讲了。他在方强那里看到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党的建设》，借去看了好几遍，连称“好书！好书！”他让他们给全军的政治干部讲党的理论和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sup>②</sup>。

一九三六年春，九军在卢霍一带筹粮。这里是藏族聚居区，因民族隔阂，藏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和反动头人的武装袭击，筹粮异常困难。陈海松担心部队盲目行动，和曾日三研究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反复强调，一定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能再给群众留下不好的印象。规定有钱用钱买，无钱

---

<sup>①</sup>访问丁先国、陶怀德记录。

<sup>②</sup>访问方强、陈宜贵、李明记录，参见《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打借条；有人在场，尽力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无人在场，也要如数留下钱或留下借条<sup>①</sup>。

部队在川康边境逗留了半年，因战斗、疾病、冻馁，减员一半以上。少数革命意志薄弱的人，早被头两次过草地折磨怕了，第三次开始过草地就出现了逃亡现象。过草地前，陈海松就找军长孙玉清商量，下令把全军的马匹集中起来，一是成立临时骑兵大队，担负侦察道路、寻找食物和警戒工作，以减轻部队的负担；二是成立搜索队，负责寻找逃亡人员。他特别告诫保卫部长陈宜贵，不许对逃亡人员乱惩罚，主要用说服教育和帮助解决具体困难的办法，使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sup>②</sup>。

草地行军，异常艰苦。陈海松却始终是乐和和的，活跃在部队之中。其实，饥饿和疲劳已使他严重消瘦了。他这时抽烟特别多。曾日三见他抽大黄叶子，便把自己保存了好久的八盒香烟送给了他。陈海松一接过烟，就高兴地大喊：“要抽烟的快来呀，曾主任请你们的客！”随手分发了六盒。剩下两盒，他也没单独吸过一支，总是吸上两口，就递给后面抽烟的战士，一支烟总要传递好几个人<sup>③</sup>。他和警卫员的干粮也不多，但一遇到断粮的伤病员，就叫警卫员拿出一些送给他们<sup>④</sup>。

部队走出了草地，在哈达铺休整三天，继续北行。

十月八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备受分裂之害的四方面军，终于又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陈海松在九军举行的庆祝会上讲话，激动得热泪盈眶。

---

①②访问李新国、陈宜贵记录。

③④访问李新国、李明等记录。

#### (四)

十月下旬，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渡过黄河，随后组成西路军。陈海松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

过河初期，红军兵力集中，甘肃敌军兵力分散。红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骑兵也不是那么难打。在继续西进时，西路军指挥部就采取了分兵的部署，把总数二万一千八百余人的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向河西走廊进发，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

十一月初，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统一指挥甘、青两省地方军阀部队。甘、青、宁三省马家军迅速纠集和扩军，兵力达到十一万五千人，马六万匹，另有蒋介石的飞机助战。

九军进至干柴洼，遭敌骑兵主力和飞机的袭击。陈海松、孙玉清各指挥一个师与敌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击毙敌第一旅司令部副长官苗雨青，使敌人在其内部发出“堵不住，打不过”的哀叹。但九军亦受重创，军部一科长刘培基英勇牺牲。

在向古浪推进途中，敌骑兵或在后面跟踪，或在两侧与九军并行，用望远镜即可辨别马队的颜色。九军只得夜行日宿，并由一路纵队改为二路纵队，缩短行军距离，防止袭击。敌则改为夜宿日袭。九军步行一夜，敌骑兵几个小时就赶上来袭扰。陈海松率后卫部队，利用横梁山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了尾追之敌。孙玉清乘机率先头部队急进，于十一月十三日袭占古浪，守敌逃窜。十五日全军进抵古浪。

古浪为凉州的门户，地当要冲，是敌必争之地。古浪城座落

在两面临山的川道里，城垣因早年地震而坍塌。距城最近的南山，居高临下，俯瞰全城。城的东北面是片开阔地，便于骑兵活动。这种地形本来就是易攻难守的。九军过河时尚有七千余人，经一路战斗，到古浪只有五千余人，兵力过少。

部队工事尚未修好，敌就在十六日拂晓，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的兵力，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进攻古浪。九军奋起反击，激战一天，歼敌近千人。

次日，敌针对九军分兵把口的部署，改变了战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骑兵作迂回穿插，切断了九军各部队的联系，正面则集中步兵猛攻南山。九军坚守南山的一个加强团，终因孤立无援，经几小时战斗，大部壮烈牺牲。

敌人控制南山后，即突入城内。陈海松、孙玉清率领城内部队与敌拚杀。当二十七师一部冲破敌人的分割，从城的东北面接应过来时，陈海松当即命令部队轻装，一举冲出城外，击溃了城外的民团。城内敌人以为红军是溃逃，一窝蜂追出来。陈海松、孙玉清即率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击毙敌六百余人，夺回古浪城，使一天的战局稳定下来。

第三日，敌出动轰炸机三架，轮番轰炸后，又用大炮轰击。九军伤亡很大。全军苦战一天，终于又把突进城内的敌人赶了出去。敌人惊叹，本是易攻难守的古浪，在红军手里竟变得如此难攻<sup>①</sup>。

经过三天苦战，九军毙伤敌二千余人。自己也伤亡过半，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都英勇牺牲。

---

<sup>①</sup>参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集。

十九日，九军奉命连夜突围，向在永昌的三十军靠拢。

古浪失利，固然有其主观原因，但一支数量不大的孤军，在那样的地形和敌我态势下，即使无任何主观错误，也是难于获胜的。如不是部队能征惯战，干部指挥有素，恐怕早就全军覆没了。何况正是九军在古浪吸引了马家军的主要兵力，右翼部队才得以长驱西进。

然而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却十分恼火，下令调查失利原因。他把全部责任推到军长、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头上，在永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恶狠狠地批了九军的三个主要负责人，撤了他们的职。接着又以过左的办法整顿九军，打击了一批中层干部。

对九军在古浪战斗中的失利，陈海松就自己的责任，作了诚恳的检讨，并在检讨中回顾了九军的历史，提出：原来屡战屡胜的九军，为什么在南下后连遭挫折，把近两万人的部队拖成残军？是九军指战员突然变得无能，还是我们的路线有问题？他历数九军的损失和大批战友的牺牲，痛哭流涕，使会场上的许多人都低下了头<sup>①</sup>。

陈海松被撤职十天后，徐向前说他是九军的核心首长，九军少不了他，又复职回到九军。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西路军，指挥部下达了准备东返的命令。陈海松兴奋地作了政治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急切等待出发的命令。不久，却来了个撤销前令的通知，部队的情绪一下子跌落下来。

永（昌）凉（州）一线，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南靠

---

<sup>①</sup>访问李新国、张朝富、陈宜贵、李明、李聚奎等记录。

冷雪终年的祁连山，北临飞沙扑面的大沙漠，中间是耕作区与沙石滩错落相间的平川。这种地形有利于骑兵，不利于步兵。当地人烟本来就稀少，老百姓因受马家军欺骗宣传，往往在红军到达之前就大部外逃，加之马家军死死缠住我军，实在无法去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滞留这一线，摆开一字长蛇阵，与优势敌人拚消耗，这在军事上无疑是极大的错误。

在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陈海松在军政委员会的会议上与陈昌浩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怀疑陈昌浩究竟是执行谁的指示。他向方强作了深谈。邀方强同他一起离开部队，去陕北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sup>①</sup>。

十二月底，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西进到甘州以西的抚彝（今临泽）、高台一线，打开了接近新疆的通道，又滞留下来。时值严冬，部队忍受着衣不暖身、食不饱腹、水难解渴的奇苦，端着缺少子弹的钢枪，与七万多敌人进行一场场悲壮的白刃格斗。五年在高台拚战殆尽，西路军全军集中在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与敌苦战之后，陈昌浩才不得不同意东返。部队突围至西洞堡，击退尾追的一个骑兵旅，全歼一个宪兵团。陈昌浩命令陈海松率九军两个团和总部妇女独立团，逼近甘州南关，准备掩护全军东返。陈海松欣然受命。他立即把部队带到指定地带，连夜抢修工事，作好了拚战到底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安排。

不料，第二天，他却接到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命令！

回到倪家营子的夜里，陈昌浩叫他去谈话。他走出门，悲愤地自语：“这哪里是带兵打仗，简直是胡闹！”<sup>②</sup>

<sup>①</sup>访问李明、方强、陈宜贵记录。

<sup>②</sup>访问李明记录。

西路军回到倪家营子，又陷入敌人重围。苦战七天，突围到西北方向的三道流沟，又被围。苦战五天，只剩三千余人的西路军，终不得西进，才改向东南方向的梨园口突围。

梨园口在临泽的南边，是河西走廊与祁连山交接线上的一个山口子。山口南侧是梨园河谷，向西通往祁连山腹地。梨园堡位于山口南侧的梨园河边，座落在梨园堡东侧的寺汪山，夹在山口与河谷出口之间，是梨园河谷的天然屏障。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太阳初升，三十军和总部已进梨园堡一带宿营，担任后卫的九军到达梨园口。陈海松在山口上观察了一下地形，即命令部队上山警戒。几乎与此同时，后尾传呼敌人来了！他即令就近的部队抢占寺汪山。无奈九军战士一个个衣裳褴褛，脸颊消瘦，眼睛布满血丝，饥饿疲惫，步履艰难，只爬到山腰，就被抢先爬到山脊的敌人压了下来。他又指挥部队占据山口南侧的一些土包和塬坎，顽强地抗击着敌人。

不久，另一路敌军从梨园河口直逼梨园堡，三十军一部在梨园河上抗击；山口西侧山梁的北边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总部和三十军大部在仓促撤退中。

此时的九军不足一千人，跟随陈海松的一个警卫排，也只有十几个人。子弹很少，真乃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为了多保存一些革命力量，陈海松命令陈宜贵赶快组织机关的同志撤退。

这时的情况谁都明白，留下来就很难再活着出去；但九军如果稍有松懈，三十军和总部的后果就不堪设想。陈宜贵要求留下。陈海松脸色一沉，厉声喝道：“叫你撤你就撤！干什么婆婆妈妈的！”

这是陈宜贵第一次看到陈海松发火。他感到这是生离死别，泪水夺眶而出。陈海松放软口气说：好啦，赶快走吧！再晚谁也出不去了。机关的同志战斗力弱，留下来无益。能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都留下来战死强。

敌人在疯狂射击之后，沿着寺汪山一条条沟壑向下运动。前沿部队消灭了几批冲出沟口的敌人，仅有的子弹都光了。敌人在“共军没有子弹了，冲呀”的狂叫声中，以各条沟口冲出来。陈海松大吼一声：“警卫排跟我上！”即向前冲去<sup>①</sup>。

警卫排冲上去，用清一色快慢机盒子枪猛扫。敌人抛下一片尸体，溃退到射程以外，又集中火力向警卫排射击。陈海松和警卫排钉在阵地上，迫使敌人不敢冲锋。

在西边，有一支敌军突破山梁上的防线，蜂拥向南插下来。九军三面受敌。战士们临危不惧，迅速拆弃了机枪、步枪的零件，挥起大刀，怒吼着，奋起迎敌。一个战士一团火，一寸土地一片血，直杀得敌人丧胆，踟蹰不前。

上午十时许，陈海松急于观察战场情况，乘敌机枪间歇之机，向包顶爬去。他爬到包顶，刚一抬身，敌人的机枪齐射，他身上连中八弹，倒在血泊之中。

这时，孙玉清率三十军一部赶回来救援被围的九军。九军只有少数人员得以突围。绝大部分干部和战士英勇牺牲。

在祁连山深处，九军幸存的三百余名战士，听说自己的政委牺牲，许多人号啕大哭，悲恸之声令人撕心裂胆！

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为董振堂、陈海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

---

<sup>①</sup>访问聂国先、周明国、蔡长元、李明等记录。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多次对一些老同志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sup>①</sup>

####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前，访问了烈士生前战友李聚奎、方强、詹才芳、周希汉、程世才、曹里怀、欧阳毅、罗应怀、吴先恩、徐国夫、陈宜贵、郑重（郑新渠）、李明、江宏海、李明（李天国）、陶怀德、丁先国、陈春堂、李新国、蔡长元、张朝富、聂国先、周明国、徐太先、单向诚（单志猛）、黄科林（戴登贤）、汤正兴、董贤应和烈士亲属陈天启夫妇、烈士少年伙伴陈继先等；参阅了《红四方面军战史》、《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西路军大事记》和《星火燎原》、《红旗飘飘》、高台烈士陵园、青海、甘肃文史资料里的有关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

<sup>①</sup>访问罗应怀、方强、陈宜贵记录。



# 理 琪

王文泉 李肇年

理琪，原名游建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做过地下工作，一九三六年初至一九三八年初任中共山东省胶东特委书记，领导了著名的天福山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胶东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二月，他率部队攻克了沦陷的牟平城，在指挥胶东第一次重创日军的雷神庙战斗中，英勇牺牲。

## （一）

理琪一九〇八年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游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一九二五年，他在开封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便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太康县国民党县党部的筹建工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理琪离开太康县，到开封考入了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sup>①</sup>。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冯玉祥所属部队的一个电台任报务员。他利用这个职务，在士兵中宣传

---

<sup>①</sup>以上情况系理琪之弟游建政提供。

革命道理，发动广大士兵支持革命。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理琪遵照党的以武装反抗蒋介石反动派屠杀的方针，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他曾秘密联络士兵和群众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但由于敌强我弱，条件不成熟，没有成功。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仍留在国民党的部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二九年，理琪随国民党部队开驻江西。在那里，他一面进行瓦解敌军、策动国民党士兵哗变的兵运活动；一面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提供给红军，为帮助苏区军民粉碎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做出了贡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理琪参与了鼓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参加宁都起义的活动，因被敌人发觉，他才离开国民党军队，到了中央苏区。在苏区，他用自己所掌握的无线电技术，为我党、我军和苏区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九三四年，正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极为猖獗的时候，理琪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经常遭到敌人的破坏，斗争环境十分险恶，他常常饿着肚子流浪于街头，但他仍然怀着一颗对党赤诚的心，坚持着斗争。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理琪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无法再在上海工作下去。在他千方百计地寻找下，终于于一九三六年春，接到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的老同学邓汝训的来信，请他到胶东去。

## （二）

胶东地处山东半岛的东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十一月初四），胶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

的武装暴动，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很快失败。此后，胶东呈现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从特委到基层支部几乎全遭破坏，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武装力量也只剩下了不足二十人。这些党员干部组成了中共文登县临时县委，想方设法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了联系，河南省委便派理琪到胶东工作。

理琪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到达胶东，住在文登县沟于家村中共文登临时县委负责人张修己家里。他脱下长衫，穿上农民服装，与临时县委的同志一起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胶东强化保甲制度，并调集了大批军警，集中对文登县各区进行大清乡，使得理琪这样的外乡人很难隐蔽。临时县委暂时把理琪转移到威海，住在一家旅馆中。不久，又辗转回到文登，仍住张修己家。理琪回来后，立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被选为临时特委书记。理琪与特委的其他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胶东的斗争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一系列切实措施，很快地把各县、区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理琪还起草了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总结了已往的工作，批评了胶东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指出了纠正的方法，并提出了胶东党组织今后的任务：

第一，严密党的组织，党的工作要注意秘密性，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的工作结合起来；要在群众斗争中，把那些阶级觉悟高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吸收党员必须严格组织手续，党员必须维护党的纪律。

第二，提高党员的文化水准。特委决定除定期出版一种刊物供各级同志阅读研究外，各级组织还应切实注意学习党的文

件，研究各种问题；党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书报，不识字的主要设法识字。

第三，加紧组织群众斗争，要把党隐蔽在庞大的群众之中。在胶东必须克服认为开展农民工作困难的右倾观点；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的一环；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对容易动摇的人，也要同他们结成抗日反蒋的联合阵线，但共产党必须“抓着”统一阵线的领导权。

第四，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各级党组织要做充分的准备，加强领导，发动坚强的游击战争。

第五，在理论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右倾，也要反对“左”倾，而当时在胶东消极的右倾错误是更为有害的<sup>①</sup>。

理琪为胶东特委起草的这封信，对于及时有效地纠正胶东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理琪经常在漆黑的深夜爬山越岭，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发动和组织群众。他还到各地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亲自帮助大家学习理论。他把带来的《社会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两本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给大家听。在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中，他看到农村识字的人非常少，就组织了新文字训练班，编写了适合农民学习的课本，自己刻印、装订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理琪的身体本来就很瘦弱，又患有严重胃病，再加上生活条件差，时常饿肚子，有时胃痛得浑身冒汗，但他从不叫苦，

---

<sup>①</sup> 《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总是咬着牙坚持工作。同志们时常见他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拿书，认真地阅读。由于经费缺乏，他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典当，作为党的经费。不管环境多么艰险，生活多么困苦，他总是有说有笑，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理琪具有优良的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从不个人说了算。一九三六年初夏，我武装游击小组决定夜袭文登县界石集。这个意见得到特委另一位负责同志的支持。理琪认为当时正在整顿组织，如果一旦战斗打响，环境会更紧张，这对完成整顿任务不利。因此，他不主张打，但他并不武断地下命令，而是耐心地讲明道理，同时仔细听取对方的理由。界石集是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个重要据点，是我游击活动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和杨里镇相隔六里，成东南西北相呼应之势，杨里镇的据点已被我搞掉，而界石集的敌人仍很疯狂。所以，我游击小组决定拔掉它。理琪见同志们决心很大，如不同意就会影响大家的情绪，于是，便批准了这次行动，并提出了积极的意见。他指出：如果大家坚持要打，就要打得干脆，多写些标语，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当传达了理琪的意见后，游击小组的同志都很高兴。结果，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一下子缴获了长短枪四十余枝，子弹十几箱，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纪念日时，特委决定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活动。理琪修改《九一八告同胞书》的传单，号召凡我爱国同胞必须同心协力，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绝不允许日寇侵占我们大好河山。我们要争取解放，把敌人赶出中国去<sup>①</sup>。在九

---

<sup>①</sup>王亮的回忆材料。

月十八日的前两天，文登、牟平等县城及许多区、镇、乡都出现了这份传单。

一九三六年秋，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人，我党又有一部分同志被捕。为了特委的安全，同时又考虑到兼顾城乡两方面的工作，经研究决定，理琪和特委机关一起迁移到烟台市。理琪在烟台以读书为名，隐蔽在毓皇顶的第八中学，继续进行党的工作。他一面利用各种形式作抗日宣传，组织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一面指导胶东城乡各地的工作。这时，理琪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烟台工作的吕志恒接上了关系，并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与烟台市委合并为胶东特区工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此后，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胶东的革命斗争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 (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由于叛徒告密，胶东特区工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不幸被捕。在监狱里，敌人将他的两个姆指用细皮条拴住吊在梁上，一边拷打，一边审讯，他始终坚守党的机密。当敌人用死来威胁他的时候，他大义凛然地痛斥反动派的卖国罪行。敌人在审讯书上写的结语中，说他“毫无后悔之心，坚信共产主义，拟请严重处分。”<sup>①</sup>敌人无计可施，便将他解赴济南，关押在高等法院看守所。敌人再次毒刑拷问，他仍毫不屈服；并在法庭上大讲我党抗日民主政策，指责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反动的罪行。敌人束手无策，只得判他徒刑五

---

<sup>①</sup>山东省档案馆保存之敌伪档案。

年。

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理琪倍受摧残、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使他感到最大宽慰的是，在狱中同其他在押的党员取得了联系。经过酝酿，监狱中的十九名党员组成了狱中党支部，赵健民任支部书记，姚仲明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由理琪担任。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党员过组织生活、学习时事和马列主义理论；同时，领导难友们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狱中党支部组织的学习，主要是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每周讨论一至两次。一天下午，他们正在热烈讨论党的抗日政策时，不料监狱的看守长偷偷地走来，弯着腰躲在窗下偷听。当他听清了讨论的内容后，便大声嚷道：“你们这些人想找死吗？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法院看守所，是监狱！你们抗战！抗战！抗到监狱里来了！”理琪理直气壮地说：“坐牢就不能抗日吗？亡了国我们要当亡国奴，我们自然关心共产党主张的团结抗日，到时候真要亡了国，你们同样要当亡国奴！”看守长理屈词穷，边走边嘟囔着：“好！好！我不和你说这些”<sup>①</sup>。次日清晨，理琪、赵健民、姚仲明三人被转押到“义”字号牢房，同其他同志隔开了。但是，他们仍设法传递信息，保持联系，继续组织大家学习和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于七月底占领北平、天津后，继续沿平汉、津浦铁路南犯。这时，日本飞机经常在济南上空侦察盘旋，监狱里天天能听到嗡嗡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家再也不能忍耐了，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同反动当局进行一次政治斗争。

---

<sup>①</sup>以上见赵健民回忆。

一天早上七点多钟，当看守长查号时，理琪带头站在靠近铁门的地方，向看守长提出：“外边抗日战争已经兴起，这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要捐款抗日，请看守长代为转达。”看守长说：“抗战有国家料理，你们犯法，还要多事，你们捐款，你们有什么钞？”这时，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钞！有钞！钞虽不多，但表达我们一片爱国之心！”说着大家便把钞单子（看守所制度规定，犯人的现金均交看守所代存，只发给一张单子，随用随取）扔到铁门下边。看守长气汹汹地说：“你们这是胡闹！”理琪又带头说：“不答应，我们就绝食！请看守长把我们绝食节省的费用，一道转交抗日将士。你凭天良想想，我们做的对不对？应不应该拒绝我们的要求？”<sup>①</sup>这时，所有牢房的“犯人”群情激昂，看守长在众目怒视下，赶快溜走了。当天，整个监狱统一行动，进行绝食斗争。狱卒送来的饭菜，在门口摆着，没人去动。一天、两天，绝食斗争继续着。到了第三天，反动当局调来大批武装警察同看守们一起，用强制手段把所有政治犯分散开，使斗争失掉了核心。在此情况下，党支部考虑，斗争已达到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便决定停止绝食斗争。这次绝食斗争影响很大，不仅使所有“犯人”受到一次抗日爱国教育，就连看守们也为政治犯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到达黄河北岸，济南危在旦夕。这时，经中共代表张经武与国民党山东省当局多次交涉，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停止羁押”的名义，让政治犯保释出狱。理琪也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保释出狱。

---

<sup>①</sup>以上见赵健民回忆。



#### (四)

抗战爆发后，由于山东战略地位重要，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了《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人民抗战》的指示，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陆续派遣了许多红军干部到山东工作。十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在省委书记黎玉主持下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决定，起义后的部队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

理琪出狱后，立即找到了中共山东省委，并按省委的指示，很快又回到了胶东。这时的胶东，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官员忙于搜刮钱财，准备逃跑。他们有的表面上赞成抗战，实际上坚持反动政策，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的则准备随时投降日寇。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抗日。理琪回到胶东后，马上召集了特区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分析了形势，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一一·四”暴动后保存下来的武装游击队为基本力量，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胶东人民抗日武装，首先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天福山位于文登县城东四十多里的地方，是一座在群峰环抱中的小山，地处偏僻，层峦叠嶂。胶东特委机关就设在附近的“小苏区”沟于家村。起义决定做出后，理琪不顾身体虚弱和疲劳，同特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紧张地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从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到宣传教育等，对起义计划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周密地安排和检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理琪带领中共胶东特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来到山顶的一座大庙里。上午九时多，起义的队伍已齐集在山上，许多群众站满了山坡。在山顶庙前的旗杆上，绣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字样的红色大旗庄严升起，在欢呼声中，理琪登上大庙的台阶，代表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讲话。他讲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了任务，响亮地提出：在日寇即将打到我们家乡的时刻，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马上团结起来，有人出人，有钞出钞，要武装起来，广泛进行救亡宣传，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sup>①</sup>。理琪传达了省委指示和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决定，讲解了中国共产党要团结资产阶级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接着，他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人们再次欢呼跳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荡山谷。特委把汇集在天福山的武装力量，编成三军的一个大队。会后，按原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以武装宣传队的名义，深入各地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开展斗争。

理琪等领导的天福山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它的成功，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天福山起义后，理琪又同特委的其他负责人到达威海市，发动和组织了威海的起义。

威海是胶东半岛的重要军港。国民党威海当局及驻军，处于战降不定的混乱局面。国民党专员孙玺凤力量小，没有抗战

---

<sup>①</sup>王亮：《半岛烈火》，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决心，想脱身溜走；警察局长郑维屏力量较大，想当汉奸，还想拉孙玺凤跟他走；驻在威海的海军教导队，武器精良，力量最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郑维屏不和，政治态度不明，不过教导队郝队长的弟弟是共产党员，他刚出狱，正在家养病，可以影响其兄；另外，在威海的国民党二区政训处的一部分人，则在我党控制下。理琪正确地分析了威海的这种形势，决定采取推动孙玺凤支持我们抗战，争取海军教导队中立，反对郑维屏投降，依靠自己掌握的力量举行武装起义的方针。

理琪在威海，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战；一面在国民党上层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时，他工作非常紧张，有时几夜睡不好觉。他曾到国民党海军教导队去作过“团结抗战”问题的报告，亲自同国民党专员孙玺凤进行谈判，使孙答应在我们保护他安全离开威海的条件下，暗中给我们枪械的支援。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威海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在理琪的直接领导下，以原国民党二区政训处的一部分力量为基础，加上市郊的农民，在我原有武装力量的配合下，举行了威海起义。起义人员打开了威海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了许多枪械和大批弹药、辎重，逮捕了勾结日寇的商会会长兼商团团长乔仁廷。起义爆发时，郑维屏想联合海军教导队进行镇压，曾三次打电话给海军教导队，教导队回答说：“共产党力量很大，不是好惹的，我们不能管；如果你要搜捕，搜出乱子来我们不能负责。”<sup>①</sup>郑维屏见势不

---

<sup>①</sup>王亮：《半岛烈火》第121页。

妙，只得率部撤离威海四十里。

起义部队占领威海后，在专员公署旧址召开了群众大会，举行了升旗仪式。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飘扬在威海的上空。接着，全副武装的起义队伍高喊着“团结抗战”、“中国人应该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在市区举行了游行示威。然后，起义部队满载着胜利品撤离了威海。

威海起义后，不但扩大了党和三军的影响，而且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委将“三军”整编为二个大队，建立了司令部，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理琪任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

## （五）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日军三千余人自青岛沿青烟公路侵占了烟台等地。为了打击日寇的侵略凶焰，理琪率三军到达文登、牟平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几天后，部队获悉日军已占领牟平城，建立了伪政权后撤回烟台。得此情报，军政委员会在理琪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首先攻打牟平城。理琪亲率一个大队执行这一任务。

二月十二日下午，理琪率部队出发。开拔之前，他在崔家口作了动员，指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打击日寇，提高胶东广大群众抗战的信心。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走了九十多华里，于第二天拂晓到达牟平城郊。

牟平城是胶东有名的坚固城堡，有“铁打宁海州”之称。部队到达牟平之前，理琪已派便衣侦察进城，并设置了内线接

应。敌人作梦也没想到我军会这样快地袭击他们，所以，城里并无特别戒备。当我侦察员向理琪报告了这一情况后，他立即指挥部队分三路攻进县城，并身先士卒，带领部队打下了伪县政府。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牟平人民欢欣鼓舞，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俘虏了伪县长、伪公安局长、伪商会长、维持会长等七十余人，缴枪百余枝。根据群众要求，除把伪县长宋健武等几名主要汉奸押回三军驻地惩处外，其余俘虏大都教育释放。部队随即撤出牟平城。部队撤退后，理琪等负责同志，带领二十多人，在城南二、三里路的雷神庙停下来休息，并研究善后工作。

牟平离烟台只有六十里路，有公路相联。烟台的日军得知我军攻下牟平时，以空军配合，出动大量兵力乘汽车迅速向牟平增援，由于我军成立不久，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担任后卫警戒的部队未能及时发出警报和有效地阻击敌人的奔袭，结果，天刚过午，敌人就包围了雷神庙。下午一点多钟，在庙前站岗的我军战士发现敌人已接近庙门，当即开了枪，并大声向庙内报告。正在南大厅开会的理琪等同志，听到报警后，随即抽出匣子枪冲到院里。这时，庙四周的日军也开了枪。在这危急时刻，理琪毫不慌张，命令大家立即占领正殿、东西厢和南大厅，组织火力封锁住庙门和各个窗口。当日军的机枪架到庙门外向里扫射，并向庙内发起冲击时，理琪立即喊道：“同志们，坚守庙门，沉着迎敌，准备突围！”在他的指挥和鼓舞下，敌人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了。下午三点多钟，敌人又从庙周围蜂拥而上，对雷神庙发起总攻。西厢和南大厅都打着了火，东厢的房顶也打塌了，敌我之间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几位同

志已负伤、牺牲。理琪不顾身负重伤，血流不止，继续指挥战斗。只听他坚定地喊道：“同志们，占住墙脚，坚决抵抗！我们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sup>①</sup>不幸，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腹部。但他仍然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拿着枪，断断续续地向大家喊着：“同志们，坚持……节约……子弹！”<sup>②</sup>当同志们听到他的声调变了，才发觉他负了重伤。几个人赶来照顾他，他却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摆摆手，要大家切莫声张，赶快去对付敌人。又过了一会，当他已无法支持时，才把自己心爱的匣子枪让同志们交给组织留作纪念。这时，敌人又冲了上来，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又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天黑时，我外围部队赶来支援，在内外配合下，同志们背起负重伤的理琪，乘着雪夜，胜利突围。但理琪早已不省人事。同志们先把他安藏在一个村庄的草垛里，当同志们再赶来接他时，这位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共产主义战士，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三十岁。

理琪指挥的雷神庙战斗，给了侵略胶东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敌人不但死伤四五十人，而且损失了两辆汽车和一架飞机。我军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胶东各地，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胶东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理琪牺牲后，党和群众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文登县崔家口村，并在马石店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胶东特委第一次用公开的名义送了挽联。为了更好地纪念理琪同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党和人民政府又将他的遗体迁葬到新建的栖霞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内。一九六二年，郭沫若为纪念理琪，写了一首诗：

---

<sup>①②</sup>姜亮：《雷神庙战斗》，载《血战八年的胶东子弟兵》。

天福英雄是理琪，  
献身革命国忘私。  
当年猛打雷神庙，  
今日高标星宿旗。  
万代东风吹海隅，  
一方化雨仰宗师。  
文登多少佳儿女，  
接力还须步伐齐。

# 张 际 春

王宗柏

## (一)

张际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笆篱堡罗轸洞谢家村。他出身贫苦，家中虽有一点薄田，但年年入不敷出，主要依靠父亲租种地主和公堂的土地养家。

张际春六岁时，父亲送他去读私塾，十五岁入初级小学，十七岁考入县城高级小学，二十岁时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这期间，常因路费和学费筹措不得而中途辍学。

张际春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政局激烈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与此同时，人民开始觉醒，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马列主义的传播一天天深入，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张际春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逐步觉醒，向往革命。一九二二年四月，毛泽东来到衡阳，在三师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他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远大的理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是实现这种伟大理想的唯一道路，我们青年人应该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张际春的心弦。他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自己



的理想。从此，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拯救祖国危亡的道路<sup>①</sup>，并积极靠近党组织，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三师的党组织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刘智远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三师的教工和学生分成了“驱刘派”和“挽刘派”，张际春和张经武、曾希圣、任云甫等进步学生，都属“驱刘派”。一次，刘智远从长沙返回衡阳，“驱刘派”打着校旗，拿着驱刘传单，西渡湘江到刘的住所，反对刘智远返校。可是，“驱刘派”返校后，“挽刘派”又打着校旗，渡过湘江，欢迎刘智远返校。“驱刘派”师生十分义愤，立即派出由张际春等组成的“请愿团”，到长沙省教育司交涉，并组织起来，把守校门，使刘智远在长达一星期的时间内入不了校门。刘智远电告省教育司求助，教育司派特派员梁铸球到衡阳进行弹压。梁铸球以武装驱逐“驱刘派”学生，护送刘智远返回学校，并张贴布告，开除“驱刘派”五十三名学生的学籍。

“驱刘派”再次派出“请愿团”，到长沙向湖南省当局请愿并抗议，张际春参加了“请愿团”的斗争。学生们的抗议和请愿活动，得到水口山和安源煤矿工会组织的支援。斗争坚持到暑假以后，谭延闿的部队从广东开到衡阳，答应被开除的学生全部转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这一事件才告结束<sup>②</sup>。

一九二五年夏，张际春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实行第一次合作，湘粤两省的工农运动正逐步发展。张际春返回宜章后，先在本乡初级小学任

---

①张际春：《伟大的启蒙和教诲》，载湖南“三师”1964年六十年校庆专刊。

②张际春：《部分简历的补充》（1968年8月20日）。

教，兼办农民协会；后到满塘张家完全小学教语文。这期间，他与同事张登骥等组建了国民党区党部，张际春任常务委员。他们还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夜校，进行反对北洋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张际春与张登骥二人在宜章县城，由李佐民、高静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张际春在县立女子初级师范学校任教，同时担任新改组的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在共产党内担任女师党小组组长，兼作学生工作和教师联合会的工作。他还在党所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东江普宁农运》课，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 (二)

一九二七年五月，“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占宜章，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张际春、张登骥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李兆甲等都遭到敌人通缉。张际春在县城无法立足，返回家乡隐蔽，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由广东进入宜章境内。张际春遵照党的指示，发动农民暴动，策动民团倒戈，配合朱、陈部队攻打宜章。

宜章起义成功后，朱、陈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宜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宜章县的工会、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等，很快恢复和组织起来。张际春奉调进入县城，担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县农民协

会秘书长。这时，国民党宜章县保安队邝镜明部，逃踞临武县水东镇，伺机捣乱破坏。张际春等率领农民自卫军驱逐了这伙敌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军队从广东进攻湘南。张际春随宜章工农武装改编的、以胡少海为师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在朱德、陈毅统一率领下，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转移，四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砦市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革命军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合编后，张际春先在三十二团党委会工作，后调到二十八团党委会工作。三十二团是由活动在当地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张际春遵照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的指示，在团党代表的领导下，深入连队，同士兵共甘苦，向士兵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期间，他曾参加了粉碎敌人“进剿”和“会剿”湘赣边界根据地的多次战斗。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直属部队和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因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粤北进军，张际春随二十八团行动。进军部队打下福建长汀后，正式编成三个纵队，张际春调到由原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一部编成的第二纵队，任宣传科长。这期间，他参加了江西的瑞金、于都、安远、广昌、永丰，闽西的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漳平、龙岩，粤北的梅县、丰顺、大埔等地的战斗和群众工作。

一九三〇年夏，张际春调任红四军秘书长。部队从闽西、赣南经兴国北上，在樟树镇打败敌王捷俊旅，然后西渡赣江，经清江等地抵南昌以西，攻打牛行车站，以纪念“八一”。此后，部队西进，往高安、上高、万载等地，抵湖南浏阳县文家

市，与以黄公略为军长，蔡会文为政委的红三军等部会合，共同围歼文家市的敌人，击毙敌混成旅旅长戴斗垣。接着，乘胜向长沙挺进，与彭德怀所率红三军团五军、八军一起，再次攻打长沙，围城半月未攻下，我军自动撤退。红四军经株洲、醴陵、萍乡等地回到赣西，攻克吉安，取得大胜，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张际春参加了成立省政府的通电起草等工作。

同年秋，张际春调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长。部队渡过赣江向东，称东路军，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宁都，广昌等地区活动。十二月，张际春调到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直至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春，张际春又调任红三军秘书长。部队在江西藤田、谭头、东固一带，一边整训，一边做群众工作，准备迎击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时，敌机施放毒瓦斯，张际春在去教导队上课的路上中毒，后经治疗痊愈。敌人开始第二次“围剿”后，张际春随部队从江西吉安的富田打起，向东横扫，经乐安、广昌，直至福建的建宁，历时半个月，席卷七百里，活捉敌师长公秉藩，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后，张际春调到以曾士峨为师长的红四军十一师，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一到职，就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部队从兴国的莲塘一带打起，追击敌韩德勤部，进到高升圩一带，与敌广东部队蒋光鼎、蔡廷锴等部接触，激战竟日，伤亡较大，晚间撤出战斗，师长曾士峨负重伤后牺牲。部队在兴国地区短期休整后，继续战斗，于夜间从敌人的空隙中穿过，绕到宁都的黄陂，包围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歼其

大部。接着，回头追击西线撤退之敌，放过蒋、蔡部，在方石岭将韩德勤部消灭过半。经过连续持久地作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第十一师和十二师合编为红十一军，张际春任军政治部主任。部队根据毛泽东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的指示，开往赣东石城一带，打土围子和拔除山寨，以消灭苏区内的白点；同时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初，张际春调任红四军十三师（十二军三十五师改编）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部队先在瑞金壬田一带整训，后围绕打赣州城的任务，经于都、信丰边境进到赣州西的唐江圩驻守，一面发动群众，一面保障打赣州的侧翼。结果，因敌陈诚、罗卓英两个师增援，赣州未克；部队经南康、信丰边境返瑞金一带，集中待命。后来，由红三、四军和以左权任指挥兼政委的红十五军组成东路军；十三师改名为四十五师，归十五军指挥，张际春仍任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部队向闽西、闽南前进，参加了龙岩、南靖战斗，并以南靖县的山城堡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同年夏，部队回师，经武平、会昌进到南雄地区，歼灭敌广东部队一部，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

不久，四十五师划归红三军指挥。部队经信丰、宁都、兴国一带，向北前进，配合五十五师，进行乐安、宜黄战役，攻克宜黄城，歼灭了守敌。以后，部队又划归红一军团指挥，番号改为三十一师，张际春仍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部队经南丰、广昌地区，进到抚州以西之浒湾、枫山铺一带，迎击敌吴奇伟的九十师，歼其大部。十二月，部队在黎川进行整训和改

编，张际春调到以李卓然为主任的红一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后兼任军团裁判所所长。

张际春在红军中是一名很出色的宣传家。他谦虚谨慎，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频繁作战、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张际春主办了军团油印的《战士报》。为了办好报纸，他经常深入连队，与基层干部、战士谈心，了解他们对报纸宣传的想法和意见，以改进工作。一次，他和李卓然下连队，发现战士们很喜欢听《三国演义》、《水浒传》上的故事，喜欢猜谜语。张际春根据这些意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报纸上宣传战斗任务，鼓舞斗志，密切军民关系，使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还经常到前线了解战斗情况，以第一手材料，及时写出战地通讯和评论，鼓励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在艰苦斗争环境里，张际春对开展部队的文娱活动也很重视。为此，他在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自编自演《庐山之雪》讽刺剧的建议。当时，政治部的同志们都没有编过剧，也没有演过戏。他自告奋勇带头参加演出，结果，演出很成功，受到大家的欢迎，从而推动了部队文娱工作的开展。

一九三四年初，张际春调到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张际春因为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受到排挤和打击，在六、七月间即改任步校训育处副处长。由于大家对他了解，不久，又调到红五军团任宣传部长。十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长征中，张际春一直跟随全军的后卫部队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行动，主要是协助部队进行宣传鼓动、部队收容和筹粮等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为摆脱蒋介石十几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当我军渡过赤水，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察觉敌人已在长江沿岸布防。毛泽东决定红军迅速二渡赤水，回师桐梓、娄山关，重点遵义。张际春奉命带着一部电台到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传达军委要该团停止前进、准备战斗的命令。他召集李屏仁、张南生等几位团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落实军委命令，并直接组织指挥战斗，胜利地完成了防御阻敌、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秋，张际春奉命随刘伯承组织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他任高级指挥科主任教员，负责政治课的教学工作。一九三六年五月，第二次北上过草地时，张际春代理“红大”政治部主任。在这期间，他与刘伯承等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深入到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中做工作，动员他们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继续北上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十一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与中央红军大学合并，改编为红军大学第二校，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调张际春到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一队学习，并担任学员队的党支部书记。

###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际春从“红大”毕业，先留校政治部工作，后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八月，

调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太原失守后，党中央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保卫黄河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决定成立绥德河防警备区，张际春于十一月调任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任中共绥德特别区委委员。警备区所辖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开辟的老苏区，群众基础较好。我军以河防名义进驻那里以后，国民党政府绥德行政专署专员何绍南，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又不断制造事端和摩擦。张际春除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严格执行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还负责与何绍南接触和谈判，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三月，张际春调回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改名）政治部主任和党务委员会书记，与罗瑞卿一起，负责“抗大”的实际领导工作。他们遵照毛泽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题词，为树立“抗大”的优良校风而努力。

张际春到任以后，“抗大”曾发生了一起枪杀案。开枪杀人的是红军的一位年轻指挥员，出身贫苦，立有战功；死者是一位无辜的女学生。对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的杀人事件如何处置，当时众说纷纭。张际春、罗瑞卿经过审慎研究，认为应从大局出发，严肃惩处，不能姑息，经报请党中央批准，边区政府审理后，依法将凶手处死。此案执法以严，在全国影响很好。

一九三九年七月，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奉命从延安迁移太行山根据地，训练前线的八路军干部。张际春与罗瑞卿一起，率领总校机关人员和学员数千人，东渡黄河，经晋绥进入晋察冀。时经半年，历尽艰辛，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于一九四〇



年一月胜利到达太行地区。一九四二年九月，张际春代理“抗大”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建立了功绩”<sup>①</sup>。

一九四三年一月，张际春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十月，调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做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审干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他返回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际春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及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从这时起直到整个解放战争胜利，张际春一直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领导下工作，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张际春遵循毛泽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刘、邓直接领导下，结合部队当时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教育部队“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使部队保持了高度戒备。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当国民党阎锡山部和孙连仲部进攻解放区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展开了英勇的自卫反击，取得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的胜利，给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以迎头痛击。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战。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与其他战略区的兄弟部队一起，展开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新的形势下，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张际春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拟订了《团的党委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试行。条例规定：“在步、骑、炮各建制团中，均须成立一领导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的党的委员会，简称‘团委’”。

“团委”是全团“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其任务是实现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及上级党委决议、军政机关指示，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一致和团结，保证全团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正确开展，和作战、训练等任务的完成。”团委书记“每半月左右召开团委会一次，讨论布置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给团司令部、政治处及全团以工作方针上的指示，以及检查、讨论司令部、政治处的工作。”“团委会依托政治处为其执行决议的日常办公机关”<sup>①</sup>。该条例上报中央后，中央军委极为重视，批转全军试行。

为了推广试行条例，张际春组织人员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实行党委制的经验。此后，部队的营、旅、纵队和军区、军分区也都建立了党委制，同时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普遍的整顿。各级党委制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领导作用，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各次战役和战斗任务的完成，对部队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总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张际

---

<sup>①</sup> 《刘伯承军事文集》编纂组1979年编的《刘伯承军事文集》第8卷（专册附录）《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14页。

春起草了《发扬和组织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的指示，指出：“半年来自卫战争中部队工作的经验完全证明，无论是保证战斗任务、练兵任务的完成也好，或者是团结官兵、团结军民、瓦解敌军等任务的完成也好，只要发挥了和组织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赞助，就有力量有办法，一切工作就可以做好，而且做得很好。”否则就是另一种状况。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认识这一环，是非常必要的。”<sup>①</sup>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张际春为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政治部起草了《为一九四七年自卫战争的任务而奋斗》的动员令。要求“不放松地继续克服部队中和平思想和个别松懈、涣散、怯懦的情绪，团结一致，不灰心也不骄傲，兢兢业业地继续消灭进攻的敌人。”这一动员令的贯彻执行，对晋冀鲁豫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大批被俘或起义的国民党士兵补入部队，如何教育、改造和使用解放战士，是当时部队面临的新问题。张际春对部队成分作了详细分析，认为老战士、新战士和解放战士，各有所长。如何使他们取长补短，是提高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战斗任务而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某部解放战士王克勤，贫农出身，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六年，受尽虐待。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经过诉苦教育，又看到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阶级觉悟很快提高，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当上了班长。他在班内经常对新解放战士进行

---

<sup>①</sup> 《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3页。

诉苦教育，尽心尽力地把在蒋军中学到的军事技术教给新战士，在班内开展团结互助活动。因此，他所带领的那个班，成为模范班。他本人从一个被国民党军队任意驱使的工具，转变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民战士，并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张际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典型，并建议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政治部，及时发出了学习王克勤的指示，很快在军区所属各部队中，开展了学习“王克勤运动”。这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了新的经验。党中央很重视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开展的学习王克勤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指出：“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借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与瓦解敌人，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希望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当前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的推行这个运动。”

张际春就是这样地悉心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刘、邓首长领导下，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领导部队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开展以诉苦、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开展阶级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并积极推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使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战斗士气，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完成了艰巨的战斗任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 （五）

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作战，我军共歼灭蒋介石的军队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余万人，全国形势发生了重

大变化。党中央、毛泽东紧紧抓住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及时作出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行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并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指向大别山，把进军中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了胜利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张际春为中原局常委。

一九四七年五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准备“向中原进击”的指示。张际春协助刘、邓首长，认真做好部队的政治动员工作。六月三日，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大纲》，要求全军人人明白政治任务，号召发扬吃苦耐劳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十三日又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认真学习新华社发表的《中共权威人士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sup>①</sup>和新华社“五一”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以鼓舞部队的斗志。十四日，张际春主持召开民运工作会议，讨论和布置了转入战略进攻后进入新区的群众工作问题。

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共四个纵队、十二万大军，从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三百里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个月内存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共六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张际春随主力出击，为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在他的主持下，政治部于八月五日发出了《关于目前一个时期政治工作中心的指示》，

---

<sup>①</sup>这一评论是毛泽东起草的，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时，改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总结进入蒋管区作战以来的经验，为向大别山挺进，进一步作好思想、组织、政策上的准备。

八月七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军进入鲁西南地区的五个纵队掩护下，分路向南挺进。全军指战员响应刘、邓提出的“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以神速的行动跨过陇海路，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越过宽达三十里、污泥及膝、没有人烟的黄泛区，接着又不断粉碎敌人数十大军的前堵后追，涉过渦河、沙河、颍河、洪河。

八月二十三日，当我中路部队先头一个纵队刚刚抢过汝河之时，敌人一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赶到了汝河南岸，将我另一个纵队和跟随中路部队行进的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挡在了汝河北岸，而身后敌三个师的追兵，相距只有五六十里。在这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万分险恶的关头，野战军指挥部果断地决定组织强渡。张际春亲临渡口，向部队宣传刘、邓关于“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指示，动员部队坚决勇敢地打过去。他随刘伯承先期渡河，指挥先头部队攻占了桥头堡，掩护后续部队继续渡河，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闯过了这道险关。然后，部队又急行军渡过沙河，胜利地到达大别山，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

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并实行战略展开，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三十一日，邓小平政委给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为了使全军上下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张际春决定先用电报把邓小平的报告摘要，迅速传达到各部队；接着又主持恢复了油印的《军政往来》，复刊第一期上，就刊载了邓小平报告的全文。

张际春很重视报纸的作用。部队抢渡淮河时，他知道六纵队在息县搞到一部石印机，立即吩咐把机器保存起来；不久，又要求留在冀鲁豫的胡痴带《战友报》班子南下，准备一有条件就办报。同时，他命令野政宣传部，千方百计地保存一台收音机，收听和记录新华社的广播，编印《时事新闻》，发给部队作为时事教育的材料。在南进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张际春还紧密配合部队的行动，注意抓好战士的文化生活。当部队开始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后，他催促野政组织部长陈鹤桥和宣传部长陈裴琴，及时编出了战略进军的歌曲。部队刚进入大别山，到处都唱起了这样一首歌：

蒋介石正是手忙脚又乱，  
我们又挺进大别山；  
……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  
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张际春听到这歌声，高兴地说：“这支歌唱到战略进军的点子上去了，曲子又是民歌，便于流行。”他还指示野政宣传部木刻工作者，用丈把白布绘了一幅“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图”，利用行军途中和宿营时间，向指战员和当地群众讲解时事。至于组织文艺队伍下部队演出和进行宣传鼓动，更是经常的工作。为了使部队尽快掌握山地战，张际春特地请黄埔军校毕业的野政联络部部长杨松青，编写《山地战歌诀》，登在《军政往来》上，供部队学习。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我进入大别山区部队的围攻，野战军

指挥部九月十九日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精简机关，减少重武器和马匹，充实连队，抽调干部加强根据地建设。二十七日，野战军指挥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刘、邓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懈现象，是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现党的战略进攻的根本环节。张际春也在会上讲话，特别强调了群众纪律对于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全体指战员都必须学会克服困难，必须严格执行群众纪律。”<sup>①</sup>各部队遵照野战军首长的指示，边整顿边打仗，斗志昂扬地进行反围攻斗争。

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歼敌，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以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为一路，组成前方指挥部，在大别山内线展开游击战争；以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为一路，组成后方指挥部，回渡淮河，北返五百里，在淮河区域外线进行斗争，以宽大机动展开，打击敌人。

为了实现宽大机动展开，后方指挥部又常常分路行动。有一次，刘伯承与中原局机关的部分同志，进到光山县北向店菜园地区，无意中闯进了敌十一师主力部队的宿营地，幸好天黑，敌人未察觉。负责警卫任务的杨国宇，一面布置战斗部队掩护，一面催促刘伯承司令员赶快上马转移。刘伯承问：张际春副政委和中原局其他领导同志是否转移？杨国宇答道：派人去联系了。刘伯承说：“不联系上中原局和际春同志，我是不走的！”直到派去联络的王参谋跑回来报告说，张副政委和中

---

<sup>①</sup>陈鹤桥、陈裴琴：《张际春同志在大别山》，见《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25—226页。



原局机关已经转移时，刘伯承才上马，在夜色中悄悄离去。

在为建立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而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犬牙交错的残酷斗争中，张际春一直不失时机地、有的放矢地进行着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初到大别山时，由于长途跋涉得不到休整，部队十分疲惫；加之在新区和新环境下高度分散，战斗频繁，又无后方依托，斗争十分艰苦，在部分同志中出现了思想涣散和纪律松弛的现象。刘、邓及时指出，要抓紧进行形势任务和纪律教育。张际春积极贯彻这一指示，及时以野战军政治部名义发出《到达大别山以后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这个文件明确指出，今后政治工作的中心在于：一，深入创造鄂豫皖边解放区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准备，认识鄂豫皖边解放区的战略地位和人民的革命传统，认识我军有各解放区战略反攻的密切配合，有条件有信心粉碎敌人的进攻。二，诱导部队迅速习惯无后方的和现地条件的作战环境和生活环境；认识困难是暂时的，为了消灭蒋军，解放人民，完成创建解放区的伟大政治任务，生活上的困难是可以忍受和逐步克服的。三，严整政治纪律，加强群众工作，认识部队政治纪律不好，会使我们创造解放区的任务无法完成，甚至失败。号召全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进行宣传，每一个人必须为团结群众，为保卫人民解放军在人民中间的荣誉和争取在人民中的良好影响而斗争。”<sup>①</sup>接着，野政又发出《时事教育切不可放松》一文，通报表扬并介绍推广了一纵队十九旅五十二团的经验。这个团过淮河后，担任牵制敌人、掩护大军进军大别山的任务。由于经常处在单独行军和分散作战中，很长时间看不到

---

<sup>①</sup>载《军政往来》第47期。

报纸、文件，也没有条件收听新华社的广播，部队产生了一些埋怨和不正常的情绪，影响了战斗力。当他们从友邻部队中得到一张野政编印的《时事新闻》，学习了新华社《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后，不正常情绪很快一扫而空，巩固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并迅速投入了战斗。野政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重视这一经验，不断地对部队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张际春还根据当时部队遇到的实际问题，自己动手写了《恢复疲劳，准备打仗》、《怎样习惯南方生活》、《怎样播谷子》、《桐子油为什么不能吃》等针对性强、短小精干的文章，对部队建设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冒风雪，忍饥饿，斗争异常艰苦。张际春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样，除坚持与战士共甘苦外，还常常在山垭路口召开干部会议或给部队作战斗动员，鼓励大家战胜困难，勇往直前。一九四七年冬，部队因远离后方，冬装没有着落。张际春根据刘、邓首长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制做”的号召，深入基层，与战士们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很快解决了冬装问题。张际春深知，能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关系到我军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的大问题。因此，他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教育。一次，张际春随部队在麻城县夜行军，发现路上抛撒了不少甘蔗叶子。他判断这是我军其他过路部队拔地里的甘蔗吃后扔下的，宿营后便打电话查问，并派干部去检查群众纪律和处理赔偿道歉等事宜。事后，张际春教育部队说：“我们在新区作战，要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就必须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我们要以党的各项政策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夺取全国胜利。”

当他得知有的干部因跃进大别山的胜利而居功叫苦时，就严肃地指出：是不是我们特别有功、特别苦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自然我们在战争中出了很多力，但所有战场的兄弟部队都是经过艰苦奋战才取得胜利的，他们有的担子比我们更重。我们应当好好向兄弟部队学习，否则，就会妨碍我们的前进，我们就要落后。

张际春从长期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政治工作必须做到基层，并注意不断总结和推广基层的政治工作经验。他领导的野政机关，除整训或总结工作时集中外，常常只有少数留守人员，多数干部经常被派到各部队去；遇有重大任务，则派部长们带工作组下去，帮助工作。他还采取通信的形式通报情况，指导工作。一九四八年年初，陈鹤桥带队到一纵队了解和检查连队工作时，张际春写了一封致陈鹤桥并转一纵队政治部的长信，指示：“加强政治工作，应该主要地放在加强下层群众工作，战士的工作，发动战士及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强调，“把重点放在战士中去，放在连队中去，放在支部中去，就是部队中的群众路线。”政治机关对于部队工作，“基本点应检查连队工作好不好（这也就等于检查了上面的领导），是否发动了战士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必须教育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与指挥员），珍重战士，爱护战士（就是俘虏也应珍重，因为他们也是贫苦农民），依靠战士，使之成为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有纪律的队伍。”“应提高现有的战士质量，准备变成骨干。”<sup>①</sup>六纵队解放襄

---

<sup>①</sup>张际春：《关于改进部队政治工作的一封信》，见《刘邓大军南征记》第38—39页。

(阳)樊(城)时，由于战前进行了深入的政策教育，战斗中和战斗结束后严格执行了党的城市政策，襄樊各界群众反映很好。张际春就要他们总结经验，并在总结上详加批注，发给各部队参照执行。这样互通情报，使机关干部既了解上面精神，又了解下面情况，采取的措施就比较切合实际和有力，使政治机关真正发挥了党委得力助手的作用。

毛泽东对挺进大别山提出可能三个前途：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的配合下，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最好的前途，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的占领大别山的光荣任务。这是刘伯承、邓小平卓越指挥和全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也凝聚着张际春的大量心血。

## (六)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中原地区的斗争任务是：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中原根据地，使之成为我军继续前进的基地。

二月，<sup>9</sup>中央军委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并决定将挺进在豫陕鄂边的陈赓兵团归还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将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唐亮兵团拨归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以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出大别山后，进驻豫西宝丰一带，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以诉苦、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这时，中央从华北解放区调了一批新战士，补充野战军。

为了搞好整党整军，张际春指示野政发出了《整党工作与

展开战士中的诉苦民主运动结合起来》的指示，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党整军，以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得到不断的进步”。指示强调“必须抓住这一环节，把整党工作与展开战士中的诉苦民主运动结合起来。”<sup>①</sup>新战士到来之前，张际春即派人迎接。接着，他又指示野政，向各级政治机关发出了《关于正确认识新战士，做好新战士的工作》的指示，使新战士到部队后处处感到温暖，决心向老战士学习，杀敌立功。

为适应战争发展需要，统一已进入中原地区各部队的指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五月九日决定：加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张际春等为常委，成立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军区兼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sup>②</sup>。

五月下旬，中原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自卫战争以来政治工作经验并部署今后的工作。刘伯承致开会词，邓小平作《党委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张际春系统总结了政治工作，提出了如何加强党委领导和政治机关工作的经验和措施<sup>③</sup>。这次会议，对加强部队党委工作和政治工作建设，迎接更大的战斗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

①载《军政往来》第75期。

②参见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页；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50页。

③《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28页。

七月底到八月初，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所作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决定整党整军运动进入最后阶段：检查团以上机关的领导作风。张际春据此在军区和野战军系统作了具体部署。

部队经过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发扬了三大民主和优良作风，提高了战斗力，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相互协同，纵横驰骋，扫荡中原之敌。经过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重要战役，打碎了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解放了洛阳、开封、郑州等重要城镇和广大农村。

十一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经过六十五天的激烈战斗，歼灭了国民党军五十六个师、五十五万人，使蒋介石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精锐之师丧失殆尽，长江防线和其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及武汉地区，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为我军渡江作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条件。张际春在总前委的领导下，组织各级政工人员，搞好战地政治鼓动和战俘的处理工作，为各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进入整训。张际春写了《关于淮海战役中部队主要的思想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报告谈到，战役前部队的主要政治工作，是着重向部队说明秋季作战任务在于配合友邻部队进行大规模作战，大量歼灭中原蒋军，全部解放中原；说明战役的整体性、持久性和行动作战的连续

性，以克服对于渡江作战存在着的恐惧心理，和某些部队因大别山遭到削弱急于得到补充，而不愿打消耗大、缴获少的钳制战的情绪。战役中，由于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一方面使得部队指战员极为兴奋，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轻敌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情况，“领导上及时提出了坚决的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而在政治上对敌政治攻势和在战术上想办法的军事民主，战壕中火线评功，火线整编队伍等政治工作，亦同时随着进一步展开。”因此，指战员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战斗作风。报告最后肯定了在战前动员中提出的“军政双胜”的口号，即不但在军事上要打好仗，“而且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入城纪律、俘虏政策、团结友邻、缴获归公等要求”，是十分正确的。

这一报告，写得具体、生动，既反映了部队情况，又总结了经验教训，毛泽东看了非常赞赏，当即批示道：“我们欢迎这样写法的报告，生动有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经验教训到底在何处。”<sup>①</sup>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中原局在商丘召开扩大会议，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准备向江南进军”的指示，集中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会议要求蔑视美蒋反动派，树立渡江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兢兢业业，正视困难，积极完成渡江准备的思想，为渡江南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都题了词，以志悼念。张际春题词有二，其一是：“巍巍太行，沧沧东海，烈士英名，辉煌千载。”其二是：“烈士陵园

---

<sup>①</sup> 《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54页。

的建筑成功，它代表着千百万人民对于为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忠勇牺牲的烈士无限的追念和崇高的表彰。这是烈士们的无上光荣，同时它将更加深切的感召广大优秀的儿女，使其更加坚定团结，英勇地向着民族和人民的敌人继续战斗，一直把敌人完全粉碎为止。”

二月九日，总前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决定渡江作战时间、地点、部署、准备及支援前线工作等问题。会后，全军进入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渡江演练和各种物资器材的准备工作。同时，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整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由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组成“二野前委”，张际春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会后，张际春全力投入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他组织政治部的人员分路下部队，与各级军政人员一起，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和军事演练。这时，部队驻地“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四月二十日晚和二十一日凌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拟定的《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同时在指定的地点，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迅速突破敌军江防，于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 （七）

南京解放后，张际春兼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除了繁忙的部队政治工作外，还以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对当时南京文



化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混乱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和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二野”与“三野”共同完成渡江作战任务后，“二野”承担进军西南的作战任务。七月十八日，“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进军西南的兵力部署以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问题。会上，张际春就如何加强部队进军西南的政治工作讲了话。会后，张际春组织野战军政治部各部门，帮助和指导各部队召开党代表会议，贯彻前委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各部队通过党的代表会议，表扬了好的单位和个人，批评了居功骄傲和缺乏整体观念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大大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提高了部队特别是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加强了部队进军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信心和决心。进军途中，张际春又领导部队对人员、马匹的健康情况进行了普查，进行了乘车坐船和预防疾病的教育，并以支部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开展了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所有这些，都为完成解放和建设西南的任务，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西南解放后，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组成了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二、三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以刘伯承为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西南军区。张际春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管理部部长以及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副书记，还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

这时，张际春的任务更加繁重了。首先是接管和改造重庆市。重庆曾是国民党的“陪都”，情况极其复杂，社会秩序异

常混乱；广大人民因国民党长期统治，生活极端困苦，大批失业人员需要安置就业；充斥街头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需要收容改造，大量旧政权人员需要包下来进行教育和使用；外国机构和外国侨民需要审慎地区别对待；工厂、商店需要恢复生产和营业……真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张际春在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镇压反革命活动，打击外国不法分子的挑衅，很快建立了革命秩序。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有条不紊地接管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为改造和建设重庆市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张际春仍以极大的精力参加西南局的工作。他除参加会议外，每天要处理大批的函电和公文。这些函电、公文中，有许多带有相当的急迫性，他以高度的责任感、顽强的毅力和很高的工作效率，及时和妥善地加以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是彻夜不眠。他习惯于自己动手，许多重要的总结和报告，都亲自草拟。一九五〇年，经他起草、邓小平签发的西南局给中央的一个综合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除党政工作外，张际春对军区的工作也不稍放松。他参与了进军西藏和剿匪等各次战役、战斗的决策；指挥部队搞好接管城市，开辟农村，协助地方党政搞好政权建设，清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

当时部队中有人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他们向往大城市，不愿驻乡村，更不愿继续进行艰苦复杂的斗争。刘伯承、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发出了《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及时给部队敲响了警

钟。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又联名写信给各军政首长及政治部，指出：“高级干部起来一致警惕，才是消灭骄傲横蛮、违犯纪律、严重脱离群众现象的基本环节。”<sup>①</sup>他们要求各级首长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做出表率，并表扬奖励了大批保持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人员，坚决处理了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包括个别高级干部。张际春作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干部管理部部长，对地方和军队的某些干部问题，都作了审慎严肃的处理。新解放区的人民对于我党我军严明的纪律，莫不拍手称颂。与此同时，张际春还按照西南局的指示，组织排演了历史剧《闯王进京》，对地方和军队干部进行预防“糖弹”袭击的教育。这样，地方和军队都克服了开始滋长的不健康思想，保持了优良传统和作风，胜利地进行了巩固和建设大西南的艰巨任务。张际春“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sup>②</sup>

## (八)

一九五四年初，张际春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同时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一九五六年，他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前后，他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际春进京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向毛泽东表

---

<sup>①</sup>引自《刘伯承军事生涯》第294页。

<sup>②</sup>《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示：我多年作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泽东亲切地勉励他说：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工作中来嘛！<sup>①</sup>

张际春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努力熟悉和掌握宣传教育工作业务。他常到大、中、小学作调查研究，并以报告和写文章的形式，推动党的宣传、文教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他在一九六〇年写的《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一文中，阐述了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必要性及其途径，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度发展，迫切要求加速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速发展教育。”“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三者是紧密结合着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发展现代科学文化。”因此，“应该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普及全民教育，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并尽快地培养出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攻克科学技术堡垒，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他指出，发展教育事业的途径，应该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中央全面规划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下，实行国家办学和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军队、人民公社、城市街道办学并举，全日制、半日制和业余教育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学校教育 with 自学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他强调，保证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解决师资问

---

<sup>①</sup>宋任穷：《深切怀念张际春同志》，197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题”。而解决师资问题也要两条腿走路：要培养新师资，也要提高现有的师资；要长期培养，也要短期训练；要多办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也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能者为师，就地取材；要办全日制、半日制师范，也要办业余师范；要增加专职教师，也要扩大兼职教师。同时，要“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sup>①</sup>

张际春很重视毛泽东关于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他主张研究和整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收集中医偏方，总结经验，以便更有力地发展祖国的新医学和新药学。

党对张际春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sup>②</sup>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六月，张际春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林彪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时，他说：“不能说‘顶峰’，‘顶峰’就是到顶了，不能再发展了，这并不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sup>③</sup>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发现江青的私党戚本禹混水摸鱼，反对周恩来总理，就及时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揭露，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但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因此对他不满，加上他的夫人、老红军战士罗屏议论过江青的丑事，

---

①载《红旗》1960年第3期。

②《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③高成林、周锁洪：《学习张际春同志的革命精神》，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江青等对他们就更加仇恨，蓄意加以陷害，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斗争张际春，诬陷他是“黑帮”、“活阎王”、“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那天夜晚，张际春回到家里气愤地说：“我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顶住！”<sup>①</sup>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

在“四人帮”接二连三地迫害打击下，罗屏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清晨，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张际春忍痛代他的孩子们写了一幅挽联：“革命的女红军战士，革命的妈妈安息吧。”罗屏本来是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但“四人帮”却造谣说“罗屏是自杀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周恩来在接见“文办”负责人时，很关心地询问了罗屏去世的情况，并且批评说：“罗屏同志去世了，‘文办’为什么不写报告？她是病故的，有人却说是自杀的，你们回去写个报告给我。”

张际春在人民大会堂被批斗后，毛泽东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曾明确指示：“不要老揪住不放！”可是，“四人帮”却继续对他进行迫害。张际春身处逆境，坚强不屈。“四人帮”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来教育工作的成绩，硬要他承认“文办”试办的北京市丰盛学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样板”。他坚决驳斥说：“这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好学生，不能说是‘黑样板’”。“四人帮”攻击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他针锋相对地说：“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嘛，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苗子’呢！”他还说：“办学校除了要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外，还要传授人

---

<sup>①</sup>高成林、周锁洪：《学习张际春同志的革命精神》。

类长期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说一强调文化学习就是智育第一。”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江青接见广州“造反派”代表时，以突然袭击的手段，点了陶铸的名，并进行恶毒的诬蔑和陷害。张际春拿到传单后，义愤填膺地说：“陶铸同志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江青有什么权力随便点名打倒？党内怎么能这么干？”

由于张际春不肯屈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他恨之入骨，进而株连他的子女，迫害他的全家。一九六七年初，康生在中央党校煽风点火，说：张际春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际春的女儿在党校，他们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要注意他们的动向。从此，张际春被诬陷为“反革命”，子女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人担心他的安全，把他身边的一瓶安眠药收了起来。他发现后严肃地说：“请放心，我不是那种人，对党对人民要负责任，困难是暂时的，我还是要革命的。”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张际春对党对革命的前途仍然充满着信心。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摧残，张际春的身体受到极大损伤。他年近七十，无人照料，要自己到粮店买粮，自己生炉子做饭，还要挤公共汽车去接受批斗。一天，他被人从电车上挤下来摔伤，从此身体日益衰弱。一九六八年九月初，他身患重病，得不到及时诊治，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九月十二日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召开了追悼会，为张际春平反昭雪。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韦国清致悼词，赞扬他的一生，“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决不留情，对同志坚持团结”，“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

荣的一生”<sup>①</sup>。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张际春简历》（1945年5月24日），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 《干部履历表》（1953年），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3. 张际春：《伟大的启蒙和教诲》，载湖南“三师”1964年六十年校庆专刊。
4. 《张际春简历》（1968年5月），存本文作者处。
5. 《张际春部分简历的补充》（1968年8月21日），存本文作者处。
6. 中共中央：《张际春同志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7. 张南生：《遵义会议的光芒》，1975年10月17日《北京日报》。
8. 宋任穷：《深切怀念张际春同志》，197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9. 李卓然：《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纪念张际春同志》，197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10. 陈鹤桥：《一个高尚而纯粹的人——怀念张际春同志》，1978年11月24日《解放军报》。
11. 陈鹤桥、陈斐琴：《张际春同志在大别山》，《刘邓大军南征记》第217页。
12. 《刘伯承军事文集》第8卷（专册附录）——《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解放战争部分），《刘伯承军事文集》编纂组1979年编印。
13. 高成林、周锁洪：《学习张际春同志的革命精神》，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14. 访问何长工、宋任穷、张子意、李达、陈鹤桥等的记录。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 马 林

刘 景 泉

马林（Hendricus—Sneevliet）出生于荷兰，曾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来中国，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对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

## （一）

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一八八三年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渐明革命道理，开始从事荷兰工人运动。一九〇〇年，在荷兰铁路部门工会工作，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一九〇二年，斯内夫利特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三年，他被派到荷兰的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在三宝瓏的一家贸易公司里担任书记。爪哇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爪哇的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到城里寻找生路，多数到糖厂做工；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平均每天收入不到半个弗罗林；工农生活都极端困苦。一九一四年，斯内夫利特等帮助当地工人创立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依靠这个组织，领导爪哇的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内夫利特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九

一五年，他创办了荷文的《自由呼声报》；一九一八年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这两份报纸都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

当时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是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在一起的性质，曾不断地同糖厂的欧洲人老板作过斗争。这个群众组织中的左翼，集中在三宝瓏。斯内夫利特于一九一六年促成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可以不放弃自己的党员身分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伊斯兰教联盟成员也可以保留他们的盟籍进入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的合作，使印尼民族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斯内夫利特的革命活动，引起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注意，一九一八年，爪哇当局将他驱逐出境。

一九二〇年七月，斯内夫利特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接受共产国际的邀请，用马林的名字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列宁亲自担任，成员中还有印度的罗易等人。斯内夫利特担任秘书，并参与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的《补充提纲》的讨论。他介绍了在印尼工作的经验，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重视。列宁将这种“土著的民族主义联盟”的建立和发展，看作是当时印尼民族民主运动不可遏止地增长的标志<sup>①</sup>。在共产国际的这次代

---

<sup>①</sup> 《亚洲底觉醒》，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9月版。

表大会上，斯内夫利特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同时担任了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推荐，派他来中国帮助建党等工作。

斯内夫利特的化名很多，主要有：马林（Maring）、马灵（Mar ling）、马伦（Mareng）、孙铎（Sun-tó）、倪恭卿（Gni Kong-Ching）、西蒙博士（Dr.Simon）、菲利普先生（Mr.Philip）、布罗维尔（Brouwer）、安得烈森（Andresen）、乐文松（Joh Van Son）等等，在中国期间常用的化名是马林和孙铎）。

## （二）

一九二〇年八月，共产国际正式委派马林来华。同年九月，他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问题之后，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动身，取道欧洲，于六月间到达上海。这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济南、武汉等地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准备。马林来华以后，到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并和北京的党员见面。马林向他们建议，应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的党员都表示同意。之后，马林又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尼可洛斯基一起，由张国焘陪同去上海，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他同在广州的陈独秀也进行了联系，并向李达等提出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在马林的帮助下，上海组发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出席了会议。他首先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sup>①</sup>。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还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sup>②</sup>。马林的报告受到与会代表们的欢迎。据参加“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他（指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sup>③</sup>。

七月三十日晚上，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但宣布开会以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

---

①③包惠僧：《回忆马林》，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又见李达：《“七一”回忆》见《七一》创刊号，1958年7月1日。

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sup>①</sup>。

马林认为，“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堪注意的一种现状，就是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一种有规则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宣传”<sup>②</sup>。“如果中国人民群众没有受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中国民族就决不能成一种势力”<sup>③</sup>。因此他在华期间，曾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他曾担任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马林工作认真负责，《向导》周刊上发表的每篇文章，都要中国同志翻译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求改正。他不但负责编辑，而且亲自动笔，撰写了许多文章，署名孙铎，发表在《向导》、《前锋》等刊物上。这些文章中，有宣传十月革命的《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新俄罗斯》；有号召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二次的世界战争》、《土匪和外交使团》、《美国与日俄会议》、《他们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有揭露中国军阀反动本质的《吴佩孚和陈炯明》、《吴佩孚与国民党》；有指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北京政变与上海工作之主张》；有强调宣传工作的《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有评论国民运动和国民党政策的《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等等。马林的文章，论述生动，短小精悍，说理充分，很有说服力和战斗力。例如，他在指斥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文章中激愤地说：

---

①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②《国民运动过去及将来》，《向导》第9期。

③《中国国民运动过去及将来》，《前锋》创刊号。

“现全国人民生活中，无处不看见外国的势力。真诚的国民运动者如何能忽略这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受害者”<sup>①</sup>。他告诫国内一些人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指出：“要想列强愿停止他们干预中国事务，要想他们能骤然完结帮助中国军阀中这个或那个的旧方法，这自然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sup>②</sup>。他认为中国人民只有起来“反对外国的宰制中国”；“把国内各种人民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各国”<sup>③</sup>。

马林还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十月革命，宣传苏维埃社会主义。他指出：“俄国革命是近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并且是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步骤，如果社会主义的社会成功了，什么种族不平等，少数人剥削群众的事，贫困与战争等等都是会消灭的”<sup>④</sup>。马林认为苏俄是各国劳动人民进行民族运动的最好的盟友，鼓吹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他说：被征服民族“要和苏俄携手，和俄国红党结密切的关系，这是巩固他们国内民族运动的唯一的道路”<sup>⑤</sup>。他还说：“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必须与新俄国发生密切的协助和亲善关系，才能使解放和独立的奋斗得到一些光荣的胜利”<sup>⑥</sup>。马林的这些论述，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林富有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并积极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林即建议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

---

① 《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

②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向导》第29期。

③ 《第二次的世界战争》，《向导》第25期。

④⑤ 《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向导》第8期。

⑥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前锋》创刊号。

运动。党接受了这一建议，遂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在上海成立了领导我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又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作为领导各地工人运动的机关。马林还多次去各地实地考查工人运动，并给予正确的引导。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工人举行了反抗英帝国主义压迫的大罢工。到一月底，罢工的规模扩大到三万余人。经过五十六天的激烈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马林密切注意这次罢工的进程，认为“这次争取提高工资的海员大罢工，矛头指向外国航运公司，具有政治色彩”<sup>①</sup>。他热情地赞扬这次罢工，“使无论哪个关心于劳动运动发展的人都惊骇不已”<sup>②</sup>。

马林在我国北方考查时，曾经不顾环境的险恶，深入社会底层，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有一次，他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时，一个人问他：“革命的主要目的何在？”他回答说：“首在争取政治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那个人又问他：“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林回答说：“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sup>③</sup>。语言简明有力，坚定果断，给予参加会议的工人以极深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爆发了开滦煤矿同盟罢工。马林曾亲自去天津，和领导罢工的同志见面，反复商讨罢工中的有关问题<sup>④</sup>。

---

①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②《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向导》第11期。

③④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以后，党内曾有不同认识。为了统一和提高大家的思想，马林在传达共产国际文件时，对“二七”罢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汉口足以证明中国的劳动界已感触了一种新的精神”<sup>①</sup>。他的话，使大家深受启迪。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马林断言：“我国近代产业的工人已经醒了”。“他们已感触到阶级意识了。劳动者已在中国社会上成为一种新势力，在将来一定会站在极重要的地位，不特在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而且在政治上将有极大的势力”<sup>②</sup>。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证实了马林的判断。

### (三)

马林遵循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依据他在印尼取得成功的经验，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九二〇年六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亲密的联盟；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的组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同他们“混为一体”，必须保持无

---

<sup>①②</sup> 《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向导》第11期。



产阶级的独立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sup>①</sup>。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林便致力于谋求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想通过这种联合，促使革命更快地向前发展。经过一番考查之后，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即国共合作必须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联合的形式完成。马林提出：“我认为，这条途径不仅以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和大会上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sup>②</sup>。

建立无产阶级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统一战线，首先要解决的是统战目标的选择问题。马林不同意共产国际远东局有些人主张联合吴佩孚或陈炯明的意见，坚持在华的统战目标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早在马林来华以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人员在中国寻求建立统一战线途径的过程中，几乎在同一时期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等人都有接触，并且对吴佩孚、陈炯明更有好感，认为吴佩孚和陈炯明都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甚至都“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sup>③</sup>。一九二〇

---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

②③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年四月，维经斯基来华，在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以后，一度曾“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sup>①</sup>。与此同时，苏俄《消息报》也有文章称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正在发展的局势中树起了新的旗帜”，因此“对吴佩孚寄予殷切的希望”<sup>②</sup>。此外，苏俄政府曾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派路博将军携带列宁的亲笔信到粤军驻地漳州，访问广东军阀陈炯明，表示苏俄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陈炯明“并有书致列宁”<sup>③</sup>。一九二一年底，维经斯基又曾在南宁和陈炯明“长谈过三次”，说陈炯明完全支持俄国革命<sup>④</sup>。当时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出版的刊物甚至称赞说：“陈炯明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位革命的将军，而且是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并受到群众的拥护”<sup>⑤</sup>。

对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上述意见和作法，马林在来华调查以后，坚决表示反对。他说：“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倾向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sup>⑥</sup>。同时，马林还指责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局限于广东<sup>⑦</sup>，因此不能作为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

---

①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载《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②1920年10月9日《消息报》。

③陈其尤：《一九一九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④《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⑤《1917—1924年苏联对中国的政策》，转引自1981年第2期《历史研究》。

⑥⑦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战对象。

要联合国民党，就必须同孙中山接触。马林是通过张继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一九二一年下半年，马林在上海会见了他认为“孙中山的最主要代表之一的张继”，并谈到“他（张继）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且有更多的西方观点”。他还说：“由于张继的联系，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sup>①</sup>。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任翻译）的陪同下，在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下的旧桂王府设立了大本营，正在进行整军和练兵，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马林等人到达桂林以后，在孙中山的大本营中住了九天，双方进行了多次深入的长谈，着重讨论了国共两党结盟的可能性以及“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问题。马林提出了下列意见：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立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础；三、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会谈中，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sup>②</sup>。孙中山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到兴趣。当他听说苏俄所采取的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时，他感到高兴<sup>③</sup>。孙中山向马林表示，他虽然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

---

①②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③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一致的。他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同时迫切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又担心与苏俄公开接近会引起列强的干涉，所以暂时还不能公开同苏俄结盟。他主张“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联公开建立联盟”<sup>①</sup>。孙中山还告诉马林，他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考察；对于马林提出的其它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等，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立即实行。

随后，马林到广州考察，适值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他看到孙中山同工人运动有较密切的联系，认为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不可少的人”<sup>②</sup>。

马林结束了南方之行以后，前往北京同苏俄派来的裴克斯使团会面。他向裴克斯送交了两份报告，请他转往莫斯科。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要谈国共合作；另一份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要求苏俄政府派使团前来帮助孙中山的南方政府<sup>③</sup>。

马林的这些活动和他提请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放弃联合吴佩孚、陈炯明，而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主张，给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了生机。它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加快了同孙中山联盟的步伐。一九二二年四月，裴克斯在北京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联系孙中山，了解孙中山的态度和国民党的

---

①《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②包惠僧：《回忆马林》，载《包惠僧回忆录》。

③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一般情况，并发给他代表苏俄政府的证书。达林返回上海以后，在瞿秋白、张太雷的陪同下，去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交往密切，先后接触达五、六次之多<sup>①</sup>。孙中山被确定为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联盟者以后，国共合作也进一步提上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面的议事日程。

关于国共两党怎样进行合作的问题，马林基于他在爪哇的经验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提出宜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来完成。

马林确认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他认为国民党由这样四类成员组成：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多数领导人是在日本或法国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移居国外的人，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南方军队的士兵；工人<sup>②</sup>。马林从此得出结论：“该党（国民党）的纲领使这些不同的派别有可能加入该党”。一九二一年底至一九二二年四月，马林对中国的南方进行考察时，同国共两党领导人分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认为国民党领导人“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sup>③</sup>。香港海员“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sup>④</sup>。马林还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

---

①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

②③《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④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比印尼的伊斯兰教联盟要高明的多。他盛赞孙中山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马林看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合作的真正的革命势力，他提出：“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sup>①</sup>。

对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早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陈独秀就曾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明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并陈述了如下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的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除广东以外，全国仍视它为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甚烈，中共若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故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孙中山不能容纳新加入者的意见和假以权柄；六、各地区共产党员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sup>②</sup>。这样，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马林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而马林一时又不能说服中共领导人接受他的意见，只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希望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来说服中共。

---

①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马林于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旬到达莫斯科以后，七月十一日起草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他指出，现在是外国列强控制着中国政治。由于华北华中一带为军阀所统治，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和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马林认为，国民党就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所以，他进一步向共产国际领导详细地陈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共产国际经过研究，迅速地采纳了马林的意见。同时决定，由马林负责贯彻执行<sup>①</sup>。同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菲立浦（即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的指示<sup>②</sup>。八月，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专门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要求尽快实行国共两党的合作<sup>③</sup>。

八月，马林同苏俄特使越飞一起回到北京。当时共产国际的意图是，为了迅速扩大东方战线，迫切需要联合孙中山以反对北京政府，而实现这一意图的前提便是中国国内实现国共合作。由于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联合的形式，因此就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克服意见分歧。为此，在马林的提议下，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再次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意见。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多数人接受

---

①刘仁静：《我记忆中的马林》，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②③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了马林的提议。十一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sup>①</sup>。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定公布于世。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旬，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反叛而避居上海。八月二十五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里再次会见孙中山，向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并邀请孙中山访问莫斯科。孙中山也表示极其需要同苏俄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次会见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孙中山积极着手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的步伐，扩大国共合作的规模，一九二三年一月，马林再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并分别向斯大林等领导人汇报。共产国际领导人同意马林反对军阀的政策，并且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的进程，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又于一月十二日专门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所以，共产国际执

---

<sup>①</sup>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德文本），汉堡出版社1923年版，芦钊坚据英文件译出，殷叙彝据德文原件校。



委会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sup>①</sup>。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以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马林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大会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很快统一了思想。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议》还强调：“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sup>②</sup>。

党的“三大”以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成。

实践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曾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马林在华工作了将近三年。在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宣传马

---

<sup>①②</sup>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指导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等诸方面的工作中，都作出了贡献。当然，他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例如，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给中国革命也曾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是，马林帮助中国革命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 （四）

一九二三年十月，马林回莫斯科，被派往海参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并于同年内再次访问了中国。

一九二四年初，马林被调回到莫斯科。同年四月，因与东方部意见分歧，辞职返回荷兰，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组织革命工作联合会，还曾经担任码头工会的秘书。马林虽然被调离中国，仍然非常关心中国革命。他曾经出席国际运输会议，向与会的中国同志谈到：“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sup>①</sup>。一九二八年，马林在莫斯科拜会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谈到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他感慨万端。临别时中肯地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sup>②</sup>。

---

<sup>①②</sup>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一九二六年夏天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此时，马林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感到自己日益同情托洛茨基反对派，终于在一九二七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离开苏联到达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以后，马林在荷兰成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从一九三三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马林是这个党在荷兰国会中唯一的代表。但是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却拒绝参加。一九四〇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马林积极参加了荷兰的反法西斯斗争，并负责编辑秘密的抗战报纸《斯巴达克》，鼓动人民起来战斗。后来被德寇逮捕，判处死刑，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被杀害，终年五十三岁。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44

---

定 价： 1.75 元